

中国抗日
战争史丛书

北京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日本人民的 反战斗争

日本人民的 反战斗争

孙金科 著
北京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孙金科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ISBN 7-200-02775-8

I. 日… II. 孙… III.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1937~1945
N. 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1787 号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RIBEN RENMIN DE FANZHAN DOUZHENG

孙金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346000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200-02775-8

K·294 定价:17.00元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刘大年

执行主任：白介夫

委员：(按姓氏笔画)

丁守和	马齐彬	王 淇
王庆成	王桢林	刘建业
齐世荣	齐密云	李 侃
李世凯	李良志	何 理
吴坤定	杨 策	肖一平
张注洪	张宪文	张海鹏
张承钧	金冲及	罗焕章
温贤美	戴 逸	

总序

刘大年

中国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起，今年正逢 50 周年。50 年前的 1945 年，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值得隆重纪念。中国学术界出版了和正在出版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来纪念那个历史上的峥嵘岁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是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它的水平未必尽能让读者满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学术界为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所作的一次努力。

人们认识历史有和旅行者观览名山大岳相像的地方。旅行者在山间辛苦跋涉，沿途奇峰陡壁，茂树丰泉，天险胜地，历历在目；但往往要走出山脚以后回头望去，方能见出它的逶迤势态，灵气所在。抗日战争结束 50 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回头来认识那段转换祖国命运的历史，显然要比以往的认识深刻许多，丰富许多。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改变了

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又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这个基本条件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蒋介石就只会“攘外必先安内”的道路上走下去；或者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那是一个大问号。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结局，就会充分明了这一点。从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方面看，人民力量兴起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民族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支配全局的矛盾。武装到牙齿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情况一天存在，这个主要矛盾就要一天存在。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它们一起把中国拖进了濒临灭亡的境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紧密相连。前一个

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走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或者左右战后中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不久，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这个历史的转折，这个力量准备所造成的。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第一，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中国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复兴。用一句话来说：中国复兴枢纽——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国近代有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抗日战争这样的规模、性质、结局的战争确实为洪荒所未有。是哪个力量决定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铸造出中国复兴枢纽的？那就是我们全民族的奋起，就是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力量满负荷的发挥，砥柱中流。抗战八年的前四年，中国是单独对日作战的。其时苏美两大国都没有卷进到战争里面。英美与日本有矛盾，也有准备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的举动。苏联同情中国，但担心日本北进，苏德战前，苏联与日本订有为期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与日本全力抗衡的，这时举世唯有中国。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由此不再单独对日作战，而是与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于是就变成了在盟国支持、协同下，共同对日胜利的结局。这是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规定的。不但中国抗战的面貌顿然刷新，世界的面貌也一下子刷新了。然而这并非中国抗战取胜的特点，而是反法西斯各国取胜的共同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是一个整体，最后一败俱败，一胜俱胜。同盟国间的支持是相互的，双向的，

而非某种单行道。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的胜利。中国抗击的日本兵力最多。按日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90%，最少的一年占35%，八年中平均每年占76.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数目最大。“九·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287.4万人。其中89万余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198.4万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死亡2000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整个二次大战中，英国武装部队、本土加殖民地人民共死亡80万几千人，美国海陆空军死亡共32万余人，其中仅一部分是牺牲于对日作战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其武装力量、边防军和内卫部队共牺牲866.84万人，死于对日作战的也只有3万余人。中国抗日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1.7亿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460亿美元，援助中国的不过6.3亿美元，不足七十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日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力量，仍然需要有美英联军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冲绳岛，仍需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谁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英美并非单独对德对日作战取胜的，其历史重要性就减少了，地位就改变了。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战场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抗战期间流行一句话：兵民乃胜利之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国人民力量兴起壮大，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本。中国由衰败向复兴转换，就是靠的这个本。

自从新中国迈上征途的第一天起，中国复兴的鸿篇巨制联绵不绝于书，尽管其间也有挫折和失败。现在，抗日战争过去了50年，中国人民正旅行在一座新的大山上。这座大山高耸霄汉，它不叫别的什么，叫做中国的现代化。和一切历史性的旅程一样，人们在当前这个旅程中，不可能一路尽是春日载阳，百花齐放，群莺纷飞，也难以避免要经历悬崖栈道、崎岖羊肠，或者碰上寒冬腊月，大雪狂舞。增进对抗战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爱国精神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国人民敢于反抗强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旅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总会这样那样作用于现实，无论现在、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珍惜这个光荣，发扬这个光荣。

就像历史本身永无穷期一样，人们认识历史至少一些方面也无穷期，以至终究要遗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只会促使有志者去勇于探索、发现真理，而不会裹足不前。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毕竟有所前进了，那场伟大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也参与改变了世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谨请以这部《丛书》献给所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人、爱国者、战士和所有先烈。

1995年2月11日

序 言

杨正光

中日两国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历史，尽管近百年来的一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疯狂侵华，但爱好和平的中日两国人民始终是友好的。不少日本友好人士为了反对本国反动统治者发动的侵华战争，坚持中日友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日本帝国主义长达 15 年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将日本人民置于苦难的境地。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抗击、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人民长期不屈不挠的顽强抵制。这就是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为第一时期。在这个时期中，1931 年到 1935 年是日本人民反战活动向上发展的阶段。在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下，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从 1935 年到 1937 年，是日本人民建设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阶段。这个时期，也可称为

以日本国内人民反战活动为主的时期。

第二时期，从1937年到1945年，是日本国内政治最黑暗的时期。由于日本政府从1928年起，不断疯狂地实行法西斯的镇压，使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活动，从1935年开始，逐步转入地下。从1939年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逐步开展了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特别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战活动在日共代表野坂参三精心指导下，逐步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华南，在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在中国开展的时期。

在华日人反战活动的队伍，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他们绝大多数是原日本军人，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他们进行的反战活动，成了瓦解日军的一支不可代替的重要力量。同时，它的正义行动，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共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它不仅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政策，而且直接投入反侵略的战斗；第二，它一开始就受到日本军部的镇压和破坏，这个运动自始至终贯彻着镇压与反镇压、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第三，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始终和反法西斯斗争结合在一起；第四，日本共产党在反战运动中，起了指导、组织作用；第五，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力协助下，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斗士，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巨大的、富有战斗力的集团，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翻阅这本由作者用三十多年心血凝成的著作时，一定会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日本人民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创的、国际上少有的对日军的俘虏政策和国际统一战线，促进了中日人民友好合作事业的进一步加强，促成中日人民战胜了他

们的共同敌人。

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史上一束瑰丽的奇葩，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令人赞佩的奇迹，更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日本战俘政策的胜利成果。它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残酷杀害中国战俘和虐杀、迫害中国劳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也是教育两国人民和青年正确认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好教材，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日人民的友好合作事业，在 21 世纪定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 目 录

序言 杨正光 (1)

第一编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 人民的反战斗争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2)

第二章 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斗争..... (7)

第三章 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 (15)

本编小结..... (20)

第二编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 和反战活动的开展

第一章 日本政府统治下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 (22)

第一节 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活动..... (22)

第二节 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 (26)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 (31)

第三章 觉醒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38)

第一节 觉醒联盟的成立..... (38)

第二节 太行支部的成立..... (43)

第三节 冀南支部的成立..... (47)

第四节 冀鲁豫支部的成立..... (50)

第五节 山东支部、太岳支部的成立..... (55)

第四章 国统区日人反战活动的发展 ·····	(56)
第一节 在桂林筹建反战同盟·····	(56)
第二节 国统区反战同盟准备会的成立·····	(67)
第三节 桂林西南支部的建立·····	(73)
第四节 工作队在桂南前线·····	(83)
第五节 三位队员的壮烈牺牲·····	(87)
第五章 重庆反战同盟总部的成立 ·····	(93)
第一节 反战同盟总部的成立·····	(93)
第二节 工作队去宜昌·····	(102)
第三节 工作队在宜昌前线·····	(108)
第六章 解散反战同盟 ·····	(124)
第一节 国民党特务的幕后指挥·····	(124)
第二节 解散反战同盟的命令·····	(133)
第七章 华北日人反战同盟工作的开展 ·····	(143)
第一节 延安支部的成立·····	(143)
第二节 冀中支部的成立·····	(150)
第三节 晋察冀支部的成立·····	(155)
第四节 山东支部的成立·····	(158)
第八章 华中日人反战同盟工作的开展 ·····	(160)
第九章 日本工农学校的初期工作 ·····	(165)
第一节 日本工农学校的成立·····	(165)
第二节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	(177)
第三节 学员的工作和活动·····	(188)
第十章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发展 ·····	(205)
本编小结 ·····	(211)

第三编 反战组织的统一和 反战运动的活跃

第一章 日本国内人民反战活动的继续 ·····	(214)
第二章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 ·····	(221)
第一节 大会的召开·····	(221)
第二节 编写《日本士兵要求书》的基本方针·····	(225)
第三节 《日本士兵要求书》·····	(229)
第三章 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 ·····	(247)
第一节 大会的召开·····	(247)
第二节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	(253)
第三节 对日本侨民工作的加强·····	(271)
第四章 日本工农学校的发展 ·····	(275)
第一节 学校成了反战运动的基地·····	(275)
第二节 学员的生产劳动、政治活动·····	(279)
第三节 晋西北分校的成立·····	(284)
第五章 华北敌后反战运动的深入 ·····	(287)
第一节 晋察冀支部的十期政治攻势·····	(287)
第二节 晋冀鲁豫分会的成立·····	(289)
第三节 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各支部的 反战成就·····	(291)
第四节 晋西北支部的成果·····	(299)
第五节 山东支部的反战硕果·····	(300)
第六章 华中反战运动的深入发展 ·····	(307)
第七章 重压下的国统区日人的反战活动 ·····	(314)
第一节 鹿地研究室的工作·····	(314)
第二节 盟员们在镇远收容所·····	(320)

第三节 鹿地亘在镇远收容所·····	(327)
本编小结·····	(333)

第四编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建立 和反战运动的胜利结束

第一章 日本政府统治下人民反战运动的蔓延 ·····	(336)
第二章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的召开 ·····	(341)
第三章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	(352)
第一节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	(352)
第二节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	(353)
第三节 解放联盟组织的发展·····	(356)
第四章 解放区日人反战运动的高涨 ·····	(358)
第一节 联盟盟员参加整风学习·····	(358)
第二节 各支部的反战斗争·····	(359)
第五章 日本工农学校的巨大成就 ·····	(366)
第一节 各方面的工作成就·····	(366)
第二节 山东分校、华中分校的成立和成绩·····	(372)
第三节 毕业学员在前线·····	(376)
第六章 国统区反战斗争的曙光 ·····	(388)
第一节 为日本的和平民主运动努力工作·····	(388)
第二节 在鹿角场收容所·····	(395)
第三节 请求盟国支援·····	(397)
第七章 绿川英子的反战活动 ·····	(400)
第一节 一位进步的世界语者·····	(400)
第二节 在被侵略的国家——中国上海·····	(402)
第三节 在东方的马德里——汉口·····	(405)
第四节 在抗日的雾都——重庆·····	(407)

第五节	在战火中的东北·····	(416)
第八章	日本投降后盟员的工作和回到祖国·····	(419)
第一节	协助劝降、受降工作·····	(419)
第二节	日本反战友人先后回国·····	(430)
第九章	国统区盟员的斗争和回国·····	(432)
第一节	国民党妄图战后利用鹿地亘等反战人士·····	(432)
第二节	毛泽东会见鹿地亘夫妇·····	(433)
第三节	盟员们回国·····	(435)
本编小结	·····	(441)
本书结束语	·····	(443)
附录		
日本人民反战斗争大事记·····		(447)
后记	·····	(458)

第一编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 人民的反战斗争

(1931年9月—1937年6月)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波及全世界，给持续萧条的日本经济以更加惨重的打击。日本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1931年与1929年相比，进口减少了44%，出口减少了46.6%。工业生产剧减，1931年比1929年，工业品总产量减少了33%。价格暴跌，1930年10月比1929年4月，生丝价格下跌了60%。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1932年几达49万人，连同半失业者，共有300万人，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

危机对日本农村的打击，更加沉重。1930年农业丰收，但价格猛跌，使广大农民陷入饥饿深渊。北海道因霜冻歉收，农民以草根为食，甚至廉价出卖青少年妇女。

深刻的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社会的阶级矛盾，工农革命运动日趋高涨。1927年，工人罢工383次，参加人数46600多人；1936年，罢工人数增加到1945次，参加人数达42万多人。农村中反抗地主剥削的租佃纠纷，1929年有2430起，1935年增加到6800起。在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党派、组织影响下，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等纷纷组织工会、佃农协会、民主团体，起来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军部的反动统治。

面临全面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阶级急于进一步对外侵略，更多地攫取殖民地，以求摆脱困境。1927年，日本统治者就在其制订的《对华政策纲领》中，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对外侵略基地的全球战略，主张“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统治者把这种主张，贯彻于行动。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地区。1930年中国东北有外国人113万，除80万朝鲜人外，日本人竟占27万人。这一年，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总值共4.62亿海关两，其中对日本的贸易，就占2.27亿海关两，为总值的49%；东北地区外国投资共合20.63亿日元，其中日资就达15.11亿日元，占73%，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一半左右。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全国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加以日本关东军于1928年炸死张作霖，使张学良与日本的矛盾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大力抵制日货，使日本对华输出猛减，“满铁”^①利润下降。日本统治者为扩大其侵略权益，决心通过战争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

为了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政府实施了军需通货膨胀政策。从1931—1936年的六年时间里，日本政府的年开支总额从14.77亿日元，增到22.82亿日元，增加了50%左右。其中军事开支竟从4.61亿日元，猛增到10.89亿日元，增长了一倍多。

这样，日本工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得到畸形发展。1928年，重工业、化学工业仅占全部工业产值的

^① 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的机构。

28.9%，1937年竟提高到57.2%。在这六年里，按不变价格计算，食品工业增长了4%，钢铁机械工业却增长约1.46倍，化学工业增长了1.5倍，陆军各种武器弹药的生产，增长了3.93倍，汽车、飞机等的生产，增加得更快。

在经济军事化过程中，日本政府使三井、三菱等老财阀的军事工业扩张倾向大为加强，特别是扶植了一批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干的新财阀，从而使日本的军事装备大幅度地提高。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武器装备，还远远落后于美英等国。六年后，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军队的各类大口径火炮的数量，已十分接近美国和英国。

在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疯狂。他们在文化思想上严酷统治、麻痹人民的同时，制造了一系列暴乱。如1932年12月1日，“血盟团”^①分子刺杀民政党领导人井上准之助。1932年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的陆海军法西斯分子，袭击首相府等地，枪杀了首相犬养毅。“5·15”事件后，军部就反对政党组阁，主张恢复由元老提名，经军部首脑同意、天皇任命来组阁。这样，1924年—1932年的日本政党内阁时期宣告结束，军事法西斯体制在形成中。

1936年2月26日清晨，一千多名日军官兵，在东京发动暴乱，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枪杀。事后虽对少数暴乱者判刑处死，但军部却借此确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的统治。

日本军部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阴谋的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在《回忆录》中

^① 血盟团的盟主是佛教日莲宗僧侣井上日召。他们组织农村青年以及农村出身的下级军官进行疯狂的杀人活动。

写道：“1931年春，关于柳条沟（按：应为柳条湖）事件的大致计划，已经制定。”这份《回忆录》，详细描述了日军上下密谋策划此次事变的内幕^①。1931年，长期热心于对中国侵略的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上任第三天，他就给陆军大臣写信：“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当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按：即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②于是日军于1931年9月18日夜，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我军阵地，强占沈阳。9月24日，几乎占领了辽宁全省。9月21日，占领了吉林省大部分。到1932年1月，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就被牵到台上亮相。1933年2月，日伪又侵占热河省。当然，这种情况，也是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实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

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不同，它遭到了中国人民和十九路军官兵的坚决抵抗。日军屡遭打击，三易战场统帅，兵力逐步增到十万人。中国方面的抗战部队——十九路军、第五路军一部分，不到四万人，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顽强抵抗，使日军寸步难进。但蒋介石政府一意妥协，于1932年5月5日，和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接着，日军的侵略魔爪伸向华北。1933年侵入河北东部、察哈尔东部，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3年5月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于1935年6月10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月27日签订

^① 花谷正：《满洲事变的策划》，见《文献昭和史》之2：《满洲事变和二·二六》，日本平凡社1975年版，第72—91页。

^② 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一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33、34页。

了《秦土协定》。接着日方又导演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事件等。与此同时，关东军加紧入侵内蒙古地区，成立了“蒙古军政府”，企图使内蒙古脱离中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①，加紧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① 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主要内容是以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为借口，相互进一步勾结，准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这个《协定》鼓舞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

第二章

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统治阶级的战争机器，加快了运转。人民被法西斯势力鼓动起来的战争热情，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厌战、怠战，以至反战的情绪。

站在这一斗争前列的，是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从1922年7月诞生之日起，就在其《纲领草案》中提出：“日本应从朝鲜、中国、台湾和库页岛撤出军队”。

1929年1月，日共机关报《赤旗报》发行了小册子——《第56届帝国国会和日本共产党的口号》，指出：“今天我们只呼喊不干涉的口号，已经不够了。因为在这个口号下，同我们的统治阶级进行实际的斗争，必须把‘立即撤出在中国的所有日本军队’的呼声，变成群众的呼声。”^①

1931年7月6日，日共《赤旗报》发表题为《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作斗争》的文章，号召日本人民“不出一分钱的军费！不送一个人去当兵！工人和贫农应当拒绝担负为三井、三

① 《日本共产党六十年》第41页，日共中央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菱、住友等大金融资本家利益进行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一切赋税和兵役。”^①

1931年8月1日，“反战日”那天，日共在各地组织了秘密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军队立即从‘满洲’、朝鲜和台湾撤出”！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9月19日，日共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干涉中国内政：“工人、农民、士兵们！亲爱的同志们！要和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革命斗争！

“立即从奉天以及一切占领地区撤出军队！立即撤回在中国‘满洲’的日本军队的军舰！决不把一个士兵送上前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一切军事行动！同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的危险进行斗争！

“保卫革命的中国！支援红军，保卫苏维埃联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的日本！”^②

9月20日，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宣言》，指出：“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是想把东三省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的直接行动……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暴行，中国与日本的工农是坚决反对的……中、日两国工农民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日本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

1933年5月26日，《赤旗报》的社论《反对掠夺华北，组织群众性的反战活动》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极力发挥反革命宪兵的作用，以求在最后瓜分中国时，得到更多的份额……进一步几十倍、几百倍地扩大正在进行的强盗式的战争，那么，不仅前线

① 易显石：《九·一八事变》第333页。

② 《日本共产党六十年》第48页。

要有几十万、几百万人牺牲，而且在国内被活活饿死和死于恐怖之下的牺牲者，也将不计其数，只有一小撮地主、资本家，靠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这些牺牲，来养肥自己……

“在所有的经营单位和企业、部落立即召开群众性的集会和恳谈会等，通过决议反对占领华北。为了把这一群众性的反战决议发展为强大的群众性行动，要提出同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反战的日常斗争，立即大胆着手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①

特别要提到的是：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始终积极地投身于反战运动。他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召集会议，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日本工人阶级，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片山潜已是77岁高龄的老人，得了重病住进医院。病情好转后，仍在休养中，就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斗争。该年10月1日、5日，他分别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无产阶级》，和《侵略满洲与日本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两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散布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制造借口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日本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与日本法西斯政府作坚决斗争。

在片山潜的不知疲倦的奔走下，1932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战大会。会上建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议1933年在上海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远东反战会议。这个计划发表后，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全国工人协议会和反帝同盟一起，发表了支持上海反战会议的呼吁书，号召各地各单位成立反战委员会，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们，起来进行反战斗争。在片山潜的支持下，1933年，英国

^① 《日本共产党六十年》第66页。

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到达上海。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宋庆龄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努力下，排除了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干扰破坏，在上海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①

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日本国内的反战斗争汹涌澎湃。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大工厂纷纷召开反战代表会议，组织游行示威。仅东京一地参加者就达2500人。农村也开展了反战运动，仅富山县就有六个村单位举行农民反战大会，有的还举行了游行示威。

1928年5月，京都、大阪、名古屋、神户、福冈、奈良等地的劳动群众，在“反对出兵中国”的口号下，结成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同盟，举行了两次“反对出兵周”活动。1932年全国工人协会领导了东京地铁工人要求“改善出征士兵待遇”的罢工，占领工作场所，取得了胜利，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全国农民协会，确定了反战行动纲领，推动广大农民进行反战斗争。富山市郊东北部农民还进行反“献金”运动。有的农村还组织“拿米来”（即要饭吃）、“索夫团”（即要回丈夫）等活动。

1929年到1931年，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黑岛传治先后发表《反战文学论》、《入伍青年应该干什么》等反战文章，号召日本人民变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反对日本军部统治的革命战争。

从1930年前后开始，在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率领下，青年们的反战运动，也迅速兴起。1932年2月9日，东京明治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散发反战传单，高呼“打倒日本军阀！”横滨等地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在上海扩大侵略战争。据

^① 张劲夫：《在和陶夫子相处的日子里》（陶夫子指陶行知），《光明日报》1993年8月29日第3版。

日本宪兵机关的统计，各界人民反战、反军部的斗争，1930年为1398次，1931年为1905次，1932年为2437次。

一些合法的左翼工会组织，也加入了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1933年6月，由关东劳动组合会议提议，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关西地区等地也成立了类似组织。1931年，日本有818个工会，36.9万会员，是日本工人运动在战前的最高峰时期。

农民的租佃纠纷，反抗斗争，也在继续发展。租佃纠纷，1930年有2478件，1936年发展到4000件。

在中间阶层、知识界中，也出现了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火焰。1931年到1932年，长谷川如是闲出版了《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一书。“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全国劳动大众党领导人堺利彦发表声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且领导成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另外，大山郁夫、浅沼稻次郎等，也持这种正义立场。

1932年7月，各无产者团体联合提出要求：释放“三·一五”、“四·一六”事件^①的被捕者，不少进步人士给以支持。

1933年8月，日本作家秋田雨雀、江口涣、长谷川如是闲、藏原惟郭、加藤勘十等一百多人，不怕迫害，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1935年，美浓部达吉教授发表论著，主张天皇是国家机关，遭到起诉，他不屈从权势，捍卫自己的主张，在贵族院答辩两小时，使不少企图加罪于他的人，也受到感动。

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也发出了反战呼声。石桥湛山提出“满蒙放弃论”，批驳了“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谬论，主张与

^① 指1928年3月15日，1929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分子的大逮捕事件。

中国发展和平的经济贸易关系，指出发动侵略战争，与中国为敌，与世界列强为敌，必将重演 1918 年德意志帝国的惨败悲剧。在 1937 年 1 月召开的第 20 次国家议会上，政友会^①代表滨田国松公开指责寺内陆相：“军部干预政治……包揽国政，实际上将流于寡头专制的作风。”^②

1932 年 7 月，日共成立了以风间文吉为首的军事部，负责整个反战兵运工作。同时，建立了关东军事委员会、关西军事委员会、水兵委员会等兵运领导机构。在兵营、舰队中，也建立了各种基层反战组织，展开了反战活动。

1932 年 2 月，日共在吴港地区创办了面向海军水兵的报纸《耸立的桅杆》。在阪口喜一郎等领导人和响应他们号召的水兵们的努力下，《耸立的桅杆》接连发行到第六期（1932 年 10 月）。大量的《耸立的桅杆》和《赤旗报》等，被散发到现役水兵手中。在这前后，吴港海军工厂日共组织发行了报纸《轰鸣的吊车》。

1932 年 7 月 15 日，日共创办了以陆海军士兵为对象的报纸《士兵之友》，并且编印了大量的反战小册子。在反战传单《告各位士兵》中写道：“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已有 4000 名士兵伤亡了。满洲成了日本实实在在的殖民地，谁得了好处？只有资本家和地主们，满洲的煤铁，饱了他们的私囊，成为剥削工农的手段……各位士兵，所谓‘天皇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地主利益而存在。士兵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而在兵营、军舰内像奴隶一样受压迫，像囚徒一样生活；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去镇压国内工农的解放运动，残杀外国的工人、农民；仅仅是为了资本家、地主的利益，把战争

① 全称立宪政友会，日本资产阶级主要政党，代表官僚及财阀的利益。

② 《太平洋战争史》之二，第 47、48 页。

强加于世界工农的希望——苏联红军和革命中国的红军。我们士兵必须弄清楚这些事情，工农是我们的兄弟，是父母。我们是穿军装的工人、农民，我们反对这一切！”这份传单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内战！打倒资产阶级、地主的天皇制！”

在日共引导下，日本士兵纷纷行动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第二师团驻仙台市时，当军国主义者举办演讲会进行战争煽动时，该师团 30 多名士兵喝倒彩，把他们赶下了台。1932 年 5 月，驻公津若松的步兵第 29 联队二等兵金田，不怕受迫害，在兵营中张贴反战传单，当他被逮捕时，身上还有 50 张印有“反对出兵满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内容的传单。据统计，1931 年，在日本军队、军工厂中，曾发生反战事件 126 起；1932 年，增加到 204 起，等等。

日本共产党成立后，就坚持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一直处于非法状态。从 1928 年到 1933 年，经受了五次大逮捕，组织上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疯狂的政治迫害日益加剧，逮捕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从 1928 年到 1933 年，因违反所谓“维持治安法”而被揭发者，共 6900 多人，其中受到起诉者有 4175 人。日本反战民主进步人士几乎都遭到迫害。他们或遭惨杀，或被长期禁闭狱中，或被折磨致死。如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1932 年 10 月被捕，11 月惨死；著名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1933 年 2 月 20 日中午，在东京赤坂福吉町被警察逮捕，立即被押送到筑地警察署。小林受到警视厅特高科警察中川、山口、须田等人先后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极其野蛮的拷问后，于下午 7 点 40 分停止了呼吸。鲁迅先生在小林多喜二遇害后，发去唁电，号召中日两国人民，沿着小林多喜二的血路，并肩奋进！还有，日共中央领导人野吕荣太郎 1933 年 10 月被捕，于次年 2 月惨死狱中，等等，等等。

这里，不能不提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

倾向，也给日本革命带来严重后果，使日共在 1935 年前，没有把反法西斯斗争作为中心任务，积极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战斗。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号召建立包括一切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1935 年 2 月 10 日，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山本悬藏在莫斯科联名发表《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纠正了过去过低估计法西斯的危险及党的宗派主义等缺点。信中明确指出：当前，法西斯战争是日本的最大危险，法西斯军部是日本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组织和群众，投入反军部反法西斯战争的斗争。但这时，日本共产党在国内的组织和力量，已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全国性的活动，已难以展开。分散各地的少数共产党组织和党员，虽坚持活动，号召建立人民阵线，但又很快遭到镇压。人民阵线尚未建成，全面侵华战争就已爆发。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没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向法西斯势力进行强有力的斗争，这是日本现代史上一个以大量革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极其严重的教训。

第三章

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

在日共的领导和影响下，侵华日军士兵也进行了反战活动。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1月29日，有200多名士兵拒绝执行进攻命令，被解除武装，押回日本。2月21日，约300名士兵，在中国上海虹口附近举行集会，有人在会上散发了署名“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号召日本士兵反对侵略中国，不要与中国军队作战。

1932年，驻东北地区宁安的七、八名日军士兵，反对侵华战争，密议投奔东北抗日义勇军，以便反对共同敌人。他们逃到唐头沟一带迷了路，被迫返回驻地，遭到枪杀。驻牡丹江市以北某地的日军守备队十多名士兵，带着中国抗日军队散发的反战宣传品，逃进森林，寻找抗日队伍，在被日军守备队追捕时，他们不愿被日军捉回，先后上吊自杀，或挨饿冻死于森林中。

1933年，在东北地区还发生过日军士兵舍生向我抗日救国军运送大量子弹的事情。那是1933年3月下旬，日军龟冈村一旅团长率领部队，企图一举占领我国东北地区的汪清抗日根据地。根

据中共吉东局的决定^①，根据地军民在四周展开了政治攻势，在敌军必经的路口、山沟，在电线杆上、树干上，都张贴了红绿色的传单、或书写了大字标语，使不少日本士兵知道这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由于我军在顽强抗击日军的同时，又对他们加强政治攻势，使龟冈村一旅团受到重大打击，被迫撤退。战斗结束后，这支抗日救国军的军长李延禄，去察看各个阵地，战士们正在掩埋牺牲的战友，李延禄站在烈士们的遗体前，默默辨认着，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在辨认中，他突然一愣，发现烈士遗体中，竟有一具日本兵的尸体！

“为什么把他抬来？”李延禄不满地问别动队的同志。

“军长，他可能是我们的同志，这一车子弹，可能就是他送给我们的。”别动队队长说完，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李延禄。李延禄看着密密麻麻的日文字，更加迷惑起来。

队长接着说：“我带着别动队员在松林里发现一辆汽车，发动机被破坏了。当时，我也迷惑不解：敌人为什么不把它拉走，反而破坏了？当我们离开松林，再向南搜索时，便在嘎呀河边，发现了这具日本士兵的尸体。离这尸体十几步，有一块石头，压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哦！就是这张纸条。”

李延禄立即找一位懂日文的同志来看，纸上写的是：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给贵军。它藏在北面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

^① 当时的中共吉东局书记童长荣，曾留学日本，很善于做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

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三天以后，抗日救国军和马家大屯的乡亲们，安葬了伊田助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还把马家大屯小学，改名为“伊田小学”，以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反战英雄、日本共产党员。

在华的日本人士，如川合贞吉、尾崎秀实等等，也自觉地投入了反战斗争行列。川合贞吉，1901年8月18日出生在日本岐阜县。长大后在亲戚家开的金属机械厂当学徒，阅读了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育和影响，开始憎恨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1922年，他进入明治大学，参加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结识了浅沼稻次郎等社会主义者，开始关心中国的情况。1928年，他来到北京。1930年8月，到《上海周报》社工作，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与中国共产党的王学文取得联系，组织日中斗争同盟，开始进行反战活动。日中斗争同盟成员有：小松重雄（满洲铁道有限公司职员）、副岛龙、手岛博俊（无固定职业者）、西里龙夫（《上海日报》记者）、嘉久某、川合贞吉、王学文、杨某（台湾人，又称刘孙，原名侯朝宗）、姜某（又叫陈伍、杨柳青，原名蒋文来）等。

日中斗争同盟受中国外兵委员会和中国反帝同盟领导。杨某负责与中国外兵委员会联络，王学文为中国反帝同盟的联络员。这个同盟的活动，由其成员集体讨论决定。

该同盟成立后，就开展了反战活动。主要是搞宣传，以当时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驱逐舰水兵为对象。川合贞吉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每天夜里，要躲过敌

人的探照灯光和机枪的监视，把中日两种文字的反战传单，散发到驱逐舰和海军陆战队总部。”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他们在11月7日夜里，在上海北四川路北端的月迳家花坛墙外，写下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与中国的苏维埃携起手来！

枪口对准资本家！摧毁地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万岁！

士兵、工人、农民万岁！

日中斗争同盟

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报道了这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的大事！^①

1928年11月，尾崎秀实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员来到上海。1930年底，他与佐尔格（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史沫特莱开始往来。

1931年夏，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川合贞吉、水野成、口高为雄、手岛博俊等，接受情报活动训练。并于10月接受尾崎秀实（1938年7月起，任近卫文麿的幕僚，后任《朝日新闻》社记者）、佐尔格、史沫特莱的领导，开始搜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情报，以捍卫日本、中国、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尾崎秀实、川合贞吉与佐尔格、史沫特莱等人一起，从1931年到1941年的整整十年里，在法西斯恐怖下，奔走于东北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和日本各地，调查关东军等的动向，他们在中国、在日本，进行了大量的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尾崎秀实、川合贞吉认为，这是他们当时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① 川合贞吉：《一个革命家的回忆》，日本谷泽书房1983年版，第21页。

战争所能采取的唯一最有效的办法。

1941年10月21日，尾崎秀实、佐尔格等被捕；接着川合贞吉也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1944年11月7日，尾崎秀实、佐尔格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被处绞刑。川合贞吉晚年，在与日本研究中国现代史专家小林文男谈话时说：“与佐尔格事件相关的同志们都牺牲了，而我幸存了下来。我以与他们一起，为中国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解放，为同日本法西斯进行过战斗，作为自己一生的骄傲。”^①

特别要提到的，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来到中国，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日人反战斗争。

鹿地亘1903年5月1日生于日本大分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1926年参加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从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又参与组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为领导人之一。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于1936年1月，和妻子池田幸子先后潜来上海。在上海，得到鲁迅、胡风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为他们安排住所，请他们翻译文章，以获取稿费，维持生活。后来，他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另外，还有日本进步人士石垣凌子和她的丈夫，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长期坚持在中国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活动，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许和支持。

上述日本人士在华的反战活动，对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个难能可贵的援助，为以后在华日人的反战运动做了准备。

^① 小林文男：《中国现代史的课题》第257页，日本劲草书房版。

本编小结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是日本军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浩劫。这迫使日本人民逐步觉醒，起来反对这场侵华战争。

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31—1935年，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斗争，从日本共产党扩展到左翼党派、民主团体，从首都东京扩展到全国各地，从工厂扩展到农村，从地方扩展到了军队。这场斗争，使日本军部和财阀们的既定侵略步骤受到影响。他们对日本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党派、团体进行了长期残酷的镇压。1935年后，虽然已没有全国性的反战活动，但地方的、零星的反战活动，仍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日本国内的反战斗争，开始延伸到中国。在侵华的日军士兵中，在中国活动的日本进步人士，在战场，在日军占领区，在中国一侧，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活动。

特别是1936年、1937年，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先后秘密来到上海，为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教育、改造被俘的日本士兵，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准备了领导力量。

1931年9月—1937年6月这六年多时间，是日本侵华战争在中国东北、华北和上海等地进行的时期，也是日本人民反战活动的最初时期。

第二编

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建立 和反战活动的开展

(1937年7月—1942年8月)

第一章

日本政府统治下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

第一节 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宣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月30日，日军侵占北平、天津。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发动进攻，11月12日，全部占领上海，11月20日，日本设立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指挥机关，确立全面侵华战争体制。12月11日占领南京。

同时，日军于1937年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11月8日占领太原，12月26日占领济南。1938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10月27日占领武汉。此时，日军进攻作战能力已达极限，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基本停止。1940年3月3日，以日本走狗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成立。其后，日本又不断对蒋介石进行诱降活动。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奋起反抗，日军在那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日本国内，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就发布命令，禁止罢工，强迫献金献物，节粮储款，购买国债。从1938年9月起，规定每月1日这一天，日本人民要粗衣糙食，禁酒止欢。日本政府

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在日共被摧残后，开始向合法的左翼力量开刀。1937年12月18日，解散日本无产党^①、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劳农派等左翼组织，在全国逮捕400多人，均为社会知名人士，其中有日本无产党执行委员长、众议院议员加藤勤十，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领导人铃木茂三郎，日本劳农派创始人山川均，早稻田大学教授猪股津南雄、茂野塞林，作家中西伊之助等等，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8年2月1日，日本有名的进步知识分子有泽广己、大内卫兵、协村义太郎等的“劳农派教授集团”七人被逮捕。这是第二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9年，东京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论著中，主张“唯和平乃真理”，被解职。1942年9月，满洲铁道有限公司研究人员细川嘉久在《改造》月刊发表文章，被指控为宣传共产主义，《改造》社、岩波书店、《中央公论》社三单位，有49人被捕，其中有3人被严刑拷问致死，等等。

正如鹿地亘1938年在中国写的《日本文化在监狱中》所述：“不论看哪本杂志，脑海中熟悉的作家、评论家的名字，都已经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些从不曾听说过名字的作者……在我心里，闪映着几千个被捕和失去执笔自由的作家、学者的姿态。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听不到了，文化已进入监狱。”^②

1940年7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了武力南进的方针。9月27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表明日本已决心与美国作战。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发动了太平

^① 由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国农民组合等组织联合组成，属日本左翼势力。

^② 见夏衍译：《日本人民反战的怒风》，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

洋战争。到1942年6月5日中途岛之战，和当年8月7日—1943年2月8日的瓜岛争夺战，表示日军进攻阶段基本结束，被迫转入了防御阶段。从1943年5月开始，日军在太平洋上不断失利、败退。

日本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使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军部获得了超额的利润和特权。

据统计，日本的战争经费，从1937年的3418百万日元，激增到1941年的13212百万日元。

日本战时武器经费开支，1937年为781.5百万日元，1941年激增到3810.9百万日元。

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从侵略战争中攫取了超额利润，日本全国公司利润额，以1936年为100（14亿元），1937年为150（21亿元），1941年为343（48亿日元）。

相反，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只是越来越沉重的苦难。大批青年被驱赶到战场，到1941年，军队人数已达240万人，占男子总人数的6.9%。日军士兵在战场大量战死。没有被征去当兵的男性青壮年，不仅担负着沉重的劳动，还得经常参加操练。民用产品大量削减，如供民用的棉织品产量，仅为战前的8%左右。

农村经济凋敝，粮食产量下降，转入军需生产的人数，从1942年起，有250—300万人。耕地逐步减少，农产品产值指数，以1933年—1935年平均数为100，1944年降到82.4，1945年降至58.2。各种日用品实行配给。每人每天配给食米300克左右，不足部分，只好买极高价格的黑市米。后来，干菜、橡子粉也成了主要食品。劳动时间每天为12—14小时，连许多妇女，也被迫到军事工厂、矿山，从事危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整个日本成了劳动者的苦役营。

在法西斯统治者的疯狂镇压下，日本人民坚持了反战反法西斯

斯斗争。有位女学生，在投向报社的稿件中写道：“人民消瘦，皇后却胖起来了。”不少人痛恨东条英机，公然喊：“击落英机！”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日本共产党就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散发了大量传单，揭露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号召人民起来投入反战斗争。拥有300万人的日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向东京政府请愿。不少工农团体也召开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东京附近某村庄的士兵妻子、姐妹们结队在车站上卧倒，高呼：“还我们丈夫和兄弟”等口号，迫使火车停驶。日本进步人士以“救济出征士兵家属”的口号鼓动出征士兵家属组织“索夫索子团”，向日本当局请愿，迫使政府做了一些让步。日共还发行了秘密机关报《冲过暴风雨》、《民众的呼声》，报道军需工厂和农村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1939年3月，反战分子投弹于大阪陆军兵器库，引起大火。4月，一艘潜艇上的反战分子，撞坏佐世保镇守府所属的潜水艇。8月，反战分子投弹爆炸了大阪皮革工厂，等等。

从1938年到1942年，工厂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如1941年神户工人发动静坐罢工，坚持了5天。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3000多工人罢工。10月，横滨重工业红鹤见工厂举行了大规模罢工。1942年，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神户川崎造船厂、东京芝浦军火工厂、爱知县钟民工厂工人先后罢工。怠工则成为各工厂普遍采用的斗争形式。军需工厂缺勤率一般达15—20%。农村租佃纠纷，1941年到1944年间，共达1万次，参加人数有9万多人。

知识界也继续展开反战活动。记者桐生悠悠因发表文章：《他山之石》，反对侵略战争，而被囚禁。基督教徒明石顺三等人，公开发表反战言论等。

第二节 在华日人的反战活动

1937年8、9月，在进攻上海的日军阵地上，出现了日本和平同盟的反战传单。传单写道：“中国被日本军阀、财阀侵略，我们被日本军阀、财阀压榨，快和中国联合起来，打倒日本的军阀、财阀！”“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变成日本国内革命战争！”“我们要抱着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兄弟并肩战斗！”“中日两国的兄弟啊！快联合起来，打倒侵略者、压迫者！向真正的自由解放迈进！”

1939年9月，华北日军中散播了许多署名“东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师团及满洲军政部内派遣士兵反战同盟”的反战传单：“看，当我们的血流遍战场时，中国民众肯定会坚决抗战到底。我们的撤退，就会停止军阀与财阀的双簧剧。我们的战争一中断，全国人民生活就会好起来，……掀起国内战争吧！集中火力向横暴的军阀、财阀决一死战！”

1938年1月—3月，在侵华战场上，在大沽口、晋西北、汉口、云梦，以及苏州、无锡、江阴等地，共有日军14000人拒绝登陆，甚至哗变暴动。1938年底，汉口日军北尾部下的一些士兵，发表反战言论。日军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的飞机驾驶员，公开反对战争，不执行轰炸命令。1939年6月，湖北增城日军司令部内发生反战斗争。同月，在武汉日军中，有500多名官兵发生哗变。7月，保定日军300多名官兵哗变。10月，驻山东日军麦仑旅团一大尉，将50多万日元军饷款，设法送给反战组织。1939年，在华日本宪兵机关就查出有反战言行的官兵136名。

日军排长石川次郎，应庆大学毕业，卢沟桥事变时，已是横浜某反战团体负责人，后被强征入伍，随侵华日军来到上海。在

上海会见了大学同学、中国人波光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传单：《反战大同盟告日本士兵书》塞给他，并说：“我即将随部队去清剿太湖地区贵国游击队，但你可以相信，我们不久将会见面，我会领更多的日本弟兄和你作朋友，不，来和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五千万弟兄作朋友。”几个月后，波光在重庆的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昨天太湖敌我激战，肉搏至烈，敌人一排于接近我阵地时，竟高呼反战口号，弃械投降，排长石川次郎已由我护送至××战区司令部，闻渠系日本应庆大学毕业生……”^①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人，请任日方译员的国民党敌后情报员何盖之配合，在一日籍友人的私宅内，架设秘密电台，经常向我五战区情报科传递重要军情，使我方对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南，围攻武汉的战略和兵力分布，都了若指掌。后和知鹰二因反对侵华被调职，就介绍了另一反战军官与何盖之合作，继续传递情报。直到何盖之即将被捕时逃离上海，才中止了这项工作。^②

福间一夫在国内是位架子工，到我国东北辑安（现集安）土口子铁路工区干活。1938年6月，东北联军袭击土口子铁路工地时，他因为坚决反对侵华战争，要求参加东北联军。杨靖宇军长接纳了他。他战斗勇敢。后调到二军一团，在团政委指导下，写各种日语传单，散发、张贴在日军士兵可能经过的地方。1942年夏天，赵政委决定福间一夫随他北撤去苏联整休。福间一夫坚决要求留下来。这样，他和留下的同志们组成一个连，开始更加艰苦的战斗生活。

有一夜，他们在穆稜县四道河老松岭原始森林南边住宿，天

① 波光：《一个反战的日本朋友》，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2月8日版。

②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6、767页。

亮时被日伪军发现。撤退时，福间一夫和一位朝鲜同志受了重伤，带队的同志要背他们走，他们坚决拒绝，要了几颗手榴弹，留下掩护别的同志后撤。他们俩保护了许多中国同志，自己却被万恶的日军肢解，尸骨被扔得到处都是。下午，同志们回来找他们时，发现了这种惨状，都悲痛得大哭起来。福间一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反战反法西斯精神，深深感动了同连的每一位指战员。他们决心为他和所有牺牲的同志，向敌人报仇雪恨。半个世纪过去了，同连的中国同志还深深怀念着他，并向中国人民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日本画家水原房次郎，1937年曾随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亲眼看到了日军长时间的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和以后，他创作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画。1994年4月，水原房次郎的遗孀为实现丈夫的反战遗愿，把价值数百万日元的《南京破坏迹》等两幅画，捐赠给中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37年10月12日，上海《救亡日报》发表了一位日本妇女给她父亲的一封信。这位妇女名叫美代子（为了她在日本的亲戚免遭迫害，没有公开她的姓），是随其中国丈夫来到上海的。她在信中说：“祖国的飞机，在上海、南市撒了传单，说：‘我们不要灭亡中国，而只要扑灭中国的共党。’这种说法，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也会笑的。相信这种道理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被屠杀的人们中，有许多是除了‘妈妈’之外什么话也不会讲的孩子，难道这些孩子也是共产党吗？假若是，那么日军为什么不去轰炸纽约、伦敦、莫斯科的‘共产党’呢？这，全是一种口实。”

“作为中国人的妻子，结果是也没有我安居之地的。李是一个热爱正义而决心和祖国共存亡的人，而作为他妻子的我，也爱着日本，爱着爸爸在那里生活的国家。对于祖国，对于我的朋友、同胞，怀念的真情，充塞了我的胸膛。我也爱国，我也尊崇正义。爸

爸，正义究竟是什么？我已经不懂了！在祖国军队未来之前，在这上海，有秩序，也有正义，人们都很经心地经营着他们的行业。所谓‘皇军的正义之师’，在我做孩子的时候就这样被教育而深深地相信了，可是现在亲眼看到的屠杀无辜的事实，却教给我相反的道理了！”

“爸爸，将事实真相尽可能普遍地告诉给我们的村人！假使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阻止这种杀人劫夺的事实，那，请你告诉正弟，我是如何欢喜啊。叫他不要做那种僭用正义之名而行侵略之实的恶汉的工具，被派来侵犯他姐姐的家园！”

1930年，日本妇女田美津子随丈夫明秋水到山东邹平县韩家村务农，并开了一爿小旅店。1938年5月19日拂晓，日军突然扑向韩家村，到处杀人放火，来不及撤退的八路军三支队七团的38名战士，随村的抗日先锋队，来到明家的小旅店，让田美津子想办法。她立即把战士带到后院里，自己穿上多年没穿的和服，锁上门，背着三岁儿子宝金，来到大街上。正在到处搜索的日军，突然见到一个日本妇女，很高兴。她用日语说：“八路军都走了，村里都是些善良百姓，请别伤害他们。”日军小头目说，自己当不了家，要她到村外找松井将军。田美津子说：“这是我的家，请保护好。”那小头目派两个士兵在门外站岗，她背着宝金去找松井了。

不一会儿，松井传下命令，不准杀人，让村里人出来救火。接着，集合日军赶往别处去了。38名战士得以安全转移。

隔了几天，松井少将派人来，请田美津子夫妇去做随军翻译。她立即答应说：“处理一下家务就去。”他们打发走来人后，连夜带了三个孩子，躲到济南去了。1960年，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给她寄来亲笔信，感谢她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日本栃木县芳贺县益子町妇女石锦昭子，卢沟桥事变前，随丈夫来到上海。上海失守后，随丈夫迁到安徽省巢县，参加抗日

工作，并且参加筹建安徽省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在动委会成立大会上，她以亲见亲闻，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表示要竭尽全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①

^① 石锦昭子：《在中国的日子里》，《华夏壮歌》第124、12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政策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行之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种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①

毛泽东又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②

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进步记者贝特兰的问题时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940、94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

“从根本说，和过去十年来红军所取的政策是一样的。俘虏要解除武器，但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加以侮辱或虐待。我们向他们解释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共同利益，于是就放了他们。”

“当然，对于军官和士兵，高级军官和下级军官，我们是加以区别的。普通士兵、被压迫阶级出身的，特别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强迫来和我们作战的内蒙人和满洲人，我们待他们像朋友和同志。假使谁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欢迎他留在我们队伍里，那些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可以随意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军官也是这样的待遇；但是那些指挥侵华战争的，支持日本军阀主义现行政策的高级军官，我们就得把他们拘禁相当时候，让他们有时间了解和体会自己的错误。那末，假使他们承认了错误，我们也就释放他们。”

“越是多杀被释放的俘虏，越是引起日军对中国的同情。对于最近山西战事中捉到的俘虏，我们已经实行了上述的政策，以后还要继续实行。”

“日军司令部公开宣称要用毒气对付八路军，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也不会改变优待俘虏的政策……”

“日本人民和被压迫的日本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即使被送到中国来打我们，但是我们和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不去，这些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不愿意归队的俘虏，都可以留在八路军里服务。假使将来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就可以参加进去，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了。”^①

周恩来指出：“对敌军的工作也应当进行：（一）经常地对敌军宣传煽动，抓住敌军中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使敌军瓦解和

^① 贝特兰著、林淡秋译：《华北前线》第127、128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第10版。

涣散，因而减少敌人的战斗力量。

“（二）在火线上，即在战斗中，也要进行对敌军的喊话或散发传单，使敌军动摇。

“（三）应当极力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①

刘少奇在抗日战争初期指出：“估计将来抗日游击队约有下列数种：……（八）以至将来还会有从日军中哗变过来的士兵及俘虏兵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②

张闻天在1938年12月15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在敌伪军中工作的方针：争取伪军反正，瓦解敌伪军。利用敌伪俘虏进行敌伪军工作。对反正的伪军应逐渐改造之。在中国军队政治部下，应有敌伪军的工作部门，敌后方地方党应有专负责这一工作的人。”^③

刘伯承说：“与敌打政治仗，就是要瓦解敌人，促其反战。敌人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之师，内部存在着许多问题，有虐待士兵，思念家乡，厌倦打仗等等。抓俘虏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他们教育好，感化过来，那么，他们回去后，就能替我们做有力的宣传，而这种宣传是我们力不能及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共产党的力量足以使他们改造成新人。”^④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部就发布了关于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命令要求：“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8、9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85、8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③ 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集》第十册，第606页。

④ 杨国宇：《放下武器，就是兄弟》。

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①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规定：“对俘虏禁止杀害，不准没收财物。禁止任何侮辱人格、习惯，负伤的绝对禁止补枪。阵亡的敌军官兵尽可能掩埋立碑，不愿随队行走的，就地释放。”

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令》中指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教育、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时期的训练。”

同年6月7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政治部关于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要求俘虏敌军士兵后，即给以好的招待与宣传。凡愿意回去者，经过短期的宣传与谈话，使他们知道日本关于八路军的宣传是欺骗他们的，然后一律放他们回去；凡不愿回去者，禁止强迫送回；对新俘虏之工作，要利用旧俘虏去进行。并指出了训练俘虏的方法。上述两个指示，都强调要争取日军俘虏为我军服务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的重大发展和完善。

1940年7月7日，朱德、彭德怀发布了八路军总司令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命令

日本士兵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是受日本军阀、财阀欺骗、强制，不得已和我军作战的。因此：

一、对俘虏的日本士兵，不加以伤害和侮辱，所持一切物品，不没收，不毁坏。而且应把他们当作兄弟对待。我军指战员有违反此命令者，应予处罚。

二、要特别注意负伤和患病的日本士兵，应给予治疗。

三、对希望回国，或希望返回原部队的日本士兵，要给予最大的方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1—1936. 5)第36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便，使他们尽可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四、对希望在中国居住，到中国军队里工作的日本士兵，应给予适当的工作；希望学习的，应让他们到适当的学校学习。

五、对希望和家属、亲友通信的日本士兵，应给予方便。

六、对战死的日本士兵，应予以埋葬，建立墓标。

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①

同日，八路军总部又发出了《关于建立日本士兵墓标的指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个特点。

中国共产党更注意团结日本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可能形成一个“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

1938年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素之一，是联合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各抗日根据地均可施行的。它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和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各国人民来边区旅游，参加抗日工作；凡受其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任何宗主国人民，一律给以平等的待遇；欢迎外界人士自愿来边区从事求学、工作或兴办实业等等。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的《保护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本军民条例》规定：由日本反战人士组成的革命团体为合法团体，在根据地中有活动自由，各级党政军民要帮

^① 载鹿地亘编《反战资料》，第292页，日本同成社1964年3月版。

助其发展，有功者给予奖励；保障敌占区日本人民财产；对普通日侨，在收复失地时，不没收其财产，不伤害其性命；日本人在实际行动上反战反法西斯，应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反战的日本人逃来，应给予优待，同时责成专署以上抗日政府均需选择适当地点，建立日本人民招待所，等等。

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反战日人规程》还规定：凡逃难到边区的日本军民，享受国际友人待遇；欢迎他们参加抗战；愿意从事工商业者，一律给予保护；对科学家、艺术家等专家，给予特殊优待；对上述人员的子女，提供就学机会，并且免缴学费，等等。

其他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也都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颁发了类似的条例、法令等。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努力联合日本人民、日本士兵，一起进行反战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人民军队的俘虏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大大丰富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内容，为建立、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与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联合阵线，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施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都加强了对敌军工作的领导。根据1937年国共两党谈判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被迫在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政治部改名为政训处。实践证明，这不利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因此，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八路军各师建立了政治委员，10月16日，中央军委成立了总政治部，接着在人民军队团以上单位，均设立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或政治处。同时，在总政治部、各师政治部内，设立了敌军工作部，在中共地方各级党委委员会内，设立了敌军工作委

员会。以后，在旅设立了敌军工作科，在团设立了敌军工作股，等等。

由各部队选派政治思想水平较高，能讲日语的中国人，以及少数朝鲜人，担任敌军工作干部。敌军工作干部开始工作时，首要任务是培训同级和下级敌军工作人员，形成敌军工作干部队伍。同时，负责对部队指战员进行简单的日语教学；搜集、整理敌方情报、资料；编印日文宣传材料；散发日文传单；书写日文标语；在前线向敌军喊话；收容、教育、处理日俘，等等。各级敌军工作部门的建立和加强，为贯彻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决定、命令，在组织上有了保证；为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在组织上提供催化剂和助产士。

第三章

觉醒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第一节 觉醒联盟的成立

日本觉醒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是杉本一夫。杉本一夫是怎样成为觉醒联盟的主要领导人的呢？

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1916年出生在日本京都的一个经营染坊的小手工业者家里。小学毕业后，在一个朋友家的商店里当学徒，一面劳动，一面上夜校。17岁时，到东京志愿参加了海军。后因病离开军队。1937年6月，到我国沈阳谋生。1938年春天，应日本满铁的子公司——基建公司的招聘，到河北省邢台市前一个火车站——双庙车站附近的采石场当监督。同年7月29日，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获。

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和他促膝谈心，生活上给予优待，给他看了八路军总部告八路军官兵的命令。命令规定必须优待日军俘虏。

在129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张香山（逝世前为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他住同一个房间。张香山和他谈自己在日本学习、进行政治活动的情况，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

国人民被迫奋起反抗的情况，使他思想开始有所触动。

后来，他被送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那里，遇到比他早两三天到达的小林武夫。小林武夫原是汽车驾驶员，是自愿到部队帮助运输的。1938年7月，他驾驶军用卡车，在河北邢台一带，遭八路军伏击被俘。这里的敌军工作干部江右书（后任日本工农学校教员，现任中国国际战略问题学会秘书长）、陈干事等亲切地帮助他们学习。他们首先阅读日本出版的河上肇著的《第二贫困故事》和早川二郎著的《唯物辩证法》两本书。他们开始知道，资本家、地主、富翁、军队里的大将军，都是些坏人；世上既没有菩萨神仙，也没有鬼怪，宗教是骗人的；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地狱，也没有什么天堂。人们的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最终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他们逐步了解了社会发展过程，发展的动力，资本社会的构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知道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浩劫，日本人民也遭到牺牲。

后来他们又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是中文印刷的，他们看不懂，就由敌工部的干部翻译成日文，念给他们听。他们通过学习，逐渐相信中国人民最终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

学习了几个月后，江右书带着前田光繁、小林武夫到前线活动。他们亲眼看到日军大量屠杀平民，焚烧百姓房屋，心里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们决心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斗争。

从前线回来，前田光繁等两人，把自己的想法和新来的冈田讲了。他们一致意见：要求参加八路军。

1939年1月2日下午，在山西省东南部的武乡县王家峪村，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野战军政治部、警卫部队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杉本一夫（为公开工作，而改了姓名）、小林武夫、冈田

义雄三人登台，感谢八路军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要求参加八路军，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杉本一夫还作为他们的代表当众宣誓。他说：“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①

会上，由敌军工作部科长漆克昌给他们作翻译。听了他们的讲话，顿时掌声四起，有人还站起来喊口号。

这时，一个坐在前排的人站了起来，走上讲台紧紧地和他们握手。这人就是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接着，朱德向全体指战员讲话。他强调，八路军全体指战员，要严格、认真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他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②

他们三人，是最早的“日本八路”。他们参军竟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烈欢迎，这使他们终生难忘。

杉本一夫参加八路军后，担任敌工部的干部。他们半天学习，半天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写对日军宣传的传单；管理和教育新来的日本俘虏；作为日语教员，帮助敌工部干部学日语。由于他们的工作，使八路军对日军的宣传，在质量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他们还利用日本歌曲的歌谱，填写上反对战争的歌词，印成传单。还到日军碉堡附近一边喊话，一边唱歌。

不久，被俘的日军士兵吉田太郎、高木敏雄，和一位理发师

^①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著，赵安博、吴从男译：《八路军内的日本兵》第1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② 《八路军内的日本兵》第123页。

出身的日军士兵，被送来了。这三人经过他们的教育，思想很快有了进步，也参加了八路军。

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为了尽量减少侵华日军的敌对情绪，对日军的宣传工作，最好由日本人来进行；为了增强宣传的号召力，加强反战工作，最好能形成一个日本人组成的团体。有了这样一个团体，就便于日本反战士兵的相互协作，保持更紧密的联系，更便于日本人的相互学习、提高，把争取、教育俘虏的工作做得更好。他们把此想法和敌工部的同志谈了。敌工部的同志很赞成，建议他们先和国统区的鹿地亘联系。鹿地亘已在那里建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他们立即给鹿地亘发信、发电报。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使两地反战的日本人始终没能联系上。于是，他们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下，经全体人员讨论同意，决定自己建立反战组织。

1939年11月7日，即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那一天，在山西省辽县（现为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由杉本一夫、小林武夫、高木敏雄、松井英勇、吉田太郎、冈田义雄、石冢修七人，成立了醒悟联盟。这“醒悟”两字，取名于日本左翼启蒙剧团醒悟队。八路军指战员与会，表示热烈祝贺。

这个联盟开始是以日本假名命名，译成中文，也可译成觉醒联盟。他们认为这样命名更好。因此，不久就改名为觉醒联盟。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

觉醒联盟成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朱德在秘书朱光陪同下，突然来到觉醒联盟盟员的住处，热烈祝贺觉醒联盟的成立。这使杉本一夫等人深为惊讶，深受感动，深切体会到八路军最高领导人对日本俘虏进步的由衷关怀。

觉醒联盟的宗旨是：（1）呼吁广大日本人民和日本士兵觉醒，起来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2）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揭露日本

法西斯破坏和平，侵略中国的本质和罪恶；(3)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革命经验，研究日本革命问题；(4)号召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觉醒联盟成立后，即创办了其机关刊物：《觉醒》。

觉醒联盟成立后，中国解放区、国统区的报纸都作了报道。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传遍了中国各个地方。从此以后，直到1942年8月，觉醒联盟与反战同盟合并，发展为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时，在华北不少地区，对日军的宣传品，几乎都是以这个反战团体的名义编写、印刷、散发的。它的组织日益发展，活动日益加强，对日军的影响日益增大。

1942年10月下旬，在关家垴战斗中，杉本一夫冒着敌军的子弹，向被包围的冈崎大队反复喊话，呼吁日军官兵认清形势，停止战斗，八路军保证其人身安全。他的喊话，在冈崎大队中起了作用。

觉醒联盟编写、印刷、散发了一百多种宣传品。使不少日本士兵醒悟过来。

觉醒联盟还在别的方面大力支援了八路军。吉田太郎、水野靖夫曾去抗日军政大学日语训练班，担任日语教员。他们使用生活日语化的教学方法，使原来不懂日语的学员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学习，能全部用日语来演出话剧^①。山田一郎原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毕业生，被俘后经过教育，到山西辽县羊角村野战总医院当医生。他工作认真、负责，医治了不少伤病员。1943年担任该医院的副院长，等等。

觉醒联盟的成立，和它日益明显的反战作用，证明了中国共

^① 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11日。

产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证明了中国人民坚持和日本人民友好合作，共同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正确。同时也证明了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财阀、军部不相容的。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他们坚持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日本人民、日本士兵暂时为法西斯集团所欺骗、愚弄、利用，但在侵华战争中，在中日进步人士有效的引导下，终于使一部分日本士兵摆脱法西斯思想的禁锢，投入反侵略的行列。

觉醒联盟的成立，为侵华的日军士兵指出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其内部固有的矛盾将加速发展，以至成为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使一部分日军士兵被觉醒联盟所吸引。觉醒联盟也为站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日本反战人士、士兵提供了亲切可贵的经验，为他们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觉醒联盟的成立，对推行“以华制华”的日本法西斯军部是个有力的打击。中国人民站在正义立场，反其道而行之，从侵略阵线中争取出一支与其斗争的新生力量，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也预告了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的危机和必然失败。

第二节 太行支部的成立

觉醒联盟成立后，继续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支部。觉醒联盟总部派松井英勇、小林武夫、高木敏雄、石冢修四人去八路军129师，建立、发展了反战组织。他们于1940年6月23日，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后改名为太行支部。先后由松井英勇、吉田太郎担任支部书记。

太行支部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以山西潞城为中心的日军36师团，以石太铁路上的阳泉为中心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以及平汉

线上的独立混成第7旅团。他们很快展开了工作，出版了《反战报》，后改名为《同胞报》。该报在反战宣传上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编印了大量的反战传单。在一份《告日军士兵书》中，他们写道：“日本士兵们，你们的家属和国民的大多数，遭受涂炭的苦难，苦闷不堪。然而一小撮人依靠战争获取了巨大利润，过着恣意妄为的豪华生活。这极少数人就是大财阀资本家和军部的高级军官们……”“日本士兵们，这些事实确实值得你们三思……你们在这个战争中，纵然丢掉了生命，也完全可以说是无谓的牺牲。你们如果当真欲为国家和民族谋幸福，忧虑国家前途的话，那就必须立即制止这场战争，并要有为实现这个愿望而甘愿牺牲的精神……”

1940年八路军进行百团大战时，太行支部成员全体出动，协助八路军打仗，向日军士兵进行宣传，给日军士气以很大影响。

太行支部组织了国际剧团，后改名为同胞剧团，为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军民进行演出。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们在河北涉县农村的一个四周是核桃树的广场上，进行演出。舞台上煤气灯亮着，布景是日军一个班的寝室，三八式步枪排列在枪架上。一个日本士兵手中拿着家信，闷闷不乐，呆呆地思索着。这时，从外面传来了凄凉的歌声：

“正是为了可爱的你，
忍受着辛苦的战斗，
忍受着战友的埋怨，
我怎能忘了你啊……”

同胞剧团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日军占领区，向那里的中国老百姓和日本士兵做宣传。

太行支部还给日军士兵送慰问袋。给前线士兵送慰问袋的传统开始于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国民自愿将士兵们需要的日

用品、食品、慰问信等，装进特制的布袋里，寄送到前线，以鼓励士兵的斗志。所以，可以把向前方赠送慰问袋的情况，看作是日本国民对战争热情程度的寒暑表。在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士兵平均每年可收到8—12个慰问袋，里面装有酒、罐头、点心、水果等。到1941年以后，只能收到1—2个，里面装的是海带、旧报刊等。这反映战争延长，日本国民更加贫困，对战争热情大为减退。太行支部的同志，根据这种情况想出向碉堡里的日军士兵送慰问袋，^①进行联欢，借以亲近他们。

一开始，他们在慰问袋里装上水果、点心。其中不少被日军当官的扔了，说什么“里面有毒”，不准士兵们品尝。后来，他们改为在袋里装上士兵们能用的毛巾、肥皂、香烟，用好布料做的兜裆布等。快到新年时，他们在袋里装上板羽球拍、信纸、信封、木屐等东西。此后定期在年关、4月的樱花节、7月中旬的盂兰节等日本传统节日，向日军各据点分送，以沟通感情，进行宣传，引发日军士兵的思乡厌战情绪。

这件事得到敌工部门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慰问袋一般是通过老百姓送进日本据点的。这很受日军士兵欢迎。他们有的回信表示感谢，有的还回送礼物。在华北、华中等地的日人反战团体，很快加以效法，开始向自己面临的日军据点赠送慰问袋。

太行支部还有准备地对日军士兵进行喊话。1942年，他们对山西省潞安县老顶山日军分遣队进行了喊话。参加喊话的大西，曾是该部队的成员。他们和八路军掩护部队事先商量的喊话的有关注意事项。在夜深时，就到了老顶山分遣队碉堡附近。部队掩护配备好后，他们就爬上碉堡前的小山，侧耳倾听碉堡里有无说话

^① 慰问袋一般用漂白细布制成成长一尺、宽八寸的口袋，正面上半部印着“慰问袋”三个一寸见方的大红字，字下边印着日本人最喜爱的樱花。

的声音。当他们断定士兵们还没有睡觉时，就先唱一首日本流行的思乡歌曲。

碉堡里的说话声，即时停止了。大西开始喊话：

“喂！战友们！我是以前和你们在一起的大西。川田上等兵怎么样？山城上等兵身体好吗？”

“哎！大西？”一个士兵说话了。

“是的，我是大西。我就是大西！”

“什么，你真是大西吗？情报员说你被八路军抓去后，整天挨揍、哭喊。”

“胡说八道！那是假话。我受了伤，八路军救了我，把我送到医院。医生、护士照顾得比亲爹娘还周到。我感动得直流泪。伤慢慢地好起来。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士，轮流来慰问我。年轻的女看护特别亲切，我的伤现在完全好了。战友们！情报官说的完全是谎话，骗人的。八路军真是好军队，这是我亲身的体验。今天晚上，我特地来向各位说一说这些事情。”

“倒真的像是大西。”

“当然是真的！哈哈哈哈哈！我的声音，你们还记得吗？”

那天晚上，碉堡里的士兵，正在一起喝啤酒，思念亲人。战友大西的出现，使他们十分吃惊，又非常高兴。分遣队长和大西是同乡，又是同学，在日军同一个班，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分遣队长激动得哭了。

“分队长，不要哭！”一个士兵对分队长说，这边听得很清楚。

“大西，我写信告诉你家里，你放心！”另一个士兵说。

“谢谢！”大西回答。接着，他又慢慢谈到八路军和日人反战组织的情况。

“战友们！今晚已经很晚了，我回去了。打搅你们了，真对不起，过几天再来。下次给你们带慰问袋来。再见！再见！……”

士兵们都伸出上身，喊道：

“大西！大西！不要回去！大西……”

“以后再来！以后再来！再见！”

这样，他们和老顶山分遣队有了接触，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和日人反战组织的情况，展开了对此分遣队反战工作的第一步。喊话可以与日本士兵直接交谈，联络感情，这引起了日本军部的恐惧和阻挠。

太行支部的反战工作，逐步发挥了作用。例如，1941年4月1日，在他们工作过的日军部队，有3名日兵，携带八路军方面印发的通行证，逃出兵营，投奔八路军；其中有一士兵，被日军捉回，当众剜眼剜肢，惨遭杀害。

第三节 冀南支部的成立

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敌工科同志帮助下，在冀南平原，由秋山良照、水原健次、成洋鬼彦三人发起，成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

在支部成立大会上，支部书记秋山良照读了他创作的、表明心迹的诗《红旗颂》：

延安鲜艳的红旗啊，
今天已高高地飘扬在冀南平原上。
不久的将来它将越过大海，
飘扬在东海之国日本的土地上。
鲜艳的红旗啊，
它是中日人民团结的象征。
鲜艳的红旗啊，
为打倒中日人民的敌人——日本军部，

将高高飘扬！^①

不久，支部盟员就增添了七位同志：筱原正义、吉田清去、小林春夫、原广见、大谷、山下、桥本。

他们积极展开了反战工作，组织发展很快。到同年10月，支部盟员已达24名。

冀南支部盟员能够根据当地日军内部的一些具体情况，及时编写、印刷日文宣传品，向日军进行宣传，收到很大效果。在这方面超过了别的支部。

特别是秋山良照，能画善写。他的文章能针对士兵的思想。他接到的日本士兵的来信，竟累积有一尺多高。他在冀南日军士兵中有很高的威信。为此，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曾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表公告，以连升两级来奖励逮住他的日军官兵。

秋山良照经常亲自到阴暗潮湿的地下印刷厂，夜以继日地印刷日文宣传品，向日军官兵散发。

他们还组织了剧团。第一次排演的剧本是《活路》，由秋山良照创作，水原健次担任主角。全剧共有三幕。

第一幕：一个贫农家里，儿子木下接到入伍通知，由于父母年老，父亲神经痛病严重，自己去当兵，繁重的劳动就要落到父亲身上。于是，他向地主借了钱，以维持父母的生活，并答应自己回来后归还。他出征了。他走后，地主要收回租给他家的田，还把木下要求保密的借钱的事，告诉了病人，父亲咒骂夺去儿子的战争和狠心的地主，含冤自杀。

第二幕：在侵华日军的班里，木下不断遭到老兵的打骂，并接受残酷的军训。木下从朋友的来信中，得知父亲自杀身亡。他

^① 秋山良照：《冀南平原》，载吉积清等编辑：《反战士兵的故事》，第185页，新日本出版社1963年9月第1版。

悲伤、气愤，找中队长诉说。中队长却说：“你父亲是军国的父亲，你应该拼死为国效劳！”

第三幕：战场上，木下不服从去杀害、抢劫中国老百姓的命令，对战争开始有了怀疑。分队长说他是胆小鬼。夜里，站岗时，他拣到觉醒联盟的传单，思想上产生了某些共鸣。手里的传单被中队长发现。中队长认为他思想不稳，对他进行了拷问。木下不堪侮辱，终于逃走。

《活路》的演出，获得成功。当演到父亲被迫自杀时，战士们愤怒地喊道：“打倒地主！”当演到木下逃走时，观众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的战士站起来，大声喊道：“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帮助你！”

《活路》的演出帮助中国民众理解觉醒联盟，知道中日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敌人。这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也使盟员自身受到了教育。

他们的工作启发了日本士兵的觉悟。独立混成第六师团第二大队上等兵村井，主动与盟员们联系，要求到八路军中来。

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八路军大举报复。1942年4月29日早晨，冈村宁次集中大量日本陆军、空军，对冀南军区部队“大扫荡”。盟员们在此战斗的生死关头，没有一个有一点儿动摇的，都经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他们在战斗中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反战活动：编写、印刷、散发传单；刷写反战标语；到碉堡前喊话；在电话里和日军士兵谈心，等等。在几次激烈战斗中，小林养夫得了疟疾，治疗无效逝世。原广见一在日军时腹部受过伤，这次复发，医治无效病故。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敌工部干部职叔敏、老孟、李敏、石嘉植等先后光荣牺牲。

由于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在反战宣传上的显著成果，1942年8月7日，当支部成立一周年时，朱德总司令给他们发来了祝贺电

报：

“在这一年里，你们在冀南前线，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士兵的政治宣传活动，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奋斗……”

由于秋山良照在反战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41年他被冀南地区人民选为地区参议员，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政权工作。

第四节 冀鲁豫支部的成立

1941年8月15日，在黄河边濮县的一个村子，召开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的成立大会。

会场正面，挂着一条大横幅：“日本人民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成立大会万岁！”两侧挂着当地党政军民各机关赠送的锦旗。

另外，还有用缝纫机缝制的，红黄蓝绿等颜色的标语：

“中日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军阀！”

“庆祝日本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的成立！”

“我们永远帮助兄弟们！中日人民解放万岁！”

上午9时，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冀鲁豫区委书记、冀鲁豫行政公署主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等，在来宾席上就座。9时10分，主持人黑田嗣彦，由敌工部长李仁帮助翻译，宣布大会开始，向各位代表、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和深切感谢。

区委黄书记致祝词，他说：“你们从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中觉醒，加入热爱和平、自由和独立的中国人民的行列，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类和平的破坏者日本法西斯，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为了觉醒联盟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决心不惜一切地帮助你们！”

接着，杨得志司令员向他们敬了礼，面带喜悦地说：“正如各

单位祝贺冀鲁豫支部成立的贺电中指出的那样，今天，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火焰，在冀鲁豫地区燃烧起来，这意味着日本军阀、财阀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这恐怕是一大威胁。为着把这一火焰烧得更旺、更广泛，我们全体指战员，将满足你们的要求和希望，大力协助你们。”^①

然后，由韩书记代表朝鲜独立同盟讲了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奴役政策失败之日，便是日本人民解放之时，我们要团结一致，携起手来，打倒日本法西斯！”

会议选举水野靖夫为支部长，朝鲜籍日军士兵、台湾籍日军士兵各一人，为副支部长。会议通过了《反对战争》等纲领、章程，《冀鲁豫支部成立宣言》、《告在华日本同胞书》、《向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宣誓》、《致觉醒联盟总部、各支部的复电》。直到下午3点，大会才闭幕。晚上，旅部的前进剧团作了专场祝贺演出。

成立大会，使水野靖夫、黑田嗣彦、木下、前岛、木村、河上，以及朝鲜籍日军士兵老刘、老朴和台湾籍日军士兵老王等九人，对在八路军大力支援下，举行了如此隆重的仪式，深受感动，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们决心尽一切可能，去瓦解日军，挽救尽可能多的日本同胞的生命。

1942年，他们配合八路军，进行了春季政治攻势。使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有2名士兵，携带一挺轻机枪、两支步枪，投向觉醒联盟。

在接着举行的夏季政治攻势中，支部第三前线工作队，对日军32师团惠藤部队展开工作。一个黑夜，他们在八路军李营长带领的400名指战员警卫下，在黑夜10点多钟，进入游击区，在村公所休息时，李营长把《告日本士兵书》，以及印着题为《到日人

^① 《反战士兵的故事》第171页。

觉醒联盟这方面来》的短文和流行歌曲的传单、小报等，共100多份，还有三块标语牌，分发到战士手中。

当警卫部队在陈家村日军碉堡周围布置好后，他们利用洼地，到了敌前30米处。

“喂，陈家村分遣队的各位同胞，我们是日本人觉醒联盟。”木村的第一句话，惊动了碉堡里的士兵。

“什么？什么？你是谁？”

“我们是日本人觉醒联盟的盟员！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了。我们向附近的老乡们打听了你们的生活情况。很想念你们。今晚来随便谈谈。”

“什么觉醒联盟？是日本人吗？”

“是的。我叫水野。请你叫清水少尉先生。”

一会儿，碉堡上人影拥挤。

“清水少尉先生，我们是前些天在信上约好的日本人觉醒联盟盟员。我们不是来打仗的。我们静下来交流些消息，好不好？八路军也来了不少。宣传队也来了。”

“水野先生，我懂了，不开枪就放心了。我是清水少尉，信已经收到了。谢谢。今晚你们又辛苦了。你们为什么到八路军那边？”

“我是丸生部队的河上上等兵，去年前在韩村战斗中，右肩左腿受了伤，流了很多血。走不动，让部队给丢弃了。最后昏了过去，当了俘虏。我被八路军送到野战医院，经过三个月治疗，已全好了。现在参加了觉醒联盟。”

清水少尉说：“你们不想家吗？以后打算回日本吗？”

“我们和各位兄弟一样，家有父母、妻子、兄弟姊妹，是一定要回去的。正因为热爱家属和祖国，我们才反对财阀、军部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的。”水野接着转换了话题：

“各位兄弟，让我们唱个歌给你们听吧！”

“好！欢迎！”

木村说：“那我就献丑了：

‘家烧了，
高粱枯死了，
父亲死在战场。

妈妈啊！

我不能再伺候你了。
抱着胡琴来回游荡，
在他乡小镇上，流浪流浪！”

“下面请各位兄弟唱一个吧！”

从据点里传来了歌声：

“月下站着的哨兵，
远离故乡，
没法回去啊！
看着东飞的大鸟，
想起离家时，
母亲潺潺流下的眼泪！”

接着木村吹起口琴，双方都鼓起掌来。水野也唱了一支歌：

“夜里冷冰冰，
战争苦难当，
我们回家去吧！
把战争停下来，
去跟父母孩子团聚吧！”

接着，李营长对据点的日军讲话，由水野翻译：

“日本兄弟们！我代表八路军，从心里赞赏这样的月下唱歌。我们的敌人不是各位，是发动战争的军阀、财阀。我从心里祈祷：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幸福，为了各位兄弟能身体好好地回国，让

我们携起手来，赶快停止这场战争吧！以后，各位兄弟不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请写信，交给附近的老百姓，和我们联系。”

喊话结束，我们在据点前插上木牌，上面写着：

“家属等着你们回去！”

我们走时，手表已指向深夜一点钟。清水少尉说：“下一次，请早点来，我们想听听国际新闻。”

我们走远了，据点的日军，按事先约定，向天空打了一阵机关枪，以便明天向中队报告：“昨夜击退敌人袭击。”

接着他们又去喊话、联欢了几次。惠藤部队三位士兵主动来到八路军觉醒联盟方面；另外，该部有12人厌战自杀；12人逃走后被抓回处死。

1941年5月，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75大队进驻清木县后，支部通过各种方法，探知该部队士兵的姓名、籍贯、思想情况后，给他们一个个发信，以联络感情。有的士兵收信后来了回信，表示愿意和盟员交朋友。有的士兵在后来的战斗中，甩掉武器，投奔了过来。大队长松本十分恐慌，给支部来了威胁信。信中写道：“你们中间，大概有我松本大队的士兵吧！本大队长为你们的性命担忧。尤其是你们家里，再三来信询问，本大队长也十分苦恼。你们受了八路军的欺骗，生活一定很艰难吧？想起了从前的战友，故乡的父母兄弟，你们整天痛苦流泪吧？现在你们已经把枪口对准了部队长，战友和你们的父母兄弟，这使你们家人何等担心，何等悲伤啊！你们应该冷静地想一想！本大队长不愿自己亲爱的部下作无谓的牺牲，你们放心地回大队里来吧！”

支部研究了这封信，以“八路军内前75大队全体士兵”的名义，给松本回了一封信：“我们没有忘记过去的战友和父母兄弟，正因为热爱他们，我们才下定决心，为早日结束这场悲惨的战争而斗争。……我们在八路军内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请你放

心……我们再也不愿回到地狱般的，每天挨耳光，用泪洗脸的军队。我们留在八路军内，将直到侵华战争结束！”这封信，像一支利剑，刺向松本们的内心。

支部成立一年时，就出版了《士兵的呼声》、《黎明》报；发行了二百多种、共计 20 多万份的宣传品；并且和日军作战 8 次。他们在战斗中不断壮大。

第五节 山东支部、太岳支部的成立

1940 年 6 月 2 日，在八路军 115 师由本桥朝治、国保等，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支部长本桥朝治。他们积极展开反战宣传，促使在山东肥城的日军士兵 4 人自杀，3 人投奔了八路军。

1942 年，在八路军太岳军区，渡边三郎、森图正明、加藤、北野千岁等，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渡边三郎任支部长。他们出版了日文报纸《士兵的呼声》，把它和传单一起，向日军士兵散发。他们的反战工作获得了很大成效。

总之，觉醒联盟成立后，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中国民众密切配合下，在书写日文标语，编印、散发传单，在前线喊话、联欢，与日军据点直接通话，向日军士兵赠送慰问袋，发行反战日文报刊，以及向中国军民宣传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不少日军官兵思乡、厌战、反战、自杀、逃跑、投奔八路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人民的解放，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工作、战斗中，他们的组织不断得到发展。到 1942 年 8 月，觉醒联盟已有 60 位盟员。

第四章

国统区日人反战活动的发展

第一节 在桂林筹建反战同盟

在上海，鹿地亘通过宋庆龄，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参加抗战的要求，没有得到回音。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追踪，他们搬入了法租界。

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个日本人青山和夫。青山和夫原姓黑田，是黑田子爵的儿子，曾在日本劝业银行工作。在日本时曾找过郭沫若，请教、研究东洋史问题；并参加过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唯物论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后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三个月后叛变出狱。受国民政府外交官王芄生的邀请，来到上海。

青山和夫见到鹿地亘后，问他：“你是不是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的？”鹿地亘说：“从我被捕入狱那天起，就和日共失去联系，已不是日共党员。”他反问青山和夫：“你是不是日共党员？”青山和夫说：“不是，我参加过日共领导的进步学术团体，从没加入过日共。”在上海，共同反对日本侵华的志向，把鹿地亘、池田幸子和青山和夫联系起来。

八·一三事变后，1937年12月1日，鹿地亘夫妇在中共党

员、文化界进步人士安排下，和何香凝、郭沫若、绿川英子夫妇，秘密坐同一条轮船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避居九龙，过着艰难的日子。其后，代表中国进步文化界的夏衍，来到九龙。鹿地亘接受他的意见，写了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论文《国民的总意》（意即全体国民的意志），公然署上姓名，在1938年1月开始发刊的中共机关报、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日本人民发自肺腑的呼声，是日本人民的反战宣言。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欢迎鹿地亘夫妇参加中国抗战的签名运动。

在国共合作抗战气氛中，在武汉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等三人任副部长。该部第三厅，即负责宣传工作部门的厅长是郭沫若。当时，郭沫若拿了《国民的总意》和文化界的签名，找到陈诚。陈诚表示欢迎鹿地亘夫妇来武汉参加抗战工作。

3月18日，林林（当时第三厅成员，现中国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访问了鹿地亘夫妇。接着，他们在林林和国民政府便衣宪兵武装保护下，坐火车到达广州。在广州休息时，鹿地亘为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写了一篇表明日本人民立场的短文《现实的正义》。

3月23日，鹿地亘夫妇到达武汉，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鹿地亘问：“我们能做些什么工作呢？”周恩来说：“请尽可能地参加中国的抗战吧！从今天开始就行动吧。这是我对你们的最大希望。”

接着，他们由郭沫若带着会见了陈诚。两人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的聘书。24日，当他们在“中国抗敌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出现时，使与会者轰动了起来。25日，由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主持，召开了武汉各界欢迎鹿地亘、池田幸子大会。鹿地亘在答谢词中一再强调：“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有

如潜在水面下的、有巨大能量的冰山。”第二天，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就上述欢迎大会发表了感人的社论。《新华日报》、《抗战三日刊》在发表此大会消息的同时，发表了介绍鹿地亘从事反战斗争的事迹的文章。

鹿地亘夫妇被迎入中国抗日阵营的消息，使日本政府极度狼狈，十分愤怒，并在报上咒骂他们两人是“国贼”。不久，又在报上公开宣布，不惜以10万日元的重金悬赏鹿地亘的头颅。

鹿地亘夫妇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第三厅国际宣传处对敌宣传科，进行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在他们的协作下，对敌宣传科印制了大量的日文传单、小册子，以及供日军士兵向中国军队投诚用的“日军士兵通行证”等等。

1938年5月，蒋介石要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请鹿地亘写了向日本各界人士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立场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等六种传单，并用几种彩色纸大量印刷。

同月19日下午3时半，奉蒋介石的命令，中国空军徐焕升、佟彦博等8名勇士，驾驶美制马丁式双引擎巨型轰炸机两架，携带上述传单百万份，由汉口起飞，经南昌、衢州、宁波加油，于20日凌晨2时飞临日本领空。飞机经多良岳、有明海、久留米直达福冈，向九州各大城市散发传单。两机于当天11点半飞回武汉。在武汉机场举行了欢迎远征军将士凯旋大会。孔祥熙、何应钦等到会祝贺。这次空军远征及散发的传单，震惊中外。美联社发表评论，标题是《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香港报纸评论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①

^① 陆茂法：《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载《人民政协报》。

在武汉，鹿地亘和青山和夫重逢。青山和夫在“八·一三”事变时，奉王芃生的命令到南京。后又因某种原因去了越南。在那里，他不遗余力地搜集在越南以及途经越南港口的轮船上所有日本人的详细情况。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他是否奉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

鹿地亘夫妇在武汉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这急坏了王芃生。王芃生原名王大廷，是日本东京大学历史系和陆军经理学校出身的外交官。卢沟桥事变前，担任驻日公使馆参事，曾多次报告日本将全面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受到蒋介石的重视，担任直属蒋介石本人领导的特别情报机关——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他自称是了解日本情况的权威。他极力搜罗日本的左翼分子，加以利用，以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鹿地亘夫妇的行动不利于他野心的实现，所以，他立即去电越南，把青山和夫调来武汉。他们住在原日租界的一栋楼内相通的两间房子里，关系亲密犹如父子。他把青山和夫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推荐给蒋介石作顾问。实际上，青山和夫只不过是蒋介石顾问王芃生的走卒而已。

青山和夫到武汉后，鹿地亘开始和他研究创建远东反法西斯同盟，提出先由鹿地亘、青山和夫、池田幸子三人组织筹备委员会，然后尽可能把一切在海外的日本人组织进来。这一决定遭到青山和夫的极力反对。他说战争时期，很不好办，就他们三人就可以了。这个反法西斯同盟还在筹备中，青山和夫自己就出了所谓《远东反法西斯同盟机关报》，报上并印有所谓的《宣言》，《宣言》最后署名竟是“反法西斯同盟书记局 青山和夫”。很明显，这是王芃生想通过青山和夫控制这个机构。但远东反法西斯同盟因鹿地亘和青山和夫意见相左，而且无其他日本人参加，还没有正式成立就胎死腹中。

在鹿地亘筹划组织远东反法西斯同盟时，在中国已有了朝鲜义勇队，台湾义勇队。鹿地亘和郭沫若、冯乃超商议，想办个小规模的特殊收容所，由他先对若干俘虏进行教育。当他把这个设想写成报告交上去后，就一直躺在国民党特务头子、共产党叛徒、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的抽屉里了。

当华北日军对八路军使用毒瓦斯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提出了严正抗议。武汉《新华日报》提议，为八路军指战员购买防毒面具进行献金运动。鹿地亘夫妇立即响应，青山和夫也捐了款。隔了几天，在该报发表的捐款书上，竟出现了“日本共产党代表青山和夫、鹿地亘”的签名。青山和夫这种举动，引起了鹿地亘的愤怒，开始怀疑他的政治品德。其实，这只是王芃生向蒋介石推荐青山和夫是日本共产党代表的阴谋的公开化而已。

有人据此得出结论：1938年夏，日本共产党派遣的两名日共代表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他们也指导了国民党方面的日俘改造工作。这是根据虚构的事实得出的谬误论断。

当曾留学日本、和郭沫若一起创立了创造社的共产党员李初梨，被国民党监禁九年戴着墨镜出狱时，马上被青山和夫认了出来。这更引起了鹿地亘夫妇的深思。

当时青山和夫在向蒋介石提供的报告中说：“日本的黄金储备只够两年用的。日本战斗力，两年以后就会枯竭。”《大公报》等报刊报道了这个消息，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实，这纯粹是个谎言，只是惑乱国民党，松懈其战备，妨害中国抗战的一个阴谋。

后来，鹿地亘在和冯乃超交谈时，说起自己对青山和夫的看法，“青山的住处，是特务机关的一个巢穴，他很难不成为王芃生那样的人。”冯乃超表示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9月下旬，鹿地亘参加了武汉三镇慰问前线将士民间

代表团，和李德全女士等一起，访问了陈诚指挥的阳新战场。突然接到政治部发来的要他离开武汉的命令。鹿地亘离开阳新前线，回到武汉，政治部决定派他去常德收容所视察。

这样，鹿地亘就和第三厅的工作人员刘舜生、廖体仁一起去常德。廖体仁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和李初梨一起，被关在狱中9年，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

常德收容所没有挂牌子，里面也没有什么设备。最初由刘长裕代理所长，王、伍两位先生担任收容所的管理员。

1938年3月28日，收容所接收了第一批俘虏，是在渤海湾搁浅的被捕者，共23人。其中军人3名，朝鲜人9名，有特务嫌疑的白俄托马诺夫1人，日本船员10名。

5月15日，阿部等8人入所；

5月22日，沟口、门仓两人入所；

6月20日，韭泽等一行入所；

6月下旬，堀田等一行入所；

7月1日，收容所正式被命名为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特务分子邹任之任所长，姚开白接任管理员，负责给俘虏讲授汉语。

7月16日，石川、广野等12人入所；

8月5日，井田等7人入所；

8月29日，森田等13人入所。

8月，应收容所要求，由冯乃超推荐，政治部派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孙必亨担任管理员，负责对俘虏进行政治教育，每周二、三次，主要讲授三民主义。

收容所当局对俘虏教育的方针是要将日本人“同化”。要求他们背诵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不服从者，以减食作为处分。但这

并不起什么作用，有的俘虏公开对抗，挺胸高叫“杀吧！”有的把剩饭晾干，装入袋中，想伺机夺取武器，杀死管理人员，逃回日方去。

在邹任之任所长后，将俘虏分为三个队，派胁田、堀田、严益根三人为队长。每队设立卫生、劳动、学习、医务等组，派了组长。并允许俘虏选举有关工作人员，以帮助当局处理有关事务。

1938年10月初，鹿地亘一行三人到达常德收容所。当时收容所有俘虏约80人，其中朝鲜人约20人。由于所方的工作，鹿地亘他们三人被当成是检查官，因而使俘虏们十分紧张、警惕，与他们保持距离。

他们到达不久，所方举行了欢迎会。鹿地亘在讲话中说：

“各位同胞，亲爱的邻国诸位兄弟！我们很高兴参加这次和平村的盛大欢迎会。我们今天站在两民族的悲惨战斗中。这悲惨的战争能否变为光辉的战争，就全看决心和努力怎样了。假如这次战争只能成为民族与民族间的斗争，那就会是一种悲惨，表明两民族的失败和死亡。……同胞们，兄弟们！我们能够把战争引导到光辉的道路上去。凭着这样的信念，我高兴地来参加这个盛会。

“这次侵华战争对日本国民有什么意义？只要看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情况，就可以明白了。国家的生产和国民的全部生活，都做了战争投机的赌本。重工业几乎全都成了军需工业，因此使国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为什么卑劣的政治阴谋，依靠武器和暴力的阴云每天笼罩着国民？准备过程本身不就是战争吗？这战争是国民和国家的敌人发动的。它使我们和中国人拼杀，这不正是他们的奸计吗？而且，拿生命作赌注的战争的结果，只能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和死亡。

“然而，我们一定要胜利。例如，眼前这里就有和平村（邹任之接收收容所所长后，将收容所称为“和平村”）。在悲惨的战争

中，我们创造两民族和平的生活，这是了不起的光辉，是胜利的征兆。那么，诸位在这里是虚度年华呢，还是参加胜利的创造呢？这全凭诸位的意志和努力来决定。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用满腔的喜悦，来参加这个伟大创造的一端——本和平村快乐的晚会。”

鹿地亘讲完话，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鹿地亘利用在常德的十天时间，和不少俘虏进行了真诚的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引导他们起来反对这场侵华战争。这在有些俘虏身上起了很大作用。

鹿地亘在和俘虏三船交谈时，三船就详细地讲了他的经历、他的决心和今后的打算。他特别要求要做工作，并表示将更改姓名，以免在日本的双亲及妻子受到欺凌。

鹿地亘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三船说：“大概是官僚做法吧！比如说，不管什么总是强制别人接受的做法。如对我们实行中国军队的训练，要我们诵读总理遗嘱，要我们信仰三民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事，对日本人就勉强了。”

三船的这些话，引起了廖体仁的不满，认为他这是胡说八道。鹿地亘则谈了自己的看法：“三船的话是对的。我们为了解中国，做中国的朋友，就要理解三民主义。但日本革命有它自己的宗旨，日本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与中国不同。各位一直是以‘民族’来和帝国主义的迫害、蹂躏进行着斗争。然而我们是在帝国下的‘人民’和它继续苦斗着。作为‘民族革命’的旗帜而产生的三民主义，不能适用于日本的‘人民革命’。”^①

鹿地亘到常德收容所，并不是要搞反战组织，他是为了今后搞反战运动，来了解俘虏们的生活、思想的。

1938年10月中旬，鹿地亘离开常德去桂林，并在桂林夏衍主

^① 鹿地亘《和平村记》第50期。

办的《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常德收容所的访问记——《和平村记》。《和平村记》从1939年1月到9月，不定期连载，共发表66期。因鹿地亘去重庆，没有载完。其后出了单行本。前29期，由邢桐华译成中文，因邢病重，后37期，由冯乃超译出。他发表这一访问记，目的是要真实地反映那里的情况，使国民政府理解并支持他的主张，使其改变对俘虏的强制做法，真心实意地引导他们，给他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比较自由的环境里，由他们自己组织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

鹿地亘离开常德后，青山和夫奉王芃生之命到常德，并准备长期待在收容所，在那里创办俘虏学校。

但到1938年11月初，收容所奉命向贵州省镇远县转移，沿途情况很糟，由于住宿、饮食条件很差，不断出现病号和死亡者。青山和夫因此和所长、管理员发生了矛盾。

在向贵州转移途中，俘虏准源吉逃跑，当即被抓回。并无故牵连到堀田、井田、加藤、铃木、藤沼、中岛、松岛、上尾等九人，把他们都抓了去，再也没有放回来。青山和夫也因此涉嫌被芷江宪兵司令部逮捕。芷江宪兵司令部和王芃生联系后，立即释放青山和夫，并让他去了重庆。

收容所的转移，经过半年时间，于1939年4月28日到达地处山谷中的镇远。

当时，国民政府在从长沙向后方撤退过程中，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县的南岳，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参加的、决定武汉战役以后中国抗战战略方针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后来称为南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决定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作为大本营，在它的两翼，即支撑西北战场的西安和支撑西南战场的桂林，分别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军

委会各机关。根据这个决策，分成三个部分组成完整的抗战体制。

会议还决定设立国民党军队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每训练四个月为一期。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为在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官员中普及简单日语，决定在桂林开办日语短期训练班，每四个月为一期，由第三厅的冯乃超、鹿地亘协助制订详细的训练计划。

1938年11月，郭沫若和即将分娩的池田幸子等乘飞机去重庆。冯乃超、鹿地亘则暂时留在了桂林，一是为开办日语短期训练班作准备工作；二是在桂林筹划日人反战同盟组织。

为什么要首先在桂林建立日人反战同盟呢？当时鹿地亘等人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里的政治形势不像西安那样严酷，也不像重庆那样极端复杂。这里是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阀独占的天下。他们对辖下的人民，说不上什么民主，但对抗日，特别是在抗日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热情，积极予以支持，并以此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热情地为夏衍等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工作提供各种条件。有人曾形象地说，武汉的抗日热潮，搬到了桂林。所以鹿地亘等估计在桂林展开日本人反战活动，会得到广西当局的承认和援助。二是桂林离湖南、广东前线较近，可以很快地把那里的俘虏集中到这里来进行教育和训练。

鹿地亘在桂林期间，各机关、团体、大学纷纷邀请鹿地亘去演讲。他的演讲给抗战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桂林行营派科长廖济寰中校协助他工作。广西省政府一姓万的委员，也经常为他作翻译工作。

后来，由第三厅的宣宝季担任他的翻译。宣宝季工作积极，他曾对鹿地亘说：“我愿意做你的宣传员。”

鹿地亘在桂林行营，大力宣传、构思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计划，得到了廖济寰，参谋处长、中将吴石的支持。吴石将军是位富有

正义感的军事学者，抗战胜利前后，曾任军政部秘书长，到台湾后，任台湾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1950年春，因主张组织祖国统一运动，被蒋介石派特务秘密杀害。

鹿地亘起草了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计划，得到了吴石的赞同。冯乃超即把计划送给重庆郭沫若等人审阅，他们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鹿地亘就请翻译宣宝季写成报告书，交参谋长林蔚、行营主任白崇禧。1939年4月初，这份报告书由白崇禧转呈到蒋介石手中。

在这份报告书中，鹿地亘主要述及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在桂林创办一个特殊的临时收容所，以收容、教育俘虏；二、明确表述了日本反战同盟的纲领。内容有：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反对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事独裁政权，建立和平民主的日本人民政府；公正的议和；中日两国互敬互助；维持东亚和世界和平，这是一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纲领；三、阐述了日本人反战组织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认定反战同盟是日本人的自主组织，中国政府仅是支援者，而不是主宰者。否则，就不会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信任，也不会对中国抗战发挥重大作用；四、反战同盟的经费由政府以补助金的形式支付。

在这份建立日人反战同盟的报告书呈上去以后，鹿地亘就和冯乃超住在一起（冯乃超的夫人因病回老家宜昌疗养），他们两人开始忙于日语短期训练班的筹备工作。到1939年4月，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鹿地亘写的日语讲义，已经印刷出来，从湖南、广东国民党部队中抽调来的约450名青年军官，和教师一起，已集中到桂林郊外的七星岩附近。

在训练班即将开学之际。贺衷寒等右翼军人叫嚣什么三厅管宣传，训练班应归一厅接管，并派出一姓黄的来接管训练班。这引起了已到桂林的不少青年军官的抗议和不满，使黄不得不聘请

冯乃超、鹿地亘为名誉教官。冯乃超、鹿地亘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接受了聘请。

第二节 国统区反战同盟准备会的成立

在等待蒋介石批准报告书之时，在桂林行营参谋处，正迅速做着成立反战同盟的准备工作。他们把在广东、湖南捕获的所有日军俘虏，开始集中到新设立的桂林临时收容所。

4月末，蒋介石批准了计划书，并命令政治部研究、实施这个计划。政治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第三厅。从桂林产生的这个计划，绕了一圈，落到郭沫若手中，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广西派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报告，若中央不采纳，那就只在桂林行营管辖下的西南地方实行，让广西派独占鳌头。这一点，蒋介石看到了，于是同意了这个计划，但通过政治部再到制订者手中。于是郭沫若紧急邀请冯乃超、鹿地亘去重庆。

在接到郭沫若的邀请后，他们决定立即去重庆，吴石也表示赞同。但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告诉他们：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他们两人去南岳为该班作一周时间的关于日本问题的特别讲座。当时他们正忙于建立反战同盟问题，想征求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意见，于是他们决定结束日语短期训练班的工作，先去南岳，回来后即赴重庆。

5月13日深夜，他们到达南岳招待所。汤恩伯等接见了他们。接着他们准备了讲义，登山游览，会见陈诚、周恩来、叶剑英、田汉等人。

在会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时，鹿地亘详细谈了建立日人反战同盟的计划。叶剑英说：“这可以先试试，小规模地做着看看。这方面还没有成功的先例，而且还会碰到各种危险的妨害者，这一点

请注意。而且，国民党是民族主义政党，要它很积极，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个工作实质上是有国际主义性质的事业。”^①

鹿地亘牢牢地记住了叶剑英反复讲的话：“千万不能忘记，国民党的本质是民族主义。”

冯乃超也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归根到底，是不愿为他国提供好处，只要有可能，就要使别的民族服务于自己。”

朝鲜义勇队的金世司来访。鹿地亘从中了解到：军政部派指导员（特务）对朝鲜义勇队进行控制，要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刺探日军情报上。这更加深了鹿地亘对国民党民族主义的高度警惕。

在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们先后举办了两周多时间的讲座后，乘车赶回桂林。然后乘飞机去了重庆。

1939年6月4日，鹿地亘、冯乃超到了重庆赖家桥郭沫若的家中。郭沫若让他们看了蒋介石的批语。蒋介石在计划书上用红笔作了修改，把“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会”中的“在华”两字划掉，并就经费和其它有关事项作了批示。他们三人就这个计划书的具体实施进行了研究。一致同意，反战同盟总部设在重庆，在军事委员会行营所在地桂林、西安等地设立支部。并决定先由鹿地亘去桂林筹建反战同盟支部，然后由国民政府决定，向反战同盟派驻顾问。政治部同时决定，由郭沫若任反战同盟总顾问。

1939年6月，郭沫若等人确定了计划的具体实施办法，但当时重庆复杂的政治形势捆住了鹿地亘等的手脚。首先是以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为代表的一些人，这时更起劲地反对建立日本人反战组织。其次，是国民党中的一些野心家，听到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书后，开始秘密策划，企图一手操纵和利用反战同盟组织。

^① 鹿地亘《如火如荼——到解放的道路》上册第221页，日本讲谈社1958年12月第1版。

第三，是以反战名义到达重庆的个别日本人，如青山和夫，投靠国民党特务组织、参加国民党，他们自己没能搞成反战组织，这时也开始反对鹿地亘领导、创建日人反战同盟。而把这三种势力联系起来的，则是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所长邹任之。

邹任之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当日本战俘问题引起世人瞩目时，他就企图以此获取名利。在收容所从常德向贵州镇远转移的过程中，他听到了批准组织反战同盟的消息，就叫孙必亨代理所长。从辰溪开始，用卑劣的手段引诱俘虏加入其所谓的“反战同盟”，一边到重庆有关部门大肆进行活动。

当时，在重庆的军委会军政部急需就近从新来的日军俘虏那里了解敌占区的情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急于向访问陪都的外国代表、记者显示自己以正义、人道立场“感化俘虏”的成绩。军政部也认为管理俘虏是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由俘虏来搞反战活动，不应由其它部门、其他人插手。邹任之通过游说，在得到上述三部门的支持和批准后，在重庆长江南岸约10公里的南温泉杨家村建立了第二收容所分所，取名“博爱村”，收容了从湖北前线转来的50多名俘虏。接着，又先后从镇远收容所带来已参加其所谓“反战同盟”的20名左右的日本人，住在杨家村附近的村子，取名为“正义村”。他抢在桂林之前组织所谓的“反战同盟”，企图以既成事实把日本人反战组织控制在自己，即军统的手中。

郭沫若、鹿地亘等人对邹任之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当邹任之邀请鹿地亘、冯乃超访问“博爱村”时，他们才知道此事，感到非常吃惊。鹿地亘立即向邹任之郑重声明：“反战同盟是日本人独立自主的团体，是协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它不涉及中国内政问题，它不和中国的任何政治派别发生任何特殊的联系。我们想先在桂林试验建立支部，然后建立西安支部、重庆总部，以后再派工作队上前线作反战宣传。先从桂林开始，也不是与桂林方面有

什么特殊关系。希望能得到邹先生的帮助。我已得到陈诚（当时任政治部主任、第十战区司令——作者注）的帮助，也希望能得到何应钦（当时的军政部长——作者注）的支持。我们很想得到尽可能多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但邹任之之流的打算与此不同。他们想把鹿地亘控制在重庆为其所用。他们竭力反对鹿地亘去桂林组织支部。军政部甚至放出空气，说桂林成立临时收容所是违法的，要撤销该收容所。王芃生、青山和夫也常去博爱村，找俘虏们谈话，一边搜集情报，一边宣传反战运动没有什么意思。

根据当时形势，鹿地亘考虑，若强去桂林，会不利于今后在重庆开展工作。因而决定等待时机，先接受邹任之的邀请，去博爱村工作。

1939年6月25日下午，鹿地亘、冯乃超来到博爱村，受到所长邹任之、沈起予（原左翼文化界人士）和姓忝的两管理员的欢迎。鹿地亘和约30名日本人开了座谈会，接着又多次去那里开座谈会。正义村的日本人也来参加。在座谈会上，鹿地亘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日本俘虏的心，使俘虏们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后来，鹿地亘多次来访，召开了座谈会。鹿地亘从这次战争是怎么开始的、是为谁而进行的、今后的结局将会怎样等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话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他的看法。他的讲话，意味深长。村民们都集中精力听着，散会后，大家都在考虑今后自己怎样做才好：是继续相信日本军部过去讲的那一套，还是听先生的。这些都应该认真研究、再研究。村民们决心进一步好好学习。

鹿地亘根据日本俘虏觉悟的情况，建议把一部分有觉悟的、愿意加入反战同盟者，带出博爱村，进行特殊教育、训练，使他们能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因为反战同盟与关押俘虏的收容所是性质

不同的团体。这就打乱了邹任之等的计划。他们坚决不同意，邹任之说：俘虏很多，在外面逃走怎么办？我忠告你，把同盟放在收容所里。

鹿地亘对此进行了耐心解释：“那样便于教育。把他们带到外面进行充分教育后，使他们成为同心同德的同志，以后我和他们一起上前线工作。”

邹任之还是一再强调发生逃跑事件谁负责，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有关机关长官的意见。他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同盟总部设在博爱村，外出时，称为工作队。工作完了，再回博爱村。以后，再由别人出去工作；同盟设在收容所内，你就不用有种种担心了。

鹿地亘不得已使用了“苦肉计”，做暂时的让步。他提出另一方案：“争取全体日本俘虏在收容所内加入反战同盟准备会，准备会员是正式盟员的候补期。在日常行动中对他们进行审查，从他们中挑选盟员。”

邹任之立即表示不同意，沈起予和新来的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的余先亮两位管理员也表示为难。冯乃超、鹿地亘、池田幸子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结果，邹任之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但它为创立真正的反战同盟做了准备，它正式否定了邹任之等过去抢先成立的所谓“反战同盟”，为以后在此培养、挑选合格的盟员，在重庆成立同盟总部做了准备。

1939年8月15日，在博爱村宣布成立日本人反战同盟准备会。准备会成立后，会员们还拍了电影片。原先在朝鲜人解放仪式上演出的话剧《新亚之光》，被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看中，建议拍成电影。这是邹任之求之不得的。他要鹿地亘参加指导，鹿地亘答应了。后来，在鹿地亘去桂林后，由邹任之一人导演，并担任主角，拍成了片子。这部影片成了极力吹捧国民党，美化邹任

之的专片。

准备会成立后，邹任之感到鹿地亘不像青山和夫那样可以控制、利用，就千方百计疏远他，甚至发展到经常寻找借口不让鹿地亘夫妇进入博爱村。青山和夫根据王芑生、邹任之的旨意，竟在会员中散布：鹿地亘是日本共产党的叛徒；我说实话，他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日本派来中国的；用俘虏搞反战活动是不会成功的。这表明，青山和夫已确实堕落为国民党情报机关的走卒，成为日本人反战活动的敌人。

在此期间，桂林行营不断来信、来电，催促鹿地亘即赴桂林，进一步筹备、建立反战同盟桂林支部。这和郭沫若、鹿地亘、冯乃超的打算是一致的，所以鹿地亘决定即去桂林。邹任之又一次反对。这次的理由是鹿地亘曾答应帮助拍片，而拍片子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鹿地亘不得不直言：我答应在此工作两个月，现在已超过三个月。我到桂林去，不用三个月就可以回来。

在鹿地亘不断收到桂林来信、来电的同时，在博爱村已开始拍摄影片镜头，鹿地亘趁机提议：“《新亚之光》影片中，不能没有反战同盟的镜头，我们今晚召开反战同盟准备会成立大会。你在大会上作指示，这些都可以拍进去。”这了对邹任之的胃口，于是在当夜召集准备会员大会，虽然没通过什么文件，但是正式宣告了反战同盟准备会的成立。

第二天，当鹿地亘将离开博爱村时，他向 50 多位日本人说：“我去桂林期间，一定使那里的全体人员都成为候补盟员，我一定全力去做。希望你们这里不要出现一个落伍者。大家都要努力获得盟员的资格。让重庆、桂林等地展开比赛吧！”

9月初，陈诚返回重庆，立即接见了郭沫若、鹿地亘。陈诚先听了小报告，加上派系关系，不甚同意鹿地亘去桂林。郭沫若做了解释：反战同盟总部设在重庆，它是个单一的组织，希望政治

部和部长多给一些支援。鹿地亘去桂林，只是在那里进行建立支部试点，不是住在那里，在那里搞完试点，马上回重庆，然后再建立别的支部。……陈诚了解到真实情况后，立即同意鹿地亘去桂林，并为他预订了飞机票。这样，鹿地亘在9月6日乘飞机离开重庆，去了桂林。

第三节 桂林西南支部的建立

在重庆决定由郭沫若担任反战同盟总顾问的同时，在桂林，决定由吴石负责过问组织日人反战同盟支部一事。

在桂林，由廖济寰、宣宝季负责，在市中心宪兵队司令部内设立了临时收容所。到6月份，已集中了50名左右的日军俘虏，他们是从镇远收容所、上饶、广东、湖南等地转来的。

1939年3月，日本驻河内领事馆书记员盐见圣策，在镇南关越境，到中国一侧偷拍国境线附近运输路线、军需物资集结情况的照片，被中方逮捕，临处死前，由于廖济寰、鹿地亘的多方陈述，对其进行教育，使其改变了立场。并由吴石保证其人身安全，安排到参谋处工作。

5月，中山泰德因酒醉打死军官而逃到中方，也加入了反战同盟准备会，参加了收容所的管理工作。

在此前后，到达的还有木冢、小林、涩谷、伊藤、北、西村、河田、雾岛、小岛、岩本、大户、阪本、土井、羽岛等。

这时，重庆的幽灵也到桂林显灵了。行营政治部高喊反战同盟应由他们管辖，攻击参谋处越权、抢权。迫使吴石、廖济寰把临时收容所，以及帮助同盟的工作移交给政治部。政治部先派朝鲜义勇队秘书周世敏来管理收容所，当教官。后又由贺衷寒系统的年轻职员麻生哲来当收容所所长。

麻生哲是留日学生，曾参加衡山的留日青年训练班。日语流畅，但好游玩。因而，他虽然带来了从广西大学毕业的朱、周两位管理员，工作仍抓不起来。

麻生哲到收容所后，就把收容所改名为苏生学园，在俘虏中间努力用物质优待来钓出反战分子。当鹿地亘到收容所看望时，麻生哲向他介绍了三位为首的反战分子：一位是姓北的原大阪刑务所的看守员；一位是姓久山的东京巡查员；一位是姓吾妻的宪兵队书记。给人一个总的印象：他们都是日本警察系统的人员。

麻生哲拿出俘虏的名册、履历书，吾妻写给鹿地亘的要求书，以及北写的感想文等等。

有一篇名为《苏生》的文章，吹捧麻生哲所长是“感化院院长”。

在收容所，鹿地亘会见了汐见洋（后改名为坂本秀夫），得知他是主动逃到这一边来的，战前，他和朋友一起参加了劳动者合作团体，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后来他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情况的详细报告：

关于我的情况的报告

汐见洋

逃亡前，中国战场中部最前线的状况：

军司令部命令在前沿阵地建筑半永久性或永久性的工事。有的地方构筑了碉堡。有的团配备了枪刺防具。后方日军 149 团所在地，距前线 7000 米处，堆放着建筑兵营的木材。从前方的架设措施，转移到南昌后方的情况，看不出中部战线向前推进的意向。长沙方面有进攻的打算。其他各线，均有国内的替换兵员来到的报道。

我于 1939 年 7 月 23 日逃离日军部队。

我所在的机关枪小队，有 4 个分队：两个分队驻在狭溪湛的小队驻地；一个分队作为预备分队休息、待命；另一个分队配置在前线胡家，协助第 149 团的某中队。

逃离情况

中部战线有很多无人居住地带，我所在处，也是无人居住地带，只有极少数做苦工的当地人在军队里干活，一起居住，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当地人。特别是夜间，在步兵哨警戒线的后方，很少有人影。我利用半夜12点钟时的黑夜逃跑。先猫腰友军步兵哨线的空隙处，躲藏在中国军队防线前百米处，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中国军队方面打来三发子弹，似命令我停止前进。日军子弹打来，擦过我的大腿，负了轻伤。

到中国军队后的经过

从连部、到营部、到团部，在这一天中，到达40师司令部。没有捆绑，没有迫害，护送时我可以自由活动。这天夜宿于师司令部。第二天出发，去临川县的第32集团军司令部，途中住了一宿。26日午后到达该司令部。停留三天后，30日坐汽车去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

至今的情况和感想

越过中国军队的防线，意外地看到了不知战争气氛的大陆悠悠地勤于耕作的农民。仅隔一个堤防，此处却呈现出一片和平景象。我对连吃败仗的中国军队，在此保卫和平的伟大精神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越境后，我在堤防旁坐下时，二、三十个中国兵稀奇地围着我，不加以伤害。我在地上写了：“我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兄弟啊。”他们看后啧啧地露出了亲切的神色，问我饿不饿，送来了饭、鸡蛋、茶水。那里的团长穿着便衣，像传说中的共产党员的样子，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背说：“辛苦了！辛苦了！”

第40师司令部给我颇为优等的待遇，我对在最前线用饭、鸡蛋、茶水款待我的弟兄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前线，战时气氛很浓，沿河两岸，都挖掘了散兵壕。走过实行灯火管制的黑暗的道路，到了第32集团军司令部。32集团军对我的来到非常高兴，参谋们很友好地说：“你是中国的忠实朋友！”在司令部住了三天，早晨由一名校官、三个卫兵，用汽车护送我去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午后到俘虏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生活状况和桂林收容所差不多。我在这里患了急性痢疾，身体非常虚弱。

我的逃跑，是由于反战思想、人道精神使然。然而，自己有时又不免讥笑自己的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思想、信念，主观与现实的行为不相吻合，精神苦恼，因而才有了独自出逃，企求寻找一个自由境地。所以我来此后一直希望当局能允许我开拓荒山。第三战区参谋处的莫先生赞同我的想法，表示尽力为我从事开垦事业给予帮助。这时，我的心

境大大开阔了。

这不是思想的转变，只是精神的转变。那是应第三战区政治部莫先生的要求提笔写了抗日宣传资料，这决定了我的生涯，同时又成为我精神转变的证明。我以我写作的体会打消了我过去的可笑想法，为了与中国一起打倒共同的敌人，希望在后方与成为日本革命势力的同志汇合。我既已下定决心，就全力以赴！我将为我的信仰去与一切不符之物进行战斗……

到桂林

第三战区的莫先生说：“为了表示我对你的信任，你去桂林时可以请你转送我的信。”我内心期待着，一到桂林就可以马上见到同志们。而现实却是，我入了臭气熏鼻的小室，不自由地蜷居着。其后，会见了在行营参谋处工作的盐见同志，由于他的疏通，转移到现在的收容所。入所第二天，政治部麻先生找我时，才知道第三战区发的信，还没到此。为了表明我的思想，把带来的资料原稿和一份感谢信交给了他。后来，通过麻先生，我几次向当局要求允许我做我尚没有做的事情。

还有个俘虏叫川本邦男，他到桂林收容所后，思想有不少觉悟，他写了封信给鹿地亘：

“我于去年（1938年）9月28日被俘以来，曾考虑逃跑。因为过去不断听说：中国军队非常残暴，一逮到日本人，不是烧死，就是枪毙。我现在不行了，只希望年老的母亲和妻子能过上安乐的生活。

当我来到桂林，才开始真正认识中国，知道自己过去的想法的错误。我只从个人考虑，没有着眼于大局。真正的爱国者，个人的事情就变得次要了。现今的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日本叫作正义的战争，叫喊是为东亚的永久和平而战斗的。我想了这个问题，我在来桂林的路上，在船上、车上，在住宿处，都受到这样的质问：“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为什么打中国？”最初我想反驳他们，然而我深入想一下：中国是因什么原因被侵略的，为什么原因挨打的呢？现在我知道自己从根本上错了。这样地叫喊什么为了东亚和平而使用武力，进行侵略，其结果能保卫东亚的永久和平吗？若以侵略暂时得到和平，那决不是真正的和平。从侵略者来说，被侵略者不应反抗、斗争，去夺回失去的东西。这样的国策，显然是错误的。我认为，尽快从中国领土撤兵，返回自己的国内，这样在中国停战，取得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

政府应是求国利、造民福的。但日本政府一年耗费七八十亿的巨款用于战争，而且还搞什么爱国储金、国际献金、为出征士兵维修房屋等

等，使人民不堪重负。而且不知这样的巨款支出，何时可以终止？看国际形势，大正年间，欧洲大战给日本带来了好景气。现在欧洲大战开始了，这个好景气好像要来时，叫嚣长期战争的少数人投入巨额费用，使很多人战死，这是政府该走的路吗？这不是混蛋吗？不要欺骗我们百姓，应该要求尽早结束战争，现在是促使国民党醒的时候了。我过去完全错了，由于先生的指导，我开始了改变，走上了新生之路。对于我的感想，请先生予以指教。希望能赐予我必要的学习资料。

鹿地亘连续两个月出入于收容所，和各个俘虏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所内详情。他发觉：所有的日本人都看着麻生哲的脸色行事，为求得物质优待而投机的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深。利用这个沟的加深，顽固分子集团实际上左右着收容所，他们对不跟着走的日本人不断施加压力。以盐路为代表的顽固派，秘密组织了观音经读经会，引诱、迫使很多人参加。接着盐路向麻生哲提出：“我们不是罪犯，不必苏生，请撤回苏生学园的名称。”盐路被监禁后，有的人竟主动要求和他同受监禁。盐路回来后，立即开始了对日本人秘密严格的统治。

这些情况，引起了鹿地亘、廖济寰的忧虑。鹿地亘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进展，时间不容再拖下去，否则，当时好不容易打开的突破口会被封住。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更换收容所中现在的中国负责人。

廖济寰在努力捕捉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有一天，一个中国方面的炊事兵，叫一个俘虏用香烟换他的盐。炊事兵拿到了香烟，而俘虏们的菜里却没有了盐。此事很快被发现，廖济寰非常震怒，痛斥了炊事兵，并责其检查。趁此机会日本人也向鹿地亘、廖济寰诉说对生活上的种种不满。这样，麻生哲管理上的腐败就被揭了出来。

廖济寰抓到确凿证据，立即向行营当局作了报告。麻生哲被逮捕、关押。因此事而丢脸的政治部，在行营内外舆论压力下，不

得不把收容所管理权交还给行营参谋处。

鹿地亘、廖济寰商定，为了排除外来干涉，把希望参加同盟的人转移到别处，和鹿地亘住在一起，施以特别的教育和训练。

吴石为同盟设置了顾问室，任命林长壙为常驻顾问。林长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孙子，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国民党上校，和廖济寰同为吴石的得力助手。

经过调查，林长壙决定把桂林南郊七星岩上无人居住的旧庙——南岗庙作为盟员的住处，并对南岗庙进行了较大的修饰。行营派来了几名顾问室职员以及卫兵、炊事兵等，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南岗庙外有大树，门口是个楼门，挂着有香味的厚木板做成的牌子，上有两行字：“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楼门内，右侧是卫兵住处，左侧是日本人寝室，里面放了三排棕绷床。过了中庭，再上几个台阶，是庙殿。内有饭桌、办公桌，这里是食堂兼课堂，庙殿左右用砖隔开，左侧是鹿地亘和林长壙的寝室，还有文书的住房。右侧是妇女房间，住着沟口（即浅野恭子）；其后是伙房。庙殿后面的树林中建造了浴室。

1939年11月中旬，以坂本秀夫、川本邦男为中心的11人，在收容所获得解放，移到南岗庙，开始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准备会的工作。这11人，除坂本秀夫、川本邦男外，还有原在神户、横滨一带以外国人为对象的酒店招待员浅野恭子；曾当过东京日比谷警察署警察的大山（即久山）；东京出生的原公司职员鲇川诚二；原青年学校教官鲤本明；原神户工人佐佐木正男；原京都西阵职员坂井敬二郎；农民樱井胜、南部实；还有鹿地亘救出来的年轻人源正胜（原名众池田）。

当天晚上，大家在食堂里参加了由林长壙举办的欢迎宴会。林带头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与和平干杯。鹿地亘接着说：“中国抗战胜

利万岁。为了中日两民族兄弟的将来”，也和大家一起干杯。

宴会后，在中庭召开了准备会第一次会议。鹿地亘在会上说：“从现在，在这里我们开始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准备会。……我们现在只有 11 人，但很快会超过这个数。这是个新的历史的开始，是史无前例的。现在我们是小小的集团，但很快会成为几百、几千、几万人的团体。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责任牢牢地铭记在胸……”

有人建议唱歌，但唱什么歌呢？坂本提议：“请先生为我们创作个同盟歌，好不好？”

南部附和说：“对，我们每天早晨起床集合就唱同盟歌。”全体一致通过，请鹿地亘创作同盟歌。当晚由鹿地亘教大家唱了一首日本革命歌曲。

在这次会议上鹿地亘提议，经大家同意，由坂本担任支部代表，坂井担任会计，鲤本明担任纪律委员。

此后，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集合唱同盟歌：

铁的意志，胜过岩石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
战胜敌人
我们是人民的先锋队。

接着，由坂本指挥做体操。午前和晚上为学习、工作时间，午后散步，做竞走等体育活动，为上战场做准备。

在这一时期，大家学习了《论帝国主义》的讲义，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第 18 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论述，获得了分析战争将如何发展的能力。还学习了日本近代史。并由何文书给大家讲授汉语。

为了加强对收容所的管理，11 月 27 日，鹿地亘、廖济寰决定将所内顽固派的首要分子伊藤慎之助、北义雄、白井康雄、雾岛

一见四人押到别处隔离教育。

准备会用铅字印刷了机关刊物《人民之友》第一号。负责印刷、装订工作的是源正胜和南部。

准备会还决定在12月底召开支部成立大会，准备同盟的纲领、规章草案等。鹿地亘用全部精力办好盟员的政治教育研究会，以不断提高盟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

准备会员还轮流去收容所，在以前的朋友中展开工作，扩大影响，使他们安下心来。这对一些人，特别是新来的俘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不少要求参加同盟的人。

准备会成立和活动的消息传到桂林各界人士耳中，南岗庙成了中外来访者访问桂林时一个必去的地方。

准备会机关报第一号的社论是这样写的：

“在《人民之友》创刊时告同胞

……

日本人民在与企图用封建主义来统治这个近代社会的支配者作了不屈不挠的流血斗争，经过某些妥协，获得了宪法，得到了初步的民权。

在与近代帝国主义日本发展的同时，人民的声音强大了，绝对制权力的基础动摇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的人民中的新阶段，始终把实现全部民权公然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战斗。但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集中全力来镇压人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战争是以防共为借口，从攻击东亚各民族，发展到以武力破坏过去列强势力范围的东亚秩序，并继续向国际战争阶段突进。这样，财尽力竭的国家和人民怎么办呢？

人民一定要有勇气。我们要毫不犹豫地首先夺回“人民之声”。我们高呼：解放日本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反对给人民带来饥饿、死亡的侵略战争；打倒人民的敌人！

这是我们献给亲爱同胞们的第一声！”

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坂本秀夫、鲇川诚二、佐佐木正男、坂

并敬二郎的诗及文章。

林蔚参谋长、吴石参谋处长等为《人民之友》的出版送来了贺辞。

1939年12月，日军从中国南海岸向广西的十万大山进攻。吴石带了参谋处的一部分人去了前方。不久，吴石就提出：“尽快组成反战同盟，待机上前方工作。”

根据这一要求，同盟准备会加紧了学习，增加了登山和急行军等体能训练，制作了将在南方战场上使用的传单和其它宣传品。

12月中下旬，吴石急电鹿地亘，要其早日带领反战同盟同志奔赴前方。

根据这一要求，鹿地亘决定：由坂本秀夫、樱井胜、南部实、鲇川诚二、佐佐木正男和他自己共六人组成工作队，廖济寰代表参谋处与工作队同行。其余的人作为留守队由大山邦男负责。

临行前，廖济寰想方设法搞到了手摇发电机、扩音机等广播用的器材。

1939年12月25日，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仓促地举行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西南支部成立大会。

大会通过了宣言：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会宣言

我们在这里宣告：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了。这是近来准备的所有在华日本人革命反战同志团结的先声。这是位于中国西南战区的支部。在亚洲东部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由于中华民族的不屈的抗战陷入了长期对抗状态。日本帝国主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正在加深，已经有近百万日本人流了血，中国几千万人民在战火中遭受杀戮，陷于饥寒。而且更大规模的战争乌云正在笼罩着亚洲东部。今天，我们日本人民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砍掉战争挑起者的双手、双脚，防止、结束这场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

……

我们决不认为这场战争如日本军阀所宣传的，是由于中国的敌对而

引起的不可避免战争；决不同意军阀们宣传的：今天的战争，是民族战争，是日本民族发展不可避免引起的摩擦。军阀们公然宣传他们侵略战争的目标，是“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就是说，他们企图独占东亚，使那里的人民都成为奴隶。他们一面扼杀东亚各国的民族独立，一面一贯地在东亚争夺帝国主义列强的既得利益。这样的计划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奇想，实是几年来不断地一步步推进的阴谋。

日本人民不会忘记，这个时期，从掠夺满洲开始军事行动的同时，整个国家忽然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劳动监狱。所谓“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化期”的继续，是国家、人民的财富全面被掠夺，这促进了日本工业的军事化。国家准备的黄金被用光了，就盲目地滥发“赤字公债”。为了军备，人民生活必需品极度缺乏。由于军事工业以外的一切生产遭到抑压，广大的中小企业者和有关的广大工人陷于失业。很多工人成为军事工厂监狱的奴隶，在超强度的劳动中和艰难的生活下呻吟。农民们所需肥料和其它生产费用迅猛高涨，而且还被迫交纳重税，过着欠债、贫困的生活。而且还有很多劳动者被征集作为“肉弹”输往战场。

在疯狂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同时，在国内，对一切不愿俯首帖耳、不愿做奴隶的人实行了恐怖政策，许多人被投进牢狱。日本已成为少数野心家及其走卒所支配的一个大军事监狱。

为什么要推行如此疯狂的侵略政策呢？不言而喻，是为了实现军阀们独霸、奴役亚洲东部各国的迷梦。他们在把日本人民作为奴隶，强迫他们作“肉弹”去牺牲的同时，还企图奴役中国和全部东亚国家。他们终于在东亚引起了史无前例的悲惨的大流血。不愿做奴隶的中华民族，一边忍受着巨大的牺牲，一边奋起抗战，现在已经战斗了二年六个月了，使侵略者陷入了这个全面抗战的汪洋大海。同时，由于其侵略损害了在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各国的利益，因而也必然地使自己陷入不能自拔的国际危险境地。日本人民应该预想到即将面临的危机而奋起挽救日本人民的国家。

各位同胞！各位中国朋友！反对日本军部冒险政策的各国友人！我们作为所有在海外的日本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向各位报告在这里我们组织起来的情况。

当我们向前线行动时，我们声明：我们的行动基础是置于下述明确的认识上面的。

第一个方面，这次中国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抗战是和我们日本人民的自由解放的目的完全一致的。中华民族赞成、支援日本人民的解放。

我们把中华民族作为日本人民的朋友，坚决援助他们的抗战。

第二个方面，我们是日本人民革命在海外的一个支队，我们当然接受国内革命运动的指挥。从协助中国抗战的关系上来说，为了和友军统一行动，我们理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指挥。同时，就我们为促进、完成日本人民的革命来说，应有独立的目的。

我们的初步目的是：

第一，立即停止侵略战争，立即撤回派遣军。

第二，打倒军火资本家、军事冒险者的奴才——官僚政府！

第三，确立完全的民权。保障言论、集会、结社、文化、教育的自由。

第四，救济在战争机构压榨下呻吟的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等劳苦大众，改善他们的生活。

第五，国家保障为战争作出牺牲的人和他们的家属的生活。

第六，为了实现上述要求，应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建立日本人民政府。

我们一定会在中国人民的协助下，为这个目的的完全实现而大步迈进！我们紧握着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和人民伸过来的、热烈援助的手。我们在国内人民革命指引下，扩大这个组织，使之成为在华全体日本人有规模的组织，以完成中国、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友人与日本民间的强有力结合纽带的伟大使命。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 坂本秀夫、大山邦男、鲇川诚二、佐佐木正男、樱井胜、浅野恭子、松山速夫、坂井敬二郎、南部实、鲤本明、源正胜。

总部代表 鹿地亘

第四节 工作队 在桂南前线

西南支部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939年12月26日清晨，工作队在空袭警报声中乘坐拖拉机奔向战场。经过两天到达驻迁江的司令部，会见了吴石，了解了战况，并决定了行动计划。

工作队到前线后，参谋处邓参谋领他们去看了一个叫小山胜之助的俘虏。他是日本岛根县人，家中有父母和姊弟九人，他排

行老二，家中十分困难。入伍后随第5师团来到中国华北，平型关一役，一个团几乎全军覆灭。后驻青岛，到诺蒙坎，伤亡惨重。后回日本宇品，以为以后再不上前线了。谁知补给后，又开到中国华南来。现在各据点已被中国军队包围，弹药已经用完，食品欠缺。他受重伤被俘。被俘后他想死，经过盟员的劝说放弃了死的念头，并被参谋处送到后方野战医院。

1939年12月28日夜，工作队去最前线侦察了地形。在昆仑关前，我军大部队包围了日军一个联队，其退路已被切断。工作队就在此形势下展开了工作。

他们来到第5军第21师121团团部，了解了战斗情况。第二天晚上到了最前线，在山棱附近的低矮处安装了扩音器和手摇发电机。

首先是廖济寰对中国士兵讲话。他对中国士兵进行鼓励，说明对日军广播的目的，请他们不要误解。他说：“英雄的中国官兵们！为求民族生存的英勇抗战的中国官兵们！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为了向敌人说明日本发动战争是违背人道、违背正义的，以此唤醒日本士兵的良知。用日本话向日军广播，请大家不要误解。”

接着，营长也讲了话：

“兄弟们，刚才讲的话听懂了吗？下面由日本的反战同志用日语向敌人广播！广播中，不要放松对前方的监视！敌人不攻击就不要射击！不要射击！敌人已被我们包围，敌人已不是我们的对手。监视前方，懂了吗？”

鹿地亘开始广播，他说：“同胞诸君！日本兄弟们！我们是日本人，大家是同胞！这个战争，是国家、国民的大不幸，是场非常不幸的战争。我们日本人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日本人民努力求和平。首先，我们从心里向各位问好！在这里，我想向大家讲点事实。”

鹿地亘讲了俘虏小山的事。从他的不幸说到他的俘虏生活。指出小山的不幸是大家的不幸；详细谈及他的俘虏生活，使他的战友们安心。

“各位，停止战争吧！保护好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父母、兄弟、姊妹……”

对方“哒哒哒哒”打来了一阵机关枪子弹。

他继续说：“我们希望的，是小山君和各位父母的安心、幸福，是和平的祖国。你们自己可以救父母、弟妹。大家不要再进行战争，同胞诸君，多么美好的日月，多么静寂的夜晚，为了父母、故乡，请各位好好想想吧！”

21师陈参谋说：“作为中国人，我听了很激动。日本人不可能不受感动！”

鲇川以他自己的名义讲了“为了祖国”。

佐佐木从他自身开始讲起：“我是川崎造船厂的职工。在战地，大家一定认为修理飞机、坦克的职工一定很好，一定有很高的待遇。那还是一张红纸，一个月八元八十分钱。有这样便宜的事吗？我们是战场殉葬品。大家起来，停止这场战争吧！”

南部实讲了自己的经历。

樱井进行了慰问广播，唱了流行歌曲：

“这以后，
看不到孩子了；
第二个春天又来了，
但那不是孩子的春天啊！
……。”

他们看表，已经是半夜11点。他们决定继续广播。鹿地亘接着讲了反战同盟的目的，向日军士兵是否同意。“若赞成的，明天天明时，各位可以到这边来，把帽子放在枪口上，我们保证其人

身安全。”

有人要到前方日军阵地上去进行联系，鹿地亘认为太冒险，制止了这一行动。

第二天中午，工作队进入山林，在日军遗弃的尸体上寻找日记、信件等，为第二天夜里的广播准备材料。

1939年12月30日晚上的广播中，工作队一边追述第5师团的历史，一边揭露军部的战争目的。讲了两国人民陷于无穷的苦难，官兵们没有丝毫前途，被迫去做牺牲品；讲了宇品的街道和山河以及在那里等待他们归国的亲属；讲了关于他们战友小山胜之助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等。

接着他们广播：“我们，作为在异国死亡者的同胞，整理了战死同胞的衣物，看到有很多信件和日记等。战死的同胞有不少人都是把这些信用手紧紧地捂在胸前死去的。他们是多么想念亲人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请大家静心地考虑考虑。

我们看死者的日记和信件，心不断地嗵嗵跳着，不断地流下眼泪。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悲伤的父母。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国民，这，你们是有勇气判断的。救救你们自己吧！救救你们的父母、弟妹吧！”

对日军的广播也使同盟成员受到了感动，廖济寰、坂本等也都流下了眼泪。

大家都认为广播一定会在日军中产生效果。但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快来到工作队面前。中国官兵对这些日本人表现出十分亲切的友情，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整个前线都称他们为“日本兄弟”。称他们的广播给中国官兵增强了勇气。部队都出来欢迎他们，请他们到驻地去。听说鲇川、坂本原是机关枪手，21师立即请他们去讲怎样进行对空射击。

广西大学的男女学生来到前线，协助做各种工作。他们借了工作队的扩音机向中国士兵作宣传。

活泼的姑娘们在树林中和队员们一起唱歌、谈论。樱井唱了日本的流行歌曲给她们听。

晚上，第5军杜军长设新年宴会招待全体同盟盟员。下午五点在司令部会客室，军官们、苏联军事顾问、全体工作队员参加了宴会。杜军长亲切地与每个工作队员握手。他在宴会开始时说：“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意外顺利地到达昆仑关。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光明的1940年干杯！”

第二天开始，工作队随部队向昆仑关推进。

第五节 三位队员的壮烈牺牲

鹿地亘因急需去重庆建立反战同盟总部，于1940年1月5日返回桂林。在桂林发表演说，介绍工作队在前线的活动和成绩，这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1月10日，鹿地亘乘飞机离开桂林，抵达重庆。

鹿地亘赴重庆后，工作队由坂本秀夫领导。不久，林长壠带着大山、松山（被捕的台湾人，翻译，原名陈松泉）来到前线，坂本即返回桂林。根据白崇禧的命令，廖济寰带着佐佐木正男去游击部队，深入到日军后方刺探日军情报，了解南宁日军动向。这项工作，由于日军增援的骑兵部队突入我后方，游击部队抵抗不力，从而引起我军全线溃退，因而这项工作没有得到什么进展。

在后退中，松山大腿受伤，大山、鮎川主动要求用担架抬着松山。他们在村里休息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大山、鮎川、松山同时牺牲。三位工作队员的牺牲，在前线、在国内外引起了震动。

工作队回到迁江前线司令部，白崇禧、吴石两位长官非常痛心，他们设宴招待了全体工作队员，并向工作队赠送了购物的款项。

在重庆和桂林，分别为三位烈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5月2日，吴石在桂林举行的追悼会上献了祭文：

“维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二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桂林行营总顾问吴石谨致祭于桂林前线殉难烈士松山、大山、鲇川三同志亡灵曰：

大和浩劫，产此鸱鸮，兴戎误国，荼毒生灵，侵略华夏，师出无名，压抑人民、墨动大兵，民生凋敝，农作不兴，灾黎遍野，哀哀其鸣。懿欤烈士，先觉天民，蒿目时弊，急谋自新，誓除军阀，极溺国魂，一致反战，联结同盟，昆仑广播，警惕愚顽。正义浩荡，河岳星辰，无朝不吊，斩丧鸿勋，闻者哀悼，风悲日晕，英灵不灭，长存永生。

尚飨。”

工作队上桂南前线后，留守队开始还照常学习和工作。但后来，留守队负责人大山和浅野恭子发生暧昧关系，而且队员们也逐步增加了物欲。工作队回到桂林后，受到各界的称赞和慰问，以坂本为首的不少人逐渐地滋长了骄傲情绪，和顾问室林长壠也发生了矛盾。

在一次同盟召开的会议上，宣季宝对此提出了一点批评，坂本公开表示不接受。这引起了宣季宝、廖济寰的不满。鹿地亘立即来信，对坂本秀夫等进行教育，使他们及时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改变了态度，并主动向廖济寰、宣季宝作了检查，双方关系比过去融洽了。

为了改变西南支部的空气，让盟员更好地接受教育，西南支部公演了《三烈士的殉难》。接着，廖济寰又请鹿地亘写了日语三幕话剧《三兄弟》。经过几次修改，以募集慰劳中国前方将士基金的名义在桂林军民中公演。

《三兄弟》一剧的内容：

第一幕：1938年冬天，宫本家中。这一家有一老母亲和三个儿子：一郎、二郎、三郎。一郎在军需厂当工人，上夜班没在家。三郎是反战分子，原是工厂工人，因反战被政府发觉，不得不躲藏起来从事地下活动。二郎被征去中国战场，临走时流泪骂三郎不是兄弟。三郎非常伤心，但仍不改初衷，一心从事他的反战工作。

老母亲久病卧床不起，一个原因就是日夜思念在战场上的二郎。

一郎是个老实敦厚、安分守己的工人，二弟出征，三弟外逃不能回家，使全家的重担全落到他一个人的肩上。物价飞涨，生活日益窘迫，于是他怀孕的妻子也不得不去做繁重的工作，终因劳累过度，加上有孕在身，最后病死。母亲也因过分悲恸，又想念二郎，从此一病不起。

由于生活费用剧增，加上给母亲治病，一郎家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终于连房租也交不起了。而且，在他家四周还布满了便衣警察，准备逮捕回家的三郎。

宫本一郎家近于家破人亡。这是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在当时，像宫本家一样，过着地狱般生活的家庭比比皆是。相反地，日本军火商人，财富越聚越多，所谓“军需景气”正是当时日本经济的一种畸形状态。因为“军需景气”，在军需工厂做工的宫本一郎就更加倒霉，大批农村失业者到军需工厂做工，依然赶不上军需生产的需要。军火商人用维护“东亚新秩序”的名义，不但压低工人工资，并且强制工人日夜做工。许多工人一下班就累得倒在地上；有的工人休息、大小便时也酒醉似地东倒西歪。工人们从心里痛恨战争，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不去日夜做工。

邻居的姑娘、二郎的未婚妻光子上班前、下班后都要来帮助照看二郎的母亲。这天早晨，光子又来看望老母亲，看见有的药瓶空了，就要去买药。老母亲因没钱，说不用买，但光子再三说要去买，老母亲不得已把买药的地方告诉她，并说：“钱，以后再给你。”

光子出去时，顺便看了米桶，原来一郎家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

光子出去后，房东的当差又上门来讨房租。一郎家实在没钱，但当差的就是要钱，因为一郎家已有三个月没交房租了。老母亲对他直说好话，请再宽限一段时日，当差的却百般嘲笑她和做反战工作的三郎，并扬言，再不交房租就请她搬出去。正当这时，做完夜工的一郎回来了。当差的向一郎要房租。一郎说家有病人，可不可以待发工资时再交房租，当

差的不允许，并且说现在正是军需景气的时候，一郎在军需工厂做工，怎么会没有钱呢？一郎非常生气，而这家房东正是军需资本家，这更使一郎火上加油，便和当差的理论。当差的以赶快搬出去相威胁。一郎无法，只得陪笑脸，而当差的却更加抖起威风来了。这时，幸亏来了一郎的几位朋友，当差的一见人多，立即改变面孔，换上一副笑脸。一位会说话的朋友说了几句好话，把当差的哄走了。

母亲和一郎非常感谢友人的帮助，友人们劝他们不要难过。

第二幕：一个星期日的黄昏，一郎出去买做夜饭的蔬菜，光子照例来看母亲。母亲病更重了，她在病中很想念二郎，甚至在梦中说二郎就站在身边，胸前还流着血，这使光子非常伤心。后来老母亲醒过来了，光子问二郎有没有来信，她从枕头下取出二郎的信让光子读给她听。信中提到：光子寄去的她亲手绣的作为护身符的手帕已经收到，这使一老一少感到很高兴。但信尾说：“秋天寒风已冻手脚，不几天还要出征去××山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战。我睡在床上不能入眠，听到秋虫的鸣叫声，便在脑海中浮现出亲人的面容。这次战斗，我大概不能生还了。”

看完信，光子便哭了。母亲强压悲伤安慰她，说二郎一定会回来的，叫她放心。

这时，忽然有人敲门，原来是街公所的办事员送来了黑帖——二郎战死通知书。光子一见通知书，立即悲恸得几乎晕了过去。办事员照例说了一套什么“战死光荣”之类的话。办事员一走，光子就扑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起来。

不久，一郎买东西回来，看到屋里的悲惨情景，便明白了大概。他拾起通知书一看，原来二郎是在8月21日战死的。光子一边哭，一边告诉一郎，二郎才来过信，是8月15日写的，他写信后六天就战死了，说完又痛哭不止。一郎也很伤心，他找出二郎的照片，点香祭奠二郎。这时，二郎的朋友们得知消息，一起来祭奠二郎。

虽然如此，军阀的魔爪还是继续伸向这不幸的家庭。正当他们在祭奠二郎时，街公所的办事员又来了，他从皮包中拿出写在红纸上的召集令，说这是“皇上的御召，是一家人的光荣。宫本一郎于明天午前8时入营”。说完扬长而去。一郎一家和朋友们如闻霹雳，随即怒不可遏。当办事员出去时，有人在他背后大骂：“这个地狱的使者！”

第三幕：当夜一郎和母亲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一郎想到国内出征的人，只有出去，没有回来，长此以往，他的朋友们大概也会先后被征出去，国内只剩下老弱病残了。母亲在想着二郎，想着二郎

与光子结婚。就这样，母子俩通宵未眠。天没亮，一郎就起床整理行装。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不待一郎开门，闯进一个男子，帽子几乎遮住了眼睛，竖起的衣领挡住了面孔，原来是三郎。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向出征的一郎告别。三郎抹着泪痛苦地向一郎说明压迫者的罪恶，人民不团结起来抗争就不能生存的道理。一郎和母亲担心便衣警察撞进来，一再要他快走。这时光子来送一郎出征，三郎见了光子，立即面谢光子看护老母的恩惠。光子以阿姊的身份力劝三郎离开。

突然，便衣警察冲了进来。三郎想从后门逃走，但后门也有便衣警察看守。三郎伸手到口袋里去拿枪，便衣警察却抢先下手，把三郎拿枪的那只手打断，随即把三郎捆起来，打骂不止。

面对这一突变，别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三郎却镇静如常。便衣警察说：到了狱中，再和三郎算账。便衣警察在得意之际，自满地夸口说他们知道三郎是个孝子，所以他们有意把三郎一家弄得哀号连天，借此引诱三郎回家。原来二郎战死的黑帖送来后，接着就来了一郎的出征红帖，是个阴谋，是引诱三郎立即回家，以便逮捕他。

三郎听了怒不可遏。他告诉母亲，如果有人问起他，就说被疯狗咬了，受了伤。便衣警察受此讽刺，恼羞成怒，又将三郎毒打了一顿，然后带走。

母亲受此打击，三郎离去后即悲痛地死去。

天渐渐亮了。光子的伏在母亲身上痛哭，一郎呆坐在地。屋外口号声渐近，原来是街民来欢送一郎出征的。来人看见屋里有血，惊慌起来。一郎悲痛地向街民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房东的当差抢着说：“你妈的事有我们负责，请你放心地出征吧！”

一郎听了这话，啼笑皆非，说：“不用，那个用不着。”他指着死去的母亲说：“母亲是给迫害死的，我今后到哪里去都可以了。”他一向认为三郎的意见、道理不错，但未必可以实行。但遭此剧变后，他改变了态度，觉得三郎一点不错，决心走三郎的路。于是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坚决拒绝出征，并高呼“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法西斯统治！”让街民们去告诉警察，他愿意和弟弟一起到监狱去。

《三兄弟》的公演，得到白崇禧、林蔚、吴石、张发奎等西南将领的支持，同时也得到夏衍等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援助，公演很受欢迎。在桂林演出收入共九千五百元，除了开支，纯收入四千元。一半作为同盟的活动基金，一半作为前线官兵的慰问金。

他们计划去柳州、贵阳、重庆公演后，再去国统区其它地方演出。以后拍成电影。

他们在柳州、贵阳成功演出后，又去了重庆。与此同时，该剧由叶君健译成了英文本，流传中外。

在这里要附带说一句，有人对《三兄弟》内容有误解。如有人写道：鹿地亘根据西南支部在前线英勇进行反战宣传的事迹，编导了日语话剧《三兄弟》……。《三兄弟》一剧深刻地反映了日本青年受日本军阀驱使和欺骗，被迫来华作战，作了无谓的牺牲，一部分觉醒了的日本青年则勇敢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拿起武器与日本法西斯军队作斗争，或勇敢地投入对敌火线喊话宣传，却遭到日本法西斯的……惨杀……。显然，这是把《三兄弟》与鹿地亘编写的另一话剧《三烈士殉难》的内容混淆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剧外，鹿地亘还写了《我们七个人》一书。此书由沈起予译成中文，1943年6月由作家书屋出版。它记录了中国抗战史一个方面的珍贵史料。

第五章

重庆反战同盟总部的成立

第一节 反战同盟总部的成立

经过鹿地亘、池田幸子、冯乃超等循循善诱的教育，博爱村不少俘虏开始觉悟。他们等待着鹿地亘从桂林回来，以便得到解放，正式加入日本人反战同盟。同时，在冯乃超的领导下，政治部的陈开先在长江北岸的赖家桥（重庆西北 30 公里的郊外，离博爱村约需步行一整天的时间），准备着反战同盟总部办公和住宿的房间。这样一来，邹任之等人的如意算盘就不能顺利实现了。

但抱定控制、破坏反战同盟宗旨的邹任之等人，在鹿地亘离开重庆后，立即筹划新的分裂活动。他们以何应钦的名义规定准备会的任务，首先是协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进行国际宣传。他们改组准备会，企图与桂林支部不发生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组织，并将鹿地亘、池田幸子排挤出去。

邹任之公开对池田幸子、冯乃超说：“反战同盟一定要成立。经费没有问题。总部只能设在杨家村。同盟不属政治部管，也不属军政部管，应直属于军事委员会。把全体俘虏发展为盟员，把收容所改成学校。经过一年的学习训练以后，就可以把他们派出

去，他们再也不会逃跑了。”并告诫池田幸子不要去博爱村，不准鹿地亘与反战同盟准备会成员通信。要求俘虏们在鹿地亘、池田幸子及冯乃超来博爱村时，大家只做自己的事情，不准和他们接触、讲话。他们还收买俘虏中的顽固分子、投机分子山本熏等人对觉悟者进行监视，对敢于揭露他们卑劣的活动者，借机送到新亚村，即原正义村所在地进行隔离。青山和夫这时已加入国民党，他极力协助邹任之在俘虏中建立傀儡组织。

准备会继续每周为广播电台送一次广播稿，继续为冯乃超领导的三厅对外宣传科写作宣传品等。

邹任之等以准备会的名义，报经国民党宣传部、政治部批准，在俘虏中组织了剧团。为政治部妇女工作队搞的为前线官兵募集寒衣运动举行了演出。协助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成了《东亚之光》的影片，送交宣传部、政治部。在自己脸上贴金抹红。

邹任之的忠实走狗山本熏（舟木），看到高桥没能加入准备会的干部会而心怀不满，竟策动其逃跑。高桥跑到15公里外即被逮住。邹任之离博爱村去镇远一段时间，在山本熏（舟木）的鼓动下，不少俘虏变得自由散漫，目无纪律，不按时起床，不出操，不学习，不开会；在博爱村内出卖军装；半夜在食堂喝酒，并经常到外面酗酒，有时整晚醉倒在外面农田里，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在有关盟员强烈要求下，池田幸子集合大家作了讲话，让大家讨论。结果，一致决定要严格遵守收容所的纪律，不得酗酒。

当池田幸子去新亚村，被收容在那里的有觉悟的准备会员对她说：“我们一定参加反战同盟，永远不改变对先生（指鹿地亘）做过的保证。但我们绝对不和舟木搞在一起。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放，而且要合力投入反战工作中去。”1940年1月10日，鹿地亘回到重庆，像凯旋将军一样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并很快收到国统区各位最高长官的感谢信。不少战区来信要求派反

战同盟工作队前去。在国统区的被俘日本人中间，都积极酝酿成立反战同盟的支部。因而，创立反战同盟重庆总部，努力培养反战骨干力量，就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周恩来接见了鹿地亘，在听了关于反战同盟工作队在桂南的工作情况后说：“过去，八路军对俘虏的日军士兵全部送回原部队，送去后，往往就没有了消息。对今后怎么处理日军俘虏，我们要借鉴你们的经验，进行重新考虑。”通过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解放区的日本人觉醒联盟很快来信联系统一问题；延安日本反战人士要去了反战同盟的纲领、规章，作为解放区组织、发展反战同盟的参考。^①

上述情况，使鹿地亘得以冲破邹任之之流所编织的迎面而来的黑网。军政部、政治部批准将解放的16名俘虏转移到赖家桥组织反战同盟总部。这16人是：泽村幸雄、及川、新田寿太郎、江都洋、川本笃、田中达、平田稔、林长吉、松野高、秋山龙一、岸本胜、成仓进、山田浩等。鹿地亘用电话向邹任之传达了政治部等部门同意组织反战同盟总部的意见时，邹任之回答：“经过询问，没有一位准备会员想加入反战同盟。”

鹿地亘、池田幸子、冯乃超不顾邹任之的反对，毅然来到博爱村，使收容所当局不得不把所有日本人召集在会议室开会。鹿地亘在会上详细报告了西南支部的活动情况及广泛影响，现在重庆反战同盟总部的组织及以后的工作和前途，最后，请自愿加入反战同盟者举手，结果，50多人都举了手。这使邹任之的阴谋彻底破产。

鹿地亘等本来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吸收到反战同盟中来，但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特别是担心破坏者乘机混进来，从内

^① 鹿地亘：《如火如荼》上册第358页。

部进行破坏活动，为了求得反战同盟一开始有个良好的基础，必须进一步对要求加入者进行考察。于是鹿地亘在会上提出：请要求加入同盟的各位作自我介绍，说明自己对反战同盟的认识和自己的优缺点；也可以对别的要求加入者作同样内容的介绍和推荐。结果没有一人发言。这样，鹿地亘就表示：选拔第一批同盟盟员的权力，由他一个人执行，大家是否同意，请大家表决。结果没有一人反对。

散会后，鹿地亘、冯乃超和收容所的俘虏一个个地谈话、考察。傍晚，将俘虏召集在庭院，发布了第一批加入同盟的14人名单。对此，只有植进、舟木两人反对。经说服、鼓励，他们表示努力争取第二批加入。

晚上，在鹿地亘处由及川推荐了山田浩，松野高推荐了成仓进加入同盟，经过鹿地亘与冯乃超商量，同意了二人的推荐，这样第一批盟员就增加到16人。

3月29日，鹿地亘、冯乃超带领这16人坐上汽车到了赖家桥。下午，郭沫若前来看望大家。接着，举行了迁进新居仪式。邹任之也来了，他是来看这16人的住处和有关情况的。除了这16人外，以舟木为队长，带了几个人去电影制片厂；青山和夫也带了5个人，到了王芃生那里的日文印刷厂做排字工。邹任之手下只有20名左右的日本人了。对此，他表现出不满情绪。

3月30日上午，将这16人集中起来召开了第一次总部会议。会议决定了同盟的组织机构。在总部分设书记局，机关报刊编辑部、教育部、资料调查部、计划宣传部、经理会计部等。午后继续开会，决定了各部负责人，商定了内务规则、奖惩规定、日常生活时间表、上课时间表等。直到晚上8点30分会议才结束。

3月30日这一天，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的日子，同时也成为反战同盟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天。

不久，重庆总部收到新四军内反战同盟盟员的来信，得知他们已经参加新四军并展开了活动。信中还对在桂南前线英勇献身的西南支部的三位同志表示哀悼。他们在新四军中进行了日语教育，教喊反战口号，教唱反战歌曲，制作反战传单等。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纪念日时和中国同志一起演出了《三兄弟》。希望“今后密切和总部联系，得到指示，为革命胜利而坚决战斗！”

第二天（即1940年3月31日），他们就开始了新生活。早晨6点起床，点名、做保健操。7点吃早饭。接着就开始每个星期天早晨的相互批评会。9时结束后，由鹿地亘读桂林支部佐佐木同志的来信，信中详述了三同志在桂南前线牺牲的情景，给大家以极大激励。下午，各部分头活动，教育部的同志走在前面，开始印刷资料。

4月1日上午8点到10点，由三厅派来的廖体仁担任讲师，给大家讲授中国语。他亲切、生动的讲述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午后，出席政治部成立两周年紀念大会。同时，为庆祝反战同盟总部成立对盟员表示祝贺，第三厅举行了盛大宴会，郭沫若一边温和地微笑，一边和盟员们握手。鹿地亘、岸本胜作了发言，对第三厅的领导表示衷心感谢。最后，政治部人员和盟员们分别作了有趣的演出。

4月2日，在秋山龙一领导下，编辑部召开会议，研究机关刊物的出版问题，决定刊名为《为真理斗争》，商定了创刊号的内容，各篇文章的撰稿人。由成仓进写《日本人眼中的汪精卫政权》，泽村幸雄写《论米内内阁》，岸本胜写《战时统制经济和日本农村》等等。

4月3日，晚饭后到6点半自由活动时间，不少人散步。7点开始进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现状”、“目前国际形势”的研究讨论会。9点半就寝。

4月4日，由于缺糖，根据大家的建议，早晨举行了“稀粉会”的聚餐。上午，根据郭沫若建议，政治部的孩子剧团演员来慰问盟员们。午后3点半，由秋山龙一召开编辑部会议，审查交付的稿件。晚饭后继续讨论，决定了机关刊物的形式、稿件的编排顺序等，10点散会。

4月15日，同盟出版了《为真理斗争》（每周发行两次）第一期，它的《发刊辞》这样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经过三年的恶战，今天已步入了新的转机。这个转机决不是保证侵略者有美好的将来，从各方面看，只是多年的帝国主义美妙的计划开始露出了崩坏征兆。日本大步地迈入明显的必然失败的侵华战场，继续大量地消耗着国力。在中国人民英勇抗击下，在燃烧的世界帝国主义争霸战火中陷入无法挽救的颓势和危机中。

“日本激烈的经济震荡已很明显，工业衰退，物资匮乏，粮食不足，饥饿袭来。被投入地狱的国民已对战争发动者极度愤怒，高声狂叫的已失去威信的统治者，至今已丧失了对国民的统治能力。在国内，在战地军队内，国民的愤怒也开始冲破极其强大、残酷的压迫，形成了英勇的反战斗争。在这种转机时刻，极其狼狈的侵略者已经惊惶失色，叫嚣重要的是‘解决事变’。现在他们到处发出‘解决事变’的悲鸣，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呼喊。呈现在人民面前的日本必然大失败的局面使他们今天不得不闭起眼睛来欺骗国民，祭起所谓‘解决事变’的法宝。过去和现在，国内报刊都在追问他们：‘你们不断叫喊着解决事变，为什么不告诉国民具体的解决办法？’国民对侵略者们为遮盖自己的穷途末路而制造出来的汪精卫傀儡政权，从一开始就嗤之以鼻。这只能激起大陆更大的民族革命的怒火。为了继续进行战争，支持、利用丑物汪精卫，只能使国民永远陷入饥饿和流血中。

“不言而喻，承认那个所谓新秩序，只会加强与固守大陆权益的各国危险的国际冲突。结束事变不兑现，国民必将作出新的牺牲。若那样，国民自己会奋起解决事变的。

“从东亚扫除日本帝国主义营造的地狱，协助中国的神圣抗战事业，彻底消灭侵略者，这是我们解决事变的唯一途径。”

他们还向国民党有关机构送发《为真理斗争》，为冯乃超领导的对敌科制作日文宣传品，为《敌情研究》刊物供稿，盟员们每周一次交替着去重庆市区活动，为对日本的无线电广播送稿，等等。

1940年5月底，西南支部同盟盟员到达重庆，在长江北岸受到重庆各界两万余人的热烈欢迎，鹿地亘即席作了热情激扬的讲话。

从6月5日起，在重庆国泰剧场开始了预定五天的公演。公演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田汉、洪深等重庆演剧界人士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经常访问重庆的外国人阿卡兰斯·斯曼努鲁等也给予了很大鼓励，重庆各界人士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各种方便。前三天的演出观众场场爆满，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到公演的第四天，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突然以所谓“反战会给中国官兵士气以坏的影响”为理由，命令不准再演。不言而喻，这是亲日派准备和平投降所表演的一个插曲。也不难看出邹任之等军政部上层官员及王芃生、贺衷寒之间暗中勾结所进行的破坏。

当时任军委会赏勋局局长的李济深等人约见了鹿地亘，公开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直率地表示了对当前政局的遗憾。

公演中止了。鹿地亘利用西南支部和总部在一起的难得机会，把全体盟员集中到赖家桥，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夏季特别训练。这一个月的训练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边进行思想、理论的教育，一

边进行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西南支部的盟员树立了新的自觉性。他们习惯了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批判了自己的缺点，鼓足了反战斗志。针对西南支部干部软弱的情况，在训练的最后，从总部选送川本笃、田中达、泽村幸雄、平田稔、林长吉等5人去西南支部，同时把西南支部有问题的两位女性以及村上清、秋山盛、佐佐木正男5人调到总部。这就加强了桂林反战组织的力量。

7月20日，同盟总部利用与西南支部在一起的机会，举行了全体盟员参加的总部成立大会。郭沫若、杜心如以及政治部其他长官，王芃生和宣传部的代表，朝鲜义勇队的代表，特别是文化界的老舍、田汉、冯乃超等也参加了大会。直到大会结束，邹任之和青山和夫也没有露面。

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了同盟的纲领、章程，发表了大会宣言。纲领针对青山和夫关于“不提打倒天皇制的反战同盟，是反革命的团体”的恶毒攻击，特别明确地指出：反战同盟是无政党派别、超越思想信仰，为和平而奋斗的人民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在这个成立大会召开前后，国统区和平投降的逆流进一步猖獗。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的1940年9月，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带头提出“军人不能干涉政治”的叫嚣，陈诚被免去政治部部长之职，派往第六战区任司令长官，周恩来被免去政治部副部长一职，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一职也被免去。这样，在武汉时期成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部已不复存在，从而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部。郭沫若也不再担任同盟的总顾问，而由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杜心如接任，由亲日派特务头子汪恰民担任常驻顾问。汪恰民的实际工作是对同盟进行监视和破坏。他经常躲在办公室里向杜心如写报告，反映鹿地亘和盟员的各种情况。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宣传鹿地亘很可能是日本派来的

间谍，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是危险的，不会有什么作为。不断进行“神经心理战”，使盟员思想混乱，矛盾丛生。

当时，为了避开重庆的一些不利因素，充分发挥总部的作用，培养、提高盟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鹿地亘与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商讨，组织工作队上前线的可能性。

这时周恩来向新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提出：“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张治中表示待报告了蒋介石后再定。据张治中后来回忆，他当时很想安排这些左派朋友，就借周恩来的这阵东风，建议蒋介石妥善安排这些人^①。没隔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工作人员，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重庆，准备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请原三厅的人参加，仍由郭先生主持。接着蒋介石决定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阳翰笙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断然说：“就答应他吧！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他又说：“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②

郭沫若在蒋介石答应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时，乘机提出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管理反战同盟为出任条件，得到同意。文化工作委员会在1940年10月1日成立并开始正常工作，郭沫若复任同盟

① 《张治中回忆录》第67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515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总顾问。在此之前，鹿地亘、郭沫若决定找机会和陈诚商量派出工作队去前线的事。

9月上旬，陈诚回重庆，最后一次向张治中交待有关工作。他非常欢迎鹿地亘率工作队去他管辖的六战区工作。并亲书手令，交给鹿地亘。接着，鹿地亘又取得张治中的赞同和支持。鹿地亘将陈诚的手令给汪恰民看了，汪恰民感到非常吃惊。但他的主子已不敢阻拦，他也便装出合作的姿态，叫会计借来了10月份的同盟事业费，从有关部门借来了扩音机和手摇发电机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第二节 工作队去宜昌

反战同盟赴前线工作队，包括鹿地亘在内，由12人组成，同行的还有负责与中国各方面作联系工作的张令澳以及要求到第六战区司令部工作的十几名年轻的国民党员。留守队由池田幸子领导，由秋山龙一、江都洋等人协助。关于留守队，郭沫若、冯乃超表示：他们会关照的。

1940年9月24日上午，工作队出发。在公路两边，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一直到儿童剧团的少男少女，几乎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全体人员都出来夹道欢送。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各位战友：

今天，在诸位光荣出发之际，我们得到欢送机会，实在是铭感在心啊！

眼前的事实证明，由于诸君勇敢坚决漂亮的行动，我们已完全站在同一条战线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着同一脉搏，我们的血流向同一目标。拥护正义，争取真理，以决死的意志去完成先驱者

的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同体一心的。

诸君前回在桂南战地取得了光辉的战绩。这次去前线，一定会取得同样光辉的战绩。为了取得比这更加光辉的战绩，祈望你们作加倍的努力。

我们没有更好的言语赠给诸君。比我们以言语更鼓舞诸君的，是诸君已表现出来的漂亮的行动，这已使我们十分感动了。我们保证要更加努力工作。

最后，和诸君一起，喊三个口号：

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

日本人民革命成功万岁！

中日两民族解放万岁！”^①

鹿地亘代表工作队致答词。他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一定越过一切障碍，去达到目的，为了两国人民的和平、解放和合作，我们必将使破坏者们面壁而泣。”

工作队当晚停宿于市内的大田湾宿舍，购买了足够的电线等必需物资。25日鹿地亘去政治部，向部长告别。张治中接见了，对他说：“昆仑关前的成功是巨大的。我相信，这次你们会取得比以前更大的成绩。请不断来信报告情况，请陈将军多多支持，我当尽可能地给予援助。”

9月26日早晨，他们在嘉陵码头上上了500吨位的军用船——“民风号”。顺着滚滚浊流，第二天午后4点到达万县。这里已是第六战区管辖的范围，重庆特务们的手暂时还伸不到这儿来。

万县地处面临长江的丘陵山峡中。工作队在县城住了三天。不断受到各界宴请。由于船只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决定走山路去恩施。

^① 反战同盟总部：《为真理斗争》1940年10月号。

29日，他们坐船到长江南岸，开始了丘陵地的行军。路上不断受到有组织的欢迎。走了10天，到了四面是丘陵的恩施县城，后到郊外战区司令部招待所休息。陈诚得知他们到来后，立即表示热诚欢迎。

他们到达恩施的第二天就开始进行上前线去的准备和训练。

午前学习，制作在战场上使用的宣传品，并为此进行了研讨，给总部机关刊物《为真理斗争》写稿。午后做弓箭，把传单绑在箭上进行射箭比赛。将宣传品卷成一束，进行投弹练习。大家像孩子一样，热情洋溢，朝气蓬勃。热了，就光着上身进行练习和比赛。夜间，举行战略战术基本理论研究会议；还拿着扩音机到山上做广播演习；研究地形、距离和广播效果的关系。

广播稿是先分工写作，后集体讨论、修改的。这是用文字制造的子弹。

工作队集中精力讨论了《日本士兵要求书》。这是供广播用的一份主要稿件。下面是要求书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发放津贴、物品的要求

给士兵的津贴增加五倍！8元8角能做什么用？

给班长以下士官的津贴，增加三倍！

军官和士兵的津贴不能差别太大！

改善士兵伙食。5个士兵一个罐头，根本不够吃。要和军官一样，两人一个罐头。

发物品，要做到后方和前方一样！

停止征兵，搞征兵的军部和高级军官有罪！

发慰问品，士兵应和军官一样多！

二、生活上的要求

反对拆阅邮寄给士兵的包裹、慰问袋和信件！

不准检查士兵寄回日本的信件！士兵不是犯人！

派宪兵到战争第一线去！

不准派士兵服各种劳役！

最前线的部队要定期轮流到后方休息！

三、关于伤病员的要求

伤病员的津贴，要与军官一样！军医要对他们一视同仁。

伤病士兵的津贴，每月发一次。

要公开给伤病士兵发工资。

军官和士兵在同一病室，应一样照顾、医治，看护不能只护理军官。

对要求回国的伤病士兵，应立即让他们回去。

四、关于回国的要求

部队长应允许士兵立即回国。一起来的士兵，应一起回国。

反对让士兵在战场上待一年以上。

坚决反对再次征集已返国的伤病员。

不准再次召集一般士兵。

五、关于战死者的要求

发给战死者家属一次性现金 5000 元。

每年给战死者家属抚养费 500 元。

给阵亡士兵安葬费 500 元。

六、关于国内后方的要求

征集年收入 1000 元以下家庭的劳力，给补助费 500 元。

不准征集负担家庭生计者，已征集者应立即归还。

不准征用农民家的马！

反对一家征集一人以上（现在有从一家征集 5 人的）！

先征集生活富裕家庭的子弟！

保障被征者家属的生活和职业！

保障出征军人回国后的生活和职业！

国家保证回国士兵的健康！

七、关于对剥削士兵者的要求

在师里当了一年主管会计，一生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该不该吐出来？

军队经营的小卖店，应由士兵们来管理！

小卖店商人从士兵身上榨取的暴利应立即归还！

帐目等交士兵管理！

八、士兵政治方面的要求

给士兵讲清楚这次战争的目的，向士兵说清楚何时停止战争。

把挑起这场大失败的战争，使人民陷于苦难的近卫、坂垣、闲院交国民审判！

严惩挑起卢沟桥事变的军部头子！

召集人民大会，根据人民的意见，决定结束战争的办法。

士兵们，不要白白送死！大炮向高空射击！

号召国内同胞都起来反对战争！

全力协助中华民族抗战，打倒侵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不准牺牲人民！

不准日本帝国主义者吞食东亚！吞食人民！

士兵们！和国内工人、农民阶级以及各界国民团结起来，打倒真正的敌人——天皇、资本家、地主专政的政府！

建立民主的日本！东亚和平万岁！

在恩施，他们还编就了为战场广播用的《语言的子弹》，有关于国际方面的，也有关于日本国内方面的。下面是其中的几篇：

关于国际方面的广播稿

“各位日本士兵兄弟：

大家好！下面请听最新的新闻。

在南宁、龙州方面的日军，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士兵们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人向他们作解释，被人牵着鼻子撤出了南宁。如今，在广大的桂南平原上，已没有一个日本军人。军部发言人说：‘这是战争的需要。’日军到何处去了呢？从南宁撤退的各位战友到哪里去了呢？

兄弟们，警惕啊！现在你们那里会不会来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大撤退命令呢！

所谓‘为了战争的需要’是什么意思？

想想吧！去年底以来的一年间，以数万名士兵的生命，换来了对南宁的占领，是为了什么？这样大的牺牲，今天在所谓‘战争需要’的名义下，很快撤退了。

这是什么愚蠢的‘战略’！

兄弟们，请注意，这里面有问题。日、德、意三个侵略国家的军部缔结了军事同盟，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与英美等国争夺霸权、殖民地，残酷奴役中国人民！

德意志、意大利去年以来，不断发动攻势，想一举冲进英吉利王国的核心，但失败了。现在，意大利在摩洛哥和北非发动了战争，企图切断英国同远东殖民地的联系。现在，在摩洛哥和北非，已开始了激烈的战争。为了使美国不能顾及英国，德国希望日本在南太平洋上发动战争，

以牵制美国的海军力量。

追随着德意志尾后的日本军部，很高兴有这个实施南进政策的好机会。但侵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损失了很多的士兵。不要把痛苦的士兵从南方和中国别的地方派到更遥远的南方去了！

亲爱的兄弟们，下个战场在哪里？死去的兄弟的坟场在哪里？在赤道地带太阳直射下腐臭的骨头呢？在马来椰树林里得了热病倒下的尸体呢？

亲爱的兄弟，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

这次根据命令撤退的第五师团，自开战以来一直在第一线作战。在北方，离开诺蒙坎时，该是凯旋字品（日本的一个港口），但实际是被骗到了南方。这已经四年了！到南方去做什么呢？

司令官没有同意大家凯旋，安藤自己回国了，等着士兵们的只有死亡！永远默默地躺在那里！第五师团兄弟的事，何止这一件！兄弟们！团结起来，要求回国吧！要军部的奴才明确地答应大家立刻回国！在诺蒙坎，兄弟们为什么流血？在突然放弃的桂南平原，一年间相继死去了多少弟兄？国内的同胞也极为艰难，我们的父母、弟妹，正在忍饥挨饿。难道我们是为了当奴隶才出世，为了剥削者争夺外国权益去战斗？他们使人民忍受苦难，像狗一样死去。现在奴隶们要明白地说话了！人民再也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随意吞食了！

在敌后，求解放的亚洲东部的人民大众，正与中华民族一起，在亚洲东部追歼战争投机狂人！亚洲东部的和平就要来了！

兄弟们，和国内兄弟团结起来战斗吧！追歼人民的敌人！”

关于国内方面的广播稿

“喂，日本士兵诸君！你们到战场后打了几百发子弹？你们的子弹，打死了中国人。你们可知道，为了制造这些子弹你们的家属遭受了何等的苦难？你们发射的子弹打死了中国人，也把日本的国民打死了。军事工厂的工人每天被强制劳动达16个小时，不少童工得了肺病。鸡蛋每个1角5分，但工人连两个鸡蛋也买不起，就连病人也吃不上鸡蛋。米都是加工过的很粗糙的米，物价不断地上涨，学校里的老师没有饭吃都改了行，各地都缺少小学教师，小孩子们该怎么办啊？（中略）

农村又怎样呢？政府高喊要‘增产’，‘增产’，但肥料的供应量只是需求量的20%。……在铁的供应缺乏的情况下，新的镰刀也买不到。一般农家连必需的马和农具都缺乏。由于人手不足，到下雨的时候，长期

寄宿在学校的孩子也得回家劳动。他们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今年大概要赤身裸体了。

喂，亲爱的各位战友，现在国内政府、资本家、地主随意掠夺人民，甚至把女人带走，把马牵走。还用‘统制法’暗中巧取豪夺。物价上涨了5倍，税费上涨了3倍。一个人连饲养金鱼或鸟等都要纳锐。

国内梅毒患者很多，但没有药。少年犯罪或学生品德恶劣的，已增加了4倍，暴力伤害案件已是过去的5倍，……这就是国内的大致情况。”

另外，工作队还撰写了《中日战争与日本人民》、《战地士兵的要求》、《讲讲自己的体验》、《反战同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等广播稿，以及讲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情况的稿件。还撰写了反战歌曲《红纸》：“接到红纸一张，来到悲惨的地狱。邻近村落都来召集令，我心想何时能没有红纸呢。”把它作为广播的前奏曲。

第三节 工作在宜昌前线

11月27日上午6点，工作队从恩施坐拖拉机去宜昌。30日，换坐小船到三斗坪的江防司令部。

在三斗坪江防司令部，工作队受到热情的接待。12月1日，司令部举行了欢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工作队大会。司令官吴奇伟——北伐战争中铁军的四大天王之一，后为新中国军事委员会的参议——作了即席发言，他说：“什么地方残存着帝国主义，什么地方就没有真正的和平。一边用武力去进行侵略，一边侈谈什么和平，这是对和平的侮辱。真正的和平是人民的日本和国民的中国之间的和平。”这样公正、坦率的言论，在大后方的政客嘴里是听不到的。

12月3日，工作队在江防司令部官兵的欢送下，坐船从三斗坪出发，在宜昌市西20公里处登陆。走了一段很长的山路，到达

了26军司令部。12月5日，工作队到达41师司令部。6日，41师司令部举办了军民大会。师党部特别指导员一边掉泪，一边感动地说：“上司请日本朋友来帮助我们了。我们在战斗，良心上对不起啊！对不起日本友人！我们有良心！我们有友人！”之后，工作队向大会献上了四个底部装有传单的蜜柑，还有圆形、筒形的卷着传单的纸手榴弹，在恩施练习用的带着传单的箭等。

工作队的来临，震动了整个宜昌前线。日军在前线不断地用话筒、传单向中国军队鼓吹他们必胜，要中国士兵投降。但中国军队中却没有一人会日语，无法对日军作相应的宣传，因而前线的官兵心中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工作队的来临，对官兵们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当然，反战同盟工作队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而是通过宣传使日军士兵在感情上发生共鸣，在行动上进行反战活动，从而瓦解日军，以停止侵略战争。在这中间同时也要鼓舞中国官兵的士气，使他们一起来进行反战宣传。

在宜昌，工作队决定，每天上午研究工作，给日语口号训练班上课。下午出发到团部，晚上到前线向日军广播。

午后3时，丁治盘师长、张副师长和工作队一起，越过长江到达宜昌对岸的某团团部。在那里，工作队吃了便饭，听了关于当前敌情的介绍。这个团面对的敌人，是日军13师团104联队，纵深布防约5公里。双方处于对峙状态，目前没有发生战斗。双方阵地之间隔着山头，距离很近，加上在伪军中有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因而对日军情况了如指掌。

宜昌前线的日军，由于日本军部忙于向南方进攻，因而在此采取守势，大搞所谓的和平攻势。在工作队到来之前，曾有南京汪伪政权少将参议何队长在阵地前沿诱劝中国士兵逃走或投降。并应他的要求，双方派人在阵前进行了接触，互劝对方投降。

工作队跟着刘营长到了最前线，眼前是一片山的海洋。前面

是日军阵地。团长说，在蜿蜒的山陵的右端 1200 米左右处，有日军的炮兵阵地，它的炮口指向中国军队。对方弧形防线的最高处是日军阵地的突出点，驻有日军第 13 师团 104 联队，那是及川原来所在的部队。及川听后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工兵在日军看不到的山顶死角处设立了掩蔽所，在山顶装上了扩音器，把电线引到了掩蔽所。

工作队在征得指挥员的同意后，勤务兵旋转了手摇发电机摇把，先由刘营长向敌人喊话：

“喂！喂！何队长！何队长！你好！我们都在这里。今天，不是由我讲话，是由日本革命家给日本兄弟讲话。请不要开枪打炮。若射击，就说明你方失理。若你方有理，请讲话。现在就请日本革命家讲话。”

观战军官和新田、中村、森本等撤退到安全处。鹿地亘作为工作队队长，开始了第一夜的第一次讲话：

“日本 13 师团的同胞们，大家好！我们是日本人民的海外代表，请大家听我们讲话！请把武器放好！这只是我们日本人之间说些心里话。

我们的国家现在怎样？日本已深深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兄弟们遭受异常的苦难，这完全是由于近卫的新体制。是他们蓄意准备、发动了这场恐怖的战争。

战争再打下去，结果会怎样呢？把中国作为敌人，把希望和平的全世界人民作为敌人，在亚洲孤立，在世界孤立，那不是只有亡国这一条路吗？

侵略他国，决不会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发动战争的一小撮军阀、财阀们带给人民的只有牺牲和苦难。他们是危害国家的罪人，是我们的真正敌人！

日本正不断地向危险的深渊行进！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作为朋友呢？中国不希望把日本人作为敌人，他们希望亚洲的和平与幸福，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被迫起来进行斗争。

不能停止侵略战争吗？不能使政府成为中国的朋友吗？为此，不要讲究什么面子、什么既得利益，停止侵略行为，撤回全部军队！兄弟们，用我们国民的全体力量，要求政府这样做！大家要用和平的办法考虑拯救我们的祖国！”

日军阵地静悄悄的，他们没有开枪射击，都在专心地听着。

鹿地亘讲完后，及川又接着讲道：

“喂，喂！13师团的战友们，104联队的弟兄们！我过去和各位在一个部队。”

他详述了13师团从上海登陆以后的侵略行径后，接着说：

“这个师团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是站在第一线进行激烈的战斗！几次说部队要回国，但最后都化成了泡影。而师团长获洲已经取得极大荣誉，确实回国了。联队长们都不断出名，确实回了日本。只有兄弟们一直留在战场上，一直到战死也不能返回祖国，回到家乡。

日本国内又怎样呢？我们的父母、妻子成天在艰苦地劳作着，不断增加的税收压在他们头上。不少田地荒芜了。

喂！13师团的各位兄弟们，停止战争，大家都要求回国去吧！”

接着由原13师团的高野讲话。

刘营长在中间插话。他请日本方面也用扩音机，以便对话。他招呼宣抚班，请何队长明天上午9点讲话。

之后，由成仓唱反战歌曲：

“父亲，你看见过这样的笨蛋吗？

在那么炎热的天气里，

他到处喊着大胜利！大胜利！

他日夜喊着大成功！大成功！

那是人们多么熟悉的骗人曲啊！”

在广播的几个钟点里，对方一发子弹也没打。工作队在广播中再次邀请对方的何队长明天上午9点对话。

工作队的广播，中国士兵虽然听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向日本士兵宣传侵华战争必败的道理，因而广播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主动地把工作队交给的传单包扎起来，代替手榴弹投向日军阵地。在漆黑的夜里，士兵们爬到日军的哨兵线，从铁丝网中把传单塞了进去。

回师司令部不久，敌方开始发炮袭击，轰轰地持续了几个小时，打了150发炮弹。对方平常在夜间是很少打炮的，工作队的广播宣传引起了日军长官们的极度恐慌。

第二天，团部来电话，说当天上午9时，对方的何队长没有来，来了个中国军官学校九期生、伪军的李参谋。他是在成为日军俘虏后当参谋的。他说：“昨晚这边的广播，士兵们都侧耳听了，军官们对此十分恐惧。”

工作队员每三天重新搭配一次。第二天夜里，仍由鹿地亘、佐佐木、成仓、新田、中村、及川、森木去前线。他们带了二十多个中间包着石头的宣传用的手榴弹。

到团部，陈团长说：“今夜我们已经警告过对方，估计他们不会开炮。”到前线，中国官员仍像昨夜那样热情地欢迎他们。工兵已在昨天的前100米处修筑了由岩石构成的坚固的掩体，工作队员来到后立即投入了工作。

他们根据午前工作会议的分工，首先由鹿地亘详细地讲述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太平洋战争接近爆发的危险。佐佐木揭露了军部独裁者把日本国民、士兵作为不准讲话的肉弹投入战争。新田把在恩施拟定的《日本士兵的要求书》一条一条地读完。及川号

召日本士兵为了和平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成仓根据报刊广播有关消息。

接着，进行文艺表演，有相声、歌曲、诗朗诵等多种形式。

刘营长向日军宣抚班打招呼，请他们讲话。他们回答：“士兵都认真听了，大家都同意应该停止战争。”

这一夜，日方果然未打一发炮弹。

第三夜，由及川、中村、新田、佐佐木、高野、山野井上前线工作。他们在半夜胜利完成任务，回到师部。

他们在日军右翼阵地连续工作了三天，休息一天后，被接到中间第二阵地。据介绍这儿是日军半月形战线的突出部。最前面是圆锥形的高山峰，它前面左右两侧的山，由中国军队防守，对日军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

午后3点，鹿地亘、成仓、森本、高野、山野井、佐佐木出发了。途中在120团司令部会见了等在那里的李副师长、张指挥官、黄特别指导员和去观战的军官。李副师长用才学的日语说：“日本兄弟们，你们好！”原来，他午前听了“日语口号训练班”的课，学会了这句话。

李副师长带着工作队员很快来到圆锥形山顶的前面。在日光之下，日军的配置尽收眼底。

在这边山顶上装好扩音机后，鹿地亘先讲话。对方说，距离太远，不好对话，希望能接近一些。山野井开始猫着腰向前跑去，接近了日军阵地。李副师长接到报告，立即赶到工作队处，对方打了三发子弹，李副师长命令我方不要开枪，并让山野井赶紧回来。

山野井回来了，讲了对话的经过：

“今天的讲话，兄弟们听懂了没有？”

“听不懂！”

“请你们想想，你们是为为什么来打仗的？”

“是为了国家！”

“既然是为了国家，为什么牺牲的都是士兵？为什么一小撮高级军官捞了极大好处荣归日本呢？”

“你是个坏蛋！”对方只好以骂人来作答了。

山野井接着广播：“13师团的兄弟们！你们受骗了。原来和我在一起的成田君、全昆罗君等等，都已经不在了！军部一股劲儿命令兄弟们向前冲锋！天皇是活的神仙，而你们却是应该射出的子弹！”

突然成仓负伤，血从头上流了下来。卫生兵马上给他包扎起来。

鹿地亘再次进行广播：“日军兄弟们，请大家听我讲，明治天皇是这样讲的：天皇能够正确地决断世界上一切事情。这样，我们人民就只能供驱使了。

大家忧虑国家。而国家已成了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地狱。战争是为了谁，不是很清楚的吗？”

对方又是猛烈地射击。

佐佐木接着说：“喂，请大家考虑我们的话，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谈吧！”

张指挥员向中国军阵地广播：“兄弟们！不要随意向敌人射击。日本革命家向日军讲话后，若对方有一个人，两个人跑向我方来，我们要热情欢迎。那说明这些日本兄弟觉悟了！是我们的好朋友了！碰到这种情况，我们绝对不能开枪！”

回到师部，总结当夜的工作时，山野井说：“言语的子弹很有用，我们应该多准备些！”森本表示“明天一定要更好地进行广播。至于日军开枪，那是日军军官想阻挠我们的广播。这说明他们害怕了，也从反面说明我们的广播有了效果。”

第二天上午，在41师师部举行了该师第一期日语口号训练班结业典礼。学员们当天又返回前方阵地。当夜，前线各处都将配合工作队广播，高喊口号。学员们领了结业证书，又领了小捆的日文传单，以便向日军阵地散发。

下午，鹿地亘、及川、佐佐木、山野井、高野、新田去前线广播。李副师长在中途等他们。他们一到阵地，就听到士兵们在齐声高喊：

“日本兄弟，你们好！”这是结业的训练班学员带着士兵们在喊日语口号。

鹿地亘、山野井在山顶正要开始广播，在右方突出阵地已传来了新田广播的声音。原来他正在就《日本士兵的要求书》进行解说。

对方打来了一发子弹，他继续说：

“兄弟们，能听懂吗？”

“不懂啊！”

“要求要一个个地提出！”

又打来一发子弹。新田又大声地宣读《日本士兵的要求书》。这时，及川在另一个地方开始广播了：

“13师团的兄弟们，怎么样？谁是我们的敌人，弄清楚了吗？”

“不懂！”

“打了三、五年仗，结果对谁有好处？给兄弟们本身、家庭带来的是什麼？想一想，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我是宫城县人，原来也是13师团的，兄弟们肚子里想的事我都知道。我知道各位的难处，兄弟们在军官面前只好说不懂，但绝不能做死狗。我们要尽力争取和平，要把战争停下来，回国去过和平的生活。这个懂了吧！”

“懂！”

今天日军机关枪没有射击。全线都是喊日语口号的。这口号声震动了日军阵地，惊动了日军指挥机关，他们不知该命令士兵向哪里开枪了！

第三天夜晚，工作队又在前线做了一次成功的广播。

工作队在第二阵地三天工作结束。休息了一天。早晨，李副师长、丁县长在师招待所客厅对队员们进行了慰问。在慰问时指挥员说起一件事。昨天在另一阵地上，来了日方的一个军官和伪军李参谋，要求谈判。中方同意了这一要求，派出刘营长等两人作代表。日本军官用汉语说：

“你们连日的广播，我们都听明白了，士兵们都很受感动。大家都愿意和平，是否可就此谈判一下。你方关于和平谈判，有什么打算呢？”

“我们愿意谈判。要达到和平，在我们看来很简单，那就是你方停止侵略战争，无条件把军队撤出中国，这样就带来了和平。”

“我们愿意撤兵，这对日中两国都好。撤兵方面，中国是否有具体条件？还有，美国方面是否会趁日中双方打得精疲力尽而渔翁得利呢！这方面不能不警惕吧！”

“不！我们既不屈服于日本，对任何国家的侵略，也绝对不会屈服。”

“那好，那就谈媾和条件吧！”

“这，我不能决定。大概你们两位也无权决定。我向上级反映，我们明天晚上具体谈，好不好？”

“好！那就这样定了。你们这里山头上都是兵，部队不少吧？”

“不少。你们那里士兵多吗？”

“很多。在附近有 13 万左右的兵力。”

“啊！在后方，我们大概有一百万军队。”

对方苦笑着说：“噢，你们的士气很旺盛，你们的日本人是从

哪里来的？”

“从贵国来的啊，这里没有。是从各战区各地方来的。”

“喔，是这样。那就明晚谈媾和条件吧！”

张指挥员把撰写媾和条件的任务交给了工作队。慰问一结束，工作队就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由鹿地亘执笔，以中方的立场，写出了《媾和条件书》。

“日本军司令官先生：

昨天（12月12日），贵方来人，要求我方提出和平条件。中国军司令部方面，愿意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们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工作队，受中国军司令部的委托，有幸向贵方提出中国方面的基本和平条件。

第一，日本军无条件撤军。这个战争是日本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要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来谋求和平的基础。中国方面，对日本人民和士兵诸君是没有敌意的。过去的就让它像水一样流逝。撤兵的原则，应不赔偿、不割地，废除增加双方人民负担的一切条约。

第二，废除汪精卫傀儡政权。若让日本统治中国人民的这一工具存在，那就意味着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继续。日本对汪精卫这些中国民族叛徒的支持，就是对中国民族的敌视，主权的侵犯，有损双方的友情和平。中日两国的永久友好必须以尊重对方的主权，互尊互助为基础。

第三，日本脱离日德意三国同盟。中日双方不参加任何攻击他国的战争集团。为了东亚避免战争，必须就此作出严正保证。关于中国要求美英援助，贵方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中国抗战是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决没有在贵国撤兵后加害日本的意思。为了抵抗侵略，中国求取爱好和平国家的援助，是站在共同恢复和平立场上的，若贵方停止了侵略，对第三国的顾虑也就自行消失了。

以上是中国军司令部委托我们传达给贵方的三个基本条件。除此以外，我们作为在海外的日本人反战运动者，痛感需要再提一个必要的条件。

我们这次不幸的战争，是一小撮帝国主义者，无视日本人民意志而进行的，这一点，是必须严肃正视的。日本一小撮帝国主义者，残酷迫害反对战争的国内进步人士，封住国民大众的嘴巴和耳目，把在军事独裁恐怖统治下的国民大众赶上亡国的战场。因此，为了在亚洲确立永久

和平，为了保证中日两国的相互信赖和真诚友好，必须废除这个军事独裁，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政府。近代日本的历史上，大量的不幸的战争是与一小撮侵略成性者，剥夺日本国民的自由，把人民生命视作鸿毛这一事实紧密相关的。

以上四条，希望贵方能予以诚心的研究，这是我方的真诚希望。

我们衷心祈求中日两民族的友好和幸福。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前线工作队

1940年12月14日”

山野井用毛笔誊清了这份草稿。当天夜里，工作队分两个组去两个阵地，向日军士兵广播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公布我方的和平条件。

第一组由及川、山野井、中村三人组成。第二组有鹿地亘、新田、森本三人。晚上10点以后，两组先后回来。情况是在鹿地亘等讲了这事的前后经过后，日方要求明天再公布我方的和平条件。于是两组成员就讲了日人反战同盟的一些情况，唱歌慰问后，提前回到了师部。

15日晚上，工作队广播了中方的和平条件，在广播结束后，日方参加对话的两个人，一个是伪政府的何参议，一个是日军的左参谋，他们并没有对和平条件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说：“明天，从宜昌司令部要来一位参谋长和贵方的日本革命家见面。我方三人，你们也请出三个人。”

第二天，即16日早晨，对方何参议和日军左参谋就传来话：

“你们对和平没有诚意，实际不是想和平，而是借谈和平向我方士兵进行欺骗宣传。这样就没有必要谈了，明天我们就回汉口。”

果不出我方所料，日方主动提出所谓和谈只不过是弄清工作队的来历，借机加以消灭而已。

12月16日，是工作队在41师的最后一天。从早晨起日军就不断地向41师阵地开炮射击。队员们全体出动，去第一阵地的有

鹿地亘、及川、山野井、佐佐木、中村、森本；李副师长带着新田、成仓、高野去第二阵地。

鹿地亘在第一阵地讲了话：

“各位兄弟，宣抚班的猎狗们欺骗了大家。说什么和平谈判不应该提不平等的条件。我请问大家，我们提出的和平条件哪一点不合情理？哪一点欺骗了各位？宣抚班的猎狗们才是真正披着和平外衣的骗子！我们能和这样的骗子打交道吗？我们一定和兄弟们一起，为了和平，为了日本人民的幸福而工作。

兄弟们，宣抚班的骗子们明天要回汉口了，大家用唾沫赶走他们吧！”

接着，由山野井、中村表演了相声《帝国主义是什么》：

“若没有战争，

我想回故乡，

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

半夜一点，在第二阵地的队员归来。新田说：“我们的文艺表演很受欢迎。”

来接工作队去 44 师的使者已来到了好几天，他们请工作队早点去 44 师。这样工作队不得和以丁师长为首的 41 师军官们依依惜别。李副师长很想把新田留在师里工作，但因队员太少而没能如愿。

队员们才离开 41 师，日军就向第二阵地施放毒气弹。当工作队出现在 44 师第三阵地时，敌人已无计可施，只能拼命使用火力，企图阻止他们的广播。

据当天中国秘密侦察员报告：宜昌大街上增加了日本的便衣宪兵，他们偷偷摸摸到菜馆、酒店，看到三个以上的日本士兵凑在一起，就竖耳细听，听士兵们是否在谈论工作队的广播内容。队员们的广播牵动了日军指挥机关的中枢神经。

天不断地下雨，队员们被迫休息了十天。天晴后，下午队员们在罗指挥员的带领下到了141团。太阳落山后，季团长带着队员们往前沿阵地，阵地在中国军队的左翼，长江边不高的丘陵地带。双方各占着对立的丘陵，这边的战壕一直修到紧靠的丘顶。广播室就设在离棱线丈把远的壕地。夜幕降临，鹿地亘先发表讲话。中村唱歌时，对方传来“好啊！再来一个！”的喊声。不久，前沿哨兵报告：日本兵走出来听了。新田接着说：“日本兄弟们，下面表演相声，题目是‘为什么进行战争？’”鹿地亘和佐佐木开始表演。对方不断传来“好！好！请继续！”的喊声，并且一齐拍手，呼应这边的演出。不久，对方的机关枪、山炮、掷弹筒等一起开火了。

第二夜，根据罗指挥员的建议，把广播室放在后面，用电线和前面的扩音器连接起来。广播不久，日军的各种武器就开始咆哮，同时还发动大量拖拉机来制造噪音，干扰广播。

第三夜广播时，日军发射了更多的炮弹。在工作队回师部途中走过山路时，扫来了探照灯光，接着很快地打来了20多发炮弹。这是根据日军司令部命令，在墨箕山日本炮兵观测所指挥炮兵发射的。第二天早晨，队员们还没有起床，日军又打来了50发左右的炮弹，但都落到了队员宿舍后的山坡上。日军侦察机整天在这一带盘旋飞行。

工作队接着到第四阵地、长江对岸第五阵地巡回广播。完成预定任务后，44师司令部对他们进行了慰问，请他们在石头垒成的温泉浴池里洗澡。

在44师，工作队曾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袭击后，飞机撒下了红色传单，内容是《告中国前线抗战官兵同志书》，右上方有中国32师原参谋王发家的照片，传单也是以他的名义写的。传单用日本式的中文写着：中国抗战不会有什么前途；只有接受日本所

谓“和平”解决——就是投降——的办法；欢迎大家投奔伪军，参加汪精卫的和平救国运动。这样一定会有光明的前程。中国军官兵看了传单，非常愤怒，有的把它撕成碎片，有的说：“留着擦屁股吧！”

晚上，师部招待工作队，祝贺他们一个月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山野井有事出去，回来说：“刚才我出去看见有人在追拾传单，敌机就对着拾传单的人扫射、投弹，炸死了四个人。”罗指挥员听后说：“日本军阀善于自己打自己的脸，不怕丢丑！”

招待会将结束时，师部收到蒋介石拍来的电报，对工作队的活动大加赞扬、鼓励。师长当场宣布：明天由他举行宴会，进行祝贺。第二天早晨，又收到张治中代表政治部、陈诚代表第六战区发来的电报，赞扬工作队的成就，鼓励他们更有成效的工作。

1941年元旦，工作队回到三斗坪江防司令部。吴奇伟举行了欢迎工作队胜利归来的盛大元旦宴会。队员们同时还收到重庆寄来的很多信，不少登着他们在前线活动情况的报纸，这使队员们更加兴奋。

根据前一阶段工作情况，鹿地亘觉得需要把不遵守纪律的佐佐木、成仓换出工作队，把留守的濑户、片桐调来工作队。同时负责与中国方面联络的张令澳，因不愿意到危险的前沿阵地进行宣传，和队员们发生矛盾后，不仅自己对工作失去兴趣，而且在佐佐木、成仓那里挑拨是非，鹿地亘也想调换他，这样就有必要回重庆。陈诚同意了他的意见。由于工作队在41师、44师办日语口号训练班很有成效，陈诚建议他们再留一个月，到六战区各师进行巡回教喊日语口号。因而，他们继续工作了一个月，培训了一千多人后，离开了宜昌前线。

与此同时，桂林支部在1940年9月22日曾派出以坂本秀夫为首的前线工作队，去广西前线。他们在第七战区司令部的支持

下做了广泛的宣传，获得了良好的评价。

由于日军撤出广西，他们在1940年10月中旬到广东游击区做反战宣传。

坂本秀夫根据自己的多次经历，总结出一条在前线工作的经验：我们工作最理想的情况，是首次战斗后日军完全被中国军所包围，处在这样相对静止的对峙状态时。在混战的斗争中，我们的广播会影响中国战斗部队的动作；考虑到战斗中日军士兵的心理，不会有宣传效果。这种场合应及时撤出工作队。

桂林支部赴广东前线反战工作队开创了平原前线日人从事反战工作的先例。

工作队从三斗坪上船，返回重庆。同船上有一批从各部队挑选出来的军官，到贵阳接受特别训练。他们在船上谈起国民党消灭新四军军部的事情。鹿地亘多少听懂了一些，他就问张令澳。张令澳在鹿地亘的启发下，终于低声讲了皖南事变的大致经过。张主张不想让队员知道，怕引起他们的不安。鹿地亘认为这个秘密很快就会公开，为了使队员们到重庆后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建议向队员们讲讲皖南事变。

工作队在船舱里召开会议，听了张令澳的报告后，队员们都比较冷静，他们思想上早已有了准备。随着日本和平攻势的加强，国民党的投降气氛更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这样严重的事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鹿地亘在会上说：“根据国内外形势，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展、中国内部抗战力量团结的情况看，这个事件不会引起中国抗日战线的分裂。在这样重大事件面前，工作队本身的团结不能出现裂痕，绝对不能涉足于中国的内部事件，不传播这方面的情况。要坚定不移地遵循民族自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有信心向自己既定目标迈进。大家回到重庆后，一

言一行要慎重又慎重。要用自己的团结来克服自身的问题。”

散会后，鹿地亘就开始考虑：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回重庆？还是立即返回第六战区司令部？陈诚曾有“继续在战地工作”的邀请，但若以后中国发生全面内战，那在国民党地区就不分什么后方和前方，张治中和陈诚也不会有什么区别了。在战地，陈诚不会为难工作队，但工作队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在重庆，会有很多中国同志一起来商量对付危险的办法，给予实际的帮助。他最后得出结论：还是返回重庆有利！

1941年1月30日午前，工作队到达重庆码头。重庆两万市民站在码头上面的路边，热烈欢迎工作队凯旋。郭沫若站在最前面和每位队员握手。鹿地亘致了感谢词，他说：“我衷心祈望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不要发生不团结的事情。”他的讲话得到欢迎群众热烈的掌声。接着，工作队员坐拖拉机去欢迎会场——国泰剧场。路上，隐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国民党暴徒向队员们投掷小石头。

在剧场，郭沫若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热烈欢迎工作队的凯旋。他说：“在抗战中，中日两国人民结成了兄弟般的友情，你们作为日本人民派来的使者，给予了我们百万援军般的力量。我们中国人应该怎样来报答你们呢？这就要求我们不背叛，不使日本兄弟失望，团结抗战到底。团结，就是我们的全部责任。”他的话使全场的听众沸腾了。当时国民党禁止民众一切集会、言论的自由，市民们满腔的怒火，趁着欢迎工作队的机会喷发出来了。

夜里，郭沫若设宴慰问了工作队员。

第六章

解散反战同盟

第一节 国民党特务的幕后指挥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重庆《新华日报》公开揭露了国民党挑起内战、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但国民党仍不就此罢手。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工作委员会从最坏的情况作准备，有组织地把干部疏散到各个可能组织抗日民族运动的地方。反战同盟继续和郭沫若、文化工作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并协调步伐，对中国内部问题保持沉默，不予介入，坚定反战的信念。他们继续向市内派遣盟员，送日语广播稿，继续与电影制片厂、青山和夫负责的印刷厂内的盟员进行联系。学习会也照常按时进行。

当工作队在宜昌前线时，顾问汪恰民因种种问题被撤销了职务，改由冯乃超担任，卫兵也被撤走了。这给盟员搬去了头上的压力，但也使外面的各种人，得以自由地出入同盟，从而对某些盟员发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六战区回来的不可靠分子成仓进、佐佐木正男开始与留守队中的不满分子迅速勾结起来。他们分别出去，但经常一起很晚回来，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在外面策划什么。

同盟为了团结反战，经常举行相互批评会、听取意见会。成仓他们总是说：“什么意见、不满，都没有。”但他们在行动上却加快了破坏纪律的步伐，他们不参加研究会；执行任务时，或禁止外出时外出；相互批评会刚结束就到外面买了酒，夜间在厨房里大吃大喝等等。

当时，岸本、广濑访问制片厂时遇到植进。植进说：“现在，同盟碰到了大暗礁，趁此机会可以在内部搞个大动作。”显然，一个分裂同盟的阴谋正在暗中策划着，植进也参与了这个阴谋。对此，同盟不能与国民党作对抗，不便单单禁止成仓等外出，不好给主谋者以处分，这会给国民党提供“同盟不稳”的口实。因而同盟只能进行思想教育，使阴谋者反省；从内部给予约束，使他们感到理亏。而不满分子正是看准了同盟的这个弱点，继续向深渊滑去。

这时，原日军少年航空兵新田在相互批评会上，直率、坦诚地反省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和错误思想。这震动了阴谋的策划者，使邹任之公开地跳了出来。

1941年2月26日，邹任之来访。他说：村上逃跑事件现在又重演了。前线工作队的成绩已被抵消，社会各界的评论很不好，同盟面临着解散的命运。若同盟解体，收容所的工作也没有出路，作为朋友，不能不作忠告，同盟一定要改组。并强调说：“今天，我讲的是最后的意见，希望你们能够同意。”邹任之提出的改组同盟的方案如下：

- 一、取消桂林西南支部，全体盟员集中到重庆，进行再选择，加以再训练。

- 二、调整组织。首先密切与收容所的关系。现在同盟在外界是孤立的，这非常不利。收容所受同盟委托，在重庆设立两个收容所：一个是同盟盟员候补者的“训练所”；另一个是落后分子的“再训练所”。

- 三、除了政治部，还要密切与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所、国际问题

研究所等国民党各机关的关系。从这些机关的有名人士中，聘请名誉顾问，再邀请下列 20 名左右的赞助会员：王芃生、刘维炽（军令部第一科科长）、陈博生、刘峙（重庆警备司令）、军政部王司长、崔万秋、龚德伯、张季鸾（《大公报》主编）、何浩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冯乃超等。

四、在同盟内部，要提高会长的地位，不管同盟发生什么事情，会长不负直接责任。会长除决定同盟的大纲外，会务、人事等均不予过问。

把同盟组织军队化，排除民主，只准少数干部接触会长，这少数干部和两名中国人指导员向会长负责，以命令来贯彻方针。

五、同盟的工作方针，要有连贯的计划性。过去把前线的宣传工作作为重点是不正确的。对同盟抱疑惑态度的人们，对工作队向日军做什么样的宣传是有疑问的。与其如此，不如进行使一切人都能理解、同情的公开的活动的活动，把文字的宣传和研究作为重点。

六、从今天的形势看，同盟盟员的将来是不能有保证的。一部分盟员已陷于不安和动摇。例如，在中国和日本妥协结束战争的情况下，同盟怎么办？你考虑过这事没有？这一点，要与政府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上的协定。

七、这样改组后的同盟，当前约需经费二万元。这有必要请政府以补助金形式支付给同盟……

邹任之说完改组方案，继续说：“你立即把我讲的内容上书报告给蒋委员长。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报告书必须在 3 月 15 日发出，过了 15 日，同盟和你本人就危险了。”

鹿地亘驳斥了他的中国政府与日本妥协的论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的，并告诉他，要和政治部研究后再给予答复。邹任之要他不要和政治部研究，自己作决定，必须在 3 月 15 日作出回答，并许诺，你如同意改组，政治部将给你名誉设计委员的头衔，这将大大改善你的生活。

邹任之的改组方案，实质上是要把鹿地亘变成没有一点实权的名誉会长，把同盟变成完全听命于国民党的傀儡组织。

邹任之的方案使鹿地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邹任之已在直接指挥成仓进等的活动。第二天，鹿地亘想召开总会，以洗涤不满

分子心中的积淀，防止同盟内部危机的总爆发。这引起了成仓进的不满，他扬言：要趁中国内战的时机干掉新田、濑户、鹿地亘。总部开会后决定逮捕成仓进，送往政治部特务营监禁。成仓进眼看情况不妙，立刻作了检查，表面上也老实了一些。接着，总会也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盟员外出或对入内的外界人员，尽量少讲话，不接触；限制散步区域；送广播稿去市内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成仓进等也表示服从，似有悔改的意思。

3月15日，鹿地亘去拜访邹任之，两人没有商谈出什么结果。16日，鹿地亘刚吃完晚饭，新田寿太郎就慌慌张张跑来，说成仓他们上午出去至今没有回来。鹿地亘立即赶到同盟处，进行了解。午前8点半，佐佐木正男、中村一夫、秋山盛三人说到医务所看病外出；这以后约10分钟左右，松野博、浅野恭子去医务所附近散步；9点，高野诚、根本新平到政治部合作社买酱油，还带了瓶子；最后，成仓进去合作社理发。到晚上6点，八个人一个也没有回来。

检查他们的抽屉，发现了一份复写的成仓进等人向国民党有关各界人士的《陈情书》。该书中写道：鹿地亘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对盟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他们自己信仰三民主义，并愿以三民主义来改组同盟，与政府精诚合作；会长不给病人吃饭，但对追随他的人却给予优待伙食，发几十元的机密费；到市内送广播稿，政治部每次给20元谢金，同盟收去5元，给本人15元。但鹿地亘或池田幸子出发时，每次要花去几万元；在改组“独裁”统治的同盟前，他们不得不潜伏到附近的山中，以示抗议；政府改正了同盟的错误，罢免会长鹿地亘后，他们旋即返回同盟。最后日期注明是1941年3月17日。报告附带说明：此《陈情书》已送张治中，王芃生，以及有关的不少人。

鹿地亘立即向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了报告，冯乃超赶来了。他

们很快断定这是用谎言和阴谋制成的一瓶毒药。成仓、佐佐木之流经常以有病为由，不参加同盟的活动，并要到6公里以外的中央医院去看病，经再三诊断，医生确定他们没有什么病，但他们还是硬要享受病人的特别伙食；他们在“病”中向勤务兵借钱，去饭店狂饮暴食；熄灯后到厨房喝酒等等。为此，同盟禁止炊事员以外的人进入厨房；除星期天或举行宴会，禁止饮酒；根据医生证明，有病者方可享受特别伙食。这引起了成仓、佐佐木的极大不满。

至于《陈情书》中所说机密费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

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外出和他们去市内送广播稿是两码事，他们的开支与盟员的经费不发生关系。

他们想借此毒药，引起张治中等人对鹿地亘的不满与仇恨，从而撤销其会长职务，甚至将其监禁起来。这样，邹任之、王芃生之流就可以很容易地实施他们改组同盟的方案，把同盟接管过去，使之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傀儡组织。

《陈情书》的日期是3月17日，很明显，它是根据邹任之的布置事先写就的。他们等待着3月15日鹿地亘对改组同盟的最后表态。如果鹿地亘到时不表态或不同意，就通知成仓进在同一天准备并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植进联系，3月17日一起逃走。只是由于突然发生的山田被捕事件，使他们仓促地提前行动了。

鹿地亘、冯乃超根据分析断定：一、他们八人的行动，是有计划的逃亡事件；二、逃亡的方向，是离重庆最近的日军占领区——湖北宜昌以东地区。他们要越过嘉陵江，渡船处只有磁器口、璧山、北温泉三处。另外也可能潜伏在青木关附近的大山中。因此，决定分三组，配合政治部的卫兵一起去寻找。及川、森本去磁器口；山野井、片桐去璧山；新田去北温泉。卫兵一到，他们就连夜出发了，结果三组都没有找到人。政治部不得不转请宪

兵队负责追捕。

上面提到的山田浩被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是1941年3月8日夜，山田浩借口借筐子盛东西，到鹿地亘的勤务兵杨云波家，欲强奸其妻子，但没有得逞。这个女人当时在刘仁、绿川英子家作佣人。鹿地亘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开了审查会，决定停止山田浩的盟员资格，看他反省如何再决定是否还留在同盟内。在此之前，先把他送到政治部特务营监禁。

因为山田浩与成仓进关系密切，所以八人逃亡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鹿地亘、濑户、廖体仁就去审问了山田浩。当天午后，新田、山野井、康天顺三人又去审问了他。两次审问，山田浩作了如下交待：

（一）关于成仓进物色逃亡人员的情况。

成仓、佐佐木在宜昌前线时，就有不满情绪，产生了企图逃走的想法。1月末，前线工作队回到总部后，成仓等就开始组织不满分子团体，他们盯住了政治上比较动摇的盟员，在散步时，把他们请到菜馆，一边吃喝，一边用各种谎言诱导他们参加反对派，山田就是被诱惑的一个。

他们首先挑起山田对鹿地亘的不满。工作队在前线时，鹿地亘曾写信给留守队员，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克服缺点，加强团结。成仓却借此对山田说：鹿地亘在前线就想处分你，你这样下去是一定会被处理的。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我们一起，破坏同盟，逃回日本去；你喜欢女人，这是人之常情，日本女子比中国女子温柔、漂亮，在日本男女比例为1：30到40，你一旦回国，要找多少女子都可以办到。而且，目前中国正面临国内战争。你看到的，在赖家桥一带驻扎了很多部队，在紧张地挖掘堑壕，这是在准备内战。日军是否会趁机进攻重庆等地？日军一来就会首先杀死我们，我们得趁机逃走。成仓就是这样将山田拉入了反对派准备逃跑的组织。

（二）关于成仓几次大的阴谋活动情况。

第一次是在2月29日，成仓去市内送广播稿回来，把不满分子召集到政治部第三厅第一宿舍附近的山丘上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成熟，这个计划得到中国人大力支持，请不必担心。在行动以前大家要自重，不要暴露任何蛛丝马迹。

第二次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午后，成仓、佐佐木、山田在邻居百姓家的小山上会面，成仓、佐佐木谈了为准备逃跑进行地形侦察的结果：从冈田逃跑事件看，再顺江东逃是不可能的。从新店子方面，在嘉陵江磁器口过江，走山路到湖北，再顺长江而下，这样比较有把握。并要山田做好起事时的有关准备。

第三次，在逃亡前，借用唱歌先生的房子，开会研究了逃跑的具体问题。成仓、佐佐木、中村、高野、秋山、松野参加了会议。他们商定了这样几件事：

1. 岸本、秋山龙一、及川是敌人，新田是叛徒，片桐、森本站在敌方，但不是为首分子，江都是中间分子。逃跑时，由浅野恭子骗秋山龙一出来散步，成仓骗新田出来谈话，由事先埋伏好的几个人把他们两人杀死。

2. 佐佐木主张，走时一定要使制片厂的植进一起行动。要尽快决定行动时间。

3. 逃跑当天，分别走出宿舍，到政治部合作社附近集合，在这一天内越过嘉陵江。

4. 成仓说：中国已发生内战，鹿地亘将逃去延安。我们须尽快行动。

(三) 逃跑事件的主谋是成仓。他在收容所里一直动摇，只是他的文章写得比较好，鹿地亘爱才，才允许他加入了同盟。他入同盟后，一直是消极动摇。在宜昌前线受到张令澳的消极影响。回重庆后，在邹任之的秘密指挥下劣根性发作。

佐佐木正男是成仓坚定的同伙；高野诚是成仓的参谋长；秋山盛是坚决主张逃跑的；中村一夫、根本新平、浅野恭子是被骗的追随分子。浅野恭子原是娼妇，她过不惯同盟的生活，即使不逃跑，也会生出其它事情的。

(四) 逃跑事件的后台是邹任之，还有王芃生。逃跑前在山田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有一次，我和秋山盛议论，成仓说的中国支援者，到底是谁呢？秋山盛说：这不是明摆着吗？除了邹任之、王芃生还有谁呢！我也有同感。”事实上，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能够经常接触盟员，并能给他们以影响的中国有力人物也只有邹任之与王芃生。

(五) 关于这次逃跑事件的性质、目的。从邹任之、王芃生策划这次逃跑事件来看，他们是想造成一个政治潜伏事件。他们要求逃跑者先潜伏在山中，后即逃到他们那里由他们保护、控制起来，以便进一步利用，直到他们搞掉或架空鹿地亘并完全控制同盟。那时再根据情况决定或继

续利用他们为其服务，或监禁起来，必要时，为保护自己也可除掉有关的知情者。

从成仓他们来看，是利用了邹任之的支援进行逃跑。在《陈情书》中说，是潜伏在附近山中，待后再返同盟。也答应了邹任之去他那里暂时存身的要求。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当天渡过嘉陵江，走长江北边的山路到湖北的日军控制区，然后设法返回日本。

所以，这次八人逃跑事件，从政治上看是邹任之之流策划的严重破坏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事件；从成仓等逃亡的事实来看，是个企图逃回日本的逃跑事件。

(六)关于逃亡者行动前的准备工作。在逃亡前，他们借外出之机侦察了地形，买了地图和指南针，在歌乐山买了刀，以备被人追捕逃脱不了时举刀自杀。成仓乘鹿地亘不注意，从他挂着的上衣口袋里偷了政治部发给他的派司(身份证明)，以便自己在路上冒充鹿地亘骗过检查者。另外，还想买下廖体仁身边的有关物品以备路上使用。由同盟经理部员高野偷了同盟事业费1000元，准备到湖北后用。在四川，他们计划用偷袭孤立农家的办法来获取食物。

山田给鹿地亘送来了检查书：

鹿地亘先生，……我彻底地悔改。在加入同盟时，我是真正企求日本解放的，在批评会上也始终是把批评当作有益于自己的宝贝看待的。现在我是真正变坏了，我走到了反面。我是怎样成为坏人的呢？……我后来开始追求享乐。有人看中了我的弱点加以利用，牵着我的鼻子走，把我推入了坏人堆中。我决心改过，从现在开始，我要像鹿地亘先生说的那样，不管什么事都要勇于改正。我从今要断然变成新战士。从今以后，不论碰到任何困难我都要勇敢地向前迈进。……我希望早日和各位一起辛勤工作，我盼望着为日本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山田浩

民国30年3月17日

逃跑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17日，邹任之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赖家桥，用强硬的口气对鹿地亘和冯乃超说：“赶快进行搜查，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车子、汽油。”又说：“根据他们信中讲的，他们不会逃亡，大概潜伏在青木关附近的山中了！”

邹任之接着兴冲冲地来到市内郭沫若的家中。一见到郭沫若，

邹任之就用带着威胁的口气说：“你对逃亡者不注意，难道不负重大责任吗？”郭沫若针锋相对地说：“关于我的责任问题，不需要你来教导！我当然有责任，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搜查、追捕的责任已经移交给警察。好好出些点子，我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郭沫若不客气地把邹任之撵走了。

接着，在大雨天，青山和夫访问了郭沫若。他幸灾乐祸地对郭沫若说：“怎么样？在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上，我和鹿地亘意见不一样。从这件事来看，你认为谁对呢？”郭沫若右手握拳猛击茶桌，震得茶杯向上跳起。他愤怒地说：“混蛋！”青山和夫像遭雷击一样，登时立了起来。

郭沫若的口气有所缓和，他说：“你坐下。过去我就了解你，你是得到参加中国抗战机会的少数日本人中的一个。只要有可能，人们都是要使反战事业成功的。但你至今做了些什么事呢？鹿地亘的工作，有失败的地方，但他做的是正义的、漂亮的工作。大家都应看重、支持他的工作，使他成功。你青山和王芃生、邹任之一起，却因友人遭到挫折而兴高采烈，这该怎么解释呢？”

青山和夫强词夺理，不说自己不对，反而向郭沫若诉起苦来。他说：“冯乃超、鹿地亘骂我是走狗！”

“你亲自听到冯乃超、鹿地亘这样讲你的吗？”郭沫若问他。

“不，不是亲自听到的。是王芃生告诉我的。”

“王芃生是亲自听冯乃超、鹿地亘这样讲的？”郭沫若追问道。

“不是，他是从邹任之那儿听说的。”

“你有没有当冯乃超、鹿地亘的面核实一下呢？”这时青山和夫无言可对了。

“你对王芃生、邹任之比对自己的朋友还相信吗？”郭沫若继续耐心地开导他。

青山和夫最后说要去见冯乃超、鹿地亘，告别了郭沫若。

鹿地亘见到郭沫若时痛心地掉下了眼泪。郭沫若说：“邹任之这个人我了解，他是个年轻的破坏者。这次逃跑事件他是主谋。我们工作中有缺点，有空隙，让这个害虫钻了空子，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

通过调查，了解到逃跑事件的前因后果，根据郭沫若的意见，鹿地亘给政治部张治中部长写了报告：详细叙述了事件的起因；至今还未发现逃亡者的踪迹；指出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就是收容所所长邹任之；同时检查了同盟本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要引以为戒，注意改正。

这个报告呈上以后不久，邹任之就被派到敌占区上海去工作了。一年之后才又回到重庆。

当然，这八个逃亡者并没有按照邹任之、王芃生的要求潜伏在青木关附近的大山中，他们在3月16日当天渡过嘉陵江后，就一直根据地图、指北针奔走在向东的山路上，到了梁平县。接着，小心翼翼地走向万县的轮船码头，企图在那里坐船顺长江东去湖北。在那里已等待他们两个星期的宪兵、警察，发现并逮捕了他们，之后被送回重庆，关押在政治部的特务营里。

第二节 解散反战同盟的命令

成仓进等八人被逮捕、监禁后，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找到郭沫若商量处理意见。张治中最后说：“把同盟取消，给失职的鹿地亘记大过一次。”

郭沫若愤怒地说：“好！就这样吧！请别忘了也给我记一次过，取消文化工作委员会。”

张治中说：“你怎么啦？难道你不知其中的缘由吗？”

郭沫若生着气离开了张治中。他找到冯玉祥等人，请他们向

蒋介石讲明此事。鹿地亘找到了谭平山、邵力子、孙科等人，叙说了事实经过。他们颇为同情，表示将向有关方面游说。

郭沫若、鹿地亘等在做了种种努力之后希望同盟的命运会好一些。郭沫若当时对鹿地亘说：“我们尽可能争取吧！”

· 1941年4月初，青山和夫访问鹿地亘，他问鹿地亘今后同盟该怎么办？鹿地亘说：“我想辞去会长职务，由你来负责同盟工作；若需要帮助，我可以做些工作。”青山和夫表示同意。鹿地亘又说：“不过，这事我还要和别人商量以后才能决定。”

鹿地亘征求同盟盟员的意见。新田等人坚决反对，他们说：“青山和夫一当会长，我们这几个人一定会被送到收容所关押起来。”

濂户说：“鹿地先生，他们要解散就解散好了，怕什么！我们已经觉悟了。以后我们再一起干就是了。”

青山和夫对鹿地亘说：“我准备对盟员逐个进行审查，合格的，由青山研究室采用并给予各种待遇。”

在鹿地亘考虑是否辞去会长职务时发生了一件事。青山研究室的关村等五人逃到赖家桥，诉说他们不堪青山和夫的种种虐待，不愿再回去。鹿地亘把青山和夫找来，说不能对关村等使用非常手段，青山和夫一口答应。鹿地亘买了汽车票，派人送他们回去。但关村等回到研究室就被青山和夫叫来的宪兵戴上手铐押回了收容所。这事引起了同盟盟员的极大不满，鹿地亘也最后打消了辞职让青山和夫当会长的念头。

在邹任之出走，王芃生、青山和夫被揭了尾巴，内部破坏分子被逮捕，落后分子充分暴露出来之后，同盟对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正确的处理，对每个盟员进行了思想的、政治的训练，同盟出现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时期。

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8月8日，美、

英、苏、中发表声明，结成联合战线。这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对日妥协投降的方针，内战政策也随之暂时搁置起来。但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的方针至死也没有改变。对倾向共产党政策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他当然不会放过，只不过是等待时机罢了。

这时，反战同盟仍一如既往，坚定信念、开展活动。1941年7月20日反战同盟总部成立一周年，总部的同志和郭沫若、阳翰笙、老舍、冯乃超等，共几十人出席了重庆文化界为此举行的纪念集会。郭沫若、阳翰笙、鹿地亘都即席题诗。老舍题诗：“一代和平风扫沙，海天雷雨斗龙蛇。旧潮垂死血成碧，大地重生春是家。小住巴山盟菊竹，待还瀛岛醉樱花。临流共誓同舟志，东海晨开万丈霞。”表达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结成的深厚情谊。

在八人逃跑、关村等被送收容所事件发生之后，在同盟内部又发生了植进逃跑事件。植进在从中国电影制片厂调到青山研究室不久就只身逃跑，被逮捕。这一系列由邹任之、王芃生、青山和夫策划或迫使所发生的事件，使国民党抓住了同盟的小辫子。

1941年8月23日，鹿地亘吃过晚饭，正要去同盟办公室看看最近编辑的一期《为真理斗争》刊物的印刷、装订工作的进展情况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传令兵送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请即去郭先生处，我也去。冯乃超。”

鹿地亘来到郭沫若家，冯乃超已先到了。郭沫若对冯说：“请你向鹿地先生说明吧。”

冯乃超点头说：“好！请你先看这个吧！”

鹿地亘拿起桌上的公文一看，竟是张治中签署的解散同盟的命令。

命令说：反战同盟“思想不稳”，同盟盟员不服从会长的管理，为了对全体盟员进行“再训练”，自8月25日起向设在贵州省镇

远县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迁移。“同盟的名义，和会长的地位，还和从前一样。”

这个命令表面上是保存同盟，但其实质却是解散、取消同盟。

郭沫若、鹿地亘、冯乃超等，对此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郭沫若说：“到今天，我们已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接公文后我立即打电话给部长，没找到。现在看来，要撤回命令已不可能。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进行努力，将来使同盟复活。到后天这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做什么？”

郭沫若看鹿地亘不作声，又说：“请你考虑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

鹿地亘说：“我要找部长说个清楚！”

冯乃超问：“你这话是想说什么？”

鹿地亘气愤地说：“中国政府认为同盟和我已没有什么用了，那所谓的保留同盟和会长的名义就没有必要了。请他都收回去吧！我请他同意我到别的国家去！”当然，鹿地亘有句话没有讲，就是：“我也可以到延安去。”郭沫若、冯乃超知道他有这个想法，但那是实在不能继续留在国统区时才能考虑的最后一出路。

“那样做怎么行呢！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同盟盟员怎么办？明天他们知道了这事，该怎么办啊！你是了解当前的世界形势和中国抗战的情况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一意孤行到底。”郭沫若劝导着鹿地亘：“同盟盟员的事，现在已没有商量余地。我们就研究一下盟员返回收容所后的工作吧！要马上作好准备！”

鹿地亘的头脑很快清醒、镇静下来，说：“请放心，不管怎样，我一定把事办好！”接着鹿地亘在郭沫若家中写了给张治中的报告。郭沫若亲自将其译成汉文，并加上了他的意见。

报 告

遵照本月二十二日的训令，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到二十三日实

质上已被解散。

我就有关会长重任，没有尽到自己责任事表示：一、没有因此事改变对阁下和政治部的信任；二、对至今誓死同行的多数同胞，因我而遭受到不幸，深感无限的内疚。

请求内阁和政治部，为了我的那些同胞，对我的进退做出裁定。

一、请当局决定：同盟的名义，是继续存在，还是不存在？至于我的会长职务，请准予辞去。

二、我的政治部名誉设计委员的任命，自然随会长职务的辞去而失去意义；从责任来看，希望能一并辞去。

三、因为出了重大事故，我不可能在原来工作过的地方继续工作，因此，请求允许我自己去寻找适当的存身地方。

四、有机会，我希望能向你面禀。

谨祝你好。

请郭先生转呈

政治部张部长

鹿地亘（盖章）

民国 30 年 8 月 26 日

鹿地亘接受了郭沫若的劝告，把不稳妥的想法“离开中国”改为“自己去寻找适当的存身地方”。

在郭沫若转呈鹿地亘报告的同时，还附了一份签呈：

签 呈

在这里，我把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会长鹿地亘的报告原文翻译成汉文，供你们审阅。我想，该人是敌国知名人士，因从事反战而招致敌国军阀的忌恨；为了抗日战争事业，辗转逃避敌方的搜捕，奋起参加抗战。在这里，为对敌宣传工作出主意，展开四年有效的工作。这次逃亡事件实属意外。因此产生退去的想法也是属于人之常情。他报告中的各项要求，请阁下裁定。我考虑，该人学识渊博，对研究工作有极大兴趣，是否可从原拨给同盟会的经费中每月发给若干补助费，成立“鹿地研究室”，使其能和过去一样继续为我抗战服务。

敬请考虑、批准。

谨呈

张部长
梁、王副部长

郭沫若

转呈鹿地亘报告和译文各一份。

郭沫若的用意是劝告张治中同意设立鹿地亘研究室，免得鹿地亘离开国统区，同时给张治中以适当的退路。

郭沫若写好上述意见后，痛苦地说：“我们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有的盟员会受不了而出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证不出任何事情。”

鹿地亘说：“请你放心，盟员们已经觉悟了，他们已做好了对付各种情况的思想准备。他们知道中国现在有两种力量，知道国民党会搞阴谋。”

郭沫若考虑了一会儿说：“今晚上，让大家睡个好觉，明天早晨好向他们宣布‘命令’；明天午后举行盛大的欢送会，表示对政治部的抗议；会后，由文委会举行宴会招待全体盟员；按各位盟员脚的尺寸给每人送一双皮鞋，以示纪念。”鹿地亘心情激动地点头同意。

鹿地亘、冯乃超告别了郭沫若，走过水田中的小路，来到了同盟办公室。他们看到森本、江都在印刷材料；新田把印好的纸搬过来；片桐、山野井把纸放齐，折起来；濑户、及川把它们装订成册。鹿地亘来时，已快全部装订完了。鹿地亘看看表，已是十一点钟，就叫大家回寝室休息。

第二天早晨8点，在办公室召开了同盟总部紧急会议，冯乃超也参加了。鹿地亘在会上传达了张治中的“训令”，并就对此事的态度向盟员作了报告：

一、前天，政治部发来解散同盟的训令。这样的事，当然是不好的。这个“训令”实际上是解散令。然而我们可以根据训令的文字表面，

说不是解散。同盟不解散，不管到哪里，改变的仅仅是外表。我们一定要继续生存下去，并且获得发展。

二、命令是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来的，不是从中国人民那里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仍将不是决定抗战前途的主要力量。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决定权握在人民的手中。同盟将继续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中国破坏抗战者进行斗争。

三、战争总是有时打胜仗，有时又会打败仗，事情总是有起伏。不能因胜利而骄傲，因失败而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苏联的参战以及美英苏中建立联合战线，法西斯侵略者最终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我们日本人民也一定会胜利。

四、中国人民抓住了从背后斩杀新四军的投降派的手，保卫了民族抗日战线。新四军受到伏击，遭到重大伤亡，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比原来更强大了。对反战同盟的破坏事件，在中国民间传为“小皖南事件”、“小新四军事件”。和新四军一样，我们同盟一定要以进一步发展的实际行动来回击国民党的挑衅与破坏。

五、在重庆和桂林的同盟员、非同盟员即将去镇远，加上原来在镇远的，共有五百位日本同胞。他们不少人不知道光明在哪里，看不到前途。我们要给他们以力量，给他们以光明，要和他们团结起来，把他们带入和平与希望之中。今后，同盟将成为秘密组织，同盟将不去前线工作。到了镇远，同盟要成为坚强的核心，要比过去更加诚心、亲切地爱护、团结、教育、依靠这 500 位日本同胞。

六、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友人，一直非常关心同盟，不断给同盟以支持、指导，他们对目前发生的事件极为痛心。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使他们放心，让他们对我们抱有信心。我们要控制自己，不要发生使他们担心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争取同盟的公开活动继续战斗。希望再见的时候，不缺少一个人。那时，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高兴，要使解散同盟的那帮家伙惊讶！我期待着今后能见到更多的新同志……

大家都专心地听着鹿地亘的讲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与

不安。

鹿地亘讲完后，征求盟员的意见，新田张大嘴说：“我今天听得很仔细，你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在这里宣誓：我坚决相信郭先生的教导。”

濂户接着说：“我就不宣誓了。大家都已经听清楚了，请郭先生放心，我们决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今后一定根据具体情况去进行工作。”

及川说：“冯先生，请你和郭先生完全放心好了！”

冯乃超说：“现在，我完全放心了。郭先生也一定会放心的！”

散会后，郭沫若的副官送来了赠给盟员的皮鞋。之后，大家立刻去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了。

过了一会儿，濂户回到办公室指着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机关刊物说：“这是最后一期了，怎么办啊？”

冯乃超说：“和别的文件一起交给文化工作委员会吧！”

儿童剧团的少男少女们来了，他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指责国民党政府的非正义做法。新田用汉语对他们说：“我们是出去工作的，请不要悲伤，我们一定努力工作，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和大家再见了！”

午饭后，郭劳为、阳翰笙、廖体仁、朱洁夫、刘仁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他人员都来了。郭劳为立即抱着及川、阳翰笙抱着新田的肩，不少人流下了热泪。盟员们安慰着大家。

郭沫若来了，他和每个盟员握手。不少盟员一边笑着，一边诚恳地说：“我们的事，请您不必挂念！”

及川贴近郭沫若的耳朵说：“让您费心了。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请相信我们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导，在那里做好工作。”

阳翰笙对鹿地亘说：“真想不到，大家思想都那么坚定，这是

出乎我的意料的。本来，我们是来安慰你们的，现在反倒被安慰了。”

冯乃超站起来，宣布欢送会开始。郭沫若首先讲话，他说：“过去同盟的前线工作和其它工作，使我很感动。但是，今天日本朋友们的言行，使我更为感动。同盟不是什么物品，可以随便搬动。同盟是一座磐石似的大山。在什么时候同盟成长起来，成了这样的大山？这会使想解散同盟的人见了也会发抖的。我很放心，我已亲眼看到了一切，你们是可以送到任何地方去并会在那里开花结果的。请大家保重身体。希望再见之日大家身体都很健康。”

鹿地亘接着发言，他说：“我们已经遭受到很多挫折和失败，人人准备着再经受厄运。但是，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继续战斗，我们同盟一定要继续存在，从这里开始我们新的工作。为了大家奔赴新的战场，让我们高唱《同盟歌》吧！请盟员们起立！”

盟员们集合好，高声唱：

“铁的意志，胜过岩石。

我们克服一切困难，

战胜敌人。

我们是人民的先锋队。”

接着山野井、来宾们，一个个发表了令人振奋的演说。

散会后，在同盟食堂，郭沫若为盟员们举行欢送酒宴。郭沫若带头举杯。在干杯中，郭沫若诗兴大发，要来纸笔墨砚，写了送给盟员们的感怀诗：

英雄肝胆佛心肠，

铁血余生几战场。

革命精神昭日月，

和平事业奠金刚。

风声飒飒流松籁，
鸟语嘤嘤庆草堂。
同是东方好儿女，
乾坤扭转共担当。

（1962年3月14日重写给鹿地亘）

这时，政治部传令兵送来公文。冯乃超接过一看，轻蔑地说：“喔，是部长叫送来的。”公文是三厅何厅长根据张治中电话指示写的。郭沫若看了一下，冷笑说：“好，那些家伙好像害怕了。让我向大家公布公文的内容吧！”他接着宣读公文：“关于同盟所发训令的内容，上司的意见是否会有变化现在还不知道，请等待下次指示。”

“上司的意见即使改变，我们的意见决不改变。诸位，请继续吧！”

在热烈的掌声和笑语中，郭沫若把酒杯高高举起，和大家又一次干杯。酒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宴会散后，郭沫若用力握着鹿地亘的手，把他拉到身旁说：“今天我才知道同盟的事，好像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你花了多少心血啊！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成熟，他们都是磐石。在这里，我脱帽、低头，向你致敬！十年来，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鹿地亘的双手紧握住郭沫若的手，不断地流下热泪，郭沫若也激动得流下热泪。

郭沫若等于25日清晨，依依送别了反战同盟的盟员们。

第七章

华北日人反战同盟工作的开展

第一节 延安支部的成立

1940年春，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野坂参三来到延安。野坂参三是1931年2月受日共派遣，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的。在那里，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

1939年11月，周恩来右手臂受重伤去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1940年2月决定回国。野坂参三早想回日本参加革命斗争，得知此消息后，想和周恩来一起到中国，再转道回日本。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意了他的要求。

1940年3月初，野坂参三告别妻子野坂龙，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真名马斯·普拉沃依洛戴鲁乔·阿明）一起，装扮成华侨、周恩来的随员，和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以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经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热烈欢迎。暂时住在延安枣园中国共产党敌区工作委员会内。

由于当时的形势使他无法潜回日本。经中共中央研究，由周

周恩来、王稼祥代表毛泽东，邀请他留在延安和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野坂参三在1989年出版的《风雪岁月》一书中回忆道：“周恩来建议我工作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将其报告给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对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希望我亲自抓俘虏的教育工作……”他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敌伪问题研究室”担任八路军敌军工作部的顾问时，考虑到需要保密，改取中国姓名，叫林哲。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他公开身份时使用在共产国际时的姓名：冈野进。1946年回国后才用本名野坂参三。

开初，由王学文协助他工作。王学文生于1895年，江苏徐州人。1910年到日本留学，1921年进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优秀学生。同时，参加日本进步团体的活动。回国后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领导在沪有关日本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后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王学文每天走很多路来到林哲住处，送取有关文件、资料；把林哲写的文章送到报社发表^①；研究有关工作。由于受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组织日本人觉醒联盟和鹿地亘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重庆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的启示，经总政治部和中共中央同意，他们开始在延安筹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当时，在延安，另有三位日本人：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森健原名吉积清，1915年生于福冈县。原是日本满洲铁路有限公

^① 当时不少人问《解放日报》编辑部：“这些文章是谁写的？”编辑都说：“是王学文写的。”当时，只有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知道作者是谁。

司工人。1938年被王震指挥的359旅俘获。他企图逃跑未成，却帮助另外两个日本俘虏逃走了。他受教育后觉悟很快，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班的日语教员。高山进，1917年出生在日本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高中毕业后又就读于农业补习学校，毕业后务农五年，又到大阪当工人。1938年被征入伍，到我国华北，不久，即被八路军俘虏。1939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班任日语教师，后到军政学院学习。

由王学文把成立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想法传达给森健和高山进。他们去信和鹿地亘联系，商讨组织关系问题等。由于国民党有关部门阻挠，联系没有取得结果。这样，他们只得单独进行组织，展开工作了。

根据森健、高山进的请求，由王学文代拟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章程（草案），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他们两人看后反复思考，没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很快定了稿。

不几天，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延安支部成立的消息，向国内外发表了成立宣言。下面是该宣言的全文：

日本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了“圣战”的真面目

我们是在华北的战斗中被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没到华北以前，我们也和其他很多的战友一样，相信这次中日战争是为了确立东亚和平，为了日中共存共荣的圣战，因而踊跃地出征了。

但是在战场上奔走了几十天，我们的信念动摇了。我们看到的事实和军部宣传的完全相反，日中两国人民的血和泪筑成的只是日本军部和财阀的“乐土”。

后来我们做了八路军的俘虏，八路军不但不以敌人相待，反而把我们视为自己的兄弟骨肉。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的种种事实，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了“圣战”的真面目。什么圣战，一切都是迷妄，一切都是欺骗。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受难？为什么家庭陷入悲惨和贫穷的地狱里？我们的尸体扔在异国的山野，我们与寒暑搏斗，受疾病折磨，不停地日夜恶

战、苦斗，我们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后方的人民大众又得到了些什么？庞大的军费开支，物价高涨，一切的统制，中小工商业的破产，劳动的强化，农村的荒废和压迫，自由和民权的被剥夺——这就是人民大众所得到的东西。再看另一面，财阀发洋财，军阀独裁统治，不就是在圣战的幌子下进行的吗？

所谓圣战，就是军部和财阀合伙，一起抢掠中国的领土和资源，为了发战争财而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所谓东亚和平，就是东亚的破产。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就是建设军部和大财阀的“乐土”。

听吧！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愤怒的吼声；看吧！为了维护祖国和民族独立、自由而武装着的男女老少站立起来的雄姿。

他们的敌人是谁啊？不是别人，就是进犯中国领土，杀戮他们的同胞，破坏他们和平的生活，蹂躏他们自由、独立的日本军阀和财阀。他们不曾以日本人民当作他们的敌人，并且今后仍将以在同一压迫下呻吟着的弟兄相待，紧紧地热烈地握着我们的手。

被欺骗者、被蹂躏者！让我们一起突进吧！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们的自由，真正的东亚永久和平才会到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援助而且直接参加了中国民众的解放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就是真正的、值得我们牺牲生命的圣战，这就是我们爱国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今天，在八路军驻地内，我们首先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其宗旨完全是为了实行上述的责任和义务。

当我们支部成立之际，我们宣誓：誓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谨此宣言。

立即停止侵略战争！

立即撤退在华日本军队！

打倒日本军部！

打倒日本战争政府！

中日人民团结万岁！

中日人民共同斗争万岁！^①

这份 1940 年 5 月 1 日公开宣布的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

^① 见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士兵之友》创刊号，1940年6月。

言，其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引导下，高举反战旗帜，与中国人民一起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解放中日两国人民而战斗到底；其宣布的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帮助八路军做敌军工作，进行战场喊话，教育、改造日本俘虏，以及尽可能帮助八路军做其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延安支部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搞宣传、教育，利用各种方法及通过各种渠道，向与八路军作战的日军士兵、下级军官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传。

他们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士兵之友》。该刊创办于1940年5月，系日文月刊。开始是给八路军内的日本士兵看的，后来扩大到也适合于日本军队内的日本士兵阅读。这个刊物教育、争取了不少日本士兵，使他们投入反战的行列。

他们编印了100多种各种形式的宣传品，如他们曾多次大量印发的《告日军士兵书》就是其中之一种：

亲爱的战友们：

我们和各位一样，都是日本士兵，我们中间有的是逃出可恶的军队，有的是在战斗中当了俘虏，不得已而来到八路军中的。

现在我们在八路军内，不但没有被当作敌人，却被当作国际朋友般的对待。我们过着自由的、快乐的日子。八路军是我们日本士兵的真正朋友。

战友们，像你们所知道的，不论在国内是怎样一个独立的男子汉，到了军队以后便不值一文钱。一切都借口于命令、军纪，强制你执行。人比步枪、马匹更不值钱。尤其是战争延长，实行现地教育后，日本军队就更加可厌了，长官的横暴比敌人的袭击更可怕。我们士兵们的生活不自由，所有士兵都愿意生活得更像人一些。即使在军队内，我们的自由也应该广泛些；过稍微好一些、舒服一些的生活。这种情况虽然嘴上不说，却是每个人心里都想的。

受委屈的战友们！请你们想想，我们日本士兵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是什么呢？是血和泪的海洋！是军费、公债！税收！是贫穷和死亡！除此之外，还得到些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非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和不自由不可呢？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都是为了战争的缘故，如果没有战争，当然不会有这样的事！

本来，假使这个战争是真正正义的，是真正为了东亚民族解放的战争，那么，我们就有忍受任何不自由和艰难的决心。但是现在军部所进行的战争，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战争呢？

1937年7月7日日中战争爆发后，军部向国民说，这个战争是自卫战争。但是战争到了今天，日本军队占领了比日本本国还要大得多的中国领土，杀戮了千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军部和财阀的野心昭然若揭，连三岁的小孩都明白是谁在这场战争中发了财，升了官。不论“日支共存共荣”也好，“大东亚共荣圈”也好，都不过是军部和财阀们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的借口而已，我们劳苦人民和士兵却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

战友们！当你们明白了战争真相，就勇敢地起来反对这场不义的、使中日两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战争吧！

请你们来八路军方面，参加真正站在日本人民立场上的反战同盟吧！

我们永远等待着你们！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延安支部从1940年11月起开始日语无线广播，每周两次，以日军中的士兵为对象。广播内容有战况评说、八路军中日本士兵的生活、日本工农学校的情况，并用大量事实生动地说明这次中日战争的性质。后因收听效果不理想，改用罗马字电报，发往华北前线反战同盟各支部，再由他们收录、印刷，向日军士兵散发。

延安支部针对某些盟员入盟动机不纯、对前途缺乏坚定信念、个人主义等等现象展开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使盟员们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反战工作能力逐步得到提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志愿参加了八路军，部分人加入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延安支部召开大会，由森健、梅田照文、中小路静夫以及八路军敌工部代表廖体仁讲了话，

最后，在热烈紧张的气氛中一致通过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战争宣言》，宣言表达了与会者的心声：

战争已经爆发了，日本法西斯为了达到其南进的野心，采取了不宣而战的故伎，袭击英美的军事基地，太平洋上的大屠杀便从此开始。

这场战争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中日战争的必然归宿。这是日本法西斯匪徒为了弥补其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失败，响应德、意法西斯而进行的强盗战争。

这是日本法西斯匪徒假借圣战之名，而使日本人民陷于生灵涂炭而进行的战争。这是在建设“新秩序”的名义下企图置太平洋，不，企图置全世界人民于日、德、意法西斯杀人魔王们的刀枪之下而进行的战争。

我们反战同盟员，作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和全世界劳苦群众中的一员，郑重宣言：我们要坚决反对这场不正义的战争到底，我们要和英、美、苏、中及全东亚人民，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共同携手，为消灭日本及一切法西斯强盗而斗争。

日本的劳苦同胞们！

希望你们也和我们共同奋起，为反对战争，打倒暴虐的战争政府，建立自由和平的人民政府而斗争。

日本的士兵同胞们！

我们要为反对法西斯军部，从占领地区撤兵，回故乡而斗争。

现在已经有 22 个国家宣言要打倒日本及一切法西斯匪徒。全世界已经结成坚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全世界十分之九的人士都是我们的战友。法西斯蒂已经孤立起来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打倒全人类的死敌日本法西斯军部！

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万岁！

最后胜利属于正义的战士！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1941 年 12 月 13 日^①

为了加强抗日力量，防止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1942 年 8 月 15 日，延安支部和日本工农学校的同志自动组织起

^① 《解放日报》1941 年 12 月 18 日版。

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发表了坚定的参加边区自卫军的誓词：

亲爱的边区弟兄们：

我们是曾经受日本法西斯欺骗的日本士兵。当我们彷徨在战场上，正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得到了八路军的搭救。现在，在你们深厚的国际友爱中，我们成为工人阶级反战的战士而成长着。

同志们！你们是我们的第二慈母，边区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不愿敌人踏进我们的第二故乡，来蹂躏我们慈母兄弟的一寸土地。我们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边区。

你们和万恶的敌人英勇斗争了五年，而且继续斗争着，我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同时，我们决定参加边区自卫军。我们谨以至诚之心在这里宣誓：

坚决保卫边区并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

为彻底消灭中国和日本人民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强盗和你们共同奋斗到底！

1942年8月15日^①

在延安支部全体同志的积极工作以及八路军各级敌军工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反战同盟组织迅速在华北、华中各地成立了支部。从1940年5月到1942年8月，延安支部在林哲和八路军敌军工作部领导下，成了事实上的华北、华中反战同盟组织的总部。同时，与觉醒联盟相比较，它在发展敌后日本人反战斗争方面逐渐起了更大的领导作用。

第二节 冀中支部的成立

1941年2月23日，在冀中军区后方，平汉路西唐县南洪城村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支部成员有田中实、东忠、吉田、多多良四郎、小松、中山六郎等六人。后来又发展了

^①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0日版。

和田真一、松山一郎、林义雄、西村、津田、吉村、浅见、三木、渡边、水户、三浦等，共十六、七人。

田中实任支部长。东忠任副支部长兼宣传部长。冀中支部编印了大量传单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本质和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以及日本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有一份传单写道：

父亲：

久未问候，祝您身体健康，您那儿一定是很辛苦了，我们还是和您出征前一样，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现在已到麦收季节，家中深感劳动力不足。在插秧时由于邻居安造君的协助，总算按时植完，而今安造君也被召从军，家中再无人来帮忙。我虽然年仅十三岁，也得像大男子汉一样地参加劳动，但仍感人手不足，十分困难，将如何是好呢！

到底这个战争为何而打呢？朋友们说是为日本、东洋和平而战。但是父亲不在家，就是日本、东洋和平了，我也不愿意。如果没有战争，我想，父亲是不能到远离家乡的中国去打仗的，家中也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咱乡小学木村老师的遗骨昨天已经送到家了，父亲是否也将变为骨头回来呢！这成了我每天担心的事了。母亲每天在背地里偷偷地伤心落泪，盼望您早日归来。

想念您的孩子 谨上

他们向日军据点送慰问袋。内装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签发的到解放区的通行证，还有一盒在战场上缴获的五颜六色的糖块，一块印着反战、厌战歌曲和樱花的白麻纱手帕以及反战同盟的各种传单、刊物。

他们还在1941年夏天，以反战同盟盟员为主加上日语训练班一部分学员，三名朝鲜义勇队成员，组成了一个“国际剧社”。节目大部分由反战同盟盟员自编自导。有小型舞蹈，有用中、朝、日三国语言轮唱的小合唱，他们还排练过话剧《满洲囚徒》，该剧反映了中、日、朝三国爱国战士反抗日本侵华军法西斯暴行的斗争。

吉田在入伍前是小学音乐教师，会谱曲，会唱。他在八路军日语训练班为学员教日语时，教学员唱一首《思乡厌战歌》。歌词

大意是：

啦啦啦……

丢下老婆、孩子，丢下家，

来到支那打天下。

今天这儿，

明天那儿，

白天黑夜去厮杀。

家里没米，

孩子在叫妈。

做娘的，没办法，没办法呀！

盼望丈夫早回家……

啦啦……

他还教八路军同志吹口琴，唱日语《国际歌》。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时，他英勇牺牲。

“五一”大扫荡时，冀中军区为了战胜敌人，把反战同盟冀中支部、军区日语训练班、军区敌工部的同志分成若干工作队，分别到各军分区，化整为零地配合八路军反扫荡。

盟员松山一郎随支部第六工作队来到靠近天津的静海、大城、文安等县活动。他带着病坚持工作，对敌进行反战宣传。1942年5月下旬一个夜里，任（邱）河（间）大（城）支队悄悄包围了大城至任邱公路上的吕公堡据点。割断了通往据点的电话线，把带来的电话机接到电话线上。松山拿起话筒开始与据点内日军谈话。

“喂喂，你是班长佐佐木先生吗？”

“不是，他睡觉了，我去找他来接电话。”日军士兵放下话筒去找佐佐木。

“喂喂！我是佐佐木，你是哪里？”佐佐木以为是上级来电话，拿起话筒问道。

“你是佐佐木先生吗？晚安！打搅你了。我不是你的上司，是你的朋友，是一切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官兵的朋友，是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盟员。我叫松山一郎……”松山回答并作自我介绍。

“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反战同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打电话的？”佐佐木不知道反战同盟是什么组织，急忙反问道。

“我原是一个日本军人，在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了。八路军没有杀我，而且受到尊重。经过学习，我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侵略，所以参加了被俘日军士兵组成的反战同盟，为反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军阀、财阀而斗争。我现在就在你们据点的附近。”松山把自己的经历给佐佐木讲了一遍。

“不要讲了，我明白了，你是八路军，是敌人！”佐佐木扔掉话筒，从据点里传来唧唧的警笛声，下命令的吼叫声。接着红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据点不断向四周打机枪，开迫击炮。

松山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在旁边蹲着的宋朴队长，宋朴队长建议他不断摇铃直到有人接电话。

“喂喂……怎么不讲话？不要害怕。我们不是来拿据点的。别的据点也统统被我们包围了。请你们不要打枪开炮。我们是来和你们谈心、送慰问袋的。我们保证不攻击你们。请安静地听我讲吧！”

“告诉我，你们在哪里，我们去找你们。”佐佐木进行挑战。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八路军一个团已经把你们和别的据点牢牢包围了。你一定要打，请先摸摸自己的脑袋。”松山据实回敬过去。

“能等到天亮吗？夜里看不到你们，等天亮能看到你们，我们出去交战。”佐佐木的话软了下来。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来攻打的，是诚心诚意来谈话交朋友

的。”

“刚才你说找我谈话、交朋友，是什么意思？你真是日本军人吗？八路军在战场上抓到日本军人就杀掉！你为什么背叛天皇投降了八路军？你的武士道精神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自杀？还有什么脸活着？”佐佐木复述着上司欺骗他那一套武士道精神的话。

顺着佐佐木的话题，松山一口气讲了八路军如何优待日军官兵，如何启发思想觉悟，自己清除了过去所受的欺骗宣传的影响和武士道精神等情况。佐佐木一直没有插话，似乎忘记了是在和敌人通话。

松山的目的达到了。他最后请佐佐木把这次谈话好好想一想，给士兵们讲一讲。明天到据点附近拿赠给他们的慰问袋。最后双方都客气地道谢，说再见。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时，反战同盟员也投入了反扫荡作战。如东忠同志在群众中隐蔽一段时间后，就随部队一起行动，差不多每天都与敌人战斗。5月29日，他们宿营在晋县小兴庄，被敌人包围。战斗十分激烈。部队为突出重围，每三十人组成一股，从东北角向外冲，东忠主动报名参加第一梯队。突围时，东忠奋勇当先，高喊杀声，用手榴弹向敌人猛掷，他第一个冲入敌阵和敌人拚杀，当即打倒一名日军士兵，缴获一支步枪。八路军战士奋力和他一起冲向敌人，终于打开一个缺口，使部队随后胜利突出重围^①。

反战同盟冀中支部在1943年7月冀中军区撤销时，并入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

1944年11月，八路军冀中军区恢复，冀中支部的中山、渡边、

^① 见《新华日报》1942年9月8日。

津田、水户等同志随军区回到冀中，于1945年2月12日在冀中军区驻地重新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冀中支部，中山太郎当选为支部长。

第三节 晋察冀支部的成立

1941年5月4日，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驻地平山县小北头村举行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支部长是宫本哲治，宣传部长中原，盟员有藤中岸、古泽、夏川中西、安藤、小岛、浅野、渡边、上野、山川、中村、镰田、西川、小村、有川、大城、冈岛等。

参加大会的有全体盟员、八路军部队代表和人民群众2000多人。在全体盟员用日语合唱国际歌后，由宫本哲治致词，他痛述侵华战争给中日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指出成立晋察冀支部的重大意义，呼吁全边区人民给予帮助。

大会发表了支部成立宣言：

日本军阀将人民推入战争泥潭，今天已走上立国以来最恐怖，最艰难，最困迫的绝望时代。战争的继续推进，人民的生命财产更会无限制的消耗，这也同时促使我们觉悟的提高，我们要和一切被迫害的日本士兵弟兄携起手来，为扑灭侵略战争而斗争！

起来！日本弟兄们，拒绝战争吧！立刻要求回国吧！破坏一切武器与军火制造业，破坏一切战争计划，同日本人民忠诚的不可数计的战友——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联合起来，让万恶的军阀财阀政府倒台。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

1941年5月4日

晋察冀支部成员较多。在支部长下，分设组织、宣传、联络、总务四个部和编辑委员会。全体盟员在支部领导下愉快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工作。

《解放日报》记者侯亢较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情况：

我曾经去过他们那里几次，每次他们不是静静地埋头于写作，就是围拢在浓密的树荫下热烈地开着学习讨论会。如果在吃饭后，他们一定在操场上或在俱乐部里游戏；有的时候他们同在一个池塘中洗澡。在公共活动的场合时常可以听到八路的同志喊：“夏川同志去打球”，“古泽同志去下棋”。

这里没有一个人用蔑视的眼光像看待俘虏似的看他们，而是以革命同志的友爱去对待我们的国际朋友。

他们过着有组织的生活，在行政上也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这个行政组织是队、班。有队长，队务书记以及班长、学习组长、队员的分工。还建立了会议、汇报和值班的制度。

学习对于他们是很有兴趣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日本问题研究，八路军介绍，中国语，时事报告是他们的学习课程。每天上午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周有三次学习讨论会，两次读报。他们的学习情绪非常高涨，在游戏时间里也可以时常看到三三两两的在争论问题。或者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坐在夕阳斜照的草地上低着头伏在膝盖上用铅笔在纸上写字，你走近他们身边，他还羞赧地掩藏起来。还有的日本同志微笑着指着一个实物问你：“什么的？”比如你说“茶碗”。他会接着重复几句“茶碗”，如果他咬不清字音，他还会再问你。

在这里不能不提的是他们在七月间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座谈会。在这个大会上，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国内生活，中日战争以来日益恶化的情况以及日本进行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联系理论，指出日本人民的解放是与中国抗战胜利不可分离的，而且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是非常民主的、进步的，在中国全民族团结下，中国抗战最后胜利是为期不远的。

由于他们政治理论的提高，对中日战争的正确认识以及有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他们定期出版《前进月刊》，《前进半月刊》（前线版）。从晋察冀支部成立以来，印刷发行了近二十种小型对日宣传品。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负责的。中西教授掷弹筒射击，安藤教授刺杀和重机枪射击，都和我们教授时一样认真负责。

不论是教课或者写宣传品，他们认为都是革命工作——宣传品的内容是反战的，教课是加强我们的技术。他们在百倍努力，丝毫不懈地努力工作着。

他们对我们做敌军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曾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比如在宣传品的内容上应该浅显具体，要采用富有故乡情调的文体。在樱花

节对敌宣传中，他们采用了日本的许多传统形式，写上思念家乡的内容。他们告诉我们，宣传品怎样才能直接送到日本士兵的手里，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我们发现日本士兵往家乡寄的一百多封信中，大多都有我们印制的宣传品。在易县，一个日本军官对我们的宣传品感到没有办法对付了，宣传品像一颗将要爆炸的炮弹一样威胁着他，他无可奈何地对士兵说：“八路军这些宣传品也不能说不符合事实，没有道理。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团体，还是不要去看它吧！”

他的这些安慰话不能治疗日本士兵的思乡病，从俘虏和尸体的口袋里往往发现这些宣传品。

这样的工作成绩，他们认为还是不够的，他们仍在谦虚地学习，研究着革命理论，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改变自己，推动时代而努力。他们还热切地希望到前线去协助八路军作战，尽快地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①

1941年底，晋察冀支部配合八路军展开对敌政治攻势。当日军指挥机关在石家庄等地的大据点发现反战宣传品后，立即戒严搜查，发布通告：“凡保存、谈论此种宣传品者，以通敌论罪。”驻天津的日军指挥机关在广播讲话中宣布：对此“今后皇军当以毒瓦斯进行报复”。^②

1942年2月，晋察冀军区展开对敌第二次政治攻势，反战同盟对驻孟县城东20公里处的南昇据点进行反战宣传。一开始，盟员们只向日军提出在战地共同欢度日本樱花节，日军很快同意了。盟员们用口琴合奏了一曲，曲终，对方鼓掌叫好。盟员要求日军士兵表演，他们也用口琴奏了一支曲子。我方也热烈鼓掌。接着双方又分别合奏了几支曲子，使气氛越来越融洽。这次宣传虽然没谈论政治，但确实扩大了同盟在日军中的影响，使据点中的日本士兵深刻领悟了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知道了中国人民与日本

^① 见《解放日报》1942年9月2日。

^② 见《解放日报》1941年6月30日。

人民不是敌人。

第四节 山东支部的成立

八路军 115 师一贯重视敌军工作。1940 年师政治部的敌工科扩大为敌工部。1941 年，敌工部在蛟龙湾的师整训展览室里展出了抗战以来对日军工作成绩、经验的照片和文字，并根据上级指示，不再提“打倒日本天皇”的口号，强调“打倒日本军阀、财阀”。开始重视调查、研究日本风俗习惯，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激发他们的思家厌战情绪，尊重日军俘虏的民族自尊心，加强了对敌军瓦解的份量。在此基础上，1941 年 6 月 2 日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支部长由大西正担任，副支部长是上中庆太郎，宣传部长中野博，盟员有坂谷政三、上田正雄等。

同时，在山东军区的下一级军区，也先后成立了反战同盟支部。

1941 年 9 月 18 日，在八路军胶东第五旅司令部，召开了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大会，小林清担任支部书记，布谷任组织委员，石田为宣传委员。中共胶东党委、军政委员会、八路军胶东第 5 旅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胶东军区敌工科长张昆主持大会，宣布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宣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和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的贺信。王文政委、仲曦东主任分别代表胶东区党政军讲话，热烈祝贺胶东支部的成立。

小林清代表全体盟员用日中两国语言宣读了誓词。接着，盟员一致同意吸收松下等为盟员。会后很多中国同志和盟员们紧紧握手，热情祝贺。

1942年秋，渡边三郎从山东军区政治部回到胶东，任支部长，小林清仍任支部书记。小林清原名小林洁，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是原日军第19步兵联队的一名上士。他被俘后不久就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使世界观、立场有了根本转变。

山东支部、胶东支部用各种形式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有一次，盟员托老乡给青驼寺据点的日本士兵送去慰问袋，和井伍长从卫兵手里接过慰问袋，自己从里面取出一块红毛巾，两个柿饼，一张传单，对旁边的士兵说：“我拿这一些，其余的由你们分吧！”把慰问袋交给了士兵。士兵们一边吃着柿饼、花生，一边从慰问袋里拿出传单，仔细阅读。

第八章

华中日人反战同盟工作的开展

新四军从成立那天起，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对日军俘虏的政策。在对日军工作有相当研究的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直接领导下，展开了对敌军的反战宣传、政治瓦解工作，使被俘的日军士兵逐步增多。如1938年7月，新四军在金坛附近的战斗中俘敌兵香河正男。8月，俘获敌兵田畑作造。12月，日兵后藤勇、三谷端一在被新四军包围，听喊劝降口号后主动缴械；山本俊一被包围，听到口号后仍不缴械，新四军扔给他一张传单，他看后笑着缴械了。据统计，从1938年7月到1941年7月三年时间里，新四军俘日军92名，根据政策大部分被释放回去。对愿意留下来的日俘，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逐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思想得到改造，确立了新的人生观。1940年2月，在军部驻地皖南云岭，香河正男等人集体宣誓加入新四军并从事对日军的反战宣传，这标志着华中敌后日本人民反战力量开始产生。

1941年11月，在鄂豫边区，成立了反战同盟鄂豫支部。负责人为森田义男。开始，他们几个人主要是进行政治学习。

1943年，在新四军五师，即鄂豫军区正式召开了鄂豫支部成

立大会。由于在此之前华中敌后已成立了四个反战同盟支部，所以鄂豫支部又称为第五支部。有人据此否定鄂豫支部成立于1941年11月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由坂本义次郎担任支部长，成员有森增太郎、森田义男、松原秀雄等十多人。

他们在1942年，编印、转发了日文宣传品十多种，出版了日文小报《赤旗》。他们经常用仿造的日军军用信封盖上仿造的日军军用邮戳，填上事先已获知的日军驻地、番号、士兵的姓名，寄去有针对性的宣传品，等等。

由于5师的不断打击，盟员的深入宣传，使驻鄂豫地区日军的斗志逐渐削弱。1942年，湖北应城长江埠一日军骑兵背一支步枪向5师部队投诚。驻竹沟一名日军士兵以外出打鸡为名，跑到附近的汪家台村对中国农民跪下磕头，要求帮他投诚新四军。他怕农民不相信，立即把步枪交了出来，在农民引导下，他投入了新四军的怀抱。

1942年5月，日军58师团开往湖北应城时，一路上有18名士兵逃走。其中有部分人投诚了新四军五师。

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上半年，五师就收容了投诚的日军士兵4人。其中第3师团的3人；混成第18旅团的1人。

由于支部的反战成效，支部长坂谷义次郎被选为鄂豫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2年3月15日，在新四军第一师（苏中军区），成立了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支部长香河正男，成员有滨中政志、横山岩吉、田畑作造、后藤勇五位。后又增加松野博。

有人说：1943年12月，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在新四军第一师成立，支部长香河正男。据当事人香河正男的回忆和其他当事人的文章：苏中支部成立于1942年3月15日，不久，即随部队转移到苏北；在香河正男等的参与下，于1942年7月15日成立了反

战同盟苏北支部；1942年8月，香河正男等随部队回到苏中后，恢复了苏中支部的活动。故有人误认为苏中支部成立于1942年秋季。1943年12月3日，苏中支部在苏中东台县三仓河举行成立大会。所以说，认为苏中支部成立于1942年秋季或1943年12月，都是不确切的。这种情况和反战同盟鄂豫支部一样，它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并不是它成立的时间。同时，要说明的是，1943年5月反战同盟华中地方协议会已经成立，香河正男担任会长，苏中支部的支部长已改由滨中政志担任。

苏中支部成立后，盟员继续学习有关文件，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反战工作能力。同时，大力开展反战活动，搜集工作所需的一切情报资料，然后编写传单，刻钢版，印刷，散发，以及教育俘虏等。

他们出版了《新时代》刊物，主要对象是周围日军据点的士兵。

在支部驻地不远有个小镇，叫黄桥镇，它以黄桥烧饼闻名。日军警备队在那里驻扎一个小队。这个小队的翻译实为朝鲜义勇队派去的李德武，他和支部有联系。所以苏中支部对这个小队的情况非常清楚。支部利用这个条件，经常写成厌战、反战的传单、信件，通过李德武委托的黄桥附近农民，利用每天给警备小队送柴的机会，夹在柴捆中带进去。李德武告诉盟员：一个值班的新兵炊事员，看到柴里的传单和信后与别人议论开了。有一个新兵对李德武说：他以前从老兵那里曾听说新四军里有日本人，自己还不相信，对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生活等等，感到不可思议；读了他们的传单，才知道日本人建立的反战同盟正在开展工作。

支部把搜集到的这类动态，通过开研究会加以研究整理，编写成更有力量的反战宣传资料。这种研究会同时又是一次现实、生

动、有效的学习会。支部全体成员很感兴趣，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1942年7月15日，在新四军第三师（苏北军区）成立了反战同盟苏北支部。支部长古贺初美，盟员有香河正男、田畑作造、堀本龙藏、坂桥、古桥、竹田、村田等。

不久，香河正男、田畑作造等返回苏中军区。

到1943年，支部成员有古贺、堀本、坂桥、竹田、松田谦次、坂本节未等。

1944年，古贺调华中地方协议会长期学习，苏北支部新增成员吉春、清水两人。

1945年苏北支部又增加青柳、森垣等人。古贺回到支部工作。

苏北支部做了大量对敌军的工作。他们编印、散发宣传品，去前线喊话，涂写反战标语，做日军俘虏的教育转化工作等。

他们印发了不少反战诗歌，如：

冰冷的夜晚，
倒霉的战争。
回去吧！
别打仗了，
回到妻子儿女身边！

喧闹的城镇，
宁静的村庄。
回去吧！
别打仗了，
亲人在翘首等待！

他们的辛勤工作有了成效。涟水城的敌人据点里一名日军士兵拾到一张支部印发的，便于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用的通行证，

不小心被伍长发现。士兵非常害怕，伍长却指指头，示意他快把通行证藏到帽子里去。士兵迷惑不解。伍长立即取下自己的帽子给士兵看，原来伍长帽子里就藏着一张同样的通行证。

新四军攻打大兴镇，最后剩下6名日军士兵。他们本想顽抗，但想到盟员们常宣传的新四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就一起放下了武器。

盟员们主动努力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人手少，但1942年开的荒地却占三师政治部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产量，占政治部的四分之一以上。他们的生产成绩经常在政治部的生产快报上“坐飞机”，得到表扬。

他们还在1942年夏季，和在三师活动的朝鲜友人王信虎、李成镐、金锡润等，一起讨论、修改朝鲜同志起草的《朝鲜青年联合会苏北分会的纲领和计划》，并列席了这个分会的成立大会，发表演说，表示：中日朝三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打败日本的侵略战争！

盟员们还经常参加苏北人民的各项重大活动。1942年7月，古贺、田畑参加了盐阜区各界在直属区召开的纪念抗战爆发五周年大会。1942年秋，堀本参加了盐阜区青救总会成立大会，等等。古贺初美还当选为盐阜区参议会的参议员。

第九章

日本工农学校的初期工作

第一节 日本工农学校的成立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需要，为了培养战后日本工作干部，由林哲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在延安设立一所特殊的学校。在研究时提出了几个校名，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这所学校决定取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日本工农学校设在哪里呢？正好当时有个为东北地区培训干部的学校，地方大，空闲着，可以利用。但有人反对，认为它在延安的中心，靠近宝塔山（原名嘉岭山）的山顶，山顶上有个古老的唐朝时建造的九层宝塔；山下两旁依傍着延河水，风景优美，是延安名胜古迹所在处，又是日本轰炸机袭击的目标，不适于作教育俘虏的学校等等。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学校设在这里。

学校的校长是林哲（但当时对外讲，校长是王学文。学员们也认为他是校长）。副校长是赵安博。赵安博 1915 年生，年轻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先在八路军 359 旅政治部任敌工科长。1940 年 11 月，调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副校长。他具体负责学校的各项

工作。他文化水平很高，工作能力很强，善于做教育工作，日语说得很流利，和日本人一样。他工作极端认真，从不草率地处理事情。他对学校每一个学员、职工，都十分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使人感到亲切，得到温暖。1943年4月，调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我国东北解放区担任中共齐齐哈尔六区区委书记、市委部长，东北人民政府日侨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对日本的民间外交工作，曾任廖承志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现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虽年近八十，还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努力工作中。

教员是由王稼祥再三考虑后定下来的，由林哲、王学文、李初梨、赵安博、何思敬、江右书等人担任。何、江两人也都曾留学日本。何思敬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江右书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何、江两位革命前辈已经逝世。

1940年夏天，从前线各地又陆续送来了5名俘虏。10月，晋西北送来6名。这些俘虏，经过前线部队的初步教育和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有了觉悟。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全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着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我们。当时，不仅肉体上痛苦，精神上也极其苦闷。

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120师的一位战士。他不顾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

不久，120师师部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

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城东 15 公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里的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特别是有位住院的柳岸同志，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很客气，给我介绍八路军内的生活；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不管有什么事，请告诉他，他会尽可能去办的。我没有仔细考虑就说：“我想要些手纸。”第二天，他就给买来了。

有次，我睡了，觉得有人给我掖被子，睁开眼，看见柳岸正在深情地看着我。原来，他即将出院，得知我动了手术，特意来看望我，还带来了苹果、梨等。他这样关怀我，使不会讲中国话的我，只能由衷地说：“谢谢！谢谢！”

在和平医院，我认识了另一位八路军同志，渐渐地我成了他的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位八路军的旅长，就惶恐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不一样。”病愈后，我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去了。^①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

学校的教学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在这一阶段，要了解学员是否有入学要求，是否具备了入学条件。审查通过后先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 10 个月的本科生教育。

最初，入学学员的审查工作，学校委托森健负责。他第一次

^① 《反战士兵的故事》第 47—48 页。新日本出版社 1963 年 9 月初版。

审查时，初审了三个入学对象。第一个是原在日军中搞情报工作的。他到村里刺探情报时被抓住。森健和他谈了较长时间，最后，他说他不想入学。第二个是位农民出身的士兵，请他写履历，他不写。他说他只能讲，不能写。经过盘问，才知道他上小学时就中途退学。他不能读、写，但希望学习，恳求作为学员入学。经过研究，把他作为候补生登了入学簿。第三个人条件合格，本人也请求入学。

学员通过入学资格审查后，还须填写入校志愿书：“我进此日本工农学校，自当努力学习学校所教授之学科，并服从本校所规定之校规及纪律，若有违犯，愿受校规的处罚。”

1940年10月，开始上课时，有学员11名^①。其中包括主动要求参加学习的森健、高山进等人。

1941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有14名日本同志到达延安，使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增到25名。这25名学员中，有一人是受我军俘虏政策的影响，自动投诚的；有二人是不堪忍受日本军官的暴行，逃出来时偶尔被八路军俘虏的；其余22人都是作战时被俘的，其中大部分人是百团大战中过来的。

根据办学目的，学校制定了校训，共10个字，这就是：“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②。

学校开始上课前后，中日两国有关的同志林哲、王学文、李初梨等商量，报经八路军总政治部同意，制定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规。校规规定了学校的宗旨，领导机构，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等等，共有九条：

第一条：本校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① 赵安博：《蜕变》，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2日第2版。

② 《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1版。

第二条：本校目的主要是对日本士兵施行政治教育。

第三条：本校学习科目如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中国语、时事问题，以及其他的必要科目。

第四条：本校的学习时间为一年。

第五条：到本校学习者，要经学员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推荐，填写入学志愿书，才能入学。关于学生守则，另定。

第六条：本校隶属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任命五名理事，组成理事会。理事会是有关本校重大工作的最后决定者。

第七条：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命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校务主任。校长统辖校务，副校长协助校长，和代理校长负责校务。

第八条：理事会得任命学员审查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必需的委员会，并决定这些委员会的任务和组成人员。

第九条：学员享受学习上的必要便利，享受生活上的保障。学员要严格遵守本校校规。若违反校规，要受到直至开除出校的处罚。学员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应从事一定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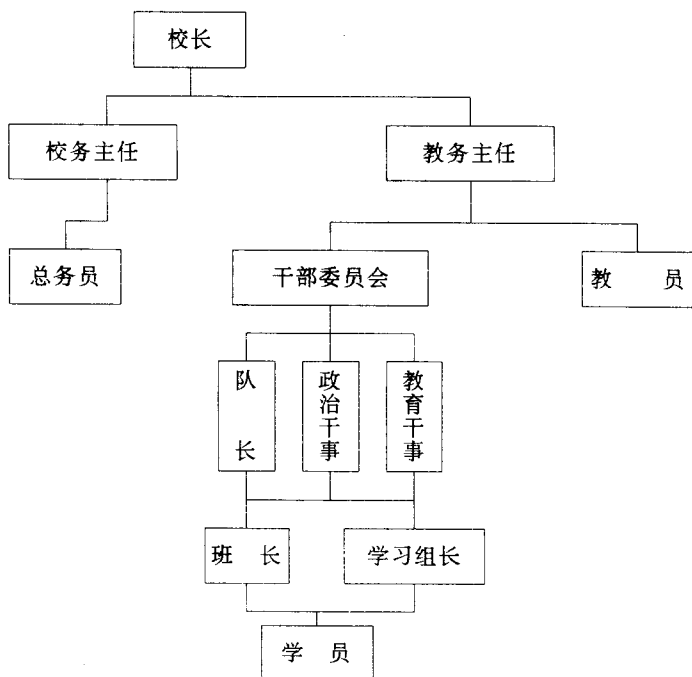
学员得组织学员会。学员会自己讨论、议定有关改善学习、纪律、保健、娱乐、生产以及其他的事项，就上述方面向本校领导提出建议^①

以后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个校规是正确的，必要的，对办好日本工农学校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于1940年10月。创办初期，组织机构比较简单，教学活动和行政工作分别在教务和校务处的领导下进行。

^① 《抗战兵士的故事》第343页。

日本工农学校前期的组织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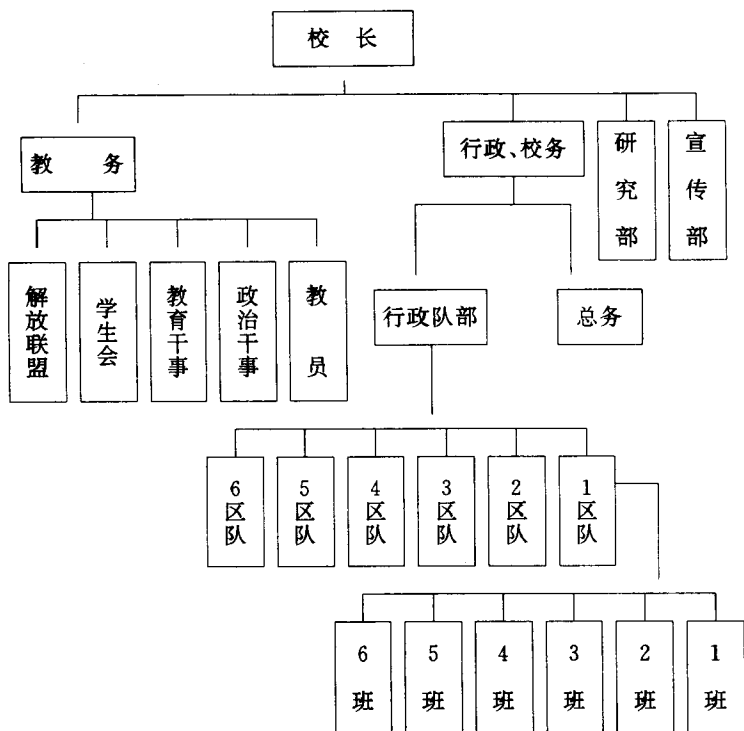


随着学员的不断增多，教学的不断深入，学校的组织机构也不断地调整、充实、完善。后来又增设了研究部、宣传部，与教务处、校务处一起担任学校的全盘工作。

为了加强对学员的组织领导，还将学员分编为区队，在区队下又分编为班。学员一般以班为单位进行教学活动。下面是学校后期的组织系列表（见 171 页）：

1940 年 10 月某一天的早晨，林哲吃过早饭走出窑洞，下了坡，跨上专门拨给他的大马，快步奔向宝塔山。没用多长时间就到宝塔山山腰，接着跨进学校大门。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学校。

这天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开始正式上课的日子，林哲作为这个学校不公开的、内定的校长，来视察学校、看望学员了。



他站在大门口，看着靠近山顶处的一片窑洞。这是学员们的宿舍、食堂和教室等。他在战后回忆当时情况时，写道：“最大的窑洞是教室。墙上涂着白粉，还明亮。成行排列着十排狭窄的课桌和长凳。坐着 11 名学员。等着我来的学员们，怀着好奇心想：来动员开学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进入教室时，他们以复杂的表情迎接了我。他们还保留着俘虏意识，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有的抱着偏见、憎恨，为他们的将来而忐忑不安。我向他们作了学习动员演讲。在我开始讲话不久，他们的表情逐渐明朗起来。他们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专心一意地听着，像怕漏听一个字似的。从此，开始了困难的改造工作，即把过去的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

革命家的工作。”^①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开始工作。首先学校给学员生活、行动（包括外出）各方面的充分自由，在校内，让学员进行自治，衣食住方面，给予尽可能的优待。这样做，首先消除了学员的俘虏意识，使他们确信八路军的诚意，习惯于有规律的学校生活。在学习方面，用日本话讲授各门课，用启发的方法引导学员得出正确的看法和结论。

1940年11月，赵安博受命担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他到校不久就和秘书、管理员等工作人员一起，进一步建设学校。他们在窑洞前面的平坡上，用土坯砌起一栋平房，作为教室，这比原来的教室宽大多了。^②

1941年5月15日下午6点，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典礼会场的墙上贴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巨幅标语，主席台的后墙两侧，挂着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盟旗和日本工农学校校旗。

毛泽东亲自为典礼大会题了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朱德题词：“我们是国际主义者，赞成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消灭当前的帝国主义大战，建立真正的、友好的和平的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参加典礼的人很多，约有2000人。除学校学员、工作人员，还有延安各学校、团体、机关的代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等出席了典礼。

^① 《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编）》第243、244页，新日本出版社1967年8月初版。

^② 1993年5月12日下午、13日上午，作者两次登宝塔山，到日本工农学校旧址参观、采访。这些窑洞、平房均还在，都有农民居住着。当地人称之为“日本屋”。操场、大门等所在的地方都建了新的窑洞或平房。

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傅钟致词，他热烈祝贺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

接着，朱德在一片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健步登上主席台讲话。他说：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一件大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是，这种状态，不久的将来必将随着中日两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结束。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衣带水的兄弟邻邦，是两个伟大的民族，子子孙孙应该永远友好下去……

朱德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在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冯文彬在讲话中，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并预祝日本工农学校能迅速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起来，以团结教育更多的日本士兵，特别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日本青年士兵，做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代表接着讲话。他指出：全体反战同盟盟员，要始终站在反战同盟的光荣战斗岗位上，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早日来到，与中国人民、八路军并肩携手，誓与日本法西斯战斗到底。希望日本工农学校越办越好，成为吸引前线日本士兵走向革命道路的核心。今后，应当更努力地号召更多的日本士兵前来学习。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界人士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使学员们激动万分，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在长时间的热烈而有节奏的掌声中，全体学员列队登台，集体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首长和延安各界代表鞠躬，表示感谢，并且庄严宣誓：

亲爱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将士们：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对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表示衷心感谢，并在此庄严宣誓：八路军不仅不杀我们，并且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八路军不把我们当作敌兵加以侮辱，给以完全的自由和平等，尽可能好的物质待遇。把我们作为朋友、兄弟、同志、同胞，使我们开始知道了国际主义精神。我们从心里感谢八路军指战员。

八路军使我们跳出罪恶的深渊，认识了战争的本质。我们深深感谢八路军。

八路军为我们办了学校，改造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觉悟了，并树立了正确的信念，谢谢八路军！

在这里，我们保证，我们一定严守校规，掌握革命理论，为将来建设新日本而努力学习。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这是八路军对我们的深情厚意，也是我们在校学习的主要任务。

通过学习，觉悟了的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汗水和热血和八路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直到胜利。

八路军指战员同志！今天，在开学典礼上，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的教导，对各个学校、团体代表鼓励的祝贺辞，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一定不辜负先辈同志的殷切希望。

我们对领导八路军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表示满腔敬意。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工农学校的慈母般的关怀、严师般的教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

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

1941年5月15日^①

学员们宣誓后，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全场2000多人振臂高呼：

“欢迎日本同志与我们并肩战斗！”

“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万岁！”

^① 延安革命纪念馆藏：《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誓词》。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学员们也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八路军万岁！”

当学员们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时，不少人拥到他们面前，与他们紧紧地握手、拥抱，阶级的情谊，同志的温暖涌进了他们的心中。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激动使不少学员又一次流下了热泪。

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文娱晚会。由中日两国同志演出了丰富多采的文艺节目。青干少年团演出了非常精彩的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等。特别是中日两国学员用日语联合演出的带有浓厚反战气氛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创作的话剧《前哨》，得到观众多次雷鸣般的掌声。

直到半夜 12 点左右，晚会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5 月 16 日凌晨一点多钟，学员窑洞里的油灯还亮着。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来回走动，有的低头沉思，有的在热烈地讨论。他们上床后，还久久不能入睡，翻来覆去，不由自主地认真回想起自己到中国后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

开学典礼前，学校收到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很多封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贺电和祝词。5 月 11 日，杉本一夫、坂田太郎、高木敏雄、松井英男，代表日本觉醒联盟从太行山拍来电报致以祝贺，认为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建“是从未有过的创举，是东方人民解放史上崭新的一页，是中日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携手并进的旗帜。”^①

第二天上午，学员们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从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

^① 《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16 日。

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后，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时，往往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相威胁，并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现在连酒井也终于觉悟，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了。这以后，他经常主动向教员和别的学员借一些书认真阅读。他僵硬的脑瓜开始开窍了。酒井的变化，在学员中引起了很大反响。1941年10月26日，他和别的学员一起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宣誓参加了八路军。

学员佐藤过去深受日本军部宣传的毒害，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后，还经常穿那身日本黄呢军服，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是“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认为做了八路军的俘虏是“最大的耻辱”。在讨论会上，他说：“过去我诬蔑八路军是非常荒唐的，八路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要认真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以后，他穿上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八路军军装，并十分认真地读书，联系自己的思想。后来，他被选为学校的文娱干事，经常指挥学员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等抗日战斗歌曲。

泷泽三郎深情地说：“我经常听到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昨晚，我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听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掌声时，我的呼吸急促，眼眶发热，几乎流出泪来，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可是‘俘虏’这个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它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在这一天夜晚，他在

校部的窑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着勇气进去了，把一张纸条递给学校的负责同志。纸条上写着：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填表时没有写；他本来住在神户××区的第三町目（即胡同，巷），在表上写了第四町目；他本来在大学只念了一年，却写已经大学毕业了。

学员小林清接着发言。他说：“‘俘虏’这个曾使我几乎毁灭的词，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下已从我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现在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

学员五味三郎在当时的墙报稿上写道：“我们不论何时何地决不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生活，好似充满黑暗、痛苦的深渊。用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的的生活进行对比，使我们更加感到过去生活的黑暗。”不久，他就向学校声明：过去由于受错误思想的支配，自己在履历表上有意写了许多谎言，请求改正。

.....

庆祝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规模庄严盛大，讲话扣人心弦，欢呼声震耳欲聋，演出的节目精彩，掌声阵阵如雷，再加上上述生动感人的座谈会，使到会的67名学员前进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

第二节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

开始正式上课时，几名学员编在一个班里，课程安排大致是这样的：

1. 时事与日本问题。主要内容有（1）明治维新；（2）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3）国际形势等。主讲人：林哲。

2. 问题讨论（由学员自己组织实施）。主要内容有：（1）日本所说的“非常时期”是什么意思？（2）自由与放纵区别何在？（3）我们看到的中国人；（4）何谓“东亚新秩序”等。

3. 中国话。主讲人：赵安博、杨同志。

4. 社会发展史。主讲人：王学文。

5. 政治经济学。主讲人：何思敬。

6. 中国问题讲座。主要内容有：（1）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革命；（3）中法战争。主讲人：廖体仁、罗明达。

7. 自然科学。内容有：（1）日蚀；（2）视觉与听觉等。主讲人：李初梨。

8. 时事报告。内容有：（1）中国共产党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宣言和八项纲领；（2）中日战争的简要战况等。主讲人：赵安博。

9. 特别问题恳谈会。主持人：林哲。

10. 听写及练习新文字（文化课）。由学习委员会领导实施。随着学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学内容也逐步由浅到深。1942年学校的课程大致如下：

1. 日本国内问题及时事。主讲人：林哲。

2. 联共（布）党史。主讲人：林哲；辅导员：梅田

3. 政治经济学。主讲人：王学文、李初梨。

4. 政治常识。主讲人：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

5. 中文课。主讲人：赵安博、王学文、江右书。

6. 文化课。主讲人：赵安博。

7. 党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开设）。主讲人：李初梨。

8. 时事报告。主讲人：李初梨。

9. 其他活动。

在政治理论教学中，学校特别注重学员对理论的系统、深入

的掌握，了解其规律，从而使学员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准迅速提高。为此，1942年的时事及日本问题课程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

1. 日本资产阶级势力的抬头；
2. 日本的工业化，向亚洲国家渗透；
3. 工人阶级的非人劳动、罢工受到镇压；反对战争的活动；社会主义运动及对它的空前大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即将爆发；
4. 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发展；
5. 经济恐慌及克服对策；
6. 裁减职工及经济危机；
7. 农业生产衰落及农村危机；
8. 资产阶级的壮大和阶级斗争的激化；
9. 工人的情况；
10. 《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11. 工人为什么要组织工会？劳资纠纷与抗议的原因；
12. 时事分析；
13. 日本的现状；
14. 国家机构；
15. 枢密院、天皇、重臣、元老、军部；
16. 军部的特权、军部特权的来源，军部与财阀，军部内的派系；
17. 内阁、警察、监狱与法院；
18. 时事问题：苏德战争、太平洋战况、国内问题、印度问题；
19. 财阀与政党（着重政党的历史）；
20. 什么是政党？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特征，政党的兴衰；
21. 什么是法西斯？
22. 日本法西斯发展的历程；

23. 大政翼赞会、联保组织、日本人民的生活；

24. 日本法西斯对日本及亚洲的人民干了些什么？法西斯给日本军部及大财阀带来什么？什么是法西斯军部？

25. 日本法西斯的弱点是什么？怎么打倒法西斯？

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因为任教的中国同志都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

由于是用日语讲课，有的学员作了详细的笔记，后来，这些笔记成了日本工农学校各分校的讲课稿。当时的学员香川孝志曾在1980年5月28日写信给王学文表示感谢，并寄回了当年听课的记录。这本记录稿已由何思敬的亲属王艾英、何理文译成中文，改名《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于1983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这个记录原稿约20万字，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他在信中写道：“这个名叫《政治常识》的记录稿，是我为了把先生教给我的知识再教给新到八路军中的学生而加以誊清的。当时用的是延安生产的纸和毛笔誊写的，现在还看得很清楚，真是幸运……”

这个记录稿的第一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已故的何思敬教师讲授的；先生讲第二篇，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讲的，先生把那么难懂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初步理论，讲得那样通俗易懂，使我除了说伟大之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这个讲稿至今仍作为日本人民中有觉悟的青年们的学习材料在有效地运用着，这就是先生的学生、后辈连续不断产生的道理。”

这封信表达了香川孝志的感情，也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日本工农学校教授知识的一个方面。

学校规定，学员讨论时必须讲中国话。即使讲得结结巴巴，也必须坚持讲。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就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较快地提

高每位学员的汉语水平。

1942年下半年，有的学员还学习了陈云的《怎样做共产党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

关于学员们的生活情况，中小路静夫回国后回忆道：“我们在延安时，居住的地方很有意思。这里的人，由于土质、气候等关系，都住窑洞。不仅本地居民，军队、机关、学校的人员，也几乎都住在窑洞里。我们工农学校的窑洞，是在宝塔山的山顶下一个绝壁的侧面。往山里挖进宽2.5米，深4.5米左右的洞。五六个学员在这里生活。我们的住处是一般的窑洞。6个一排，面向北面的旧市区。最大的窑洞是教室、图书馆。窑洞的入口，是像日本帐子似的白纸门。至于安全问题，在解放区是不用担心的。

“窑洞冬暖夏凉。冬天，在陶盆中烧木炭取暖。也不怎么怕日机轰炸。我记得这样一件事：1943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吃完早饭后，就听到警报声。接着，我们透过窑洞的窗子，看到天空有日军9个飞行分队，27架轰炸机。飞机在高空往没有居民的延安城内丢炸弹。这天晚上，我们听日本广播电台广播说什么‘皇军’空军在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把延安的军事设施炸得全成了废墟。实际上，只炸死了一头毛驴。军民搜集起炸弹碎片，用来锻打生产工具，或把炸弹碎片送到延安北面约四五十公里的安塞兵工厂，加工成武器。《解放日报》社还巧妙地把一个没有爆炸的炸弹，改造成印刷用的滚子。

“窑洞里没有电灯；我们在器皿里放入灯油，拿细棉线捻成灯心，用这灯心点火，一到晚上，五六个学员围着这小小的灯火，辛勤地学习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没有油了，就在黑暗中讨论。”

当时，他们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

早6点：起床。

8点：早饭。

9—12点：学习。

12点：午饭。

下午1—4点：学习。

4点：晚饭。

7—9点：讨论。

冬、夏的作息时间表有半个钟点的时差。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这就是在最低限度的衣、食、住外，发一些香烟、肥皂、毛巾、牙刷，再发一点津贴费。八路军给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以尽可能的优待。

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一）第一月发给津贴费5元。（二）被毡按实际情况补充之。（三）鞋袜各一双。（四）毛巾及肥皂各1条。（五）牙刷1把。（六）牙粉及烟各1包。（七）旱烟袋1根。（八）碗、筷一份。（九）单衣单裤各一件。（十）衬衣衬裤各一件。以后，每隔4个月每人补充：（一）鞋袜各1双。（二）牙刷1把。（三）手巾1条。（四）肥皂两块。（五）草烟2斤。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一）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二）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拾斤（不扣米）。（三）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1940、1941年，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军相呼应，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实施进攻，在经济上加强封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战士没有鞋袜穿，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衣。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原来1角钱1包的香烟，涨价到1百元、3百元。学员的津贴费，原来是3元钱可以买30包抗日根据地生产的香烟，后来，津贴费每月增加到3百元、5百元，却只能买到2、3包香烟了。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八路军仍然给他们以特

殊的照顾。1941年新春来临时，买不到肉，八路军管理局杀了一头牛，把全部牛肉送到了学校。学校做了日本风味的菜肴。五六十名学员的新年生活，就过得心满意足了。

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延安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每人每月也只供应小米1斗（合30斤），麦子2升，油15两，肉2斤。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却以白面、大米为主，每人每月供应小麦2斗，优待面粉10斤，小米1斤，肉6斤1两，油15两；节假日有会餐补助；有时还供应大米。

在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影响下，学员们开始搞生产，生产成果完全归学员所有。这样，学员的饮食有了显著改善。由学员组成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指导炊事员做日本饭菜。学员有自己特殊的厨房和食堂。1944年，学员们在4月21日就吃上了学校自产的冬菠菜，接着，就是大量的春菠菜、春白菜、水萝卜。6月25日，就有自产的大量西葫芦、黄瓜送进厨房。自产的鲜嫩蔬菜吃不完。

当时，学校的生活委员每星期制订一张新菜单，下面是1944年12月11日到17日的食谱：

- 12月11日 早餐：油炒萝卜、牛肉（18斤）、粉条、豆腐烩白菜、馒头
中餐：面条。
晚餐：油炸洋芋丝丸子、炖白菜、洋芋汤、馒头。
- 12月12日 早餐：羊肉（10斤）、炒洋芋、包心菜汤、馒头。
中餐：疙瘩汤。
晚餐：牛肉（12斤）炒白菜大葱、炖洋芋、白菜汤、馒头。
- 12月13日 早餐：牛肉（10斤）炒白菜、洋芋汤、馒头。
中餐：面条。
晚餐：炖羊肉（15斤）、豆腐、咸菜、萝卜汤、馒头。
- 12月14日 早餐：羊肉（12斤）炒白菜、洋芋汤、馒头。
中餐：疙瘩汤。
晚餐：炖牛肉（15斤）、萝卜、白菜汤、炒包心菜、馒头。

- 12月15日 早餐：羊肉（12斤）炒萝卜、豆腐白菜汤、馒头。
中餐：面条。
晚餐：油炒洋芋丝丸子、咸菜、猪肉（8斤）、白菜汤、馒头。
- 12月16日 早餐：羊肉（10斤）、炒白菜、洋芋汤、馒头。
中餐：疙瘩汤。
晚餐：猪肉（15斤）炒白菜、咸菜、白菜汤、馒头。
- 12月17日 早餐：猪肉（8斤）炒洋芋、菠菜豆腐汤、馒头。
中餐：面条。
晚餐：羊肉（12斤）丸子、咸菜、白菜汤、馒头。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现在改为白面。每星期有时还有一次米饭。一天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两三个菜。后来，有的学员请求：“早晨不吃肉吧！”也有人提出：“晚餐肉可以减少些。”每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并且有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的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抢着干起来，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而包不起来，即使包好了，放到锅里一煮也全破了，有的连馅都出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国同志的耐心帮助、指导下，学员们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有位叫谷川的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①，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曾特意去视察了日本工农学校。他仔细地察看了校内的各个地方，详细地看了学生编写的墙报，对该

^① 鸡素烧，是用油、葱爆鸡、牛肉片，这是日本人非常爱吃的菜。

校的成绩称赞不已。当他看到墙报上学生谈到在延安生活幸福并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似地对在旁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了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您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那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不少学生回国后还经常提起聂荣臻对他们的关怀和鼓励。

由于大生产运动使延安军民都尝到了甜头。街上饭店里，也以米饭、馄饨、馒头为主食了。有各种各样的肉菜。连当时驻延安的美军人员有吉·幸治也说：“拿延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西安相比较，重庆、西安有不少游玩场所，但食品很差，吃肉不多；延安没有什么游玩场所，但食品丰富，肉多。”

学员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是和当时在校做总务工作的中国同志刘兴渭的努力分不开的。

假使学员病了，那末在医院里会得到比中国人更好的治疗条件。他们是外国友人，医护、治疗、饮食、衣服，都得到优先保证。《新中华报》曾经报道：学员到医院后“衣服脏了，破了，女同志们给他们缝洗，像慈母对久病的儿子，学员们深深享受到了中日深挚的革命友谊。”曾有一名叫兴津君的年轻日本士兵，在池上部队负伤被俘后，被送来延安的白求恩医院。医务人员尽最大的努力进行诊治，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八路军总政治部为这个年轻士兵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参加，李初梨代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读了致兴津君家属的慰问信。有的学员边听边被感动得轻轻哭泣起来。

学员的津贴费，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学校成立初期，每人每月发3元钱。当时，八路军的津贴费，分成5个等级：

士兵：1元；

排长：2元；
连长：3元；
营团长：4元；
师长：5元。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津贴费也是5元。

学员的津贴费3元钱，在当时的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有余。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衣无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款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了学员们。这反映出他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也证明了他们生活水平的改善。

1943年，他们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1944年，平均每个学员向合作社投资3000元（这里含有当时物资紧张、物品涨价、货币贬值的因素）。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欠了很多债；到延安，倒变成有钱人了。”

学生的行动是自由的。比如，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出校门随意散步。不少人喜欢到商店街去。当时，延安还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七八所培训干部的学校。所以，到傍晚，商店街就成了学生的海洋。有的学员把商店街称学生街。

学校很重视学员的娱乐。娱乐项目有体育、围棋、扑克、日本将棋、游艺、旅行参观等等。

体育方面，每天清早，学员们到学校操场上做健身体操，他们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锻炼身体。每周搞一次运动会，全体学员参加棒球、排球和其他项目的比赛。学校规定篮球、排球是学员的正式课程。学员的棒球队在延安是唯一的一个。他们在延河主流的河滩上修建了一个相当大的棒球场。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知道此事后，把她们唯一的一副棒球送给了他们。

每逢他们打棒球，总有不少八路军指战员和老乡围上来观看。有时，中共中央的首长们出来散步，碰上他们打棒球时，也都十分感兴趣地驻足观看。这时，学员们就打得更起劲了。敌工部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有些同志，受学员们的影响也拿起球棒，学着打棒球。

1942年1月初，学员们在延安公共体育场进行了精采的棒球表演。

1941年国际青年节期间，延安各界青年在体育场展开各项比赛。观众特别拥挤的是垒球比赛场。延安各界青年组成的联合队和日本工农学校校队的垒球赛十分精彩。联合队勇猛顽强，日工校队机智娴熟。结果，以联合队负6分告终。不少观众称赞日工校队的技艺高超。

学员们喜欢在晚饭后、节假日打麻将牌、纸牌、扑克，下围棋、日本将棋，学校每月举行一次比赛，并给优胜者发奖品。

唱歌方面，一是从中国学员那里学习中国流行的歌曲；一是唱日本原来的歌曲，如日本著名诗人石川啄木写的歌词：“整天劳动，劳动，终是吃不饱饭。凝视着两只手！”教员江右书曾教学员唱北原白秋的《枸桔花》歌：

“枸桔花儿开哟，
白白的花儿开。
枸桔刺扎人哟，
绿绿的刺如针！”

再就是唱学员们自己创作的反战歌曲。

中国内地的各种剧团到延安，都要到日本工农学校演出。1942年，战斗剧团赴延安演出，就住在日本工农学校。演员和学员在一起聚餐、爬山、演剧，他们交朋友，携手高唱：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重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宏亮的歌声，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感情的交融。

每逢纪念日举行游艺会。学员们演出独幕剧、对口相声、魔术、唱歌、吹口琴、笛子等等。1943年中秋节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艺活动。学员们自编自演了《弥次多喜旅行记》、《希特勒的威风》、《某中队长》等非常精采、有意义的节目。

第三节 学员的工作和活动

大部分学员在日本军队里受了法西斯主义的训练，思想上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烙印。为了克服这种影响，学校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克服办法，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学员自觉地批评不良倾向。每月举行一次批评会，由学员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各班定期举行生活检讨会。学校大张旗鼓地鼓励先进，表扬有进步的学员，奖励品行特别优良的学员。这样，学员一般在入学几个月后就开始逐步好转了。

先进的学员，一面学习，一面做实际工作，以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他们写作宣传品，编报纸，演出朗读剧，演讲，担任教师，报告时事新闻，组织各种团体活动，负责学校管理工作，等等。

1941年末，森健、杉本、梅田、高山等已担任授课任务。1942年秋，部分学员直接参加管理工作，如森健担任政治干事，茂田

江纯、梅田照文担任正副教育干事，中小路静夫、大山光美担任正副队长。

在校方的领导下，主要由学员会来组织学员的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等。学员会是学校的重要组织部门。学员会初成立时，设正副委员长（委员长森健，副委员长小林），学习委员（正委员大山，副委员茂田），文化委员（正委员梅田，副委员松本），图书委员（正委员山田，副委员役藤），经济委员（正委员中小路，副委员富田），编辑委员（正委员泷泽，副委员浅井）。

学员会的组织及人员也不断调整变化，1944年学员会就改选了三次：

第一期（1944年1月到2月15日）：学员会主席：重田；编辑委员：白鸟；文化委员：东；图书委员：冈部、后藤；经济委员：高木。

第二期（1944年2月20日—7月10日）：学员会主席：白鸟；编辑委员：上野；文化委员：谷川；图书委员：西村、夏川；经济委员：北村、田代。

第三期（1944年7月15日—12月）：特增设副文化委员1人，卫生委员3人，以加强文化及卫生工作。其分工如下：主席：水野；编辑委员：西村；文化委员：夏川、三木；图书委员：田代、松山；经济委员：石冢、山川；卫生委员：公文、相田、中村。

绝大部分学员参加了反战同盟。

学员们最努力的活动是宣传工作。由学员主持，编辑、出版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机关报——日文月刊《士兵之友》。另外，到1943年为止，延安的新华社无线电广播局用日语向日本士兵、侨民进行广播。稿件是学员写的，广播员也是学员。

整个广播工作和出版《士兵之友》工作，由森健和原清志负责指导。这两项工作对动摇日军士兵的战斗意志，削弱日军的战

斗能力，以及教育八路军内的日本士兵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反对日军侵华，要求早日停止这场战争的各种形式的传单、宣传小册子以至教科书等的起草、编辑、出版工作，也都是学员做的。他们曾出版了《中国事变与日本国民生活》、《怎样挽救我们人民的破产》、《我国勤劳大众当前的使命》、《苏联与日本》等日文小丛书以及一本《片山潜小传》。这些书籍在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作用。

如《解放日报》1942年8月29日第4版发表了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泆井生写的《一个日本俘虏的故事》。这是一篇据实写作的、较好的反战宣传作品。这篇文章的全文是这样的：

一个日本俘虏的故事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泆井生

“你明明知道你是一个日本军人，为什么舍不得死？俘虏还不如自杀？真混蛋！”威风凛凛地在审问着的宪兵班长，忽然站了起来，对准他的腮颊给了一个有力的耳光。被打者立刻从眼里冒出一阵火花，刹那间，眼前变成漆黑一团，接着恍恍惚惚地倒在地板上。

宪兵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拉了起来，又继续给他两、三个耳光。他用手掩盖着被打的腮颊，眼眶里充满了热泪。他用怨恨的眼睛看着那异常可恶的宪兵的脸。过了片刻，宪兵吐出了“滚回去”这样一句话。他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无力地走到室外。

他回到黑暗、肮脏的禁闭室，靠着墙角坐下。被打肿的腮颊红红地胀了起来，发着高热。两颊好像被刀刺似的一阵一阵地痛楚。黑暗的前途凄惨地充塞着他的头脑。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是不应该回来的……”八路军战士的亲切友情，又重现在他的眼前：“伤还痛不痛？”“烟够不够抽？”“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地告诉我们。”这些满含着爱抚的慰问，差不多天天可以从八路军那里听到。

但是他总是想很快回到日本军队去。亲友们的面貌，父母的慈颜每夜都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一天到晚要求回到日本军队去。“如果你回到日本军队里去，一定会被杀死的！”八路军所说的一些话，他不相信。他认为连互相厮杀的敌人都这样亲切，如回到自己的军队中，也一定会

受到欢迎，因为我并不是情愿当俘虏的。经过几次请求，终于得到允许，回到了日本军队。可是日本军队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当他刚回去就被押到宪兵队，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理他，安慰他。

今天的审问，他没有一点隐瞒，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可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所得到的结果。在所谓敌人——八路军那里并没有被当作俘虏看待。相反的，回到日本军队来，却反而当了囚犯。

我成了俘虏，的确是一个（自己军队的）俘虏了。爸爸、妈妈，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对于出征时抱着真诚的心来欢送我的亲友们，我有什么脸去见他们呢？自杀吧！除了自杀之外，再没有可走的路了。他这样想着，将禁闭室的上下左右，用眼角瞟了几下：被煤气熏黑了的天花板上，有几根与尘土接连的蜘蛛网垂了下来，潮湿的气味不断地刺激着他的鼻膜，在墙上挖有一个窟窿，那算是窗户。从这个窗户里透进来一线微弱的光。自杀的决心下定了，他渐渐地安定下来。

“谁把我弄到这般地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一定能很快乐地度过一生。可诅咒的战争啊！”“日本为什么要同对人那样亲切的八路军打仗呢？为什么把八路军叫做‘共匪’呢？日本国民被随便地拖进了战争的漩涡，说是为日本天皇去拼命、去流血，可是不幸当了俘虏的又回队了，为什么要叫他自杀？为什么要叫他‘俘虏’、‘罪人’呢？真是岂有此理！”他不禁沉浸在无边的深思里。几天后，在被送往军法处的路上他偷跑了，重新回到八路军温暖的怀抱里来了。

1943年这一年，他们就印发了传单32种，小册子以及教科书14种，总字数达52万。

学员们经常把学校以及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活动，写成新闻报道，在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据作者的不十分精确的统计，从1941年5月16日该报创刊，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这四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以日本工农学校为主要内容的文章共计76篇：其中的大部分是学员写的。

在纪念“九·一八”事变11周年时，1942年9月18日《解放日报》第4版上，发表了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梅田照文、茂田江纯两人献词的手书。梅田照文的献词是：“纪念九一八，反对侵华

战争！”茂田江纯的献词是：“中日青年团结万岁！”

全体学员参加了《希望墙报》，后改名《战斗墙报》的编写工作。到1944年，已出了66期。

学校的图书馆收集了日文书籍二百几十种，每天开放，供学员们阅读、使用。

日本工农学校还派了二名有较高文化的学员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日语训练班的教师。这两位学员对日语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为了使中国同志尽快地掌握日语，他们想方设法把课教好，还提出了“课余生活日语化”的建议，尽量多抽时间与中国同志生活在一起，辅导中国同志练习用日语交谈。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使原来没有任何日语基础的中国同志，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基本日语。这些中国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全部用准确的日语演出自己编排的话剧，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赞场。

1941年11月22日，日本工农学校邀请了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敌军工作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敌军工作干部学院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学校庆祝学员森健当选为边区参议员的大会。林哲、赵安博和全校教师、学员、职工出席了这个大会。

在这个大会前一天，即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与会的参议员193人，各界代表600多人。森健作为参议员，出席了大会，并应邀在开幕式上致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日本人森健是怎样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的呢？

1941年秋天，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决定根据“三三制”原则，重新选举参议员。为此，有

关各地、各单位展开了选举参议员^①的活动。

推选参议员候选人时，日本工农学校（选民约100人）和邻近的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选民约200人）联合开会。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没有提出候选人，两校共同推荐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为两校的候选人。9月25日《解放日报》就报道了“日本兄弟准备竞选参议员”。

这两个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选民约2000人）、鲁迅艺术学院（选民约2000人）以及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院等八个单位组成一个选举区，即延安东南区专门学校选举区，产生一名参议员。

10月初旬选举那天，日本工农学校全体人员列队去选举会场。他们队伍最前面是候选人，接着是乐队，学员和职工的队伍。学员们举着旗帜，旗上面写着候选人的竞选纲领。队伍一边庄严地行进，一边高呼口号：

“为抗日战争胜利而斗争！”

“加强抗日政府！”

队伍终于到达抗日军政大学前的延安机场。这里是八校选举参议员的会场，八校的队伍先后到达指定地点。

日本工农学校的选民在会场的一角，搞起竞选宣传。他们先跳起新奇动人的日本舞蹈，伴着优美悦耳的乐器声，把大批选民吸引过来，然后，就为候选人森健竞选参议员从各个角度加以宣传。

别的几个学校也展开了临选前群众性的竞选宣传。会场上十分热闹。选民们不断从这一宣传场地快步赶到另一宣传场地，以

^① 陕甘宁边区共进行了三次普选：第一次是1937年；第二次是1941年；第三次是1945年。每隔四年举行一次。

进一步了解各位候选人的情况。

10点钟，八校选举参议员大会开始。

首先，由各校推选的处理选举事务的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指导大会的进行。大会的进程：各候选人进行施政方针演说；各候选人推举一人，作推荐候选人的演说；选举分票、收票、唱票、监票、计票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当场计票，当场决定当选人。

候选人共八名，除了森健，还有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抗日军政大学的郭化若、黄志勇和别校的王凌波、饶正锡、刘向三等。候选人的演说时间规定不得超过20分钟；推荐人演说，规定不得超过10分钟。

先由抗日军政大学负责人郭化若的代表及其推荐人演说。听了他们的演说，选民们对郭化若十分钦佩。

接着，由森健演说。由于森健及其推荐人讲日本语，需要翻译，大会同意，他们的演说时间分别增加到40分钟和20分钟。由赵安博担任翻译。

森健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从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打倒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

森健的演说获得了选举人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由梅田照文作推荐森健的演说。他说：“我作为日本士兵，也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日本人民根本不想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坚决打倒发动这场战

争的日本军阀、财阀……假使我在日本军队里，听到反战的日本人当选为边区的参议员，那我就放下步枪，拒绝和八路军作战！”他的推荐演说，也受到选举人的热烈欢迎。

这时，日本工农学校的选民在下面不断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

“中日两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其他各位候选人及其推荐人演说后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得票最多的是郭化若，他得 606 票。郭化若当选为参议员。^①1941 年 10 月 10 日《解放日报》第 4 版以头条新闻报道了这件事。这条新闻的标题是：“抗大、鲁艺等八校竞选空前热烈，结果，郭化若当选为边区参议员。”

森健得票占第五位，说明其他学校有不少选举人投了他的票。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深情厚谊的有力证据。

选举大会后不久，边区有关领导机关根据“三三制”原则，根据广大选民的心愿作为特殊情况，给上述八校选区增加一位参议员名额，决定同意森健为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这是森健的光荣，日本工农学校的光荣，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表现和成就。

此后，延安市参议员改选时，日本工农学校的中小路静夫当选为该市的参议员。他在学校积极肯干，一天到晚为工作四处奔走，好像有股永远使不完的劲。1942 年，他担任日本工农学校的队长，显示了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对学校的创建，有不少贡献。

1941 年 10 月 26 日到 30 日，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

^① 有人说是周扬当选为参议员。作者在此是根据《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的有关报道写的。郭化若 606 票就当选，是因为有的选民没有去参加选举会和候选人较多，选票分散了。

西斯代表大会。

在此以前，9月30日的《解放日报》第3版，发表了《各民族代表发起、召集延安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宣言》。发起人有朱德、吴玉章、林伯渠、罗迈^①、贾拓夫等20多人。

开会前夕，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工农学校的代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谈话。他们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支部长大山光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宣传部长松本敏夫以及日本反战人士原清志（女）等6人。他们是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员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着华北地区的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几百名成员。

原清志用流利的中国话对记者说：“日本工农学校有两位学员，听说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异常兴奋，以至整夜没有睡着。学校有几位学员主动到几十里外的荒原去割草，以这个实际行动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后，在华北各地的日本人觉醒联盟总部和各支部，反战同盟华北总部和各地支部纷纷给大会发来了祝贺电报。

大会于26日下午1时，在中共中央大礼堂开幕。参加大会的有18个单位，130多位代表。其中有5位日本民族的代表，他们是森健、原清志、松本敏夫、大山光义等。

大会一开幕，首先进行有关的选举。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大会名誉主席和大会主席团。

由荷印^②代表阿里阿罕以英语致开幕词。

叶剑英接着讲话，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相信大会将对今后

① 罗迈，即李维汉。

② 即今印度尼西亚。

的反法西斯斗争，作出重大贡献。

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森健在会上作了感人肺腑的发言，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是不符合日本人民利益的。我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站在大和民族的立场上，对大和民族的直接敌人——日本军阀，要给以痛击，直到彻底打败他们。这就是日本人民的根本意志，也是日本人民正确的革命道路。我们全体反战同盟的同志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日本，热爱我们的大和民族，热爱我们的父老同胞，正是为了我们所爱的祖国和人民，我们不得不憎恨好战的日本法西斯军阀。我们要和东方各兄弟民族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蒂！”

大会主席宣布：在延安的日本兄弟要求参加八路军。这个消息使不少代表感到突然，但很快都以响亮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支持。

成队的日本兄弟和朱德总司令走上讲台。一位日本代表宣读了要求加入八路军的申请书：

我们是日本士兵，在过去，我们曾拿枪和中国兄弟打过仗。但是，正当我们快要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时，正义的、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八路军救了我们的生命。在八路军友爱地热心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一两年的过程中，使我们渐渐认识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20多年的被欺骗、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

我们抱着极大的喜悦和希望，参加八路军。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

日本工农学校学生 35 人

1941年10月26日^①

朱总司令满脸流露出喜悦，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热烈地欢迎亲爱的日本兄弟参加反法西斯的八路军。八路军始终为

^① 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上旬。

了人类自由、幸福、平等而战斗。八路军是人民的武装，也是为东亚各民族服务的一支军队。日本兄弟，劳苦群众，受着苦难、压迫已经很久了，因之，他们的要求和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共同消灭法西斯匪徒后，中日两国将会永久和平共居，共建人民的乐园，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亲密和友爱。”^①

朱总司令的讲话强烈地鼓舞了学员们。学员大山代表参加八路军的35名同志，激动地表示了态：

“我们是刚刚参加到八路军中来的革命战士。我们的大多数，过去都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八路军的日本士兵。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八路军不但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对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教育下，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知道了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要消灭这样的战争，为使日本、中国和东方各民族的劳苦大众从日本法西斯野蛮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为此，我们将努力奋斗到底，绝不能有愧于八路军战士的光荣称号。”

27日下午6点继续开会。宣读了各民族、各单位的贺电。朱德作了总报告。这个总报告全面地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特别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方面，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朱德这一关于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的总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28日，由日本、朝鲜、荷印代表作报告。首先由日本代表森

^① 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上旬。

健发言。他以平稳的语气详尽地说明日本国内不断恶化的形势和日益高涨的人民斗争，恳切地希望和东方各民族一起，团结奋斗，彻底打倒法西斯势力。

接着，日本女代表原清志用中国话谦虚地向大家说：“今天，日本妇女依然过着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被压迫、受奴役的生活，而且每况愈下了。在中日两国的四年战争里，她们，年幼的失掉了父亲和兄弟；年轻的失掉了丈夫和情人，甚至还有沦为娼妓的；年老的失掉了赡养自己的儿孙，受尽一切痛苦。但她们已经开始要反抗了。她们要和占十一万万人口半数的东方各民族的妇女结合在一起，成为摧毁法西斯的一支主流。”

吴玉章发表了即席讲话，他特别要求消除民族偏见，要促成和强化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最后，荷印代表毕通文以西班牙国际纵队队员的资格，祝贺大会的召开和成功！

29日会议上，有越南代表黄振光、蒙古族代表乌兰夫、荷印代表阿里阿罕先后讲了话。

30日会议上，在有关民族代表发言以后休息时，毛泽东冒着霏霏的细雨突然到来，使全场狂欢不已。他健步走到台前致词：

“我想大家的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结。在中国、在东亚，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弱点。

“现在中国就是因为是团结的，所以才能抗战，但是还团结得不够，因为有一部分人表面打日本，暗中破坏团结；另一种人一面抗战，一面摩擦。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前一种是汉奸，后一种人是不懂得大势。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能够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

“今后还有更大的仗要打，法西斯野心很大，力量还有，还要更疯狂地侵略；希特勒在英美苏的大团结中，到处乱打，……所以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这个会很有意义，莫斯科和远东都在开会。我们这个会也是为了克服困难。法西斯正利用这些困难。我的看法是，法西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日本正要向南北侵略，大体是要来的。

“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 ABCD 阵线；一条是英、美、苏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被打倒的，我们要了解情况，克服困难，不要害怕，要有信心。

“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的。”^①

毛泽东历时一刻钟的讲话，在全体与会者起立、欢呼声中结束。

上午 10 点钟开始，经过 4 小时紧张热烈的讨论后，19 个提案终于修改完毕，顺利通过。这些提案主要有：由代表大会产生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简称联盟，总部设在延安，在各地设立分盟；在华北建立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部队；建立东方民族学院；广泛宣传本大会的文件；通电各国，呼吁援助中国、苏联抗击法西斯日本、德国。

接着，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这个联盟的简章和有关决定、文件。

^① 见《解放日报》1941 年 11 月上旬。

大会最后选出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共 37 人，他们是朱德、林伯渠、罗迈、蔡畅、冯文彬、阿里阿罕、巴素华、原清志、森健、武兰夫^①、蔡前、武亭、桑柏格尔德、桑吉悦喜、默罕、萧三、李延禄、李初梨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工农学校收到了来自觉醒联盟总部和各个支部，反战同盟各支部等的日本同胞的贺电、贺信。他们都热烈祝贺大会胜利成功，祝贺 35 位学员加入八路军。

11 月 21 日，在重庆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负责人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也发来贺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转日本革命同志诸君：

欣悉同志 35 人参加八路军，敌忾同仇，俾法西斯授首，日本人民革命胜利，谨向诸君致无限热望。

鹿地亘、池田幸子 叩

1942 年 2 月 17 日，延安的留日同窗会，邀请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出席联欢会。

在中国，有不少留学日本的学生。有代表性的是周恩来、吴玉章、郭沫若、廖承志等。这是老一辈的留日学生。他们亲身在日本、在中国体验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贪婪和掠夺。他们站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列，一贯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流血流汗地战斗着。

延安的留日同窗会成立于 1941 年 9 月 1 日。开成立大会时，约有会员 80 位。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工农学校代表松本敏夫在会上表示祝贺，盼望与会各位先辈、同志多予指教、帮助。大会选出了理事，发表了宣言，决定努力征集日文书刊，成立日文图书馆等。

^① 即乌兰夫。

那天，当学员们来到联欢的地方——延安的军事俱乐部时，留日同窗会的吴玉章、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赵安博、江右书等人已经到会。他们对学员们表示热烈欢迎。

联欢会由吴玉章主持。他是四川人，当时已65岁。他在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遭侵华八国联军镇压等灾难深重的情况。为了救国救民，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5年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党内负责重要工作。在延安，他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被尊称为“革命五老”。他在会上作了深暖人心的讲话：

“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中国学生，经常频繁地接近日本人民，从他们那里得到真正的友谊和情爱，得到可靠的保护和援助。我们是在日本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从日本获得大量的书籍和珍贵的文献。这些事，是在座的诸位学员不知道的。这是中日两国革命史上值得夸耀的光荣。中日两国革命先辈进行的崇高革命事业将不断启发大家脚踏实地，自觉地走热爱日本民族、日本人民的道路。

中国人民和在座的这样多的先进的诸位兄弟握手，并肩反击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部、财阀，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值得大喜大庆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紧紧地握起手来，结成更亲密的战斗情谊。对于诸君的进步，我们将给予全力的配合和援助。让我们和诸位兄弟一起，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最后胜利和幸福奋斗不息！”^①

吴老讲话后，和与会的日本工农学校每个学员有力地握了手。吴老的讲话，使他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们把与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共同战斗的兄弟情谊，深深地铭刻在心里。他们又一次感受

^① 《反战兵士的故事》第123、124页。

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力量。他们从老一辈革命家的生涯中进一步体会到：必须打破一切阻碍，使各国——首先是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并肩携手，努力奋进！

1942年5月15日是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建校一周年纪念日。那天早饭后，全体学员和列队前来的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集合在学校操场上，联合举行纪念大会。

纪念会先由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讲话，他作了题为《一年来的日本工农学校》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年来学校的工作和学员们思想的进步情况。

接着，由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王学文讲话，他特别强调了日本学员一年来思想革命、政治进步的重大意义。

在王学文讲话时，朱德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满头大汗地赶到会场。坐了一会儿，就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走到讲桌边。朱德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日本军队在华北很怕两样东西：一是日本人反战同盟；二是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这两个团体。这从反面证明，这两个组织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也证明，中、日、朝三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坚持强化革命军队，坚持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是这还不够，还应该加强与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人士的团结与联合。

他还希望大家除了从书本上学习革命理论外，还要更进一步学习革命工作的实际经验，为日本劳动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朱德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逐渐增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最后取得胜利！

朱德的长达两小时的讲话，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全场洋

洋溢着昂扬的热烈气氛。

接着日本工农学校和反战同盟的代表森健致了答词。他感谢朱德的深切教导和热情关怀，感谢有关各方和老师们一年来的辛勤教育和细致照顾。

最后，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致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信。这封信的全文是：

敬爱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暨八路军全体指战员：

当我校开学一周年纪念的今天，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生，谨以十二万分喜悦的心情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敬礼！

回想去年5月15日的开学典礼上，我们对着我们的恩人——八路军及其领导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以谢意时，曾经这样宣过誓：我们愿意尽我们的所能掌握革命理论，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

转眼已经一年了，我们自那天起踏上了新生的第一步，在你们正确的领导和爱护之下，我们找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

我们直到今天仍坚守着那天的誓言，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理论，今后还需更大的努力。

目前正是世界大转变的前夜。我们再次向你们宣誓：一定努力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我们的学业虽然尚未完成，但若有必要，无论何时，我们都愿意在你们的领导之下，和中国弟兄一起，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最后，敬祝你们健康，并请对我们多多指导和帮助。

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生

1942年5月16日^①

^① 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21日版。

第十章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发展

为了培养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战士，在林哲领导下，经过长期筹备，于1942年6月23日下午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室，举行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

大会会场的正面，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片山潜的巨幅肖像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旗。两旁摆着多种鲜花。会场布置庄重，气氛严肃。大会主持人林哲首先向大会推举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市川正一、毛泽东、朱德五同志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团。接着，林哲作了大会的主题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表示在延安的日本同志有了飞跃的进步。他们中部分同志已迫切要求参加共产党。现在参加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已有24位同志。他们都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人员或学员。这个同盟不等于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共产党的准备阶段。本同盟的成立，对于日本的革命运动，对于同盟盟员本身，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希望同盟盟员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外部来促进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他强调指出：“同盟所以能够成立，是与中国

共产党和在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真诚援助分不开的，我们从心里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接着，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全体盟员，在森健带领下高声朗读了《入盟宣誓》：

“当我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谨在日本及中国民众面前，作下面的宣誓：

（一）为同盟之目的，同盟之利益，贡献我的一生，永不背叛；

（二）绝对服从同盟的纪律、决议、命令，严守秘密；

（三）在工作、学习、自我锻炼、日常生活各方面，皆须成为他人之模范。”

继而，在全体同盟盟员的一致同意下，通过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章程规定：

第一条：本同盟乃由在中国之日本人所组成，其目的在于进行以下的任务：

一、研究、掌握以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二、培养、锻炼共产主义运动之战士。

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天皇制以及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日本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积极地献身于以上之事业。

四、与中国革命团体及军队亲密提携，相互援助，共同奋斗。

第二条：本同盟定名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设在陕西延安。

.....

第十三条：为了获得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并吸收其经验，总部及支部得聘请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所指定之顾问。顾问可出席一切会议，但无表决权。

.....

然后，杉本一夫建议给毛泽东发封致敬信。他宣读了信的全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

我们谨以满腔的喜悦向你作这个报告，就是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

同盟今天已经正式成立了。

我们底大多数，在过去都曾是日本军队的士兵，都曾有过反动的思想。但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抚育下，在一年乃至四年中，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不仅知道了现在在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坚决相信，为要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为要使日本的劳苦大众从野蛮的天皇制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道路——即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道路前进不可，并决心为此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在这里，我们深深地感到，凡有这样决心和信念的同志，应该好好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因此，就产生了本同盟。我们将在同盟内努力掌握马、恩、列、斯的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努力锻炼自己，准备迎接将来的斗争。我们过去都没有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我们在理论上都很幼稚。然而我们并不灰心，因为我们是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这里对于我们的学习和锻炼能给予最好的机会与便利，特别是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直接领导。

当我们今天向着共产主义的大道踏上新的一步的时候，深切感谢你们过去对于我们所表现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并希望你们今后给予更多的指示和帮助。

此致

敬礼！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

1942年6月24日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这封致敬信后，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致贺词。他说：同志们来延安时间不长，但进步很快，今天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我们衷心表示祝贺。现在这个同盟组织不大，人数很少，但必定将有惊人的发展。同志们必须利用今天的有利环境，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准备将来在日本的具体应用。希望同志们不屈不挠，奋斗到底。

八路军总政治部代表李初梨接着致词。他说，十年前，他曾

在日本京都参加过日本劳农党大会，今天又在延安参加在华日本

共产主义者大会，觉得很有意义。希望同志们注重理论和实际统一，以无产阶级的道德为最高标准，来锻炼自己。他指出：同盟的成立定将给日本国内的革命同志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加入这个同盟的盟员发言，表示坚决按照同盟的章程去做，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

最后，盟员代表中小路静夫向来宾致答词，他说：我们的进步，仅仅是个开端。我们决不辜负各位来宾的殷切企望，要不断努力向前迈进。希望未参加同盟的同志，也来监督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深信，我们的事业定会取得胜利。我们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才能对得起日本共产党。

过了两天，即1942年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同盟成立的消息：《延安日本同志创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时，在头版发表了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社论。社论写道：

本月23日，日本的同志在延安创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创立这个同盟的同志，和将来参加这个同盟的，他们的绝大多数，曾经是在日本军队中接受过反动的武士道精神教育的日本士兵。他们的脑袋里，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装进了；现在的侵华战争是所谓“圣战”的思想。这些士兵被我八路军俘获后，在日本工农学校或前线受了一年至四年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终于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决定自己要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在这样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这件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第一，表示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待战俘政策的正确。第二，显示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对于日本劳动者来说，并不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参加这个同盟的人，到八路军的时间平均不到两年，这决不是很长的岁月。在这样较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掉转枪口，对着曾经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日本天皇和那些将军们。这件事，不仅显示了共产主义的威力和胜利，而且给我们今后的对敌军工作以极大的信心。

这个同盟，正如其章程表明的，不是共产党本身，而是共产党的准

备组织。同盟当前的任务是努力用共产主义教育和锻炼盟员，在日本人中间创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同时，同盟要着力于向在中国的日本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活动，全力推动日本同志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例如，对敌军的工作，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将来，这个同盟要进一步发展到积极推进日本国内的革命活动。

这些工作，对处在残酷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下与国外断绝了关系的、孤军奋斗着的日本共产党来说是个很大的援助。同时，对于我们的抗日战争，也是个极大的支援。因为这样，就给面对敌军的我们以新的可以信赖的力量。

这个同盟的组织，现在只限于延安；如今正在山西东南部建立支部。今后同盟的组织要扩大到山西省、察哈尔省、河北省和华北其他各个地方。这样一来，同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了不可轻视的威胁了。

然而，同盟的组织，现在刚刚产生，极大部分的同盟盟员，缺乏革命运动的经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还不能熟练地运用。这些弱点在他们今后的努力学习和反战斗争的实践中，定会克服的。但这样还不够。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待同盟，定要像兄弟一样，竭尽全力给予援助。

同盟成员都说：“我在战场上死过一次，被八路军救活了。我要把这条命献给反对侵华战争和日本革命事业。”这样的决心，是革命者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我们对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将来寄予更多的期望和信任。

在这同一天，毛泽东给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林哲写了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坚决的支持。信里写道：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决定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1942年6月25日^①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从1942年6月23日起到1943年上半年，在日本工农学校，在反战同盟的各个支部，先后建立了支部，参加这个同盟的人数约占学校各个支部人数的一少部分至一半左右。加入这个同盟的人都是经总部严格审查其政治觉悟水平、反战实践表现后才批准吸收的。而且有三个月的预备期，以进行进一步的识别和考验。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都成了其所在单位的骨干，起了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作用。

1943年7月10日，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礼堂，由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日人反战同盟联合召开纪念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一周年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三周年大会。八路军总政治部不少同志应邀参加了这个大会。

冈野进（即林哲）校长在会上讲话指出：苏联人民进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给德国法西斯强盗以沉重打击，英美在欧洲西部开辟了第二战场，日德法西斯即将彻底失败。接着，他向日本同志提出了三项任务：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二、周详地研究日本情况；三、虚心地学习中国同志的革命斗争经验。

这一天，是冈野进在延安公开活动后，公开就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日子。

后来，根据斗争形势需要，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和活动转入了秘密状态。

^① 本节内的引文，除注明出处的外，都引自《解放日报》1942年6月30日。

本编小结

从1937年7月到1942年8月，在这五年时间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日本人民的生活条件越加困难。随着日军开始转向失败，更多的士兵逐步厌战，以至反战。

在国民党政府的利用政策下，以鹿地亘领导的国统区日人反战同盟，曾对中国抗战做出了一定的独特的贡献。随着国民党倾向与日帝妥协，反战同盟坚持自主自立，不受国民党政府控制、利用，国民党政府转而对其进行限制、压迫，以至公开下命令并实际上予以解散。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军队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统一战线政策，优待、团结、教育日军俘虏，使其中一部分人转变了立场，加入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并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为抗击日军侵华，积极投身于反战活动，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为较大规模、较有系统、有成效地培养大批反战同盟干部，培养日本进步力量提供了基地。它在推进在华日人反战斗争中，起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及其各个支部的建立，为华北、华中日人反战运动提供了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为以后日本的革命斗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

第三编

反战组织的统一和反战 运动的活跃

(1942年8月—1944年1月)

第一章

日本国内人民反战活动的继续

从1942年到1944年1月，日军为在太平洋战场上抵御美军的反攻，想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大量兵力。但由于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抗击和在部分地区的反攻，使日军不得不在中国大陆保持极大的兵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美、英等国以及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极为有力的配合和支援，至今还有人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个客观事实，这完全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1942年7、8月到1943年2月，美国夺取瓜达卡纳尔岛、苏联保卫斯大林格勒，这两大战役的胜利，使太平洋战争和欧洲战争开始发生转折，战局对法西斯侵略者越来越不利。1943年4月18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等人被美军飞机截击殒命，使日军士气更加沮丧。

接着苏军开始连续反攻。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美英在太平洋地区转入总反攻。在中国军队、越南独立同盟、菲律宾人民抗日军配合下，美军包围了腊包尔岛，英国攻占缅甸北部地区，等等。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已面临彻底的失败。

在这一时期，日本军阀政府强化了对人民的控制，组织了大

政翼赞会以及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复员军人会等等，把日本全国变成名副其实的军事监狱，使日本人民沦为军阀、财阀的奴隶和囚犯。

日本军阀统治集团为应付其庞大的战费开支，更加野蛮和残酷地榨取广大日本人民的血汗。1943年政府所征税额达132亿日元，比1942年增加了一倍，成为摊在日本人民肩头的重负。

日本政府还修改《兵役法》，将服役年龄从20—40岁放宽到19—45岁。1941年，日本陆海空军总兵力计241万多人，到1944年，日军及迁徙到占领区的侨民高达900多万人。

战争使日本政府不断扩展劳动者征用年龄。男子从16岁—41岁，扩大到12岁—60岁。女子从16岁—25岁，扩大到12岁—40岁。

战争导致军需工业进一步膨胀。民用工业、农业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生活消费品锐减。物价飞涨。日本人民陷入了苦海。1942年，每人每天粮食定量只有6两（10两为一斤）大米，后来，在这6两大米里，还掺入了大量的糠、山芋叶等。棉织品供应极少，市场上也买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因为无法生活，用自杀的手段来控诉法西斯的统治。更多的人在事实的教育下，逐步进行消极的抵抗和隐蔽的斗争。较普遍的是工厂缺勤率猛增，一般工厂的非正常缺勤率均在10%以上，军需工厂则常常在20%以上，有的竟达50%。

入厂工作的工人，一般也是消极怠工，有意制造大量次品，浪费原材料，以表示自己的反抗。1942年夏天，日立制造公司的龟有工厂工人，公开举行有组织的怠工活动，使产量大为下降。农民也不断展开反征购、反义务交售、反高地租的斗争。

1942年以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更加炽热。1943年日本平

均每天发生一起有较大影响的反战事件。在大阪、长崎等地，经常出现大批反战传单以及铁路被破坏，征兵处被烧毁等事件。

在日本各海港、车站，经常有上千的送丈夫或儿子出征的妇女公开咒骂侵略战争。1943年8月，一批新兵和在战场上负伤才治愈的老兵，被押送到神户港去南洋作战时，前往送行的士兵的母亲和妻子，在港口包围轮船驾驶员，警察用水龙放水冲驱她们，双方发生殴打，结果，100多人死伤，妇女们高呼口号：“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部！”“还我丈夫！”“还我孩子！”

1943年，东京举行全市防空演习时，反战人士趁机在六个地点燃起大火。别的地方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1943年，日本一位作家根据过去的历史故事《100袋大米》改编成戏曲，内容是说明明治维新后不久，东北部地区仍遵循旧传统反对政府。现新泻县长冈藩在和政府军反复战斗中变成一片焦土。藩主归顺了政府。政府没收了全藩财产的2/3，使8500名武士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邻近藩主送来了100袋大米，共21.6吨。这使武士们欢呼雀跃，以为一定会有粮食分给他们食用。但当地有名的政治家小林武三郎，是一位很有政治远见的武士。他认为要使长冈藩重新恢复起来，就应先发展教育，培养人材。他主张把100袋大米全部卖掉，用所得的款项办一所学校。一些武士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跑来，拔刀质问小林武三郎：“办什么教育？建什么学校！赶快把大米拿出来，分给大家。”小林武三郎回答：“正因为吃不上饭，所以我们要先办学校！”双方争论不休。最后武士终于被说服，接受了小林武三郎的意见。

这出戏演出后，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后来又编写成书，很快销售了5万多本。这戏和书之所以受欢迎，反映了日本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的对外侵略政策的极度不满。

事实表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转向失败，日本国内人民

在政治上逐渐觉醒，他们公开厌战、怠战、反战，从内部动摇了日本法西斯统治的侵略战争体制，汇成了日本法西斯侵略政权最后灭亡的内部因素。

同时，这一阶段日军内部的反战活动比以前明显增多。1943年4月，独立混成第8旅团独立步兵第32大队第1中队去阜平县山区，在行军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到处都有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传单。官泽军曹偷偷拾了几份传单。

有一份写着：

告日本士兵诸君：

轴心国方面，意大利军队异常脆弱，在德国机械化师的支援下，虽然勉强挽回了败局，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侵入苏联的德军，今冬在斯大林格勒大败，损失数十万官兵，眼下正继续败北，已后退到波兰附近。

日军前线，在新几内亚岛丧失了数万官兵，正在败退。国内物资奇缺。

官泽军曹把这份传单传给了樱井军曹和关吉少尉，三人对战局感到悲观。三人约定，以后相互多联系，以利交换情报。

在这个中队，有个岩本上等兵，是茨城出生的补充兵，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参加过学生运动，曾担任企划院的技术员。他有渊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又努力学着汉语。有时还独自唱起禁唱的昭和维新歌曲：

“虽有权势，
但无忧国诚意。
虽很富有，
但无思念祖国之心。”

关谷少尉请他偷偷看了传单，问他：“日本未来会怎样？你看反战同盟的传单说的对吗？”

岩本回答：“传单里讲的很对。竹内军曹在暗中学习，怎么不一起干呢？光有想法不干还是……”这样，岩本就开始和关谷、樱井、宫泽、竹内一起学习传单和别的资料，有时为大家作辅导。

有次作战回来，得到一本铅印中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比较难懂，就请岩本每周在樱井独住的房里给大家讲解。

接着，他们开始行动，樱井以驻地汪伪县警备队长巨万春腐败为由，解散了该警备队。樱井还以不能医治为由，擅自把有共产党员嫌疑的三名有病的中国农民给放了。

上述日军的第一中队在1943年9月移防到冀东。不久，作为作战部队的一翼，在拂晓时分向抚宁县、永平县交界的前来头村进行四面包围、攻击。作战开始，小山小队长在山上命令往下冲，但第一分队宫泽军曹喊道：“在这样平坦的田地里作战，那不是白白送死吗？”不愿送死的士兵们，没有一个往下冲的。

生气的小山小队长挥舞着军刀，高叫着：“这是命令，给我冲！”这时第二分队的全体士兵都掉过枪口，指向小山。小队长害怕了，只得在原地坐下，呆呆地望着山下。

过了好大一会儿，又开始攻击。这时小山小队从山上往下冲时很安全，因为300名八路军士兵，早已突围了。

关谷少尉被派到秦皇岛补充兵教育队担任教官。补充兵大部分竟是30—35岁的士兵。上级要求各部队派五名下士官到这个补充队工作。结果，竟有30名下士官报名，他们都想借此机会早日回国，当一名在乡军人干部。

关谷少尉和每位报名者谈了话，说明进了教育队，下士官就不会轻易退伍，就很可能不能活着回去。结果，报名的人数立即下降到两人。

上级对此事发生了怀疑，派人调查，弄清了真相，关谷少尉

立即被免去教官职务，并被关了四天禁闭。

还有的日军士兵，主动设法和中国抗日军队联系，进行反战斗争。坂本贤阶就是其中的一位。坂本贤阶 1913 年生于日本京都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随家在上海上学，对中国人民的处境十分同情。他哥哥是位日共党员，常常对他进行教育。后来，他在东京一家皮鞋厂当工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反对日本军部的侵华战争。但不久，他自己也被强征入伍。

1942 年夏，他的言行受到上级的怀疑，被派到离浙江义乌北部大陈车站五公里远的楂林村的日军木材采伐队当队长，受楂林据点的日军警备小队队长河野监视、管辖。

他改变了斗争策略。他在河野面前，砸了中国人小吃摊的摊子，夜里偷偷给摊主送钱。如此几次，他的行动引起了附近抗日游击队——浙东游击纵队坚勇大队在楂林村的情报员老娄的注意。

后来，他通过我方有关人员与坚勇大队的领导同志有了联系，通过交通员不断送来情报，使日军的扫荡扑了空，使我方避免了损失。他通过秘密渠道给坚勇大队送去一批又一批药品及棉花、粮食等。

有一次，根据坂本的一份情报，游击队逮捕了楂林采伐队去杜门收购木材的大本和两个伪军。游击队限定河野三天内送去 30 担大米、20 袋面粉，过期就不保证大本的生命安全了。大本是日军义乌县警备司令的亲戚，河野怕出差错，不得不送去大米、面粉。

冬天将临，坚勇大队人数多了，但缺过冬棉衣，坂本及时送去情报，县城日军警备司令部即将给楂林日伪军运送一批军需物资，其中有军火、药品、毛毯。游击队得到情报，巧妙地缴获了

这批物资。毛毯使部队安然度过了寒冬。

日军要在春天采伐大批树木，坂本用各种办法拒绝行动，被撤职。接替他的黑田非常凶残。他就把黑田巧妙地领往杜门，在路上由游击队逮捕了黑田。黑田被捆住双手后还逃跑。游击队员被迫开枪把他击毙。

黑田的死，使河野更加怀疑坂本。很快速捕了他。他在被送往金华警备司令部的途中，趁火车在苏医一段路转弯慢行时跳了下来，由英勇大队战士们接应，撤进丛林，参加了中国抗日队伍——浙东游击总队英勇大队。

第二章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

第一节 大会的召开

从1939年11月7日，在八路军总部成立日本觉醒联盟的几年来，在华北敌后，又先后成立了觉醒联盟、反战同盟等八个支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但由于反战同盟总部设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远离华北敌后，而且被阻挡了正常联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觉醒联盟、反战同盟之间，工作中也没能很好地协调、配合，显得力量分散。

为适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加强反战斗争，进一步发挥反战运动的作用，迫切需要加强敌后日人反战组织的政治、组织和工作的统一领导。为此，在冈野进领导下，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大力协助下，延安支部在1941年底1942年初，先后决定于1942年8月，同时召开华北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由于在延安的反战同盟员半年多时间的辛勤筹备，随着华北各反战团体代表的陆续到达，开会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这两个大会相当重视。延安《解放日报》于

1942年8月14日，发表了社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开幕》，全文如下：

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开幕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明天将在延安召开。我们祝贺这两个对抗抗日战争有极大意义的大会开幕，并衷心地期望大会成功。

日本士兵代表大会的成员，现均在我八路军里。他们代表着在华北与我作战的日军十八个部队的士兵。他们是从各个地区来的，其中，有数月前才脱离日本军队，参加八路军的士兵。他们代表着日本军队的所有兵种，代表着从二等兵到少尉的所有等级。这些代表，从日本士兵立场出发，讨论他们现在的切身要求。这些要求，从“给我们肚子一碗饭吧”的经济要求，到“给现役军人以选举权”的政治要求，有230多项。大会一结束，代表们将设法把这些要求传入日本军队，掀起以这些要求为中心的、日本士兵群众反对军部的斗争。

此外，士兵代表大会，将为我们详尽地揭露日本军队的腐败、它们内部的争斗、军官们的卑劣、老兵的怠工、对士兵的野蛮暴行、士气的低落等等的事实。同时，我们将有亲身体会的人的嘴里听到：在日本士兵中，厌战气氛是怎样地高涨着；他们对于上级军官，进行着怎样的单个的或集体的自发斗争；他们怎样逃离日本军队，来到八路军的所在地等等的非常感动人的谈话。通过这个大会，我们将看到挣脱了法西斯军部锁链的日本士兵——日本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姿态，将听到他们真正的心声。

促进这个士兵代表大会，帮助做工作的，是日本人反战团体。这次反战团体大会，是由在华北的反战同盟的十几个支部（总部在重庆）和觉醒联盟的代表们倡议、主持的。在这些代表中间，也有和八路军指战员一起，经过枪林弹雨，奔驰转战各个战场，英勇地对日本军做政治工作的老战士。这些代表，在大会上，将认真地讨论过去活动的成绩和缺点，依据内外形势，决定反战斗争的新方针，同时，将集结、统一在华北的日本人的反战力量。这样，壮大了的反战团体，受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指导和援助，在对敌斗争中，将协助前线部队更好地完成任务。

这个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团体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除了少数自己投降过来的），都曾是八路军的俘虏。但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他们绝大部分，有了阶级觉醒，理解了侵华战争的本质，作为反战战士而新生了。这证

明我军对于俘虏的政策和教育方针，是正确的；同时又清楚地证明，日本军部当作牌位供起来的“武士道”精神，是多么脆弱；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感化力，又是多么强大。总而言之，大会上士兵的呼声，敲响了日本法西斯军部的丧钟。

其次，这两个大会，也将大大促进我们的对敌政治工作。过去，我们的对敌工作，在调查研究日本军队方面是不够细致的，对具体情况，掌握不够。这次士兵代表大会，将根据日军内部的实际状况，士兵的真正要求、气氛和思想，商定进行怎样的斗争。进而在反战大会上，将讨论以往我们共同创造的，对敌宣传活动的成绩，议定今后的新方针。这样做了，就一定能克服过去对敌工作的不足之处，把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这两个大会，对于日本的革命运动，也灌注了新的力量。大会的代表，通过大会的准备工作，大会的讨论，一定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大会结束以后，他们去前线活动，或在根据地学习、讨论中，一定会锻炼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斗争，不断地在华北发展，对于日本的革命，对于在极其困难状况下战斗的日本共产党，是个很大的援助。

总之，这次士兵代表大会、反战团体大会，是日本军队崩毁的一个征候；同时，也是推着日军在崩毁的下坡路上，加速往下滚的动力。我们在为实现当前的目标：“今年打倒希特勒，明年打倒日本”而奋斗时，应该把这个力量算在里面。因此，为了完成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援助日本兄弟，使他们的活动更有成效。

华北日本士兵大会与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于1942年8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大礼堂一起开幕。16日—19日，举行士兵代表大会。20日—26日，召开反战团体代表大会。29日，两个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式。

参加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人。他们代表驻华北地区17个师或独立混成旅，以及关东军、海军等部队。代表应征前的职业：工人占52.8%，农民占20.8%，职员占12.2%，商人占9.4%，渔民占2.8%；到达八路军的时间：1938年的占9.4%，1939年的占13.2%，1940年占56.6%，1941年的占15.1%，1942年的占5.7%。代表们的资格，表明他们可以代表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

的日军各个部队。

参加大会的，还有林哲、原清志等日本同志。接受邀请前来参加大会的，有八路军指战员、政府部门、民间代表数千人。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等各国代表多人。

8月15日，举行开幕式，首先由代表这两个大会的森健致词。他说：“大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华北日本人的反战力量，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新的斗争。……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大会的本身，就象征着日本军部开始彻底崩毁。”他的讲话，得到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选出十人为士兵大会的主席团。成员有中小路静夫、高木敏男、小林武夫、松本敏夫、中川秋男、大山光美、浅井悦夫、山田义次、后藤光昭、泷泽三郎。

又选出由25人组成名誉主席团。

接着，来宾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由八路军代表朱德总司令来到讲坛上致词。他说：“反法西斯的日本人民大众和士兵，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将来是争取东亚和平和幸福的朋友……希望你们努力，把在中国的几百万日本士兵，团结在你们的旗帜下，使他们的枪口，对着你们和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军部……”

其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吴玉章致词。他说：“从中国的辛亥革命想到日本人民的革命，成立同盟会和推翻清朝的当时，中国不少革命青年，在日本，从日本先进的人们那里，得到很多援助。今天，日本革命的人们，在延安开会。我祝愿日本的反战兄弟们，随着我们革命的发展而进步。今天这个日子，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有重要意义。现在日本一国的事情，就不仅是日本，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事业。所以，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

第二节 编写《日本士兵要求书》的基本方针

从8月16日起，会议进入中心课题——为编写《日本士兵的要求书》进行具体讨论。在大礼堂，几千位中国指战员，政府、民间的代表，以及外国朋友们，列席旁听。

首先，由士兵大会预备委员会委员长大山光义说明本大会的目的，说明制作《要求书》的理由，接着，进行热烈的讨论。

为了写好这个《要求书》，确定了基本方针。

1. 要求反映日本士兵迫切的、为了造成反战斗争所需要的情绪。

2. 不管怎样迫切的要求（例如，性的要求等），会削弱士兵战斗力的，就不提。正确的要求是激发军队内的阶级斗争（士兵向上级军官作斗争）。

3. 引导军队的士气、战斗力的弱化和崩毁。

4. 进而使士兵群众（穿军服的工人、农民）和军队外的群众进行共同斗争。

5. 为了以上目的，所提要求应选择可能合法提出的，说明后能理解的，有可能实现的。

他们根据这个基本方针，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制定了《日本士兵要求书》。

大会一致通过了《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原文如下：

亲爱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们：

我们怀着满腔真挚的热情，代表现在在华北和你们作战的十九个部队的日军士兵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友的敬意。

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反而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用“兄弟”来称呼我们，用同志来对待我们，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这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你们亲切的抚养教育下，今天我们已经彻底的认识了：我们的敌人不是你们，不是中国人民，而是驱使我们来当炮灰、陪我们的家庭于极端贫困的日本军阀财阀。五年来，日本军阀在你们的国土上，尽其一切惨无人道的残杀、破坏、掠夺和种种暴行的能事；同样的，日本军阀也在我们的故乡残杀日本人民，迫使日本人民走向饥饿与死亡。日本军阀强迫、欺骗我们到战场上来送死，而你们却解放我们，指引我们走上真正达到自由和幸福的道路。没有比这个事实更能明确地说明问题了。你们的敌人也正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紧紧地和你们携起手来，打倒这个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蒂，才是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唯一出路。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友们：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军阀！让我们和你们在这个光荣的目标和响亮的号召下团结起来，一齐战斗吧！我们今天再一次向你们、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反法西斯蒂的人士宣告：我们已经不是进行侵略战争的无知的兵士，我们已经是再生的，为自由、民主与和平而斗争的战士了。我们将效法你们，按照你们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所走的道路前进。

同时，我们愿意不仅在日本军阀没有打倒之前和你们团结在一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即在这个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我们也同样还要团结在一起，来共同建设真正的东亚和平，建立中日两国间真正的共存共荣的关系。

今天，在延安，日本士兵召开了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大会。大会讨论了我们斗争的纲领，这次大会的成功，将会加速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崩溃，促进我们胜利的日子更快地到来。但是，我们今天的力量还非常不够，我们还需要各方面更多的帮助，因此，我们首先向你们提出要求，在前线，在后方，希望给我们更有力的帮助，使我们这支反法西斯的新生力量，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从我们的内心发出下面的呼声：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万岁！

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

胜利在正义方面，在我们方面！
和平、自由与民主的东亚万岁！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
1942年8月15日于延安

大会主席团推选原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第十二大队四中队士兵梅田照文，在会上揭露了他亲自经历的日军在华北的罪恶行径。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母亲，在日军的摧残下，躺在血泊中死去。她怀里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还无知地伏在她胸上，吸着她的奶汁。日本军官们在一边狂笑。

1940年3月，方山一个束着皮带的老百姓，被日军抓了，原因是他竟束着皮带，长官命令42个士兵，用刺刀戳他。他身上被戳了几十个窟窿，立刻死了过去。长官检查士兵的刺刀，发现34个士兵的刺刀带血，表扬了他们，其余8个士兵立即被关押，并挨了一阵“集体耳光”。

1939年6月，昔阳县的警备队长，抓了一个老百姓，铐了他的双脚，叫狼狗咬他。老百姓用手与狗搏斗，狗胆怯了，警备队长马上把老百姓的双手捆了起来，让狗把他咬得稀烂。

日本军队，在华北到处掠夺民间物资，无孔不入，从银元到伪币，全装入自己腰包。军官穿的皮衣，都是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并且以此为荣。被征来的黄包车夫和一切苦力，常受他们拳打脚踢，每天只给五分钱的工钱。中国人听不懂日本话，常遭军官毒打。看到他们认为“可疑”的中国人，马上就吊起来毒打，灌辣子水，用铁针戳指头；冬天，就用冷水把他们冰起来；还经常奸淫中国妇女。

每到—个村庄，军官们下了“无人村”命令后，放火班就领着士兵，带着煤油等引火物去放火，把整个村子烧光。

另外，军官们还命令士兵往水田里、菜田里，到处放毒气。这

种毒气大都是属于糜烂性的。华北人民常遭这种毒害。^①

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下述宣言：

《向日本军部抗议，严惩横暴长官》

我们曾经相信军部所说的“为东亚永久和平，为中日共存共荣而进行圣战”的话，而且认为按照这句话，顺乎正义人道而服务才算是男儿真正的志愿。但是，在华北战场上军部命令我们所做的种种事情，却和这些美丽的词句完全相反。

我们在军队里实际看到和实际做出的非人道的行为是太多了，真是多得数也数不清。以皮鞭和刺刀虐待无辜的民众，用暴力对软弱妇女实行野兽行为，无情地抢夺粮食财物等是很平常的。可疑的人，不管是谁一定要被捕而受到不忍目睹的残酷的拷打之后，或烧杀，或纵军犬咬死，或浸入水中冻死，这些残暴的行为是数都数不清的。特别是在最近的战斗中，更加厉害，军部公然下命令：“此次歼灭战中，要杀尽全部生物，烧光全部房屋粮食。”或者“进攻时，应彻底破坏，使其无容身之地。”不问男女老幼，见着就杀，房屋粮食烧得精光，使善良的中国农民无家可归，无饭可吃，活活饿死。并且还用毒瓦斯，毁灭整个村镇的居民，或者到处散布恶性细菌，危害和消灭中国人民的生存。

我们日本士兵坚决地反对这种行为，我们也是有人性有感情的人。我们做这非人道的、野兽一般的行为，难道能得到永久和平吗？不会的，纵经百年、千年也是绝对不会得到的。这难道能说是为了日本人民的幸福，为了东亚永久和平而进行的圣战吗？不！绝对不能说是圣战，军部所说的圣战完全是撒谎，欺骗。我们从小就受着“以己之艰辛，度人之疾苦”的教训，而且相信这是正确的。那么，假定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没收，父母兄弟被惨杀，我们又将怎样呢？我们觉得痛苦的事，他人同样也是无法忍受的。这些都是日本军部迫使我们做的。我们今后对这种非人道的命令，是绝对不能服从的。所以我们日本士兵，在这里团结起来，为反对军部的野蛮行为，提出以下的意见。

坚决反对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暴行、杀戮、放火，使用违反国际公法的毒瓦斯，实行细菌战，拷打和虐杀俘虏等，严惩命令我们实行一切暴行的长官！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

1942年8月19日

^①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9日版。

8月26日，士兵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了大会的规约。规约有四条：

第一条，本大会，由在华北的日本士兵以及下士官（包括下级军官、军队职工，以下同）组成，以维护、提高日本军队内外的士兵及下士官的人权和利益为目的。

第二条，本大会的最高决议机关，是华北代表大会。在大会常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召集本大会。

一切赞成本大会宗旨的日本士兵和下士官，得代表其所属部队，出席本大会。

第三条，大会常任委员会，负责从大会开始，到大会结束的一切事务。

这个委员会，由委员长一名、委员若干组成。委员长、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本大会，得在华北各地，召集地方士兵大会。

本大会和地方大会的关系，以及地方大会的规约，另定。

根据上述规约，选举了大会常任委员会的成员：委员长，大山光义；委员，中小路静夫、茂田江纯、高木敏男、重田唯好、松本敏夫、谷川直行等六人。

第三节 《日本士兵要求书》

《日本士兵要求书》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第一次大会

1942年8月通过

《告华北各部队的诸位战友》

亲爱的诸位战友：

我们和各位一样，是日本的士兵。我们是自己逃离肮脏军队

的，以及由于战斗的结果，不得已到八路军方面来的。

但是，我们到了八路军后，不是被作为敌人，而是受到了朋友的待遇，过着自由、舒畅的生活。

各位战友！正如你们知道的，不管在什么地方，被人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一旦征召入军队，就变得一文不值了。一切都是命令，是军纪，连答话的权利也没有了。人被看作不如枪和马！特别是，战争拖延，初年兵实施现地教育以来，从战场到中国最北部，都像国内的部队一样，变得严酷，难以容存了。军官的压迫，比敌人的袭击，更为可怕。这种情况，不是不断地呈现在不自由的我们的眼前吗？“我们羡慕稍为好一些的生活，羡慕舒展的晴朗的日子，若我们军队，也允许有点自由，就好了。”这样的心情，是士兵们谁也有的。但不敢说出来。

为了使不敢讲这类话的各位战友，变得敢讲不满的看法；为了商谈、改善我们日本士兵的所有生活问题，我们最近在延安召开了士兵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代表所有战友的希望和要求，进行了商议。结果，从各个方面的士兵讲的想法和希望中，选出了二百二十八条要求（其中，主要的有一百二十一条）。

这些要求和希望，都是大家在一起写成的。若军官不配合，就不能实现。那末，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军官配合呢？我们反复研究的结果，创作了这份《要求书》。

各位战友！希望大家深入地商谈一下我们创作的《要求书》，勇敢地向军官提出来。假若小队、中队的士兵们奋起斗争，大家互相配合，就一定能实现这些要求的。

假使不能全部实现《要求书》的要求，那末，先实现一半，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实现《要求书》，不管何时何地，都坚决地援助各位，直到这些要求得到满足。

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

昭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一师团代表	山中 正
第十二师团代表	伊藤 正
第二〇师团代表	村山 正
同 上	海田弘道
第三二师团代表	田代 清
第三六师团代表	宫本 正
第四一师团代表	白石新一郎
同 上	冈崎昌弘
第一〇五师团代表	松本敏夫
第一〇九师团代表	高木敏男
同 上	松井英勇
同 上	中小路静夫
第一一〇师团代表	山口一夫
第一一八师团代表	石田美喜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代表	中川秋夫
同 上	户田 益
同 上	秋山辉夫
同 上	竹内义雄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代表	佐佐木清
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代表	谷川直行
同 上	恒川吉男
同 上	重田唯好
同 上	稻津新太郎
同 上	大山光美
同 上	东健 一

同	上	加藤政夫
同	上	大森五郎
同	上	浅井悦男
同	上	浅野修二
同	上	梅田照文
同	上	高山 进
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代表		石塚 修
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代表		市川常夫
同	上	山本荣作
同	上	岸纯 二
同	上	青木定夫
同	上	泷泽三郎
同	上	永井敏夫
同	上	大谷 正
同	上	山田义次
同	上	冈部 尹
同	上	后藤光照
同	上	南 一雄
同	上	渡边俊夫
同	上	三上 一
独立混成第一六旅团代表		秋田英勇
同	上	木村 一
同	上	北村 巧
独立混成第一八旅团代表		田中新太郎
关东军代表		冈田义雄
同	上	小林武夫
水兵代表		上杉荣一

要求书目录

一、关于给养的：

- (1) 工资和储蓄；(2) 食物；(3) 军营内零售店；(4) 纺织品；(5) 被服；(6) 恤兵品和慰问袋；(7) 娱乐。

二、关于军纪、教育、私刑的：

- (1) 军纪和敬礼；(2) 精神训话；(3) 教育和训练；(4) 进级和功绩；(5) 罚则和惩罚；(6) 侮辱、暴行；(7) 对于宪兵。

三、关于通信、外出的：

- (1) 通信；(2) 外出；(3) 休假；(4) 会面。

四、有关读书、集会和政治的。

五、有关军事行动的：

- (1) 警备；(2) 行军和宿营；(3) 战斗；(4) 掠夺、暴行、杀伤、放火。

六、有关伤病兵的。

七、作为下士官的要求。

八、作为下级军官的要求。

九、作为军队职工的要求。

十、作为在乡军人的要求。

十一、有关兵役制度和入营的：

- (1) 征兵；(2) 入营；(3) 召集；(4) 返回和退役。

十二、有关职业和保障生活的。

十三、有关出征家属的：

- (1) 保障生活；(2) 对于死亡士兵家属的赐金；(3) 减轻各种负担，家属战地慰问；(4) 减少租金，没收土地，其他。

十四、对国库的要求：

备考：在要求上面，印有0的，表示是主要要求。

下面是要求书的具体内容：

一、有关给养的

(1) 工资和储蓄

01. 要求停止强迫存款，准许士兵自己做主。
2. 给予士兵取出存款的自由。
3. 准予自由地提取汇款。

4. 要求不霸占、丢失汇款，确实送到士兵手里。
5. 不要强迫购买公债。
06. 要求把士兵、下士官的工资和战时津贴，增加两倍。
7. 要求同军官一样，给士兵和下士官发奖金。

(2) 食物

01. 要求给吃饱饭。
2. 要求把所有的食物供应量发给我们！
03. 要求停发代用食物，不要减少食物。
4. 要求给前线士兵，不光是干粮，还要有鱼和新鲜食物。
05. 要求根据士兵的意见，订立菜谱，按谱开饭。
6. 军官的特别菜，要用他们自己的钱！
7. 要求如实向士兵发表伙食收支报告。

(3) 军营内的零售店

01. 零售店卖东西时，不要区分军官与士兵，要公平对待。
02. 要求零售店的出卖品，只卖给士兵。
3. 不要强迫士兵买不需要的零售店的物品。
4. 不要以损失、腐败、物品不足为理由，提高出卖品的价格。
5. 停止把零售店的商品，转给地方商人和黑市。
6. 要求零售店的利润，不用于军官的会餐，只用于改善士兵的生活。
7. 要求每月如实向士兵提出零售店买卖的决算报告。
08. 要求让士兵来管理零售店。

(4) 其他食品^①

01. 要求多分发其它食品。
2. 要有更多的其它食品的种类和数量。
3. 不要把其他食品，作为零售店的商品出卖。
4. 要求停止凭票供应其它食品。
05. 要求如实地公布从兵站司令部领来的其他食品的定量。

(5) 被服

01. 在检查被服、武器时，不准打提意见士兵的嘴巴。
02. 要求分发新的代用衣裤。
03. 要求根据士兵的意见来分发袜子、手帕、肥皂、鞋带等物品。

① 其它食品指香烟、酒和甜食品。

4. 要求发两副以上的防寒手套、两双以上的防寒袜子，并把它们规定为消耗品。

5. 要求个人不能修补的、损坏不严重的被服，能交工厂修补，或进行交换。

6. 不要使士兵穿易破的服装，要求军官不要违反规定，着士兵的服装。

(5) 恤兵品、慰问袋

01. 发慰问袋时，要不分前线、后方，不分军官、士兵，平等地发给。

2. 不要扣拿恤兵部日用品袋中的肥皂、毛巾、兜裆布等；要求按原袋发放。

3. 要求不扣拿慰问袋里的东西。

4. 要求不侵吞寄给个人的慰问袋。

5. 要求公布恤兵金的使用情况，提出确实的决算报告。

(6) 娱乐

01. 要求慰问团，一视同仁地对待后方与前线。

2. 要求给前线同后方一样多的娱乐品。

3. 要求能自由地玩自己爱好的娱乐品！

4. 在娱乐时，要求不区分军官和士兵，不用讲究礼节。

05. 要求设立一般士兵的娱乐室，有各种娱乐品、装备，和自由收听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

6. 要求每月举行二、三次娱乐会。

07. 要求规定每天晚饭后时间、星期天、节日为娱乐时间。

二、有关军纪、教育、私刑的

(1) 军纪和敬礼

01. 要求遵守《军人敕谕》中的“公务以外，要和睦相待”的规定，禁止军官连自己的私事，也乱用“上级的命令”。

02. 即使礼节上有欠缺时，也不要给处罚。

03. 要求能自由地讲地方话，不强迫使用军队语。

(2) 精神训话

01. 要求停搞军官自己也不能做到的、没有趣味的精神训话。

2. 不要光作精神讲话，还要如实地讲战场情况，国内和国际的实际状况。

3. 要准予对精神训话的内容自由地提出问题。

(3) 教育和训练

01. 老兵和初年兵是兄弟。兄长要亲切指教小弟，不要虐待。
02. 不要太急太严地搞内务班教育。
03. 不要强迫士兵默记整个教谕、典范令等。
04. 要求再减少演习时间。
05. 演习时要搞轻装。
06. 在教育、演习方面，要适当照顾身体不好的，或能力低的士兵。

(4) 进级和功绩

01. 当兵满两年的，就不能还当一等兵！
02. 不要以军官个人的感情和利害，来左右士兵的进级和功绩。
03. 不要以存款的多少，或娱乐时的行动，来判定士兵表现的好坏。
04. 不要把伤病兵区分成一、二、三等症，要同样地给予进级。
05. 在决定进级、功绩时，不能由管理功绩的人独断，要根据士兵的意见来进行。

(5) 罚则和惩罚

01. 要求在武器、被服破损时，不给以惩罚。
02. 在处罚士兵时，要允许其战友陪审。
03. 不能根据军官个人的感情和利益，来加重对士兵的惩罚。
04. 不要包庇军官、宪兵的不法行为，要按规定加以惩处。

(6) 侮辱和暴行

01. 不要因区区小事而虐待士兵。
02. 要求禁止侮辱士兵、打士兵嘴巴，对违反者，给予严惩。

(7) 对于宪兵

01. 停止滥用职权，不准在饮食店训斥士兵，打士兵嘴巴。
02. 没向着便服的宪兵敬礼时，不得打嘴巴等。
03. 不要滥用职权，吃饭不付钱。
04. 要求严肃处理高级军官和宪兵的不正当行为和犯罪行为。

三、有关通信、外出的

(1) 书信

01. 不要拆阅士兵发的信和来信。
02. 不要强使士兵在上级面前念自己的信。
03. 不经本人同意，不得涂抹、修改发信的内容。
04. 停止以汇报的形式，公布士兵们被扣压、拆阅的信件。
05. 要求及时、安全地把信交给本人。

06. 要求允许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事!
07. 要求准许自由地向国内寄送照片和其他物品。
08. 给国内寄来的军事邮件以免费。

(2) 外出

01. 要求简化外出手续。
2. 外出时,可以自由地穿便服。
03. 要求在星期天、节日和每天晚饭后,能自由地外出。
04. 准予士兵外出的时间,和军官一样长!
05. 在外出期间,不用敬礼,不准打嘴巴、训人。
6. 要求在外出的地方,设立免费娱乐处。
7. 外出时间不给军队给养时,要退给伙食费。

(3) 休假

01. 要求规定:完成勤务后,休息一天。
02. 要求在讨伐、作战后,休息两、三天。
03. 要求快点规定:勤务两年以上者,给以三个月的休假和休假津

贴。

04. 农忙时,为了帮助家里干活,要求给予两周的假期,返回家乡。
05. 出征前,要有一周以上的外出时间,并发给日薪。

(4) 会面

1. 在会见侨民时,要给予最大的方便。
02. 会见人来后,能在接待室自由地谈话,并且可以回到班里做事。
03. 在接待室内,停止一切敬礼。
4. 要求取消接待室内的哨兵。
5. 应允许带会见人自由进入营房。

四、有关读书、集会和政治的

01. 要求能自由地阅读报纸和书籍。
02. 为了士兵间的亲近,要求建立战友会。
3. 要求设立意见箱,以便自由地申诉意见。
04. 停止所谓“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规定,给现役军人以选举权。
5. 要求准予自由地加入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团体。

五、有关军事行动的

(1) 警备

01. 禁止不准下班的连续勤务。
02. 不要强迫默记整个守则(或特别守则)。

03. 勤务至少有四班以上的替换，要求——特别在冬季——只勤务三十分钟。

4. 要求简化勤务前后的军装检查和交接班事项。

5. 军官巡视，不要做无聊的质问和说教。

6. 要求充分供应火炕、火炉用煤。

7. 讨伐队伍出发后，不要派当留守员的病号去执行勤务。

8. 勤务中，士兵有戴钢盔或不戴钢盔的自由。

9. 在警备方面，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前线部队和后方部队的交换。

(2) 行军和宿营

01. 不派没治愈的病人参加讨伐。

02. 不殴打掉队的；让掉队者骑马。

3. 要求尽量在下雨天不搞夜间强行军。

04. 要使士兵轻装，用马搬运弹药、家具。

5. 士兵不带军官的私物，不携带口粮。

06. 要求行军一小时内有十五分钟休息时间；马多时，要给更长的休息时间。

07. 要早一点搞宿营准备，尽可能早一些休息。

8. 行军中宿营时，要准予自由外出。

9. 要求用客车、客船输送士兵。

(3) 战斗

01. 在战斗中，不强迫士兵执行无理的命令。

2. 退却时，要确实做到收容所有的士兵。

3. 收容战死者时，要真正做到不马虎草率。

(4) 掠夺、暴行、杀伤、放火

01. 若士兵不愿意杀伤不抵抗的中国人，不要强迫士兵去做所谓的“试胆量”。

2. 严禁并制裁命令士兵进行掠夺、暴行、杀伤和放火者。

(依据陆军刑法：掠夺罪判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徒刑；强奸又杀伤罪，判七年以上徒刑，严重的判死刑；放火罪判死刑……)

(六) 有关伤病员的

01. 要求让伤病员早日入院。

2. 入院时，都乘救护车。

03. 不要区分上级军官与士兵；要给以关怀，不准马马虎虎地治疗。

4. 在工作时间外，也要不厌烦地、亲切地予以诊治。
5. 不要区分一、二、三等症，要给同样的待遇。
6. 在医院里，要求不点名、不敬礼、不打嘴巴、不用给军官端饭等。
7. 不要让病人吃代食品。
8. 要尽早地给病人送信、送工资。
9. 在不影响治疗的前提下，给病人想吃的食品。
10. 在彻底治愈前，不强迫出院。
11. 要求增加看护兵和警卫。
12. 对重病者，要派一名战友看护。
013. 要求士兵在病室、伙食方面，和军官一样。
014. 在工资以外，要给病人发病伤特别津贴。……
015. 要求把伤病员都送回国内。

七、作为下士官的要求

01. 不要强迫下士官储蓄。
2. 不要在士兵面前予以侮辱，要保住下士官的体面。
3. 不要把应由军官做的工作，叫下士官去做。
4. 功绩不能只由管功绩的人独断，也要采纳下士官的意见，然后做决定。
05. 要同等地对待下士官和预备役下士官的进级。
06. 要求设置意见箱，以便随时申诉意见。
07. 要求下士官能自由地集合，以便经常会餐、交换看法和申诉意见。

8. 勤务两年以上者，给以三个月休假，并发给休假津贴。

09. 要求和从前一样地发给奖金。

八、作为下级军官的要求

01. 不要强迫往国内寄工资；把工资发给本人。

2. 不要强迫购买公债。

03. 停止对下级军官的特别教育。

4. 不要在士兵面前给以侮辱，保住军官的体面。

5. 对下级军官的言行、书信，不要作过细的干涉。

06. 要求和——在前线与后方警备的——高级军官一样，每年前、后方对调一次。

07. 要求真正实行期满退伍。

8. 勤务两年以上者，即给以三个月休假，并发给休假津贴。

09. 不要依据名门的出身、毕业学校的不同，与高级军官个人的感情和利害，而给予不公平的苦、乐、安、危的职务。

010. 对现役、特别志愿、干部候补生以及一年志愿军官，要同样地进级。

11. 功绩，不能由中队长以上的军官独断，也要采纳下级军官的意见，然后做决定。

九、作为军队职工的要求

01. 要求工资不少于百元。

02. 要求公家供给衣服。

3. 带妻的，要给免费的住宅；不带妻的，要发分居津贴。

4. 伤病者都给住院，予以亲切、周到的待遇。

5. 对于应征者的家属，不收煤气、电灯费，不强迫储蓄、征收献金。

6. 要多给遗属抚养费。

07. 停止强迫征集军队职工；由其本人自由决定工作或辞职。

十、作为在乡军人的要求

1. 搞防空演习、灯火管制、选举运动等应予报酬。

02. 不要限制在乡军人的旅行；准许自由迁居。

03. 停止检阅点名的预习。

04. 检阅点名时，允许自由着装。

05. 检阅点名时，要发旅费和日工资。

06. 要简化检阅点名，不要搞成凶残的。

7. 不要搞在乡军人的检阅、查阅和假想动员。

08. 在附近召集教育期间，要保证留在家中的家属生活。

9. 由国库统一支付在乡军人会会费，不能由个人出。

10. 不要强迫在乡军人储蓄。

十一、有关兵役制度和入营的

(1) 征兵

01. 禁止军官、宪兵的横蛮言论、行为。

02. 检查时，准许自由地决定着装、发式。

03. 征兵时，不检查生殖器部分。

04. 去检查处时，要发往返旅费和日工资。

(2) 入营

1. 要求停止入营前教育。

02. 入营时，准许自由着装。

3. 陪送的人，能自由进出班住处。
4. 要发给陪送人的往返旅费和日工资。
05. 因入营使家属生活困难的，要准许不入营。
06. 一家只征一人入营。

(3) 召集

01. 临时召集，以及补充人员召集时，至迟要在十天以前通知本人。
02. 停止召集归回兵。

(4) 归回和除队

01. 不要派已确定归还的士兵，去参加所谓的最后讨伐。
02. 在营年限要和从前一样，为两年，真正实行期满就予退伍。
3. 一齐来的，要一齐归国。
4. 准许自由地把归回日期通知家属。
5. 停止在退伍的同时，搞什么即日召集。
6. 要求不用升任伍长的办法来拖延退伍。
7. 停搞：长期延期退伍，而到快够领养老金时，却叫退伍的勾当。
8. 准许自由地寄土产回国，不检查，不纳关税。
09. 家属生活困难者，允许早日退伍。
10. 在现地不留三等病患者，要及时送回国内治疗。

十二、有关职业和生活保证的

01. 军队中的工作人员、职工等，只要不是现役兵、召集兵，政府就要发给他们到部队前的整个工资，发给其他的独立经营者和农民到部队前的全部收入。

2. 凡休职而到部队者，由公司退给他们积蓄金、储蓄的付款。
3. 凡退出部队者，准许恢复其以前的职业。
04. 不能在部队里没为公司做事为理由，比一般人迟升级，少给奖金。
5. 要求保证受伤军人的终身职业和生活。

十三、有关出征士兵家属的

(1) 生活保证

01. 优先配给出征家属日用品（食品、棉布等）。
2. 要求公开揭发禁止出征家属领取恤兵金（恤兵品）的事情。
3. 要简化领取抚养老金的手续，公平地发放抚养老金。
04. 召集解除时，不停发抚助金，直发到本人有职业时为止。
5. 一家出征一人以上时，有一个人，就要发给一个人定额的抚助

金。

06. 出征家属有病时，要给以免费医疗，发给生活费，直到治愈为止。

(2) 给遗属的赐金

01. 要多发战死者的一次性抚恤金，早日用现金支付其公债券。

02. 给士兵遗属以军官遗属同样的赐金和待遇。

3. 要支付遗属患病时诊断、住院的一切费用。

04. 要求增加遗属抚养费。

5. 遗属中子女的教育费，要一直发至成年。

(3) 减轻各种负担，家属现地慰问

1. 停止国防献金和义务执勤服务。

02. 要求免收出征者家属的电费、自来水费等，准以半费乘车、坐船。

03. 要求免交水利协作费、附加税、按户数比例等摊派的公共费用。

4. 家属现地慰问的一切费用，由国家负担。

(4) 有关减少地租、征收土地和其他的

01. 出征者家属要求时，就分给肥料。

02. 要求减少地租。

03. 不准强迫收购出征者家属的米、麦、豆等谷物。

04. 停止征收出征者家属的土地。

05. 停止强迫出征者家属搬家。

06. 停止征用出征者家属的船、汽车、马、干草等。

十四、对国库的要求

(1) 以上各项要求，是为了改善士兵、下士官、下级军官以及出征者家属、遗属的生活，政府增加预算时，这些负担，不应摊在一般劳动群众身上，应由战争中的暴发户——大资本家——担当。

* * *

怎样做，才能实现以上各项要求呢？方法是：

看了这份要求书，不会不认为，这些要求若获得满足，那士兵的生活，就会成为愉快的了。

若只认为这些要求是正确的，好的，但不要求上级答应，那末，是决不会变成现实的。托付他人——不管是谁——去做，那是没有希望的。另外，每个人自己不断地提出要求，反而会遭到上级的殴打、处罚，必然失败。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发动、团结尽多数的赞成者。

一、根据要求书，怎样增加赞成者呢？（怎样推广这些要求呢？）

(1) 首先，要把倾向《要求书》者，看成可以信赖的亲密的战友。

(2) 其次，参考这份要求书，选择现在自己部队里士兵最不满意的，而且下士官、下级军官也能赞成的事，作战友间的亲切的商谈。

(3) 把选择出来的要求，和一个又一个的战友商谈，把要求写在纸上交给战友，写在厕所及其他场所，使从分队到小队、中队有很多的广泛的赞成“要求”者。

(4) 对其他中队的战友们，可以利用电话、通信联络兵等；外出或作战时，各部队的很多士兵汇集时，可以商谈，这样就会出现更多的赞成者。

(5) 产生很多赞成者的地方，新兵、老兵的携手并肩，是最重要的。同时，对可以争取的下士官、小队长，也一定要尽力做工作。其次，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提出有关的要求比较合适。

(二) 提出要求的方法

(1) 向什么样的上级提出？

1. 容易体察士兵情绪的班长和小队长。
2. 分遣时，和士兵们同住一寝室的分遣队长。
3. 同年兵的预备役军官，后备役军官。

促使上述的上级向中队长、更高的军官请愿。

4. 根据要求的性质，直接向高级军官请愿，也是一个方法。

(2) 用什么样的方法提出呢？

1. 道理说不通时，由个人以及全体人员提出要求。

2. 利用讨伐中的集合时间，进行请愿。

3. 用电话来请愿。

4. 全体人员，以及大多数成员请愿。

5. 申诉意见的形式：是派两位代表去请愿。

(有规定，三人以上申诉意见的，要给处罚。)

6. 书面请愿。(赞成者都署名。)

7. 在士兵集中的地方，上级来时，大家一齐请愿。

8. 重要的是：第一，赞成者，不管在哪里，都要保护带头请愿的人，要努力使他们不受处罚。

其次，对不愿参加请愿的，也不要失望。要意志坚强地，多次反复地请愿。若这样做，就一定能成功。

以上讲的，不过是一种方法。这以外，当然还有一些好的方法。要多和朋友们商量，想出好的方法，大家齐心协力地向上级提出来。这样，要求就一定能办到。

作为证据：

一、昭和十四年（公元1939年）独立混成四旅团三中队，池田中队长以下，共32人被派遣，那里给养很坏，饭、纺织品比中队少。士兵们执勤很疲劳，但饭吃不饱，不满情绪激增，要求有较好的给养。大家几次反复向小队长请愿。小队长说：“即使断一根骨头，也要向中队长申诉意见。”各方面调查的结果，了解到是经理人在捣鬼。经理人受到严厉的训斥。从此，分遣队的给养，比过去好多了。

二、独立混成三旅团的一中队，饭不够定量，无论什么时候食器只盛到一半的饭。大家很不满。有一天，饭特别少，经全体士兵讨论，决定不吃饭。喊来少尉，大家大声叫嚷：“看这个！”平时老是板着脸孔的少尉，这时对士兵们一致行动的力量，感到恐惧，一句不满的话也没说，只说了个“嗯”字。接着，马上去经理人那里大吵。追问后，经理人作了坦白交待，在饭和公款上捣了鬼。以后，饭也多了，菜也好了。

三、在军官中，也有深入地仔细地观察士兵情绪的人。

在独立混成四旅团，就有这样的事。军官来巡视，询问：“饿不饿？”勤务员如实地回答：“不太饿。不发点心了吗？”这个军官微笑着说：“好！”了解情况后，回去很快向中队长反映了意见，从很远的地方调来了面包、点心，按摩室也有了。

此外，还可以举出若干例子。这样的事例，各个部队都曾发生过的。

这样，士兵形成一体，意志坚强地、勇敢地把正确的要求向上级军官提出来。开始实现这些要求，就能脱离现在的困难生活，过幸福明朗的日子了。^①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日本士兵要求书》非常重视，认为它对敌军工作走向成功，提供了钥匙，有划时期的政治意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3日，为此发表了题为《日本士兵的要求书和敌军工作》的社论：

敌军工作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极重要的工作，而最近的国际和

^① 见《反战士兵的故事》第305—331页。

日本国内形势以及华北敌军内部的情况，对于我们开展敌军工作是非常有利的。日本军部公开提出“长期战”口号，使疲于五年战争的敌军士兵更加疲惫，更加厌恶战争和增长反战的情绪，更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

同时，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观条件，现在也比过去有着显著的改进，这表现在：第一，自从党中央指出目前三大中心工作之一是敌军工作以来，前方和后方，对敌军工作的重要性已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已经开始认真地开展这部门工作。第二，“整风”帮助我们克服在敌军工作中一向存在着的歪风——特别是忽视对敌军调查研究的倾向，因而引导工作走向成功。第三，和反战团体大会同时召开的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提供了使敌军工作走向成功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代表十八个单位的日本士兵，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与通过的《日本士兵要求书》。

这个要求书提出了二百二十八个要求事项，涉及的范围很广，从要求改善伙食，严禁长官用私刑，到获得选举权；从保障家属的生活，到反对屠杀掠夺中国民众。这些要求中，百分之四十一是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百分之二十七是关于反对野蛮的军纪和战争的痛苦方面的。

到今天为止，在日本军队所发生的逃亡、自杀、反抗长官、自动投诚我军等事件之大部分，不是起因于士兵的政治自觉，而是自发性的行为。日本士兵的这种行为，都是起因于侵略战争中他们所受到的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日本士兵要求书》中所载的，是目前日本士兵最迫切的要求。这些要求乃是日本士兵时常公开或秘密地谈论着的；即使日军军官也不能借口是“八路军的宣传”而干脆置之不理的。过去当日本士兵为这些要求而集体行动起来时，也曾得到过某些成功。这说明了这些要求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士兵大会不仅决定了这些要求，而且接受了过去的经验，经过慎重的讨论，将实现要求的斗争方法也附在要求书上。这种斗争方法，是普遍的日本士兵们，以最少的牺牲就可以行得通的。具体提出了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斗争方法，是这个要求书的重大的贡献。过去我们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可是没有能够发动日本士兵起来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没有具体提出可能的斗争方法。

因此，《日本士兵要求书》对我们敌军工作，具有划时期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深入日本士兵内部，广泛地宣传这个《要求书》。然而，应该不把这个《要求书》变成教条，这只是给日本士兵的一本参考书，我们应该宣传并努力使日本士兵以此为参考，提出他们部队内部最迫切

而可能实现的要求，采取最适合于他们的处境的方法，发动他们起来进行斗争。而且，当一个要求实现时，不可就此满足，必须进一步发动他们为实现新的要求而斗争。

这些要求的大部分虽只是日本士兵最切身和初步的要求，没有包含直接反战的因素，但当士兵们要求“让士兵们吃顿饭”而团结起来向长官请愿时，这个行动本身便包含着深刻的反战和反军阀的性质了。因为那种行动就打破了日本军队的盲目服从的原则。不管要求成功或失败，日本士兵在行动中，将发现军队内部的不合理，野蛮和矛盾，将增强对长官的反抗和反感，将提高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将体会侵略战争与法西斯军队的实质而觉醒过来。

另一方面，因为这些要求只是日本士兵的初步的要求，所以，如果以为只要宣传这些东西就够了，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对敌宣传工作，虽然以要求书为主要的中心内容，但同时还必须积极启发日本士兵的阶级意识，暴露战争的本质，指出摆脱战争的道路，发动日本士兵起来进行反战斗争，还必须引证通俗的例子，运用士兵的语言，将这些反战宣传和日本士兵的初步要求联系起来，综合起来。

以上是《日本士兵要求书》的意义和运用的方法。要求书是由具有政治觉悟的日本士兵所制成的瓦解日本军队的一个新武器。我们必须和日本士兵们协同一致，灵活地运用这一武器，在对付我们共同敌人的政治攻势中，一定能够取得新的很大的成果。

第三章

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

第一节 大会的召开

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接着于8月20日—26日，在日本工农学校召开。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山东支部、觉醒联盟总部、太岳支部、太行支部、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山东支部等8个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的代表，因路途受阻，在大会结束后，才到延安。

各支部代表，都是被俘后经过教育，觉悟较高，反战贡献较大的同志。下面简单介绍几位代表的情况。

高山进：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1941年到晋西北直接展开敌军工作。在前方艰苦的环境下，表现了英勇顽强的反战斗士的品质。他健壮、活泼、亲切，脸上常带微笑，深为同志们所敬爱。

泷泽三郎：日本关西大学毕业，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曾在轮船公司工作。1939年被征入伍，充任瓦斯班班长。1940年百团大战时，来到八路军方面。他为人谦虚，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努力，能和工农出身的日本学员，打成一片。半年后，被

聘为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日文教员。他工作认真负责，循循善诱，深为同学们敬爱。

高木敏雄：觉醒联盟第一支部代表。西服店员出身。1939年1月来到八路军方面，同年“五一”劳动节时，声明加入八路军。他是最早自动投诚八路军的，也是觉醒联盟的创立者之一。他在前方三年多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战斗中度过的。百团大战时，他曾日夜不停地奔忙在炮火硝烟里，处理负伤的日本士兵，整理缴获的文件，和宣传队一起写标语，战后更进行慰问民众等工作。曾获得一等奖励。

大山光美：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在神戸三菱造船厂当职员。被征兵后，对部队生活深为失望。他通过干部候补生的考试后，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被升为炮兵少尉，指挥一个小队。但他对工作消极怠工，只盼望早日退伍。因他不肯虐待士兵而常被上级斥责。他到八路军后，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进步很快。对此次日本士兵代表大会的召开，他出了很大力量，被选为延安日本人自卫军大队长。

中小路静夫：少年时代就航行在被称为荒海的日本北海上，经得起风浪的颠簸，经常挨大人的拳头。他的兄弟被这场侵略战争吞食。他对日本法西斯军部怀有强烈仇恨。他被选为延安市的参议员。

出席大会的代表认真听取了杉本一夫、森健、松井敏夫等的报告，一致认为，几年来，反战组织已取得很大成绩；对日本军队的进一步地具体了解，是今后对日军工作的重要关键。代表们在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反战斗争的《工作方针书》，作为今后反战斗争的指导文件。

大会根据觉醒联盟总部的提议，决定华北的两大反战团体——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华北日

本人反战同盟联合会。接着，讨论通过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联合会纲领。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

一、这次日中战争，是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进行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牺牲日本士兵生命、威胁日本人民生活的战争。因此，我们反对这场战争，为使日本军从侵占的所有地区撤退而斗争。

二、由于军部的欺骗宣传，大部分日本士兵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军部的工具。因此，我们为日本士兵认清战争的本质，进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而斗争。

三、军部是压迫、牺牲日本人民，掠夺他国的野蛮的侵略者。现在的政府是军部独裁的战争政府。因此，我们要使日本士兵确信，必须打倒这些人民的敌人，为建立能带来和平、自由、幸福的人民政府而斗争。

四、以中日两国为首的朝鲜、台湾省以及南洋各国人民，都是受日本军部压迫的牺牲者。因此，我们要团结整个东亚的人民，进行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军部——的共同斗争，为建设真正的东亚和平而斗争。

五、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积极援助在华北的中国军的抗日战争。^①

同时，通过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章程：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章程

第一条 本会在同盟总会（在重庆）规约第七条的基础上，由在华北的反战同盟支部组织成立的，取名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

第二条 本会的目的，是实现华北联合会的纲领。

第三条 本会进行下列工作：

一、对各支部作指示，进行援助。

二、和各支部进行联系。

三、和各支部交流经验、教训。

四、宣传和教育（特别是研究上述的有关问题）。

第四条 本会的最高决议机关，是华北代表大会。

第五条 华北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各支部在支部大会上，以

^① 《反战士兵的故事》第252页。

成员五名以下者一名，十名以下者两名（依此类推）的比例，选出代表，派往大会。

第七条 本会的最高执行机关是执行委员会，它是仅次于大会的决议机关。执行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任命的会长一名，副会长三名，委员七名组成。执行委员会设在延安。

第九条 会长代表本会，负责有关本会的一切工作。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在会长因故不能工作时，代理会长。

第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在晋东南、晋察冀以及其他必要的地方，设立地方分会。地方分会贯彻执行委员会的基本指示，对该地区的支部进行联系和领导。因工作需要，以及在有关该地区的特殊问题上，有自主的执行权限。

.....

第二十一条 对于违反本会宗旨的同盟员或支部，可以依据大会，或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给予直至开除的处罚。

第二十二条 为了指导和帮助本会或地方分会的工作，可以聘请八路军、新四军指定的同志为顾问。

顾问可以参加一切集会，参与讨论，但没有决定权。

第二十三条 必须有华北代表大会的决议，才能变更本規約。^①

大会选举了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会长，杉本一夫；副会长，森健、松井敏夫；执行委员，高山进、茂田江纯、泷泽三郎、梅田照文。尚缺副会长一名，决定由晋察冀支部推选；缺执行委员三名，由冀南、冀中和山东的各支部推选。

大会还通过并发表了对日本同胞、日本士兵的《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第一次大会宣言》：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第一次大会宣言

日本同胞们！

日本士兵们！

现在我们愿意告诉诸位，我们作为一个与诸位相同的日本人、日本士兵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并愿以大会的名义向诸位谈谈日本战局的前途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希望诸位听一听。

^① 《反战士兵的故事》第253页—255页。

.....

诚然，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在中国、在太平洋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这是事实。但究竟这个胜利是怎么取得的呢？这不外乎：一是因为中国的武器不如日本，二是因为美国和英国对于日本发动的战争没有充分的准备。

但是，目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美国和英国缔结了军事同盟。另外，美国和英国，特别是美国已为战争进行了国家总动员。还有苏联以及南美各国及其人民，都为反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轴心国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日本实际上是在同世界上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以外的所有国家为敌而战斗着。这样，日本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这一形势，从下列事实中亦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即：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等反轴心国方面的总人口为15亿，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轴心国方面才只有2亿7000万。在土地面积上，反轴心国方面为1亿平方公里，而轴心国方面才仅仅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另外在左右战争胜负的武器生产力方面也相当悬殊，反轴心国方面的月产能力为飞机9600架、坦克8300辆，而轴心国方面飞机则为3900架、坦克3000辆。从以上列举的各种事实来分析，不论在人力上还是在资源、武器上，显然反轴心国方面居于压倒轴心国的优势（即：超过了3倍乃至20倍）。除此以外，由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侵占了该国领土，军队的士气易于涣散。与此同时被占领地区的居民对于侵略者又展开了彻底的反抗和斗争。

以前，由于上述这些反轴心国家方面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其巨大力量，所以德国才在欧洲取得了胜利，日本在东洋取得了胜利。但是，如今这些力量全都为打倒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而动员起来了。最近，联合国军已在法国的海岸登陆，成功地结成了第二战线，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一个正式地开辟大规模的第二战线已为期不远了。一旦结成这个战线，希特勒就要受到苏联红军和美英联合军的夹击，那时就是希特勒的末日。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就要被打倒。而且，这一局面的出现，可以估计不是本年内，就是来年初。

希特勒被打垮以后，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必将以其强大的武力全部集结于太平洋来打击日本。那时，不管日本如何顽强抵抗也不可能胜利。东条派的日本法西斯军部，也绝对逃脱不了希特勒的可耻下场。而且，这个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一旦这个日子来临，我们日本国民将陷于何等悲惨的境地，是难以想象的。

那么,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祖国和国民从这种毁灭性的命运中挽救出来呢?这里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打倒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军部,建立维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依靠这个政府立即停战,与美、英、中等国家缔结公正的讲和。唯有这样,才能摆脱现在的战争痛苦和愈来愈逼近的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逃出日本军部的控制而来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日本士兵们组成的反战团体的十几个代表,聚集于延安,自8月15日起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将以往分散于华北的各反战团体统一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联合会,决议以联合会的巨大力量,为促进日本军队内的士兵和日本人民的自觉而竭尽全力。

.....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①

1942年8月29日

8月29日,两个反战代表大会联合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到会讲话,热烈祝贺大会开得成功,衷心勉励日本反战同盟在以后的工作中,获得更大成绩。接着通过了《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衷心感谢八路军、新四军一贯对日本反战人士的真诚援助,决心和中国军民紧紧携手,早日打倒中日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军部。

会议中间,代表们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鲁迅艺术学院、化学工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印刷厂等单位,并与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举行了多次联欢会,给学员们以很大鼓舞。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胜利的庆功会、总结会、鼓劲会。它的召开,使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实现了组织领导上的统一,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斗争目标和任务。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标志着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即由1937年7月开始的

^① 《解放日报》1943年8月30日。

第一时期，进入了第二时期，即反战组织统一和反战运动活跃时期。

第二节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工作方针书》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是在起草委员会写出草稿的基础上，最后由冈野进仔细修改、定稿的，同年10月印刷发行到反战同盟各支部。它分六大部分，共四万多字。它对过去三年反战工作的成就和缺点作了总结，详述了反战同盟的任务，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下面是这个工作方针的主要内容。

《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

第一、总论

一、反战团体的成就和弱点。

为了完成这个重大任务，我们日本人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组织，其中的大部分，虽建立的时间不长，面临各种困难，但都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较多的成就。

第一，三年前，在华北，反战团体只不过一个觉醒联盟。今天，已发展到有八个反战团体支部。

第二，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从事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俘虏工作以及对民众的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果。这方面，晋东南的觉醒联盟、山东支部、晋察冀支部等，成绩比较显著。

第三，训练、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反战斗士。这方面，延安支部的成绩比较显著。

反战团体有以上几方面的成绩，但不能不看到，尚有若干弱点。主要是：

第一，还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反战团体的本质和任务。把反战团体和共产主义团体混同，使反战团体负起共产主义团体的任务。

第二，对日本军队进行具体的、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日军的实际情况、士兵的意识和要求，来确定工作方针和方法方面，做得还不充分。由此，减少了对日军工作的效果。

第三，有同一目的，又在同一军队里的华北各反战团体，相互间却没有紧密的联系，和统一的组织。

……因此，克服这些弱点，促进反战同盟的发展，进行正确、有效的活动，是我们今后的一个主要任务。……

……

二、日本军队的实际情况

最近的日本军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日军，和五年前不能相比了：军队内部普遍存在厌战气氛，士气不振，战斗力更加低下。这种情况，对我反战同盟的活动，是个极有利的条件。导致日本军队产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 战争持续了五年以上，部队普遍极度疲劳，而且失去了归国的希望。(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了退役归国的希望。即使回了国，通常会再次被征集来。因此，老兵的思想情况，一般都变得自暴自弃了。)

(二) 士兵的供应，恶劣了。食粮的质和量都降低了，每周两次、甚至更多次供应代用食品。被服等粗劣。慰问袋显著地减少，等等。

(三) 执行勤务，成为艰苦、危险的事儿。最近，在华北，不管日本兵力减少，仍旧频繁地进行讨伐；不管警备区域扩大，仍只用少数部队担任警备。而且，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的火焰，极其炽烈。因此，士兵的劳苦和危险，明显地增加了。

(四) 日本国内人民生活艰难，使士兵忧郁、悲观。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以来，国内物资的不足和统制，使人极难忍受。还有，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殆尽。这些事，尽管政府拼命吹嘘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在士兵家属来信中，真实情况还是反映了出来。这给士兵的心理以强烈的影响。

(五) 老兵对新兵的虐待厉害了。从上面所述的各种事情，使士兵中间的不满和厌战气氛增强了。对此，上级军官耍阴谋诡计，鼓励老兵殴打新兵(打嘴巴等)，使老兵和新兵之间发生争吵。用这个方法来阻碍全体士兵的团结。使他们的不满，不去对着上级军官，而是引导到老兵和新兵之间的冲突。这是最近老兵暴行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但是，上级军官的这种诡计和毒药，效力过了头，导致士兵们普遍地厌恶军队。

(六) 特别是战斗力的降低，部队素质的变差，现地教育一般化，是个突出的原因。以前身体被检查为丙种而淘汰的，现在却定为甲种和乙种而出征。还有在战地的军队里，二十岁左右，事前没有受过军事教育

的士兵，非常地多。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最近在日本军队里，厌战气氛高涨，军纪松弛，战斗力下降了。但我们不能把这种情况看得很严重。今天，士兵的大部分，依然相信军官和政府的宣传，认为这次日中战争是根据“世界一家”精神进行的圣战，不久，将由日本获胜而结束。士兵因厌战而发生少数自杀、逃亡事件。……军纪多少松弛了（特别是老兵），但还不到日军普遍腐败的地步。在战斗中，士兵的顽固性减少了，例如，拿俘虏数与日本军的死伤数比较来看，“七·七”事变以来，是在增加着。可是，必须记住，在今年五、六月份，在晋东南和山东的战斗中，上述的比例（死伤数定为一千时俘虏数）是分别为千分之四和千分之十四的低比率。可以看出，日军战斗力降低了，但我们不能对此评价过头。必须承认，最近日军进行的“扫荡战”还是相当猛烈的。

以上讲的，是日本军队今天的情况。根据这些，必须考虑我们对日军工作的内容和办法。我们必须认真防止：认为日本士兵的情绪十分低落，提出不合他们思想、要求的过高的口号、标语。……

三、反战同盟的本质和任务

反战同盟，不同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等，不把承认一定的革命政治纲领作为入盟的条件，也不是有广泛革命任务（例如，包括到日本国内活动等）的团体。同时，例如，也不同于士兵大会，那是以改善日军内部士兵生活为中心任务的团体。我们反战同盟，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促使日本军从中国撤退，作为中心任务，决心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正基于此，才组成同盟的。若把此话反过来说，反战同盟的对象，是在华北的日本士兵，同盟的第一个任务，是促进他们政治上觉悟，加速日本侵略军的崩溃。这是在广泛的反法西斯战线上，给予反战同盟的领域。

在这点上，是和八路军、新四军反对日本军的政治工作任务相同的。而且，因为八路军、新四军是在华北、华中与日本军作斗争的主体，反战同盟对日军的工作，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工作的一翼，应该把他们的方针、指示作为基础。在工作上，与敌工部保持密切联系，分担适合同盟做的工作，并且热忱地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政治工作。当然，因此就认为同盟在组织上是八路军、新四军敌工部的一部分，是不对的。同盟在组织上属于重庆的同盟总部，这是过去早就决定了的。

反战同盟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需要有洋溢着反战思想、有工作能力的斗士。训练、培养许多这样的战士，是反战同盟的第二个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教育这样的斗士，首先要求同盟员对战争有正确的理解，有贯彻正确反战方针的能力。但对同盟员的教育，不能以此为限，必须更进一步。进行教育，使同盟员能够理解革命的理论，参加日本的革命运动。只有这样的革命教育培养出来的斗士，才能奋不顾身地投入正确的反战斗争。

实行这样的教育，绝对需要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的建议和支援。当然，反战同盟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独自实行这种教育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谈的革命问题，是关于日本的革命；而且在建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负责教育工作的，主要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

.....

第二、宣传

如总论所述，同盟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在华日军士兵进行政治宣传，松弛他们的战斗意志，削弱战斗力，促使日本军队崩毁。所以说，对日本军队的宣传工作，是同盟的第一位的重要任务。

这个最重要的宣传工作，又是最困难的工作。因为受到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受日军灌注的反动教育的士兵，靠相对立的敌人进行喊话，使他们反省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反省自己走着政治道路，不用说，那是困难的。

但是，在这个客观的困难之外，我们宣传工作本身，存在着大的缺点，也是影响宣传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确定今后工作方针以前，首先必须认真检查这个缺点。

一、过去我们宣传工作中的缺点。

就我们所知，过去，觉醒联盟、反战同盟，以及其他所有的抗战团体，对日本军的宣传，确实到了巨大的规模。但至今尚未发生：因我们宣传，唤醒日本士兵政治觉悟，使其在日军内组织斗争，或集体向中国军队自动投降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宣传效果还不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的成绩不能抹杀。如“八路军不杀俘虏”的事，已被在华北的日本军队广泛地知道了。但这个，与其说是我们书面宣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八路军、新四军俘虏政策实施的结果。

过去，我们宣传的根本缺点，是没能十分符合宣传对象——日本军队——的实情、士兵的情绪和要求。

现在，日本军队士兵的政治觉悟很低。可是，以前，我们从必须使日本士兵觉醒，必须使之反战的愿望出发，来进行宣传。这与其说是根

据一般日本士兵的思想，还不如说是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或者说，我们的宣传没能为实现他们眼前的低要求而斗争。这是我们过去宣传效果不大的最大原因。

这以外，还有许多技术上的小缺点。这在最近不断有所表现……

二、今后宣传的基本方针

我们为了克服上述缺点，首先要精密地调查研究日本军队的实情，日本士兵的气氛和要求。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地发动原来的日本士兵。

为此，各支部需要设立日本军队研究会。在延安支部，这种“研究会”对改善我们的工作起了较大的作用，而且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政治、军事方面的大量材料。

今天，相信战争是正义的日本士兵，正在过着被重重压迫、紧紧束缚的军队生活，对物质、精神各方面，产生了很多不满。主要是因肉体的痛苦、怀乡心，引发了厌战气氛。我们正确地理解这种气氛，加以助长、激发他们的不满和厌战情绪，就是说，使他们朝着为改善目前生活而斗争的方向前进，必须是今后宣传的重点。促使日本士兵奋起进行这样的斗争，从现在日本军队的实际情况看，是完全可能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以前日本军队内发生的集体的反对上级军官，或士兵自杀、逃亡、自动投降，都是由于目前日军内部的矛盾、士兵的痛苦引起的。

日本军队内部士兵的斗争，即使是与反战没有直接关系的、为改善伙食和待遇的斗争，也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作为士兵，能够看见军队内的丑事、引导他们对上级军官发生反感，是他们政治上自觉、阶级上觉悟的第一步，是动摇对军规的神圣感的第一步。士兵为改善生活而斗争，是促使他们团结，深信自己力量的第一步。

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进行适合士兵思想、眼前日常问题的宣传。但是，认为宣传范围只限于此，是不对的。进行提高士兵政治觉悟的宣传，当然是必要的。这就是说，必须进行关于战争的本质、停止战争、打倒军部、树立人民政府等根本问题的宣传。唯这种宣传，从现在日本士兵的觉悟程度来看，只是教育性质的宣传，因而，不能作为中心来宣传，作为立即的行动来宣传。

反战同盟，在组织上，不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部所属的一个部门，但正如总论所述，同盟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政治工作的一翼，应该以它的方针、指示为基础。更具体地说，同盟宣传工作的政治方向，应该服从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基本方针，接受它的指导。具体的宣传品的制作，主要应由我们担任。关于宣传品的散发，

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主要应由八路军、新四军担任。

三、宣传的内容

依据上述的我们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我们在实际上应怎样进行宣传呢？

1. 鼓动士兵奋起，为改善生活而斗争。

对于士兵，必须促使他们为改善生活而斗争。关于这个当前最中心的宣传，我们必须灵活运用华北日本士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延安）议定的《士兵要求书》。

现在的日本士兵，有很多不满，但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向上级提出来。有时，不知向谁提出不满。《要求书》向士兵明白地指示了：怎样明确地理解这种不满；向谁提出要求；怎样较有效地提出要求。反过来说，这个《要求书》，为我们的宣传，提供了过去没有的武器，同时，使日本士兵清楚地看见了过去所不注意的事情。

首先，我们应该如何灵活运用这个《要求书》呢？第一，必须全面地宣传《要求书》的全文。这样，使他们知道士兵大会的存在和全部“要求”，能促使士兵来审察自己的周围。

其次，我们从《要求书》的全文中，摘取特别重要的要求（印着口号的），制成传单。当然，在传单里，也要说明士兵大会的目的、性质和斗争方法。这和《要求书》全文不同，比较容易散布，从而能做广泛的宣传。

第三，取出每个要求书中的有关要求，作为主题，进行煽动性的宣传。例如，拿“要求给我们吃饱饭”作主题，在这里，可以对照士兵给养的粗劣与上级军官的奢侈，说明粗劣的原因，正是由于上级军官的行为不正等。这时，必须根据直接工作对象的各部队的状况，或者，根据那个时期，最贴近士兵的实例，来进行煽动，使他们产生不满。就每个要求的顺序来说，首先应该提出来的，是士兵最痛切的要求，最直接的要求。

我们必须依据上述的三个方法，不断地动员群众。同时，不要把《要求书》看成死的，看成绝对不能有任何变通的。《要求书》对我们来说，只是个参考书，只是个工作指南。必须参考《要求书》，适应部队当时的具体情况，变换要求，或者，把最易见效果的要求，放在前面。若使日本士兵起来进行斗争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成功，是胜利的第一步。但在此场合，不能提出所有的要求。必须引导参加斗争的全体士兵，进一步努力，准备提出第二、第三个要求。

当然，这样的宣传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说是个开端。在这方面，比较恰当地说，我们还完全没有经验。今后，我们必须经常研究，丰富这个方法。

2. 强化厌战气氛

除了号召士兵斗争以外，过去进行的其他宣传，还必须继续。进一步加强士兵们都或多或少有着的厌战气氛，使他们士气低落，是加速日本军队衰弱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我们在继续进行这种宣传时，必须把下列各点作为重点。

甲、加强士兵怀念故乡的心情。

……

乙、煽动悲观气氛。

……

丙、加强“我生命贵重”的思想。

……

丁、八路军不杀俘虏。

……

3. 唤起政治上的觉悟。

这方面，对我们反战事业最终目的，有着根本意义。这要求我们的宣传不脱离士兵的实际情况。

甲、说明战争的本质。

……

……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拿士兵在国内和战地目睹耳闻的资本家的不正派，军部的横暴等等的具体事实，向他们作令人信服的说明。

乙、唤醒士兵的阶级意识。

……

丙、驳斥、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

……

丁、使他们知道反战同盟和日本人的生活情况。

……

4. 应注意的有关事项。

依据上述内容，参考我们过去的经验，在作实际宣传品时，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①宣传品的创作，必须持慎重的态度。

我们制作的一切宣传品，都关系到在最前线冒着危险散发它们的八

路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我们必须时刻铭记这一点，抱慎重再慎重的态度，来制作宣传品。在宣传品制成前，应该深入地讨论它的内容和写法；制成后，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做检查。决不能因一点疏忽而影响整个工作。

②不致引起士兵的反感。

我们曾经是日本士兵。必须返回到过去曾经有过的情绪，返回到士兵的心中，来制作宣传品。例如，在说明战争的非正义性时，不考虑士兵的心情，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对士兵呼喊：“快起来反对战争吧！”反过来说，肢解了与此有关的详尽的说明，就会引起士兵的反感。拿事实来进行说服，似乎不像是使士兵考虑自身那样的宣传，才是最巧妙的宣传。

③要依据正确的材料。

在不正确的、不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所作的宣传，多半是引发大错误的原因。我们已有根据谣言“美国飞机空袭东京”，就制作宣传品，结果成为欺骗性宣传的教训。

④避免无意义的宣传。

为了适应士兵的心情而做的宣传，若太过分了，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还有感想类的文章，除了少数好的，一般会变成空洞无物的宣传。

⑤使用容易懂的语言、文字。

似乎是日本文的不变化的文章，是拙劣的，同时，不断地玩弄美丽的词藻，也是不好的。应该使用所有士兵感到亲切的语言，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士兵的语言。文字方面，要避免难认的汉字。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难认汉字时，都应该注以假名，或者就写假名。

⑥适应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宣传。

有必要依据不同的季节，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敌方的战斗情况，依据宣传对象——日本军队——的状况来进行宣传。关于这样的形势宣传，士兵们有兴趣，喜欢看，那才会有效果。

⑦对一定的部队，作系统的宣传。

我们过去宣传工作的一个缺点，是宣传内容一般化。因为使用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书写的文字，来动员士兵看宣传品，是苍白无力的。今后，必须以对峙的日本具体部队为目标，不断地用心地系统地进行工作。为此，必须踏实地调查研究该部队的内部情况。在这方面，会有很多技术上的困难，但若如此做了，定会有大的效果。而且，在该部队转移时，要把全部情况报告给转移到的地区的支部，继续对其进行宣传，那是理想的。

⑧依据宣传品的内容，进行适当的署名。

今后，我们要适应宣传品的内容，从反战同盟、八路军、士兵大会，以及士兵个人等的名义中，选择签署能产生最好效果的名义来进行宣传。使用这些名义的标准，大体如下：签署八路军的，是作为敌人的立场出发的。因而，关于八路军的政策，边区的介绍等，要用八路军的名义。反战同盟，是从觉醒的日本人的立场出发，在唤起日本士兵政治上觉悟，宣传反战运动消息时，使用的名义。士兵大会，是代表士兵利益而斗争的，是最接近士兵的战友，对士兵来讲，是最亲切的。因为这个名义最有效果，一般的宣传，特别是煽动性的，应该用士兵大会的名义，或者士兵个人的名义，或者原某某部队士兵们的名义。（当然，使用个人姓名，必须经本人同意。）在华北没有的团体的名义，我们不能使用。在使用我们以外的团体的名义时，必须得到那个团体的许可。

⑨利用唱歌和图画。

现在某日本部队的士兵，公开地唱着我们创作的反战歌：“黑夜快过去，停止战争吧！”这是谁都知道的。这是反映士兵心声的歌儿。另外，要尽可能地运用图画和漫画。这方面，必须使日本人见了，不觉得可笑，不产生反感。画得过火，使人生厌，是很不好的。

四、宣传的种类，它的具体方法。

以上所讲的，是适用于所有宣传品的一般的方针、一般的注意事项。我们必须进而一个一个叙述具体的宣传方法。

1. 传单。

……

在制作传单时，应注意下述各点。

第一，为了使士兵们阅读时，如同亲自耳闻目睹一样，传单就不能太长。标题要有吸引力。尽可能加些漫画等。（这是重要的，绝对正确的。因为士兵不能随便读这些东西。特别是最近，日军加强了思想方面的监视。大的，长的传单，更不便士兵秘密阅读。最好是一张小纸片，便于士兵一边持枪行军，一边阅读。为此，原则上，每张传单不得超过五百字。）

第二，不要在一张传单里，写很多的事。而且，必须使读者能透彻地理解其中主要的事情，使他们产生同样的感情。

第三，停止粗制滥造。今后，即使种类少一些，也要写得非常好。大量地发行这些高质量的传单，就是个大成绩。

2. 报纸。

我们的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以日军士兵为直接对象的、机关报性质的报纸。另一种是宣传性的报纸，主要发行于与日军接触频繁的前线。属于这类的，有《漫画报》等。机关报性质的报纸，主要以八路军内的原日本士兵为对象外，在可能的场合，从编辑直到散发，都不能忘记它的对象是日军士兵。

① 编辑时应注意的：

(1) 报纸必须登载广泛的、多种多样的内容。

(2) 需要很多人向报社写通讯、寄稿。所有的同盟员，都应是通讯员、撰稿人，都应大力支持报纸。只有依靠很多人的支持和创造性，报纸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得到发展。

(3) 新闻和时事解说，必须是有权威的。绝对不许说谎，还要考虑报纸从开始发行，最后到士兵手中的时间，对有时间性的报道，应该经过选择。

(4) 我们的报纸，不能搞成大的。因此，在报道方面，应多登些士兵感到亲近的东西。

(5) 报纸要尽可能有照片、漫画、插图，还要尽可能地搞些娱乐性的报道。

② 散发时应注意的事项。

……

3. 标语口号。

……

……标语的说明，要清楚，使士兵有十分亲近的感受。

① 过去的缺点。

(1) “打倒军阀”、“停止战争”等高要求的口号多了。

(2) 有的标语不作说明，就不易理解。如说“日本士兵不是敌人”，为什么不是敌人，不易理解。(意为：日本军部、帝国主义是敌人。)

(3) 有使士兵产生反感的。有的士兵说，尽叫“把子弹往天空打”，可是自己正在搞袭击，这怎么解释呢？

② 在墙上书写时，应注意的事项。

(1) 不要把对中国民众写的口号，换成对日军士兵写的口号。有把八路军宣传民众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换写成“停止战争吧”，效果很不好。

(2) 不要写在老百姓家的墙壁上。若写了，这家的房子，就会被日军烧毁。

(3) 标语的内容，应选择写在相应的地方。例如，在坡道途中的岩石上，写反映行军苦难的标语等。请中国同志写时，不要写错字……

(4) 要写美术字。简略字和太怪样的美术字，不要写。

4. 在战斗中对日本士兵的喊话。

根据过去的经验，口号式的喊话，在战斗中，是很少见效的。

对峙的场合，若进行喊话，日本士兵从好奇心出发：在讲什么啊？！他们只是听听而已。我们一讲完，他们就一齐集中射击，投掷毒气弹。没有大的政治效果。即使在完全被包围时，我们进行喊话后，也没发生过日本士兵投降的事情。在日本军即使快要被打败，但多少还有些战斗力时，或大部队遭我八路军、新四军分割时，往往还做最后的抵抗，或用手榴弹把自己炸死。当然，对被追击中的、孤立的一、两个士兵，进行喊话，是有效的。究其原因，第一，从日本士兵来说，不相信敌方——八路军——的喊话。第二，是受集团的束缚，不能采取单独的行动。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并使八路军各部队的口号，更加切中要害。喊话开始的时间，要放在日本军战败的、最后决定性的瞬间。

使用什么样的口号，才合适呢？第一，强调保证士兵生命的安全。第二，使他们停止战争行为，指出为此需采取的行动。为使日本士兵容易听懂，要选择中国人容易发音的口号。

照上述那样做了，喊话就会有政治效果。而且，在军事方面，会产生有利的结果。有这样的实例：有次战斗，我们唱日本歌、喊口号时，日军暂停了射击，日本士兵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动摇，使八路军及时展开队伍，发动攻击。在为此目的搞喊话时，应在军事方面领导人的指挥下进行。

在火线进行喊话时，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 ① 千万要隐蔽好身体。
- ② 不要许多人乱喊话，使声音混杂不清。要求有组织的齐声喊话，或一个人不断地喊话。
- ③ 喊话时，要日本士兵不开炮。
- ④ 不要在我方重要阵地处进行喊话。
- ⑤ 进行奇袭时，或妨害别的军事行动时，不要喊话。
- ⑥ 日本士兵若响应喊话，出来对话时，绝对不准开枪。

和喊话有联系的，是反战歌的问题。在战斗时，还没有过因我们唱反战歌，使日本士兵受感动的。似乎只使被俘的日本士兵得到一些好感。

因此，今后，不必重视反战歌。

5. 联欢。

联欢，是减少日本士兵对八路军的敌视和民族偏见，削弱其战斗意志，促使日本军队崩坏的开端。尤其是，若能进一步同对方签订某种协定，就能给八路军的战斗，以很大的便利。从现在的日本士兵的思想水平来看，联欢是接近他们，对他们进行初步宣传的最好方法。特别是最近，孤立的小据点多了，这对联欢很有利。我们要比过去更加重视联欢，进一步多多地研究、进行联欢。

联欢，若对离开本部队的孤立的分遣队等进行，是有效的。另外，对孤立的小车站进行联欢，也是可能的。

我们考虑，作为联欢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 送物、慰问袋。

.....

把写有“打倒日本军部”等宣传品放入里面，是绝不允许的，这是违反联欢目的的。

(2) 通信。

慰问时候，先从通信开始。

(3) 有某种程度的亲近后，可以考虑送有趣味的报纸、小册子等定期发行刊物。选择内容时的注意事项，同前述一样。

(4) 夜间，接近据点、哨兵时，可以大声讲话，或者唱歌。……

这种联欢，若由我们来搞，比较容易实现。若我们方面保证不开枪，厌烦勤务的日本步哨，是可能竖耳细听的。将来，应把此事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所有同盟员，应持积极创造性态度，来发展这一工作。

6. 对战死者的处理。

对被遗弃的日军战死者的尸体，我们作为同胞，应和八路军一起，把他们妥善埋葬好。只要战况允许，就要给他们建立墓标。重要的是要在墓标上面，写上感伤的或厌战气氛的碑铭（当然，太长的和过分的宣传，都是不好的）。若能举行葬仪、慰灵祭等，就更好。若有战死者的战友，就请他作丧仪的主持人。并且，要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死者所属的部队，或国内的家属。这种信和八路军写的信，应由战死者的战友来写。若我们和八路军不可能埋葬死者时，应把战死者送交日本军，或者把战死者的所在地告诉日军，叫他们来领走。在告诉时，我们必须强调，对来收尸的日军，一定不予妨害（在建立墓标时，要以八路军或抗日政府的名义，向中国老百姓发出公告：不准随手弄坏墓标。这方面有使日本

士兵好感的实例。从宣传方面看，这是最实际的宣传)。

另外，不凌辱战死者，不取战死者的物品。必须使八路军战士、中国民众做到：即使需要拿时，无论如何不能扒死者衣服，使之一丝不挂。

五、对中国民众、八路军指战员的宣传。

我们搞宣传时，实际上，必须依靠经常和日军接触的八路军指战员、中国民众的援助，特别是前线的指战员，和游击区民众的援助。实际上，散发传单，通信时的中间人，几乎都是他们。因而，要使他们完全理解：敌军工作的重要性，首先是我们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和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这个工作，在最前线，在游击区等地，更为重要。

宣传的内容和方法：

1. 对游击区的民众（包括指战员）进行的：

与前线部队一起行动，协助八路军，对各部队所辖地区的民众进行演说。这时，演说时间，一般是较短的，必须有效地使用这点时间。演说内容，是用事例说明，我们在实际上是和中国民众共同斗争的，使他们对我们反战同盟员有清楚的认识；在鼓舞他们抗日斗志的同时，表明我们的立场，说明对敌工作的意义。

2. 对一般根据地内的民众、指战员进行的：

尽可能地参加民众、士兵的会见、集会。还要利用报纸介绍我们反战运动的状况、我们的生活等。即使仅向他们说明有日本人反战团体这件事，就有很大的意义。

3. 演戏和其他

在适当的机会，公演有反战意义的戏剧等。但这应考虑演出人员的相互关系，要使他们巧妙地配合起来。戏剧以外，舞蹈、唱歌等，都是好的。它们的特点，是靠手、口就可以演出。若情况许可，可以考虑组织宣传队（或参加八路军的宣传队），向民众进行宣传。

六、调查和研究。

我们的宣传是正义的，是真理。我们的敌人——日本军部——的宣传，是不正义的，骗人的。因此，我们的敌人，只得依靠强大的宣传机构和第一流的宣传手段，长时期地颠倒是非，把非正义说成正义，把假的说成真的。

对此，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的宣传内容正确，尽可能地改善宣传的方法和技术。

……

我们要一丝不苟地检查已经制成的宣传品；虚心地接受外界的批评

意见。特别是新来的日本士兵的不客气的直率的意见,对我们有很多、很大的帮助。

此外,要和八路军敌工部的同志合作,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我们过去的宣传效果。我们期望宣传工作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同盟员的教育

教育的重要种类

有效地完成上述反战斗争的担子,完全落到同盟员和同盟干部的双肩上了。反战同盟员觉悟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同盟的力量,决定着反战斗争的成败。因此,对同盟员的教育、训练,必须成为同盟的一个中心任务。同盟的创建时间还比较短,其成员是由过去受日军反动精神熏陶的士兵构成的,因此,对同盟员的教育、训练,就显得特别重要。一言蔽之,同盟的将来,决定于同盟的教育、训练是否成功。

我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正确认识了内部教育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在比较短的时期里,获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在延安创立了日本工农学校,这个学校大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工作还有一定的弱点,有理论和实际脱离的倾向。即前线的支部,同盟员埋头于日常的实际工作,在学习理论上,有抓不住可能利用的空隙、机会的倾向。与此相反,在后方支部,埋头于理论学习,有脱离实际工作的倾向。我们要防止上述两种倾向,必须对前线的支部,强调学习理论;对后方的支部,强调从实际工作中学习。

……

可以考虑,在有多种困难的前线,把初级教育作为重点;在有各种有利条件的后方,把高级教育作为重点。

……

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在前线办短期的讲习班,办日本工农学校的分校等。……

从教育内容方面来看,可分这样三种:第一,是政治理论的教育;第二,是思想意识的锻炼;第三,是工作能力的培养。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养成反战的实际工作能力。

……今天,同盟干部的主要弱点是理论水平低,所以,尤其要把重心放在理论学习上。

第四,对新来者的政策

一、在生活上多予照顾。

(1) 关于感情的接近。

……

对于他们，从感情方面接近，是最重要的。若一开始，就向他们进行露骨的反战宣传，反而常常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

那末，这个工作怎样做呢？

……

幸而，我们和他们同是日本人，又经历过同样的境遇，因此是最适于接近他们的。因此，一切同盟员，必须在工作、学习中，有效地利用空暇接近他们，从各方面努力，给孤独、失望、悲叹中的他们以光明和希望。从感情上接近新来者，首要条件，是亲近他们。

可是我们常常犯错误。例如模仿中国同志远离日本人，或以粗鲁的言语、行动，引起他们的反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进步。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接近新来者的中国人的态度。有不少这样的实例：由于是“敌人”的中国人（敌工人员、勤务员、民众）对日本俘虏十分地亲切，促成了他们的觉醒。当然，也有相反的实例。因此接近他们的中国人，必须理解对待新来者的政策。

(2) 关于物质方面的。

物质问题，是新来者所极其关心的。……

在物质问题上，比较容易觉察他们的情绪。不要谈论、保证难以实现的事情。相反，在不声张的情况下，准备给予他们喜爱的东西，使他们皆大欢喜，不是更好吗？新来者喜爱而推荐的，是关于伙食方面的；为了照顾尚不习惯的新来者，可以从八路军处领取材料，由同盟员动手，做成日本式的饭菜。

(3) 关于卫生方面的。

这个问题，是个和一般物质问题关联的，对新来者相当重要的问题。

……

我们更要帮助在最前线送入医院的新来者，搞好卫生。新来者入院后，病情、伤势严重时，侍候他们的同盟员，态度要更加亲切。（有时，甚至应做帮助大小便及其处理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能使他们感激，开始从政治上觉醒、进步。这在过去已是常有的事情。

(4) 关于娱乐、运动方面的。

娱乐和运动，对减轻新来者的不安和想家，增加和我们的亲近方面，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

棒球，是新来者喜爱的运动，也是最好的体育活动。因此，凡有同盟组织的地方，必须经常准备好棒球、棒等器材。此外，通过游戏、运动（围棋、象棋、麻将、日本式纸牌等），是接近他们的好办法。但是同盟员们，决不能在娱乐、运动中，感情冲动，引起新来者的反感。相反地，也不能只考虑所谓“感情上的接近”，而忽视对他们的初步的政治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5）生活上的规则。

我们在同盟组织里，过着一定的有规则的生活。当新来者不能自动地遵守同盟的生活规则时，要避免强制他们执行我们的生活规则。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他们自然地习惯我们的生活规则。

当然，放任新来者的生活，也是不对的。例如，在他们有意或无意对老百姓、八路军有越轨行动时就要诉之于道德，批评这种缺点、错误。有的新来者，因想探望家乡而出走，又归来时，我们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同时，要诚恳地指出逃亡的不利和不对。

二、教育

（1）对返回者的教育。

对不立即返回日军的新来者的教育，首先必须使他们理解我们的立场。要努力使他们懂得：我们决不是“非国民”，和他们一样是日本人，只是为着日本和日本国民的幸福，才投身于反战运动的。若他们能稍稍理解我们的立场，以后，我们的讲话就会进入他们的耳膜。

对在两、三天内就要回归日军的新来者，我们不能进行较多的教育。我们要对他们抱尽可能亲切的态度。不能期望他们有感谢八路军、感谢在八路军内的日本人、理解八路军俘虏政策以外的表示。

对停留两、三天以上返回日本军者，必须向他们介绍八路军，特别是其俘虏政策的诚意，介绍这次日中战争双方的谁是谁非，介绍反战同盟等，使他们对此有常识程度的了解。这时，必须考虑在他们中间，有相当的人对我们是敌视的，因此，不能用强制教育的方法，不要把日本和日本军说成非常地反动和腐败。

在终于离开八路军时，要满足他们的希望，给他们衣服、日用品，使他们清洁身体。若能给予缴获来的、不包括武器在内的原来的携带品，是为他们本身安全所需的适当的方法。

（2）对留下来者的教育。

因为停留日子长了，或因战斗状况和地理关系，不能返回日本军，仍

然留在八路军里的新来者，即使是自己逃离日军而被八路军拘留的，最初也有返回日本的欲望。因此，他们想逃跑，或者没有定居下来的打算，更不会有留下来学习、工作的想法。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们断绝立即归返日本的念头，决心留在八路军内，和我们一起，直到战争结束。只要有了这个决心，他们就会急速地接近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开展教育活动。

开始时，对他们教育的中心，是使他们大体上了解反战同盟的目的。

此时，有必要尽可能地（非强制地）使新来者也旁听一般同盟员的学科，派担任辅导专门学科的同盟员，帮助他们。在此时期，最容易接近他们的，是从同一部队来的同盟员和同乡。同时，一般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日本国内的实情，以及不夸张的正确的时事问题有兴趣，所以，我们要向他们讲述这些问题。

……

第五、对华北抗日军的援助

……

一、对八路军敌军工作的援助

……

(1) 制作对日本军的宣传品。

在所配属的部、科的直接指示下，参与八路军发行的各种宣传品的制作。……受委托制作宣传品时，其内容，要和中国同志好好讨论；文章应由同盟员来写。这是适当的分工。

在发现内容有错误时，当然应该认真地检查，提出意见。即使是中国同志制作的宣传品，也应该认真地检查，特别是可能产生的言语方面的错误。对宣传品，我们应考虑：日本士兵能不能理解；与反战同盟的宣传方针符合不符合（别的内容，参照“宣传”部分）。

(2) 整理日本文献。

这里，重要的，是整理从日军缴获的军事文件、报纸、杂志，日本士兵和在华日本侨民的信件、日记等。

……盟员必须记住，从小张纸片的草写文字中，很可能发现军事上极重要的情报。

我们在整理文献时，要多多发现为我们宣传可利用的材料。我们应该尽可能活用这些材料。必须把其中的重要材料，经负责人同意后，送到后方去（即使是复写的，也是好的）。

(3) 对部队的教育工作。

要对八路军敌军工作部人员以及士兵，进行简单的日语会话、口号和反战歌等的教育。

1. 对敌军工作训练班的教育。

这方面，主要的，是在师团里，教育部队的中、下级干部。时间，是从一周到最长的一个月。这时，必须根据上级指示的教育内容（也充分地包含了同盟的意见），部队领导人决定的时间，制定相应的教育计划。这时，教育方法可依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教育内容，没有很特殊的情况，不能自己一个人任意进行变更。

教育时，必须十分耐心、细心和亲切。应该注意：喊话时日本人是否能听懂。……

2. 部队一般士兵的教育。

这种教育，多数是由训练班结业的人担任。当同盟员出发到该部队时，其主要任务是矫正发音的错误，不自然的喊话，唱歌等。（有时，也进行初步的教育。）这种教育的时间，多数是不固定的。主要是利用早饭前、晚饭后的时间。

（4）战斗中的工作。

1. 俘虏政策。

刚被八路军俘获的日本士兵的处理，是既重要，又困难的。这时，日本士兵一般是兴奋的，或恐怖的，或绝望的，或心里极不平静的。这时，作为日本人的我们，若用易于理解的言语、行动去接近他们，就能使他们安定下来；这非常有利于将来对他们的处理。

一般情况下，作为俘虏，在战斗部队停留的时间，是两至三天。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再三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的出身、思想、性格等，根据这些提供参考材料，一并报告给领导人，决定对他们的处置。

……

培养新干部时，一定要认识其所长，大胆地提拔。但在提拔群众中没有威信和饶舌的人时，必须慎重考虑。

第六，关于组织诸问题

在这里，提出反战同盟的干部标准。

第一，为实行同盟的纲领积极工作的；

第二，遵守日常纪律，言行是群众的模范，始终努力工作，积极学习理论的；

第三，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这是原则的标准。为了培养干部，必须具体地、经常地深入观察同盟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上表现出来的优点和缺点。不要根据耳闻目睹的一时的表现来判断好坏，不要把一个事实片面地看作全体，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

这样，若能掌握个性、能力、将来的发展可能性等，就能相应地分配适当的工作。要使他们担任重要的工作，鼓励他们努力提高工作能力。最初，使他们做轻微的工作时，他们即使有一点点成绩，也要给予表扬，以提高他对工作的兴趣和积极性。利用个人的小结，进行奖励，也是一个方法。

此外，要求老同志对新干部，在工作和学习上，给予亲切的、耐心的、有力的指教。

……

华北日本人民反战团体代表大会

1942年8月24日^①

第三节 对日本侨民工作的加强

在两个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设置侨民工作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设置侨民工作委员会的决议

我同盟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日本士兵。但是，为了帮助这一工作，削弱华北日本军部的统治，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日本侨民，讲求适当对策，其理由如下：

现在，仅华北的日本侨民已达477,000人（根据日本发表的数字）。这是个巨大的数字。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曾抱着一攫千金的美梦来到华北的，但如今这一美梦业已破灭，过着悲惨、贫穷、不安和毫无希望的生活。而且他们对在华北投资的日本大资本家以及与此相勾结的高级将校们的“一攫千金”和横暴，抱有反感和不满。因此，依靠我们的正确宣传，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他们为争取改善生活以及反对大资本家和军部的斗争而奋起。

^① 参见《反战士兵的故事》第256—302页。

同时，这些人的阶级出身与一般士兵相同，另外在职业上、社会上与士兵有着密切关系并具有经常与士兵接近的机会。所以，可以通过他们接近士兵、对士兵进行宣传。

根据以上理由可以明确，我同盟必须积极开展对侨民的工作。但是，在这一工作上，也存在下列严重困难和问题。即：

一、侨民的大部分与士兵不同，不是被迫来华，而是想从日本的军部和资本家的侵略中获取一部分利益，自动来华的。所以，当战争结束，日本军队被赶出华北时，他们将立刻失掉生活的依靠。因此，要使他们接受反战的宣传，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有这样的困难，也要唤醒他们政治上的自觉，这对同盟来说无疑是个新的问题。

二、日本士兵是在战线上与我们直接对峙，而侨民的大部分，则生活在远离战线的后方城市。因此，对他们的宣传方法，在我们来说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此，必须想尽办法来解决。

上述的困难和问题，则成为我们的侨民对策的中心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对侨民最近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实际情况知道的却很少，而且也很难弄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因此，本华北大会决议在联合会本部和各支部设置侨民对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各方面的资料，加以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协议定出我们的正确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指导对侨民的实际工作。这些工作，都必须尽速开展起来。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

1942年8月29日^①

在华北联合会成立后，反战同盟各组织，根据上述决议，加强了对日本侨民的工作，各支部都设立了日本侨民工作委员会。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国内兵源、物资日益拮据，日本军部在加紧对中国占领区大肆掠夺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日本侨民。

他们强迫日本侨民参加各种翼赞会，不断征集侨民入伍，进行各种各样的强迫捐献等等。这使企图来华发财的侨民的美梦，彻底破产，对军部、财阀的不满、反抗，日益加剧。

^① 《解放日报》1942年8月30日。

日本侨民的不满、反抗，集中反映在强迫应征服役上。1943年底，上海日本侨民被征入伍后，不久即去南洋作战。船出吴淞口时，船上就发生了几起新兵集体自杀事件。在青岛，1937年日本侨民中，有不少男子从事工业，但多次征兵后，到1944年初，青岛已很难看到非军人的日本男子。青岛日本人经营的五福布厂，原有日本男子几十人，到1944年下半年，只剩下一个残疾者。青岛银丁百货商店日本人白石宝善，共有三个儿子，大儿、二儿先后被征入伍、战死。1944年初，日方征兵机构又要他三儿子去当兵。他将三儿子手骨打断，企图躲过兵役。但三儿子最后还是被抓去，并且不知下落。白石宝善遭到重大打击，自杀身亡。

1944年，日本军部准备在华北征集9万日本男子入伍。消息传开后，在华北的日本人大为惊恐，青年男子自杀事件不断发生。为此，日本华北派遣军报道部长竹田说：那是别有用心者的谣传，目的是扰乱人心。但不久，日本警察等开始日夜搜捕日本男子，强制入伍。这使很多日本人公开咒骂日本军部的卑鄙、可耻。

在华日本侨民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开始领教了日本军部的凶残卑劣，自发开展反战活动。这也说明中国军民、日本人反战同盟，教育、团结、争取日本侨民走入反战行列的时机，已经来临。

对日本侨民，日本反战同盟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大量的宣传品送到侨民手中，使他们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日本侨民的优待政策，号召他们认清形势，在当地组织反战活动，或投奔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国人民军队斗争的胜利，日人反战组织的宣传，逐步扩展到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侨民开办的较大的工矿企业。1945年上半年，同盟各支部的宣传，已深入到北平、天津、保定、武汉、青岛、济南、徐州、南通、苏

州、扬州附近的日侨中间。使日侨们知道：日本侵略战争必将失败；中日人民间，不是仇敌；八路军、新四军不会杀害日侨等。

东台一日侨说：“战争结束，日本一定失败。”苏中地区一日侨，看到反战传单后，非常赞同，他对附近的中国人讲：“我们间没有冤仇，将来日本失败时，一定要请各位多多帮忙。”

山东日侨古野夫被俘后，讲了自己来华情况。他原是想到中国来发财的，但开店、办工厂，都受日军长官和日本大资本家排挤，破产后转开了妓院。古野夫经教育后，进步很快，释放时，他说在被俘中丢了一块挂表，八路军补发给他500元钱。古野夫回去后，托人捎来信，表示感谢，并说他仍开妓院，向附近日侨和去妓院的日军士兵进行反战宣传，劝他们不要为日本军部、财阀卖命。后来古野夫被日本宪兵逮捕、枪杀。

在反战同盟宣传下，在现实生活教育下，有的日侨，设法来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反战同盟。有更多的日侨，协助八路军、新四军，购得了大量的医药用品，以及枪支、弹药等等。

第四章

日本工农学校的发展

第一节 学校成了反战运动的基地

随着学习的进展，新来学员的增多，1943年，学校改编了学习组织。这方面，《解放日报》1944年9月曾作过报道：

“日本工农学校，根据学员的程度，有效学习的需要，把学员组织成A、B、C三个班。A班的大部学员是最近来到八路军的新同志，其中有今年4月，在日军里不堪虐待，逃出来，被八路军救命的同志。这个班的教师，由梅田照文担任（梅田照文，原名香川孝志，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时，来到八路军。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1941年6月到达延安，进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3年开始，一面作学员，继续学习，一面担任A班的教员。因他擅长日本柔道，边区政府的警卫部队，曾请他去教了一个月时间的柔道。战士们反映很好。后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负责阅读日本出版的报刊，以便掌握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回国后，一直在各有关单位负责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现并开设向阳社商店，对中国人给予优待。最近几年，他曾多次来华访问——作者注）。A班的教育内容，为初步社会主义理论，把解剖原始社会到资本主

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作为主要内容。这个学科，把学员们在日军和学校里学的有关的历史神话，彻底摧毁了。听了这些讲授，去年来到八路军的福田愤慨地说：‘日本国内教的历史，是哄小孩子的，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伪造出来的。’

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教师由能流畅地讲日本话的王学文担任。他教授方法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程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讲授，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历史，而且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由精通日本问题，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冈野进亲自执教。

除了上述学习内容，还有三个班的共同课：中国语、常识讲座、时事问题等。时事问题主要由冈野进讲授。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语言通俗。他联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讲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日本东条英机法西斯内阁的必然失败。联系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还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等内容，插入讲课中。并且教导学员们如何正确地观察、思考问题，如何正确地分析、处理问题。学员们对时事问题课有浓厚的兴趣。

除了上述正课，还有各种研究会。最近，学员们正在研究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告日本国民》这篇文章。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目前正在继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

所有课程，都举行讨论会。讨论不限于讲课内容，还要讨论怎样正确地把握、领会问题，如何应用于实际，尽力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此外，还经常举行读书会、座谈会等。

学员们深刻地认识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学习都很努力。每学期末，进行考试。学员们的成绩都不错。例如，1943年底的政治常识考试，平均成绩是93分。

.....

通过理论学习，学员们逐步纠正旧的思想意识，下定决心，站到日本人民解放斗争的前列。很多学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了政治、理论方面的飞跃进步。”

根据学习情况，学员可以从A班升到B班，从B班升到C班。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还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建立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相互学习语言，而且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维方法、感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当时，梅田照文就和王晓云（后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公使，已病逝。）结为一对亲密的朋友。节假日他们总是一起上街。有一次，他们进了饭馆，梅田照文对服务员说：“来碗羊肉。”结果服务员却端来一个大羊头，使他们惊骇不已。经王晓云说明，才换了。

1944年，新学期开始，由于相当数量的C班学员毕业上前线，学校把全体学员合并成一个班。这个班，以政治常识为主课，以时事问题、常识讲座为副课。

学校在1945年1月6日、7日两天，举行了评选学习模范大会。当选学习模范的条件：一是努力学习，二是把学到的理论，具体地贯彻于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的实践。全体学员经过全面、深入的评论，最后选出三位同学为学习模范。

一位是一组的春日，他原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在日军占领地区从事新民会的工作。通过新民会，他犯了掠夺中国财物的罪行。1942年被俘后，接受八路军和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教育，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汉文、

英文的翻译工作。他彻底清除了过去蔑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偏见，谦虚温和，学员们都尊重他。

另一位是二组的大坂。他是工人出身，原来小学都没有毕业。1943年到八路军方面后，提高了文化程度，努力学习理论。在农历正月他为做出美味的日本饭菜，彻夜操作，使同学们吃得非常满意，不断称赞他的手艺和诚心。

第三位，是三组的光江田。他出身商人，1942年来到八路军方面。在日军时，他深信日本军部的宣传，认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是正义的。由于八路军和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辛勤教育，他开始识破军部的欺骗，知道正义在中国这一边。在学校，他当了学习组长，耐心指导全班的学习，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在生产劳动中，他很积极。这位热心人，在较暗的纺纱房里，带动别的学员，把成堆积雪似的棉花，纺成棉纱，在学校全年可观的生产收获中，作出较大的贡献。

学员们在学习时间之外，主要工作是制作反战宣传品。

1943年后，学校的整个工作，几乎都由原来的学员主持，并由他们进行授课。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工作，仅仅是批准学校的基本方针，在经济上给予援助。

日本工农学校的部分学员、工作人员，又是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等的领导人。如学校教导主任森健，又是联合会的副会长；学校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杉本一夫，又是联合会的会长，等等。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及其延安支部，都设在日本工农学校内，它们的干部和工作，都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干部、学员担任的。

不少反战同盟员，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半年、一年、或更长些时间后，又重返前线，为加强和创建前线反战同盟各支部，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各个分校，又都是教育、培养反战同盟干部的摇篮和基地。

第二节 学员的生产劳动、政治活动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在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了大生产运动。1940年，朱德首先提出了“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战斗训练的条件下，开荒种地，自力解决衣食。

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包括公、私营的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牧畜业、商业等等，主要是农业。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后方是“努力工作、生产、学习”；前方是：“努力战斗、生产、学习。”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各单位提出了不同的具体要求：

第一种，政府保证给予一切必要经费的，有医院、保育院和日本工农学校等；

第二种，政府支付必要经费的二分之一，余下的二分之一，由机关、学校生产解决；

第三种，政府供给经费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由机关、学校生产解决。

根据上述任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没有生产任务，但学员们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模范行动的熏陶，周围军民大生产热潮的感染，积极要求参加有关的生产活动。学校做出计划，报告校长林哲。恰巧，这时中共中央给学校来了指示：“为了使你们生活搞得更好，参加生产运动是好的，但不能影响学习。”林哲也是这个意见。这样，根据学员各自的情况和要求，分别成立了纺织组、农业组、木工组等。三分之二的学员参加了纺织组。身体特别强壮的学员，参加农业组。有技术的学员，参加木工组。会木工的，修理窑洞等；会打铁的，制造工具。在日本做过糕点的，做一些糖

果点心。其余的，就糊火柴盒等。有的学员，曾自动参加修路、背木炭等重体力劳动。擅长美术的秋山良照，制成枣木烟斗，还在上面刻了一条龙。在市场上卖时，得到群众的好评。

各组订了生产计划，报告总政治部。总政治部的意见：为了改善学员生活，学员从事生产所得，不必上缴；即使上缴，也不收。

有位学员在回忆当时生产情况时说：“我们利用早晨运动时间，白天休息时间，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以及每月中的三个星期天，进行生产劳动。搞农业生产，学员在体力上、时间上，都有一定困难。学员中，过去在国内干农业的不多，而且这里的土壤、气候、耕作方法和日本不一样。我们一面向当地农民请教，一面开垦了70多亩荒地（约合日本450步）。中国同志武兆奎^①，主动给我们送来了优良的农作物种子，和优良的种猪。1943年秋天，我们收获了1万斤土豆，9石大豆。冈野校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帮助管伙食的同志，买下我们收获的土豆。”

再看几个具体的数字吧：一位身体并不健壮的女同志，一天纺六两棉纱；到5月底，木工组已做纺车103辆，倒线车1辆，倒线拐子15个，木桶14个，还帮助“团结部”^②做工，带徒弟。

学员们还自盖房屋。我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7月在延安参观时，于4日的日记里写道：“坐车到郊外，参观日本工农学校，入门，许多人在建筑一新屋，有搬运砖木的，有爬在屋面上涂泥的，他们的面目，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戴着眼镜，显见他们不尽是劳工出身。立定看一下，他们工作很努力，很有条理。学校在山坡上，一级级上去，还看见他们在做各种工作。我

^① 学校附近的一位农民，诚实、苦干，善于学习。1944年起，被日本工农学校请来，指导种菜，使学员的蔬菜供应大有改善。

^② “团结部”是当时驻延安的某单位，为保密而取的代号。

感觉到这一个日本工农学校，生气蓬勃得很……”

当时，有位学员，叫中岛，在日本当过木匠，被聘去南泥湾，参加和指导土木建筑。当时南泥湾的礼堂，就是由他设计、指导建筑的。

学员还经常帮助附近的农民锄草。1943年7月3日、5日两天，他们帮助农民锄草50多亩。休息时，农民请他们抽烟，他们不抽；中午，农民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吃。西沟王家山一位65岁的老太太说：“好人到处有，日本工农也是好人。”这也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真诚的友好和团结。

《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4日报道了该校的生产情况：“日本工农学校……生产成果很大，农业组产值小米20石^①，纺纱组产值12石5斗，木工组制造纺织机械、家具等，产值6石7斗，其他组产值2石4斗，为“团结部”合作社炸油条、染衣等等，得报酬24石。这个学校的学员，在这一年里的生产量，换算成小米，合计是66石6斗。现在，各位学员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对下年度的学习和生产，充满了信心。”

学员们自豪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二流子。”

这一年，农业组的前岛，纺纱组的泽、西村，木工组的中岛，被选为学校的劳动英雄。学员新川久男，被选为学校的特等劳动英雄，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

学员们参加生产劳动，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促进了自己思想的转变，增进了团结友爱，增强了学员们和附近中国老百姓的亲密关系。

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政府、民众，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开始丰衣足食。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体党

^① 当时延安的一石，相当于：粗粮300斤，细粮350斤。小米是细粮。

员、干部、军人、民众，加强团结，提倡军队展开“拥政爱民”运动，人民展开“拥政拥军”运动。部队和各级单位的领导人，再三地热情地教导大家为人民服务。在这种形势下，在延安展开了各单位之间，各单位与民众之间，互相邀请参加新春宴会的活动。

梅田照文在这一活动中，深受感动，他后来回忆说：

“1944年正月，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受到延安周围普通农民的邀请，去参加他们家的新春欢庆宴会。学员们分成几个组，应邀去了各个农家。

我和几位同学，访问了延安市南郊外新市场附近的吴某家，并参加了宴会。这是个典型的延安农家。房子里外，装饰一新，房里明亮悦目。宴会桌上，摆满了菜，还有自制的香甜美酒。桌中间的铜火锅，不断吡吡地响着，催促人们品尝它里面的佳肴。主人吴某不断地说：‘不要客气，请吃菜！’同时，不断地提起酒壶，往我们酒杯里倒酒。

我的中国话讲得很差，加上吴某的口音，有很重的地方语，因此只能交谈简单的语句，再加上手势来表达意思。吴某说：自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到延安以后，我们翻了身，生活逐步好起来了。若能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也要靠共产党。你和我，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是阶级兄弟。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日本人民就能得到解放。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让我们

为抗战彻底胜利干杯！

为你们的辛勤工作干杯！”

我们在吴某家度过了愉快、有意义的一天。

日本工农学校为了答谢延安民众的盛情，隔了一天，就回请这些好客的主人，到学校欢宴。他们都应邀，准时到达了。我在校门口，紧紧地握了吴某的手。我们请他们参观了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厨房，参观了墙报、运动场，介绍了我们的学习生

活。我们做了最丰盛的各种菜，请他们品尝。饭后，我们演出了八木节、木曾，以及其他的日本民谣和短剧，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和诚意。

新春庆贺宴会，使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是真正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几万万燃烧着仇恨的人民的烈火中，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定会被烧死的。

1944年4月10日，下午两点，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持，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追悼朱德总司令的慈母钟太夫人大会。

朱德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起，一直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他一直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战略战术，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当时中共中央为朱德生母的逝世，开追悼会，是可以理解的。朱德当时兼任中共中央军事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对日本工农学校特别关怀，因此，全体学员要求参加这个追悼会，以表示他们的哀思。

1943年8月3日，全体学员参加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在该校举行的纪念日本“米骚动”25周年大会。

大会由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组织委员佐佐木主持，他声音洪亮地致了开会辞：“我们在这里，纪念由于日本统治阶级压榨而引发的‘米骚动’事件，有很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以更坚决地与日本法西斯统治阶级作斗争的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日子吧！”

在掌声中，冈野进讲述了“米骚动”运动的原因、经过和教训。他说：1918年8月3日，富山县一个渔村，农民、渔民家的主妇，再也承受不了飞速高涨的米价，抢了米店。抢米店事件很快波及到很多地方。从神户港发展到周围的城市：京都、名古屋、

横滨，接着发展到东京，然后发展到很多很多的小市镇、农村。历时一个多月，有数百万人参加，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人民斗争。当时，被日本政府逮捕了几万人，投入监狱的有一千几百人，杀伤了許多人。这就是“米骚动”事件。冈野进讲述了自己东京参加“米骚动”的情况，进而指出：“在‘米骚动’中，人民群众显示了他们的伟大力量。”全体同盟员，对冈野进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反战同盟代表大谷、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代表王云汉讲了话。同盟员个人作了自由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闭幕。

学员们还经常参加在延安举行的不少其他的政治活动。

1944年11月21日，到达延安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经常参观日本工农学校。1944年6、7月份，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1945年7月，党外民主人士代表黄炎培等六人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美国军人、中外记者（除个别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外）、党外民主人士都对学员们行动这样自由，供给这样丰富，学习这样刻苦，工作这样勤奋，身体这样健康，精神这样饱满，感到十分惊讶！

第三节 晋西北分校的成立

在日本工农学校成立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和林哲，就设想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日本工农学校分校，以便在前线，对抗日根据地内的日本士兵，进行初步的政治教育。

1943年7月7日，即卢沟桥事变六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山西西北部，黄河边的一个村子里，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该分校的工作人员，都是总校的毕业生。由茂田江纯担任校长。队长是永井，他始终和学员们住在一起，经常帮助学员打水

打饭和做别的事情。另外，两三位同志担任教职员，开始对最前线来的日本士兵——学员，进行教育。

学员有20多人。开学那天早晨，学员们迅速地集合在操场上，先做按摩操，接着做日本式的柔软操。早饭后，举行开学典礼。茂田江纯讲了话，学员代表山川率领全体学员宣誓：

“……现在，八路军为我们建立了学校，给我们求真理的机会，使我们在学习中了解到战争的本质，了解到日本法西斯军部才是日本人民的真正敌人；认识到什么是真的正义，给了我们无限光明的前途和勇气。”

晋西北分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时事问题、日本问题、中国语、修养讲座等五门。中国语这门课，由中国同志担任。学员们对学中国语，也很有兴趣。其他所有课程，由茂田江纯，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负责人小林等同志担任。

学员们由于长期受法西斯的欺骗宣传，开始时，不相信分校的教育。他们认为日军的“三光政策”是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他们害怕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人民对他们的优待。1943年，在欧洲，德军失利。9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登陆，不久意大利投降。在太平洋地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被击毙。5月，美军攻占阿色岛。在中国战场，国民党配合日本侵略军，用大量军队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但没有达到目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不断壮大，华北解放区逐步扩大。日本侵略军不断失利，战败的征兆随处可见。尽管这样，分校开学时，学员们还是相信日本大本营的骗人公告，不能正确理解战争的进程，和日本必败的结局。

根据上述具体情况，分校的教育内容有：日本军部、财阀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看待战争的目前形势？等等。力求使学员们在学习初步的革命理论后，能认清自己

应站的阶级立场，培养出反对侵略战争，要求早日停止侵略战争，并且为此在最前线辛勤工作的反战斗士。

配合正课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员自觉地进行各项课外活动，做到身心健康，轻松、活泼、愉快。

学员们组织了自治会，作为课外活动的指导机构。课外活动有文化娱乐，各种球类比赛，编写墙报，到图书室借阅各类日文图书，选举管理图书的委员，等等。

在球类活动方面，还多次和八路军战士进行过比赛。八路军战士踢足球的水平不高，因为他们缺乏练习的机会。这类比赛，增进了学员们与八路军战士的接触和相互了解。

文娱方面，有围棋、日本将棋等，以及唱日本各地的民谣、流行歌和浪曲。也曾以文艺表演，欢迎和招待八路军指战员。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实践，学员们树立了初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再悲观，不再企图自杀了。他们把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八路军，看成是他们再生的恩人，决心和中国人民一起，去反对共同敌人。

在学习期间，他们还帮助周围各单位的宣传队，书写日文反战标语。

在晋西北分校，进步最快的学员是冈村、海田、王蒲等。

晋西北分校，先后欢送几批毕业学员，作为英勇的反战斗士，奔赴华北各个战场。

第五章

华北敌后反战运动的深入

第一节 晋察冀支部的十期政治攻势

根据华北两反战团体大会的精神，觉醒联盟各支部，先后单独改组为反战同盟，或者与同地区反战同盟组织合并，组成新的反战同盟支部，并且分别召开了有关会议，制定了切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工作方针、计划，加强了各支部的组织、思想建设，掀起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反战斗争，取得更多的反战成果。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1943年底，对日军进行了十期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每期约半个月。在政治攻势中，晋察冀支部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他们根据延安两个反战大会的精神和面临的日军士兵的具体情况，以《日本士兵要求书》为依据，较快地编印了几十种高质量的宣传品。

1942年12月上旬，驻该地区的日军指挥机关，准备大规模庆祝大东亚战争一周年，该支部针锋相对，在此期间内，对日军展开了强大的突击宣传周，在日军各据点和城市外围，大量散发说明太平洋战争发生的真相和盟军开始在太平洋转入反攻的宣传品。甚至在日军召开的庆祝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的大会会场，也出

现了很多反战传单，使日军指挥机关如临大敌，到处戒严、搜查，使日军内部的厌战、反战情绪进一步蔓延。

1943年3月，在开展第八期对敌政治攻势中，某日军据点一分队长，派老乡送信给八路军，要求在某地与八路军代表面谈，后又送来信，向八路军方面保证，今后将严格管理部下，不发生或尽量减少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也请八路军在他们行军或执行公务时不进行伏击，因为他的分队新兵多，没什么战斗力，士兵大量伤亡，他这个分队长就混不下去了。这样八路军某部就与这个据点的日军分队，达成了秘密谅解。

1943年5月，晋察冀支部从被俘日军士兵反映中，得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的军官，合伙贪污伙食费，使士兵伙食越来越坏。士兵们私下怨言纷纷，但不知怎样起来斗争。支部就编印了《让我们吃饱饭》为题的传单，向日军士兵说明，只有大家携起手来，一起进行抗议，或派代表向长官交涉，伙食才可能改善。某中队士兵首先行动，选出四名代表，向管伙食的准尉提出要求。这个准尉心虚，答应立刻进行调查，第二天饭量就明显增加了。没过几天，饭量又减少了。士兵们又派代表提出要求，这样重复了三次，最后士兵们忍无可忍，大家一起向准尉发出强烈抗议。准尉答应彻底追查。最后公布说是伙食部部长长期贪污。该伙食部长受到处分。这个中队士兵的伙食得到改善。这个消息很快传开，第四旅团的其他中队士兵，也纷纷起来，用各种方式进行了斗争。

该支部的反战宣传，使日军士兵加深了对反战同盟的认识，减少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该支部长期集中对天津附近一据点进行宣传，与该据点日军建立了友好关系。一次，支部与该据点通电话时，刚开始讲话，电话突然断了。过了几天，该据点一等兵中村给支部来了信，说：“你们送来的传单和慰问袋都收到了。上次你们来电话时，给了你们一个难堪，是因为突然有长官来到。今有

一件紧急事情告诉你们，上级有命令，两三天内，将要在这一带进行扫荡，请见信后迅速转移，以此报答你们的厚意。火速火速。”支部随即向八路军反映此事，这和从日伪军内线传来的消息一致。支部和八路军部队很快转移，使日军扫荡扑了空。

驻该地区有个日军下士官，作了一首诗：

风凛冽
长夜凄凉，
知心人远在故乡。
两心常在一起，
只恨隔重洋。

无奈何，
珠泪汪汪，
湿透象牙床，

.....

这诗反映了日本军人思亲的悲哀心境。该支部把这首诗谱成日语反战歌曲，在前线喊话时，唱给日军官兵听。

日军士兵自杀、逃跑、投诚事件增多。如1943年初，驻无极县的日军士兵十人在夜间逃走，两人被抓回枪决，另外八人一直没有下落。驻肃宁县西南的南市据点二十名士兵，长期盼望回国，但失去了希望，悲哀至极，在春节前集体自杀，等等。

第二节 晋冀鲁豫分会的成立

1942年8月后，晋冀鲁豫地区觉醒联盟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支部，都改组为反战同盟支部。总部在1942年10月14日解散，合并于反战同盟太行支部。

1943年初，以松井英勇为首，町中、野、雷村等六人，组成了晋冀鲁豫地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该地区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1943年3月25日，晋冀鲁豫地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日军36师团的星川、吉野、西田、坂土、镰田、福田、小沼、佐藤、伊藤、小米、野长、铃木等，第109师团的松中、森冈等，第32师团的小野、宫川、清水、宿田、秋山、小栗、吉田等，第41师团的水原等，独立混成第10旅团的森山、上田等，第1旅团的松田，以及日军铁道兵、日侨等多人。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人杨秀峰、边区参议会会长申伯纯、八路军野战总部敌工部代表漆克昌、朝鲜独立同盟负责人武亭，以及边区各部队、各群众团体代表和群众，共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对这次大会非常关怀，亲书贺幛一幅：“日本人解放之灯塔”。刘伯承在会上讲话中特别强调：晋冀鲁豫地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虽然是在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召开，但它的意义是伟大的。这个大会是求正义的大会，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大会。大会的宗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求得日本人民、士兵的解放。为实现这个目标，具体工作要有步骤地进行，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从日军士兵的具体生活问题入手，一步步地引导。要把我们的经验，作认真的讨论、总结，用集团组织的力量，来保障、达到日本人民的真正解放。这是我们应该一起努力的。与会者对刘伯承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会上，几位日军36师团的士兵代表，控诉了该师团各部队普遍存在的军官打骂士兵，压榨士兵现象，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同感，一致通过了《对第36师团的要求书》，呼吁禁止军官用木棒、木枪、军刀刀背等毒打士兵，搜括士兵腰包，任意侮辱士兵

等要求。大会于同月 29 日隆重结束。

30 日，晋冀鲁豫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召开。各支部几十位代表，认真总结了前一时期的工作，讨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大会在决议中，特别强调加强支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改善对新来俘虏的教育工作，进一步强化反战组织的内部团结，以及与中国军民的团结，以求早日打败日本军部发动的侵华战争。

大会在通过有关几项决议后，选举产生了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分会（即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地区协议会），由松井英勇任分会书记，田村为副书记。另外加上山田、吉田、秋山、水野、渡边，共七人为执行委员。

这次大会的召开，有力地密切了与华北联合会，以及周围各反战同盟组织的工作联系和协调，显著增强了其反战斗争的能量。

第三节 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 各支部的反战成就

上述两次大会后，晋冀鲁豫分会各支部不断改进了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他们的宣传品，从鼓动日本士兵为维护其切身利益而进行斗争着手，诱导日军士兵逐步看清日本军队的罪恶，其形式也以短小、活泼的短文、漫画、相声等，取代了字数较多的文章。四个支部在一年中，编写、印制了 100 万份宣传品，并且通过 11 种方式，把它们不断散发到日军士兵手中。

1942 年的 9—12 月，冀南支部对驻扎于对面的 5286 名日军官兵做了调查，掌握了他们内部比较详细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宣传，先后促成日军士兵 22 人逃跑，其中有卷子镇、武邑、白庄三地的六名日兵，秘密逃到八路军中。这个支部对几十名盟员规

定，每位盟员要联络日军据点中的十名士兵。由于他们对日军士兵情况了如指掌，反战宣传深入日军士兵心窝。冀南支部支部长秋山良照，在日军士兵中很有名。很多日军士兵托老乡捎信给他，要求他回答关于当前形势、政治、社会等等问题。他桌上堆着的日军士兵的来信，竟有一尺多高。

1943年秋，在盟员宣传下，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第72大队士兵反战情绪高涨。驻磁县第二中队，两个月中，就有八名士兵逃走。驻彭城镇的铃木中队，有七名士兵携带武器逃走。鉴于上述情况，八路军冀南军区发出通令，要求各部队认真收容、保护、团结逃来的日兵。

经过支部努力，使八路军与某一据点，达成互不袭击对方的默契。这个据点，有日军士兵一小分队19人，分队长为津金少尉，另有伪军26人。先是由支部和八路军武工队，在黑夜对他们进行宣传，以后就送慰问袋和别的宣传品。金津后来说：“八路打不光，回国的希望没有，我有很多八路朋友。”他后来严禁伪军殴打老百姓。根据金津的表现，支部给他去信，说明中日人民无仇无冤，提出以后“谁也不打谁，交个国际朋友”。以后小分队出来执行任务，都手里拿着小白旗，不打八路军，八路军也不打他们。日军五次合围八路军，他的小分队故意落在后面，有意使八路军从他小分队那里突围出去。上级调他去参加讨伐队，他请各地的维持会到中队长那里，做挽留他的工作。中队长不同意时，他就装着旧病复发，不起床，中队长也只得不了了之。^①

1943年上半年，太行、太岳两支部，共散发宣传品70多万份，书写标语5万多条。太行支部的传单，甚至贴到了平定县城内的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第121—12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日、伪军布告栏上。太岳支部的传单散发到面临的所有的日军占领区。甚至子长的日军警备司令部、赵城的日军宪兵队门口，也贴了反战传单。驻潞安的日军76师团一名下士官，得到太行支部散发的《同胞新闻》后，看得津津有味。看完后，还给老百姓一些钱，请他以后经常送该报给他。1943年，太行支部针对日军第36师团某中队士兵长年奔走在战场的情况，散发了《停止连续勤务》为题的传单。日军士兵看后一致同意，推举一等兵向中队长提出要求。中队长见众怒难犯，勉强同意了大家的要求。

1943年端午节前一天夜里，太行支部作了一条大鲤鱼旗，他们在鱼肚上贴了字条，把它挂到日军某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以此引起士兵回想起过去和平快乐的节日。第二天清晨，碉堡里的士兵发现了它，拿回去，把它挂到碉堡的顶上，使写有“不许打耳光”的大鲤鱼旗，在碉堡上空迎风飘扬。

194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太行支部两个盟员和八路军保卫部队一起，向山西省潞城县老顶山分遣队走去。盟员镰田，原就是这个分遣队的成员。

他们在老顶山碉堡周围做好一切准备后，就由镰田等二人，唱起《桂树摇篮曲》，很快引起碉堡里人的注意。有人问：“谁在唱歌？”镰田趁机开始了喊话。

“喂，我是镰田，是原来和你们在一起的镰田！你们各位好吗？”

“啊！镰田？”一个士兵吃惊地喊了起来。

“什么，你是镰田？听说你被逮走后，被关起来，天天受折磨，是吗？”

“哪有此事，完全瞎说。负伤后，八路军救了我，把我送进医院。他们亲切地照料我。现在我的伤全都好了。八路军是支很有感情的好部队。我今晚来，就是为了向你们说这些的。”

“真像是镰田。”

“没有错，你们还记得我的声音吧！”

镰田忆述往事，日本士兵静静听着。分遣队长与镰田是同乡、同学，又在同一分队。他说：“镰田，你来得正好，今天我们大家都喝了点酒。没关系，你到碉堡里来吧！”

“镰田，我给你家里写信，你放心吧！”

镰田说：“现在已不早了，我回去了，下次再见！”

“镰田！镰田！不要走！镰田！”

“我一定再来！再见！”

喊话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几天，支部给这个碉堡送去了慰问袋。分遣队回了三封感谢信，还送来10公斤大米。

1942年9月到1943年夏季，冀鲁豫支部共编发宣传品20多种，共20多万份。

1943年春节期间，他们向日军据点送去大量慰问袋、贺年片、散发了几万份他们编发的《士兵的呼声》报。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第75大队的士兵们，收到贺年片、节日问候信后，非常高兴。有的士兵说：“现在送贺年片，节日问候信的，不是日本国内，而是八路军和反战同盟了。照这样下去，日本不知要糟到怎样的地步！”有的日军据点，收到慰问袋后，还向反战同盟回赠礼物。

某据点驻守着日军32师团的一个小队，在反战同盟宣传下，把收到的反战报刊、传单，集中贴在房内墙壁上，使日军士兵都能看到。有一次，听说中队长要来检查工作，他们及时把这些宣传品藏了起来。中队长来后说：“据报告，最近有些日本人受八路军收买，写一些卖国的传单。真是混蛋。他们还把这些东西散发到碉堡里来。各地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你们这里怎样？”小队长故作吃惊，很认真地说：“报告中队长！我这里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些卖国的传单。”中队长说：“假使有这些东西，绝对不准阅读，要马

上送到中队部来！”小队长站得笔直地说：“是，有这样的东西，立刻送去！”中队长走后，小队长说：“混蛋，你来干什么！”第二天，墙壁上又出现了几十张反战宣传品。

驻清平县一带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75大队的士兵，对支部去的信，逐渐有了兴趣。许多士兵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与同盟交朋友。后来这个部队的一些士兵，在战斗激烈时，丢掉步枪，逃到了八路军中。

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松本着了慌，他在大队里造反战同盟的各种谣言，派出特务，进行追查。这些都不起作用，于是给冀鲁豫支部同盟员来了信：

“反战同盟员诸君：

诸君中间，有的恐怕是我松本部队的士兵吧！部队长为诸君的性命担忧。尤其是诸君的家里，再三来信询问。部队长也为之烦恼。现在，诸君受了八路军的欺骗，生活很苦吧！你们想起以前的战友，故乡的父母兄弟，一定整天淌着眼泪吧！现在诸君把枪口对准了部队长、战友，和你们的父母兄弟，这使你们家里何等担心！何等悲伤！你们再冷静想一想……部队长不愿自己亲爱的部下，作无谓的牺牲，放心回到部队长这边来吧！

独立混成第1旅团75大队

松本大佐

支部收到此信后，连夜召集原该大队的士兵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发了下面一封回信：

“松本部队长：

我们没有忘掉过去的战友和父母兄弟，正因为热爱他们，我们才下定决心，为早日结束这场悲惨的战争而斗争。我们现在在八路军内，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请你放心。我们再也不愿意回到地狱般的，每天挨耳光，以泪度日的军队。我们留在八路军内，

直到战争结束。特此奉告。

八路军内第75大队全体士兵”

不久大队长又来了一封信，说：“几天内，要讨伐你们所在地，你们不要白白送死！快回到清平县城来。这也是你们故乡亲父兄弟的衷心愿望……”

这封信当然是撒谎。大队长早把这些士兵，作为战死者，通知了国内家属，哪来什么父母兄弟的愿望……

支部还没回信，大队长就给冀鲁豫第2纵队司令员寄来了信：“司令阁下：

小官对阁下有一希望。阁下是军人，小官也是军人。这是军人的请求，请你接受。小官的部下，在阁下的部队里，生命得到保证，过着幸福的生活，小官代表他们的家属，对阁下表示深深的谢意。

小官的愿望，家属的愿望，请将他们安全地送回本队。请看军人的情谊上，拜托拜托。

松本大佐”

司令员收信后，把信给有关盟员看了，他们都非常气愤。于是，司令员寄了封信给松本大队长：

“松本大队长：

我亲自和你过去的部下会见了，将你的意思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死也不回来。假使你有什么话，非和他们说不可，那么就和他们当面谈谈，如何？我一定派部队护送，让他们和你见面。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

司令员的回信，粉碎了松本的阴谋。这样，真柄中队长代表大队长登台表演了。他因虐待士兵，被士兵称为鬼队长。他给支部发了信：

“……松本队长日夜为诸君担忧。……整天流泪。本中队长保

证：大队长决不杀害自己亲爱的部下。请不用担心。放心地回来吧！

真柄中队长”

支部根据有关盟员的意见，写了封断然拒绝他要求的回信。

不久，真柄中队长给支部写了封威胁信，支部立即给他回信：

“谢谢你给我们的通知。可是我们的脑袋不是容易砍掉的。我们反战同盟的反战活动，虽然很危险，但我们身后有强大的八路军。好吧，我们大家互相留心。不知谁白白送死！……”

不久，10月某天，八路军和支部几名盟员，夜袭真柄中队。他们很快打进了真柄中队所在据点。真柄早已逃走。支部长水野靖夫在带来的一张纸上，写了个条子：

“真柄中队长：

我伸着脖子，等候你的军刀，终不见你的军刀来临。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前来领教。但是，好胆小的东西，像耗子一样，逃得无影无踪。真遗憾！等着吧！我们还会来的。以后你就改名叫怕死中队长吧！”

盟员们把此条子贴在真柄中队部门口，随即撤退了。

过了几天，真柄中队举行上次夜袭中死去的几十名士兵的追悼会。真柄在会上叫嚷，要对八路军进行大讨伐。但当他接到支部送去的一篇长祭文后，就一声不响，草草结束追悼会。从此，他不再提大讨伐的事了。

由于日军进行扫荡，冀鲁豫支部1943年前后，直接与敌人作战8次。战斗中，盟员们都是英勇无畏的斗士，向敌人猛烈射击。在与敌人搏斗中，盟员叟计三英光荣负伤。醇田嗟产在被包围无法脱身的紧急情况下，英勇自杀。1942年9月反扫荡中，盟员黑田嗣彦、太田和两位新来八路军的日军士兵，组成工作小组，随八路军第2纵队南下支队展开反扫荡斗争。22日，这支大部分不

是战斗员的部队，突然被日军包围，大家立即进行抗击。在激战中，作为组长的黑田，用自制的喇叭筒，高声宣传：“我是日本人，不要开枪。你们为什么来中国打仗？中国并没有打日本啊！你们受骗了！把枪口对准你们真正的敌人——指挥官和军阀！我们是为挽救日本人，才工作、战斗的……”。在宣传中，太田和另一位日本士兵先后牺牲。敌人冲向黑田，黑田用手榴弹自尽。剩下的一个日本士兵被敌俘去。日军官强迫他在士兵们的面前，污蔑八路军和反战同盟。这位士兵被八路军、黑田的精神所感动，挺着胸，不说一个字。军官惊慌起来，立刻把他处死。黑田等的死，使不少日本士兵看清了真相。后来有位日本士兵在给支部来信中说：“我们听到用日本话喊话，大吃一惊！我们这才知道，长官们讲反战同盟员都是怕死鬼，才当了八路军走狗的话，完全是谎言。大家开始相信八路军不杀日本俘虏。”^①

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分会各支部，配合八路军，展开政治攻势，使日军士兵失败主义情绪蔓延，战斗力大为下降。在该地区，1941年俘日军13人，1942年为18人，1943年在冀南区1—4月就俘24人，投诚2人，自杀9人，逃走的有24人。这一切都证明了日军内部反战力量的加强，证明了盟员的工作已获得了硕果。

1943年7月9日，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等，联名致电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分会和各支部的盟员，对他们援助中国人民抗战，表示感谢、致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为彻底打倒日本军部努力奋斗。同日，还设宴招待反战同盟员。

^① 参阅秋山良照：《悼黑田嗣彦之死》。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29日。

第四节 晋西北支部的成果

1942年8月后，华北联合会和日本工农学校，派出小林武夫率领的反战工作团，去晋西北的120师，进行反战活动。

1942年9月，在八路军120师，建立了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由小林武夫任支部长。

1944年4月，为进行前后方干部的交流，加强晋西北的支部工作，派森健到那里工作。同年7月1日，在八路军晋绥军区，晋西北支部由森健担任支部长，盟员有茂田江纯、永井、大谷等人。

1942年秋季，日伪军准备对晋绥地区实行进一步的“蚕食”。晋西北支部立即翻印了大批《日本士兵要求书》，通过各种途径，散发到日军官兵手中，导致日军内部人心混乱，反战事件增多，迫使日军不得不暂停执行“蚕食”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搞内部整顿。

在石沙庄战斗中，八路军某部歼灭日伪军28人。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派老乡把尸体全部送还日军，使日军士兵深深体会到八路军的仁义。

1943年樱花节、孟兰节等节日，晋西北支部，通过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校长茂田江纯，派出有相当政治觉悟的学员，一起去前线进行反战宣传，展开与日军碉堡通电话，向日军喊话，以及散发慰问袋等工作。

某日军据点，偏离交通要道，供应困难，黑豆成了他们的主食。晋西北支部编印了《不要让我们吃黑豆》为题的传单，散发给日军士兵。他们还在原有的日本歌谱中，填上《肚子咕咕叫》歌词：“长官住在漂亮的都市，我们住在荒凉的山沟……早晨喝稀饭，中午吃黑豆，肚子咕咕叫，怎能去打仗……”写在长长的木牌上，

插在日军据点附近。晚上在据点外喊话，唱这首歌。白天该据点士兵把木牌扛进据点，互相学唱。他们认为木牌上写的都是真话，经过酝酿后，士兵们一起要求小队队长向上级反映自己的痛苦。

1943年12月6日，驻阳曲兰村据点的日军士兵高彬太郎，在受长官打骂虐待，生活越来越艰难时，受反战同盟宣传的启发，自动逃到根据地，投入八路军部队。

支部的长期有针对性的反战宣传等，也使日军军官们加重了失败主义情绪。1943年1月25日，驻王寨的日军第4中队第2小队队长藤中，来华作战已三年整，正准备退役回国，突然上级下令，把他提升为中尉，要再服役三年。他从反战同盟的传单上，得知侵华战争不会胜利，自己不能回国，迟早会死在战场，就悲痛自杀。8月12日，驻太原文瀛湖日军军官越川夕，深入研究反战同盟传单后，陷于极度悲哀，终使全家五口全部自杀。10月28日，驻古文据点的日本情报主任服毒自尽。他在遗书中，痛斥了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滔天罪行。

第五节 山东支部的反战硕果

1942年9月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与觉醒联盟山东支部，召开联合会会议，决定两团体合并，命名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由本桥朝治担任支部长，大西正为副支部长，上中庄太郎为组织部长，盟员有上田正雄、小岛、渡边、国保、山口、桐山等。

同月，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在八路军胶东军区成立。支部长为小林清，后改由渡边担任，小林清任副支部长。

同月，还在清河军区成立反战同盟清河支部，田村任支部长。该支部在1944年1月11日，随所在军区，改名为渤海支部。

11月，反战同盟滨海支部，在八路军滨海军区成立。国保被

选为支部长。

根据在延安召开的两反战团体大会的精神，和山东地区反战的实际情况，1943年7月18日，山东日军士兵代表大会，和山东日人反战同盟代表大会，在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根据地隆重召开。参加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在山东地区的日军第32师团、59师团、100师团、独立混成第5、6、7旅团、富永师团等单位的日军士兵。参加反战同盟代表大会的，有山东、胶东、滨海、鲁南、清河五个支部的代表。与会代表共几十人。参加大会的各界来宾有几百人。

上午8时，大会代表一致推举毛泽东、朱德、冈野进为大会名誉主席团，选举本桥、大西正等为大会主席团。

由山东支部支部长本桥朝治致开幕词。他讲述了一年多来，山东反战同盟的发展和作品，强调要总结经验，增强战斗力。

日本士兵代表胜山发言：“在日军军官的眼里，士兵只是个价值二分钱的邮票。因为只要前方需要士兵，向日本军部发一封贴二分钱邮票的信，很快就可以在国内征集一批无辜青年，到前线当兵。因此他们把士兵当牛马，随便打骂……日军的士兵，有的是刚从国内征集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厌恶战争的情绪，正在与日俱增，他们整天在苦闷与仇视中生活，得不到发泄和消除。他们迫切希望与家人团聚，尽早结束战争，获得自由。”

胜山在会上呼吁，争取更多的日本士兵参加反战同盟，以早日打败日本军部发动的侵华战争。

山东军区政治委员罗荣桓、副政治委员黎玉，在发言中强调：“希望大会成为中日两大民族革命团结的一座桥梁。反战同盟要从解决广大日本士兵的日常细小生活问题出发，团结教育广大日本士兵，促使他们早日觉悟，认清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真面目，争取广大日本士兵加入反战行列，早日解放日本人民。”

山东军区敌工部黄部长，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报告了日本反战同盟员黑田、金野同志，与八路军一起英勇战斗，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壮烈事迹。与会者都起立，为两位烈士默哀。

山东省临时议会会的马副议长和省工会的代表，一致表示欢迎同盟代表参加各级议会会议的会议；政府坚决执行保护反战日人条例。

在讨论会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各支部汇报了工作情况。

桥本在总结时提出：全体盟员必须认真履行冈野进同志所指示的三大学习任务，认真履行国际主义职责。

在会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发言者。他是大会召开前三天（7月15日）逃离日本军队，来到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昧下。

昧下因经常吃不饱，要求增加粮食，被小队长毒打一顿，受到禁闭处罚。这样，使他更加反对战争。他偷偷地把小心保存的同盟的传单带在身上，乘人不备逃了出来，决心投奔八路军。他流浪了13天，吃了不少苦头，最后找到了八路军。在会上，昧下坚决要求参加反战同盟，决心同中国人民一起，抗战到胜利那一天。

山东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致伪军书》，全文如下：

伪治安军、省县警备队的士兵们：

我们对于日本军队对你们的暴行，怀着极大的愤慨。“支那猪”、“下贱的奴才”，这是日本军官强迫我们这样叫的，并且说：“中国人是天生的鄙蠢笨猪，假使你不骂他，不打他，他是不会干活的。”军官们还说，“支那人在表面上看是嘻嘻哈哈的，其实是非常狠毒的，所以不论他们怎样装好，皇军都是不能相信的。”他们还说，“这些贪金钱的奴才，除用金钱收买外，还要用武力压迫。”这样就造成了日本军队打骂你们治安军、警备队的现象。有些不觉醒的日本兵，打骂你们治安军、警备军之

后，还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是长官的奴才，治安军、警备队是我们的奴才。”

日本军队发给你们县警备队一些弹药，你们却很高兴，似乎“皇军”已信任你们。日本军队长官在暗里偷笑着说：“县警备队很高兴！这正是死的预兆，下次讨伐，让他们当前锋部队！”后来在日本军队中流传着一个给县警备队的诨号——咱们的钢盔。就这样唆使着中国人屠杀中国人。“讨伐”后开追悼会时，日本军官在台上表扬你们某治安军、警备队如何壮烈，如何值得做“标兵”。但会后却又向日本军队讲：“只有这样恩威并施，才能使他们出力，实际他们还不是一路人，下次就要表扬今天到会的人了。”我们日本士兵同病相怜，爱惜着可怜的被奴役的中国人，有时你们还要做皇军的宣传工具：皇军命令强迫你们抢掠、奸淫以后，又把你们的几个治安军在老百姓面前斩首示众。显示“皇军”是大仁大义的。

你们饱受日军压迫的郟城县警备队，去年七月间预谋哗变，反抗日本中队，因事机不密，全被解除武装，押赴城外。二十九人用绳捆绑，被一小队全副武装的日军包围着，多氏指挥官挺起胸膛，圆瞪鼠目，拿出战刀命令士兵：“把警备队当靶子练习刺杀！”当时稍有犹豫的某班长，被指挥官砍了一刀，殷殷见血，于是士兵们被迫展开了惨绝人寰的以人当靶子的屠杀演习。当时那种悲惨的哀叫，飞溅的鲜血，真使我们毛骨悚然，热泪盈盈，背转了面孔，再不忍看这人间悲剧了。这是“中日亲善”呢？还是“东亚共存”呢？所谓圣战的真面目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

另一次，日军与警备队一同出发“扫荡”，在一个村落中，日军被八路军突然包围，手榴弹、子弹像雨点般地落下来，这时，中队长决心牺牲全部警备队，掩护中队安全突围。于是，他命令警备队集中全部力量，向八路军主力方向突击，中队长却领着日军妄图向北仓皇逃走，但又被八路军阻回，于是又命令警备队为前锋，向前冲去，日军随后突围。警备队如有退却，日军就架好机枪扫射。警备队只好冒险突围，伤亡惨重。这难道还不明白“皇军”为什么给你们发枪支、弹药吗？

如上所述的例子，举不胜举。总之，日本军阀是没有把你们治安军、警备队当人看待，他们是以极低的代价来实现“以华治华”的目的。“削减华军，使皇军兵力甚感不足，故建设县警备队，是皇军当务之急。”这是独立混成旅团向上级报告的内容。条件是“绝对服从皇军，节衣缩食，逐渐使之远离家乡，必要时调往南洋战场。”

这说明日本军部所以采取一切欺骗手段，都不过是要把你们变成

“替死鬼”、“开路先锋”来完成战争的手段罢了。

今天我们彻底了解了侵略者的罪恶，你们不要为法西斯卖命，要和八路军站在一起去消灭这场侵略战争。我们诚恳地呼吁：“你们要赶快回头呀！”……①

8月20日，大会最后一天，全体代表决定，把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改名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山东分会。本桥、大西正、山田口津、小岛、国保、渡边、小林清为分会委员，本桥、大西为正副会长。同时决定山东支部的具体工作，改由鲁中支部担任。该支部的支部长为金野博，副支部长小林宽澄，盟员有坂仓等；1944年，由小岛全之助为支部长。金野博去滨海支部工作。

1943年7月后，胶东支部分两路进行宣传。小林、石田、松下西海地区，军区敌工科同志还带了一部分警卫部队同行。小林他们在同旧店据点的日军士兵通电话时，石田为据点士兵唱了一首歌：

秋天明月分外亮，
清冷寒光照村庄，
我离别后的家乡老屋啊！
倾斜了，变成了破烂的房子！
明月偏西挂树梢，
寒风凄凄树叶儿响。
年老父母种稻又插秧，
依然忍饥受饿度时光。
夜半人静月更明，
寒光斜射照进窗。
期待着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
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悲哀。

① 见《新华日报》1943年9月4日。

石田凄凉、缓慢的歌声，把日军官兵带进了无限辛酸的海洋。

在八路军英勇作战，同盟大力反战宣传面前，胶东地区军民俘虏日军的人数不断增多：1939年仅2名，1943年为数十名。

1943年在赣榆县海头战役中，鲁中支部的上中桐随着八路军，冒雪在大官庄据点前和日本士兵进行联欢。第一天，在距日军40米处，上中桐一喊话，日军中队长就慌了，亲自出来问话：

“你们是共产党吗？”

“不，我们是日本人反战同盟。”

“你们为什么在八路军中？”

“我们是在战斗中来到八路军的。我们认识了侵略战争的罪恶，为了日本人民、士兵的解放，举起了反战的旗帜。”

“你们说，日本人不应该支持大东亚战争吗？”

“是的，我们知道的大东亚战争，就是日本军部大量牺牲士兵的性命，侵略中国，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

中队长不敢再说了，他怕反战呼声，影响手下的士兵。上中又喊了：

“弟兄们，当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日本兵退出据点，撤回城去，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另一条路，就是你们继续作无谓的牺牲。你们的父母儿女，希望你们安全回国。他们绝不希望金质勋章伴着你们的白木箱^①回去啊！”

据点里传来了哭泣声和军官的斥责声。第二天，据点里的伪军出来说，有两名士兵被军官枪毙了！

第二天夜里，上中继续对这个据点宣传。几天后，海头日军士兵二人逃出据点：一个自杀，一个逃走了。^②

① 包装日军士兵骨灰的小木箱。

② 《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同年10月，鲁中地区日军士兵村上饭岛等四人，主动投奔到八路军处，受到八路军、反战同盟员的欢迎。村上饭岛说：“到这里，能吃饱饭，没人殴打，更没有可怕的演习。使我们感到很幸福。”

1943年4月8日，反战同盟滨海支部，在八路军配合下，分散到各据点附近，对日军士兵进行“樱花广播”。日军士兵都静默听，有的掉下了泪水，使驻该地区日军士兵士气低落。在八路军发动郟城战役的某次战斗中，15名日军士兵，就被俘了6名。

郟城战役后，日军慌忙调兵加强郟城守备。驻守临沂汤头的灵木奉命调防郟城。他秘密抓来一个患疟疾的老百姓，抽了他一针血，打在自己身上。要出发了，他正发疟疾，就躲过去了。后来，又调驻防重坊的灵木去“讨伐”。他打听到蓖麻花熬汤喝，保能发烧，就喝了不少蓖麻花汤。怕不见效，又生吃不少蓖麻花。谁知用过了量。他烧得发了疯，窜墙越屋，大哭大叫，闹了六、七天。后来医官给他打了退热针，才慢慢好了。他受了不少罪，但因逃脱了一次残酷的“讨伐”，心里十分高兴。

1943年夏季，由于盟员和八路军的政治攻势，使4名日军士兵投奔过来。

从1942年8月到1943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华北敌后日人反战运动迅猛发展，成员大大增多。1943年，就向日军编发了200多万份宣传品，使日军战斗力不断下降。据日本政府防卫厅资料：1943年期间，由于战争长期化，以及八路军方面的反战活动，发生了日军投诚事件18件。其中大多数是“故意投敌”。“据估计：此外被逮捕、失踪、投敌嫌疑者等的数字，就更大。”

第六章

华中反战运动的深入发展

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非常关心新四军敌军工作和日人反战运动。他根据华北的有关经验，多次作了指示。他在离开华中赴延安途中，根据先后了解到的情况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指出：“华北争取了不少日本俘虏。他们积极工作，对我们帮助极大……特别对我们做敌军工作、争取俘虏工作，帮助更大。日本俘虏转变是很困难的，必须使他们明白新四军、八路军是正义的军队，中国抗战也是为解放他们自己，他们才转变。但在转变后，大多是完全可靠的，能努力工作，吃苦耐劳，亦不逃跑。要已转变的老俘虏去争取新俘虏，也是不困难的。望你们切实注意这个工作，并信赖他们。”^① 这些指示，有力地指导了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和华中日人反战运动。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1942年，先后建立反战同盟鄂豫、苏中、苏北支部后，于1942年10月，在新四军第四师（淮北区）建立了淮北支部。支部长后藤勇，盟员有矢口、小仓、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43—244页。

松田等。

1942年11月，在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建立了淮南支部。支部长高峰红志，盟员有加藤肇、藤井、吉春、清水。

华中各支部建立后，扩大、加强了组织机构，编印了几十种宣传品，全部散发到日军中去，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另外，还通过喊话、送慰问袋等方式，教育、争取了不少日军士兵。

苏北支部出版了《日本兵队之声》。他们在1943年4月散发的一份传单中，写道：“4月又悄悄来临，这个樱花盛开的时日，……往日的情景，历历在目，铭刻在心。如今却不会再来……身处异域的兄弟们，是谁迫使我们离开了那迷人的故乡？！”类似短小、生动的传单，深深打动了日军士兵的心。阜宁县日军某据点的三名士兵，带了反战同盟的宣传品，投奔到苏北支部。

苏北支部于1943年10月17日，在盐阜区某地举行第三次支部大会，总结支部成立一年多的工作。他们编印宣传品十多种，印发5万多份。还制作了一些慰问袋。他们学习努力，还参与新四军三师的整风运动。三师师长黄克诚对他们嘉奖备至。这次支部大会，还致电延安冈野进，并转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体同志：

首先我们谨向领导在华日本反法西斯战士始终奋战不懈的诸君致以崇高热烈的革命敬礼。当此国际局势已临空前变化前夜、苏联红军用席卷之势渡过第聂伯河、希特勒摇摇欲坠、日本法西斯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在苏北的日本反战人民及士兵，为了进一步发展反战运动，加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拯救呻吟于战争苦难中的日本人民，乃召开了第二届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大会。经过多日的讨论，我们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并布置了今后的工作，我们愿意告诉你们，并向你们宣誓，在你们的领导下，加紧工作，誓为扑灭人类公敌日本法西斯，以求东亚各民族完全解放和实现东亚真正和平而斗争到底。今后仍希望你们经常给我们指导和帮助。

敬祝冈野进同志及全体同志们健康。

1943年10月19日

苏中支部出版了《新时代》刊物。他们在一份传单中写道：“日本士兵兄弟们，你们无论何时，要保重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在无益的战争中，千万不要成为受骗的牺牲品。你在这儿进行残酷的战争，你的家属在庞大的战费下，将被压死。……亲爱的战友，保重你的身体，成了残废将是最大的不幸；如果战死，则不会再生！……”

1943年12月1日，苏中支部在三仓河畔——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所在地附近的潘家墩一所庙里，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与会的，除16位盟员外，还有一师师长粟裕，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等，共400多人。

大会由滨中政志致开幕词，他强调：盟员们坚决站在共同的反法西斯的旗帜下，贡献一切力量，来解救被压迫的日本人民。

粟裕师长指出：苏中支部是加速日本军阀溃败的催命符，也是中国抗战最有力的同盟军。今后定与日本战友共同努力，首先击败苏中前线的日本法西斯强盗。

陈丕显在会上说：苏中支部的建立，定会增长我们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接着管文蔚、地方士绅代表刘笃辉、台湾同胞王振瑞、朝鲜同志李传武讲了话，一致表示要与苏中军民一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朝鲜、日本人民的共同解放而不息奋斗！

香河正男代表大会，向各界人士致了谢词。

大会通过了支部的《宣言》、《纲领》等文件，通过了给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张云逸等的致敬电。陈毅在赴延安途中接到致敬电，立即给支部发来贺电：“你们获得解放以来，对反法西斯尽了最大努力。在你们同一意志下组织了反战同盟，这对我们以及日

军士兵工作，将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是日本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我们一定尽一切力量，使你们的工作很顺利地进展，以便早日完成我们的共同的任务。”陈毅的贺电，像春风一样，吹暖了盟员们的心房。

苏中支部制定的主要文件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宣言》、《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纲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通电》、《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致苏中各界父老兄弟的一封信》、《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给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全体同志的一封信》以及《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告和平军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告日本人民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告驻华派遣军第 62 师团同胞书》、《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关于出版〈日本士兵之声报〉的决定》、《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执委会关于痛斥日军对华暴行的决议》等等。

在华中反战同盟各支部中，苏中支部制定的各种反战文件，最为全面，战斗力最强。

苏中支部盟员全力投身于敌军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43 年 11 月，启东下沙和合镇，在六天内，就有两起共 6 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事件。他们还参加根据地建设事业，教育、争取战俘等工作。

鄂豫支部出版了《赤旗报》，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他们的活动，使驻广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 12 旅团宪兵队长官给同盟来信，要他们幡然悔悟，回到日军中，将予嘉奖；执迷不悟，必将危及盟员本身及在日本国内的家属。盟员们对此诱迫不屑一顾，给宪兵队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广为散发。信中说明同盟的性质、任务、目的，揭露了日军中大量黑暗事实，说明盟员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决心为反对侵华战争奋斗到底。公开信还警告宪兵队长，

要他放下屠刀，不做坏事，否则决不会有好的下场。这封信散发后，给了宪兵队长狠狠一击。

1943年深秋，盟员森增太郎、松原、森田三人，一整夜窃听日军电话后，找到鄂豫军区敌工部部长林滔，汇报在窃听中得知敌军一个小队将于当日上午10时分乘两辆卡车，押运军用物资，经姚家集去河口。这个小队大部分是新兵，没有战斗力。他们建议对这个小队进行袭击。

林滔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当时离军区驻地太远，他身边只有日语训练班二三十名学员和十几位盟员，因此，他到驻地附近的公署，找到任专员，任专员借给他有四五十位战士、武器较强的一个区中队，都是当地人。他和区中队队长，很快议定了作战方案。

部队立即在河口到姚家集的公路两侧几座山头，埋伏下来，并在公路上，用石头、木头设置了障碍。

敌人两辆汽车果然接踵前来，我方一阵暴雨般的子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下车逃窜。

过了一阵子，大概是个小队长，挥着指挥刀，率领日军士兵，向我埋伏的山上冲锋。但一刹那，这个小队长就被打倒了。战士们从四面山头往下冲，敌人强行把汽车推过石头、木头，跟着车子拚命向前逃跑。

战斗很快结束，公路上留下日军小队长等几人的尸体。这次战斗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军无一伤亡。

事后森增太郎把缴获的小队长的手枪、军刀、望远镜、图囊、手表等，上交给林滔。林滔从盟员那里，得知那日军小队长是森增太郎打死的。为了鼓励他，林滔当即把手表奖给森增太郎使用。这使森增太郎十分激动。

森增太郎是1941年秋自动投奔新四军的。到新四军后，他努

力学习，积极进行反战宣传。深得盟员和新四军指战员的好评。

不久，师部通讯员送来李先念师长的一封信，大家立刻围在林滔身边。那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

林部长：

你们今天战斗打得很好，请代表我向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表示祝贺。

先念

43. 11. X

盟员们把李先念写来的信，反复看了好几遍，一齐说：“李师长对我们真关心！”

淮北支部的成员有：后藤勇、林博、三孕、太田（后三人是从延安支部派来的），还有矢口，他是1941年10月25日从驻安徽宿县符离集的日军部队逃出来的。新四军第四师还在洪泽湖边的半城镇，开了隆重的欢迎国际反战友人大会，欢迎他的到来。他在国内上大学时，有一位同学是日共党员，使他知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到中国后，常常看到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品，知道日军侵华战争是不义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神圣的。同时，他所在的冈本中队的情况，也直接启发了他的良知。这个中队130人，没有一个愿意打仗的。他逃离前，已有6人自杀，8人逃亡，8人病亡，4人被长官打死。打死后，中队长就以作战阵亡的名义上报。这些情况，促使他在凌晨4点，趁大家熟睡时，逃了出来。他说：那中队还有6人准备逃跑。

淮北支部出版了《兵士呼声》报。他们的反战宣传对日军士兵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驻泗县城内的日军小队长矢岗，问一位常到根据地做生意的商人：“半城那里有没有日本人？”商人向他介绍了淮北支部几位盟员的情况。矢岗问：“照你说，新四军不杀日军俘虏？”商人说：“不杀，而且对他们照顾得很好。他们天

天和新四军在一起。”矢岗听了很高兴，说：“真的不杀，大大的好！”不久，他就托人给支部捎来信，要求捎给他宣传品、布告。淮北支部给某据点的日军士兵送去了慰问袋，对方很快捎来了回信：“谢谢反战同盟兄弟，我们每天都仔细地看你们的宣传品。”

淮北支部还做好死亡日军士兵的善后工作。1942年12月9日，日军1000多人包围我26团驻地朱家岗。我指战员英勇反击，歼敌280多人，创造了新四军又一以少胜多的战例。这次战斗我军牺牲73人。1943年10月泗阳县委决定在朱家岗建立烈士公墓。同时，在公墓东南侧，设墓埋葬了13具日军遗体，并且以支部名义，用日本文书写勒石，立于墓前。其碑文译文如下：

日军阵亡官兵之墓

日军千余人，与新四军战后，1942年12月10日，小队长以下13人，不幸与世长辞，与父母妻儿永别，长眠于此。

新四军将他们的遗体妥善埋葬，这即是侵华战争之残忍和日本军国主义、大资本家谋私利之罪证。

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

昭和18年10月10日立

这日军阵亡官兵之墓，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留下的侵略罪证，也是日本军部把侵略战争的苦难强加在本国人民头上的罪证。

第七章

重压下的国统区日人的反战活动

第一节 鹿地研究室的 work

鹿地亘送走盟员后，就和郭沫若、冯乃超商讨善后事宜。根据 8 月 23 日的商定，郭沫若在 26 日上午，把鹿地亘的报告和自己的签呈，送给了张治中。张治中所下的《训令》原本就是迫不得已的，故而在接到报告和签呈后，正好顺水推舟，报请蒋介石同意，在政治部内设立鹿地研究室。研究室的任务是协助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科工作，发行刊登研究室研究成果的《鹿地研究报》（油印月刊），由政治部拨给经费。人员共有 4 人：鹿地亘夫妇，从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科派来的康天顺及一名勤务员。

康天顺，1914 年出生于台湾省通霄县。幼年受参加抗日文化协会的兄长和学校教师的影响，从心底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15 岁时，只身去东京上中学。1938 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大陆出生的朋友的帮助下，从横滨坐船，回归祖国，参加抗日战争。

回国后，他先在 60 师任政治工作队员。1939 年 3 月，参加在桂林举办的日本语训练班，他在教务组，作廖体仁的助手。1940

年政治部开始第二期留日学生训练班，培养对敌宣传的较高级干部，廖体仁点名要他去重庆学习。

毕业后，康天顺进入了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他的工作是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派出的、常驻反战同盟的联络员。他实际没去鹿地研究室工作。同盟员去镇远收容所以后，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实际上只剩下两个部分：一是在重庆的鹿地研究室，一是在镇远的和平村训练班。训练班是同盟的实体，而研究室则是同盟的首脑机关，是探路、开路的尖兵。

由于战争，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国统区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物价每个月上涨一倍，但鹿地研究室的经费并没有相应增加，致使鹿地一家生活十分困难。池田幸子也因劳累、营养不良生了病；鹿地亘经常穿着补过的衣裤、破旧的皮鞋出去工作。不少同情者，说国民党对国际友人不爱护，不尊重。实际上这是对国民党的一种生动形象的抗议。鹿地研究室看到这种形势，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尽可能地展开活动，把徒有其名的研究室，变成有实质内容的，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单位。

当时日本为配合欧洲战场，积极准备进一步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外相松冈泽右立即奏请天皇，要求参加对苏联作战。日本统治者就此进行了反复讨论，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德苏战争暂不介入，暗中准备，乘机机会全力向南方加紧扩张，不惜对美英一战。

7月，日本内阁改组，表面上撤掉了对美强硬的松冈泽右，并于7月下旬至9月，在中国东北地区调集70万兵力，600架飞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犹如日苏间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在演习前，日本大本营内部密令对苏不得刺激，即使是发生纷争，也应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不得引起全面的日苏战争。结果，“满”苏边境什么事也没有发生。8月9日，又命令以十六个师团防备苏

联，以 11 月底为限期，作好对英美作战的一切准备。

日军在“北进”的烟幕中，不断向南进军。1941 年 7 月底 8 月初，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8 月 1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首相邱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17 日，罗斯福向日本发出了准最后通牒。9 月 10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提前到 10 月下旬完成对美英作战的一切准备。

上述公开的和秘密的情况，使得国民党上下都十分关心，不断议论着：日本军将向南侵略，还是向北侵略？

王芃生、崔万秋等推测日本将北进，其理由是：日本一定会根据同盟条约，响应希特勒的行动，向西伯利亚、乌拉尔进攻。中国应该援助苏联，派八路军进攻东北日军（把八路军置于日军炮火下，借日军这把刀，消灭八路军）。这样，美英盟军必将会支援苏联、中国，从太平洋正面攻击日本，国民党就能一箭三雕：既消灭了八路军，又打败了日本，最后攫取抗战的全部胜利果实。

当时，重庆各大单位对此问题都展开了讨论。这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敌情研究室（即第一科）协助下，鹿地亘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又接到从镇远收容所传来的不少情报。鹿地亘认真分析了当前日本战争的动向，向重庆各界人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日本主观上是想向北侵略苏联的，希望和希特勒一起，夹攻苏联，和英美妥协，使中国战场暂处相对平静的对峙状态。但英美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已经害怕德国再强大，不希望日本夹攻苏联，他们对日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因英美的不合作，就不敢北进；为了不放弃英美忙于在西方应付希特勒这一有利时机，攫取战略资源，侵占更多国家，配合德国，日本只有向南发展。并且这场战争将长期化，中国将长期成为反法西斯战线中的重要战略性战场，最后日本必将失败！

鹿地亘把反映这些观点的文章，发表在 1941 年《鹿地研究室

报》11月号中。中共的《新华日报》、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党内较进步的邵力子等，都持有相同看法。两周后，即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拉开了序幕，使国民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鹿地研究室的工作，顿时使人侧目而视，受到各界的赞扬。研究室的经费增加了，各界发出要求恢复同盟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开始当面征询鹿地亘对日本将来动向的看法，表示想聘请他为该部的顾问。

鹿地亘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大局出发，提出三个要求：保证他和镇远的盟员的通信联系；请镇远的同盟员给部里写反战宣传品和从新俘虏那里搜集日本情报；由部里给他们一定的报酬。在王世杰同意了这些要求后，鹿地亘接受了顾问的聘请书。王世杰并且还答应用飞机从昆明运一套日文的活字来，以备印刷出版《鹿地研究室报》使用。1941年12月，英国驻华大使馆致函国民政府，想邀请反战同盟派出工作队，去新加坡参加防卫工作。

1942年1月，冯乃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鹿地亘，他们都很高兴。但却始终不见政治部来人或来函商谈此事。

原来，国民政府又要了诡计。他们接到英国大使馆的要求后，不好回绝，但找文化工作委员会、鹿地亘接洽此事，必然要涉及到恢复同盟的问题。因此，他们置政治部于不顾，绕过文化工作委员会和鹿地研究室，直接让军政部给镇远收容所秘密下令：从原反战同盟中，选拔6个人，组成工作队，交给英国驻华大使馆。

镇远收容所代理所长孙必亨接到命令后，即找盟员个别谈话，要他们答应。但遭到盟员的拒绝，盟员们认为：事关重大，要有训练班集体讨论后方能决定。盟员们集体研究后，提出了：立即和郭沫若、鹿地亘联系；一到重庆即接受鹿地亘的指示；工作队的原则是进行日本人民的革命工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作队

员由训练班自己决定；保证鹿地亘与工作队、训练班之间的通信自由；保证留守队员的学习、工作自由；允许训练班从现在起可以补充准备会员等九项要求。训练班提出了工作队员名单：同盟方面由新田寿太郎、秋山龙一、泽村幸雄、益田一郎、林长吉5人参加。考虑到将来所内所有日本人的合作、统一，还提出青山研究室的江川一人加入，共计6人。所方请示了军政部后，答应了上述条件和人选。

在此过程中，训练班给鹿地亘写了几封信，使他得知了此事的具体情况。

1941年12月31日，工作队在所管理员姚开白、何禹门带领下，向重庆出发。几天后到达重庆，冯乃超、鹿地亘、康天顺等欢迎他们。双方亲切握手，将他们带到靠近港口的旅馆，濂户介绍了江川，说：“他是青山研究室的，是个好人，路上给我们不少帮助。”

姚开白、何禹门到军政部去了。旅馆住宿费无法解决，冯乃超决定把工作队队员带到赖家桥，住在原抗战同盟的宿舍。

一到赖家桥，泽村就介绍：“何禹门是广西大学的学生，到西南支部后，做了不少坏事。”康天顺说他了解这个人。

青山和夫接到电话后来了，对江川洋进行个别交谈，先是训斥，后又提出“不反战，不与训练班合作”等指示。

当天晚上，濂户和江川两人靠得很近睡觉，濂户和他谈了训练班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看法，训练班的宗旨，训练班、研究班统一的必要性等等，大大启发了江川。第二天，江川脸上神采飞扬，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他决心和训练班站在一起，共同抵制青山和夫的“不反战、不合作”方针。

泽村向鹿地亘等介绍了训练班工作进展情况和生活情况，不少人接近训练班，想加入训练班。

工作队和鹿地亘、冯乃超的接触，使国民党政府感到难堪。于是，开始对工作队实施隔离，阻挠、破坏等手段，并由邹任之、青山和夫、崔万秋负责具体实施。

几天后，何禹门来到赖家桥，突然提出工作队与鹿地亘、冯乃超接触的责任问题，接着撤消了工作队的服务人员，把队员们监禁了十多天。当时，西安收容所所长汪大捷被调来代替何禹门、姚开白。汪大捷把队员们转移到市内宽仁街国际旅社住宿，等待与英方的联系。汪大捷怕队员们不服从管理，没有卡断工作队与鹿地亘之间的联系。

不久，新加坡被日军占领，英方邀请工作队改去印度的新德里。邹任之、崔万秋等便唆使受他们控制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空公司负责人，在飞抵新德里前，要给队员们戴上手铐脚镣，以防不测。致使队员们没有成行。

反战同盟虽然没能去新德里，但却利用在重庆滞留的三个月时间，使队员们充分了解了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正确地估计了战后的情况，为训练班、研究室的接近，新俘虏加入反战的统一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正如1942年3月28日在工作队离开重庆前夕，濑户写给鹿地亘的信中所说：“思索起来，不去印度，只是来到重庆这件事，我们认为，已经得到了很大收获。这个由失败而得到的收获，决不是一句空话。不远的将来，应是接近‘光荣时期’。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回敬那‘失败’。”

3月底，工作队一行离开重庆回镇远。何禹门见康天顺熟悉日本人，就建议康天顺去镇远工作。郭沫若、鹿地亘考虑康天顺去镇远，可做鹿地研究室的秘密联络员，康天顺会给训练班以大力援助。因而，就同意了这个建议。经过冯乃超多次说服，康天顺才接受了这项任务。康天顺、何禹门和工作队员一起去了镇远。

第二节 盟员们在镇远收容所

重庆总部的盟员 8 月 28 日早晨离开重庆，坐拖拉机拉的车厢，经过 780 公里危险的山道，在 9 月 6 日下午 5 时到达镇远。桂林西南支部的盟员，这时也已到达镇远。

8 月 26 日，西南支部的盟员在早晨 5 点被喊起床。二十多名武装宪兵，站在四周。大家集合到礼堂，听林长墉讲话，他说：同盟总部和支部的全体盟员，集结贵阳、接受合同训练。重庆总部的人已经出发，鹿地巨夫妇也来。这边因为迟了，所以要大家坐汽车，一同到宪兵队，然后从那里出发。

他们先到七星岩宪兵队，受到很好的照顾。早晚散步，有报纸可以阅读，可以通信。盟员们要在这里等两三天才有火车。

林长墉走了。廖济寰、宣季宝、麻生哲等凑了 65 元钱，送给了盟员。

9 月 2 日，吃过早饭上火车。他们坐一节三等车厢。16 位盟员，加 20 位宪兵，火车向东开去。3 日 6 点到达衡阳。早饭后，立即分坐三辆拖拉机车厢，不是去贵阳，改去镇远了。

9 月 6 日下午 3 点，到了镇远收容所，过两小时，总部的盟员也到了。镇远，在贵州东南部的云贵高原山中，县城大街中，有澧水流动。县城分卫城和府城，周围有苗族、侗族居住。从明代起，就成为交通要道和物资集散地，县城大街是作为名胜地而发展起来的。

第二俘虏收容所在卫城，它后靠五老山，前临清清的澧水，环境十分幽雅。

这里原是贵州第二监狱，周围有 5 米高的用砖砌成的坚固围墙，四周有高高的监视哨，入口处，有持枪的卫兵警戒。

一入收容所大门，是一栋木造的二层楼，楼下面是职员办公室，楼上是俘虏收容室。这一部分是前院。

和前院隔个门是后院。内有设有舞台的大礼堂，它周围是俘虏收容室。这两大建筑物外，有运动场，靠山有防空壕沟，靠围墙，有俘虏的厨房和病员室。

前院楼上收容 100 多人，有反战同盟 20 多人，长沙会战后从各地临时收容所送来的新生班 50 多人，唯邹任之之命是从的青山研究室的研究班 24 人。从二楼入口，分别为训练班、研究班、新生班。邹任之这样安排，是由研究班居中监视训练班与新生班的接近。

后院是思想没有变化的顽固者。后院里还有特别班，内有台湾人、朝鲜人和中国人。另外，前院楼上还住着三位女性：一位朝鲜人，两位日本人，她们原是日军的慰安妇。后院丘陵上有监禁所，成仓等九人，都关在那里。

收容所有 20 多个中国聋哑人。他们被国民党军队作为日本人逮捕进来，这样，军官们就可得到更多的奖金。由此可见，国民党军是多么腐败！

收容所有七名职员，十多个雇员。所长邹任之已去上海工作，代理所长为孙必亨大校，政治军官。他曾留学日本，但无工作经验。在收容所，主要精力放在“吃空额”捞钱上。上级来检查人数时，到街上拉几个人来充数；有的俘虏死了半年，还向上面领他的伙食、服装等费用；俘虏的伙食低于规定的标准；不按编制设置正式的医生，而是请街上的医生兼任等等。

在收容所内，还设有国民党的地区支部，其专任干事是六十多岁的舒汉生，他是在退休后来这里的，他的工作是在阅览室管理报纸。

1942 年 6 月，所内有俘虏 446 人，后来，最多时俘虏曾达到

600人。

盟员们到镇远收容所后，总部、支部盟员汇合，共有23人。他们研究决定，对外称和平村训练班，由濂户负责研究部，泽村负责事务部，新田负责运动部，开始了独立的活动，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和学习。

1942年9月7日，为了联络感情，训练班做了很多菜肴，招待青山研究班。研究班的总干事是安田宽。他们从常德转移到这里来后，根据邹任之、青山和夫的意见，成立了研究班。原来他们准备成立独立的反战同盟，但被上级拒绝。这个团体有21人，在青山和夫的指令下，做各种工作。后来，训练班决定和研究班合作，并与安田进行了联系，安田表示可以合作，但不能和训练班一起研究问题、共同办伙食。所方也希望双方合作，但研究班一直拒绝。

9月17日，收容所主持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山野井代表训练班致了感谢词。中国方面、研究班的代表、桂林来的坂本、及川都先后讲了话。大家开始成了朋友。

训练班在征得所长的同意后，和后院的日本人，会见了两、三次，交流了生活情况和一些见解、看法。

训练班为接触全体俘虏，提议举行了棒球比赛。

训练班讨论、学习时，研究班的人来旁听，研究班讨论、学习时，训练班的人也去旁听。训练班从各方面逐渐加强了同研究班的联系。

山野井协助收容所，为镇远街上出了墙报，并撰写了文章。

1942年6月，组成工作队去重庆的6人回来后，青山研究班的人员开始集中到江洋夕的周围，安田等几个人被孤立，他们的不合作言论再也没有市场了。双方的迅速接近，为楼上三个组的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到镇远所任主任管理员的康天顺，首先把自己的住处搬到后院，以便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想法，伊藤慎之助向他反映了不少问题，康天顺根据实际情况，凡不用花钱就可以改善的，尽力着手办理。

首先，改进了点名方法。在收容所，每天早晚两次点名。点名时，除了病人，都整队集合到运动场上。先从前院开始，弄清了病号及其他未到者的情况后，再点后院。每次约需一小时。现在，前后院一起点名，有关人员报告病号及其他未到者后，就解散。这样，每次点名只需10分钟，使大家都很高兴。

其次，是卫生方面。收容所营养差，卫生设备少，医生少，俘虏得病后死亡率高，从1940年到1944年，共收容了600人，死亡者竟达159人。按规定，收容所应配有享受大尉待遇的医生，但实际上并没有配备。有病就只好到街上请医生来看。给病人治疗带来很多不便。康天顺了解到俘虏中有一个军医、7个卫生员。就和有关部门商量，给这位军医开处方权。这样，看病、吃药就方便多了，死亡率也下降了。

收容所的厕所紧挨着病房，苍蝇、蚊子很多，通过板壁，臭味不断传来。康天顺请俘虏中的木工，给解大便处做了木盖子，维修了墙壁，请卫生员当护士，每天在病房、厕所用石灰消毒，夜间烧艾草驱赶蚊子。

接着，康天顺领着有关俘虏，打了一口深井，极大地改善了饮水卫生。

1941年，新任所长莫锦龙到任。因他不是特务系统的，原来邹任之手下的特务职员就以全体辞职相威胁。康天顺拒绝参与。这样莫所长对他有了好感，把所里管理方面的大权交给了他。他在不侵犯莫锦龙的行政管理权的情况下，用了不少钱来改善俘虏的生活。

他先从改善伙食着手。在他建议下，由俘虏们自己成立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由俘虏们轮流值班，每周和职员一起，去街上采购副食品。有时，康天顺带着较可靠的俘虏到河里捕鱼，到山上挖野菜、摘野果，从而大大改善了伙食。有时，收获多了，就分一份给职员家庭，一起享用。

他又带领俘虏中的木工、水泥匠，建造了浴室，每班轮流洗澡，这大大改善了俘虏们的卫生、健康状况。

他还发动俘虏们制作工艺品。用木板制作飞机、汽车等模型；用小牛角雕刻印章；用木头和小牛角的薄片，做成了能够竖起的漂亮的麻将牌；还制作了琴和挂钟。开始通过所里的中国工人到市场上出售，工人从中抽取厚利。后来就由所方派俘虏中的专人负责出售工艺品。训练班、新生班卖的钱款，作为病人的医药费和改善伙食用。有的比较精致的作品，经过红十字会，送到重庆展览，引起很大反响。

康天顺同样注重对俘虏们的思想改造。他和训练班的同志们经常研究这个问题。他到任后不久，是第二俘虏收容所成立4周年纪念，在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请镇远县的乐团演奏了斗牛士乐曲，京剧团演了《女起解》。并请来镇远师范学校的女学生表演了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

不久，是反战同盟成立的纪念日。康天顺为了使大家得到娱乐，提议在后院大礼堂举行纪念活动。同盟员们自己写了剧本，演出了反战剧。后院的俘虏们抱着自己制做的乐器伴奏。效果很好。但第二天，后院的十几个班长向他提了意见。他们说：这次文艺表演，给了他们娱乐的机会，他们是感激的。但强制看反战剧，很不好。此前，女学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那是可以的，但自己同胞演反对祖国的反战剧，那是不能容忍的。反战分子使用大礼堂，演出反战剧是个问题。另外，强制俘虏参加反战团体的活动，

也是不应当的。

康天顺说：“反战同盟是中国公认的团体，训练班是收容所的一个单位，决不是什么特定团体。某团体举行纪念活动，你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但不准妨碍别人参加。反战剧的内容，是反对侵略战争，决不是反对你们的祖国。另外，大礼堂是收容所的公共设施，我有同意使用的权力。但是，任何宣传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的戏剧，不准演出。”

听了康天顺的话，他们不再讲什么了。

这以后，就在前院举行纪念活动，进行庆祝大会，大声唱反战歌和国际歌。

阴历5月5日是端午节。同盟员用镇远特产的皮纸，做了几条高1—2米长的鲤鱼，高高挂着，以激发大家思念故乡、孩子和平。后院的俘虏也学着做了。这时有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来视察，后院的一俘虏竟向他们提出：要像挂鲤鱼那样，在后院悬挂日本国旗。这引起了某些人的同情。他们为了征得同意，竟开始了绝食斗争。

康天顺生气了，对他们严加训斥：“你们要在收容所挂日本国旗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们铁蹄下的占领地，这是中国大后方的收容所。你们是战争中的俘虏，俘虏能在收容所中挂自己国家的国旗吗？这符合国际惯例和战时国际公法吗？你们拿着日本旗，侵略了中国。这种旗，中国民众看了只能把它踏在脚下面。日本旗，是中国人不想看的脏物。”

“我们只有在日本旗下，心里才感到好受。”他们回答。

“你们拿着日本旗，继续侵略中国，才会说这样的话。在这种旗子下，哪一天有平安呢？你们好好想想。待我们抗战胜利了，你们回国后，再挂这种旗子吧！你们作为俘虏，为你们国家作了哪些事，你们要好好考虑！在这里，绝对不准挂日本旗。在这个问

题上，我一点也不能通融！”

后院大多数俘虏，都明白了这是个错误要求。

收容所后面的山中，有原宪兵队管理的特别监狱。康天顺上任后，不得不把一个逃亡者，两个严重违犯管理规定者，送进了特别监狱。

在康天顺到任前，这里的反战同盟的工作，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在油灯下，抄写、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毛泽东的几篇论文。他们经常分析战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编辑、发行机关刊物。康天顺给他们带来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训练班的同志边抄边学，新生班的人也一起参加学习。组成了“明治维新和昭和维新”研究会，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冯乃超曾给康天顺寄来登有毛泽东写的《整顿党的作风》的《群众》杂志，以及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两次都被所内特务、业务科的赵逢吉发现，特务们开始监视康天顺的言行。

康天顺到收容所后，发现新生班的长谷川敏三有正义感，有才华，能团结群众，就主动吸收他和别的一些人到训练班学习。很快地使新生班和训练班联合起来。长谷川敏三成了反战同盟的中心人物。长谷川原是日军某团司令部宣抚班成员，是日军中受信任的人物。把这样顽固的人改造过来，引起了康天顺的深思，使他得出一个结论：改造俘虏，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认识，指出未来的光明前途。

在康天顺的努力下，三组织终于组成联合的新生活协会，后改为和平先锋队，会员 130 人，成为团结的日人民主团体，出版了《和平先锋》，后改为《东亚先锋》。

他们成立了一个福利公司，包括 400 多人，有木工、泥瓦工、铁匠、裁缝、修钟表工等。

训练班领导、引导着收容所的大部分人进行学习，提高思想

觉悟、辨别国际形势，修正自己的态度。同时，他们从不断送入收容所的新俘虏那里，搜集、汇总日本国内、侵占地区和日军内部的情报。并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形势，也为重庆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鹿地研究室，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送去有关资料。从1942年到1944年，共送资料150多份。

第三节 鹿地亘在镇远收容所

随着反法西斯各国利益的接近和团结的进一步加强，1942年3月15日，在中国战场成立了美英中苏四国联合参谋部，由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美国逐渐地取代英国，开始不断地增强了对国民政府的影响力。随着战争的发展，反战同盟过去的活动成就，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关注。美国从打败日本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表示将关注同盟的情况。

随美国战略情报局重庆分局负责人来到重庆采访的科丽小姐等两位美国记者，由王炳南介绍，会见了鹿地亘，听他介绍了反战同盟的活动、经验，及对战后日本的展望。

不久，四国联合参谋部的美国日裔军人库路福来到重庆，会见了鹿地亘，要求反战同盟与他们合作。这些美国的日裔军人，是珍珠港事件后，从美国内陆沙漠地带的日裔美国人集中营解放出来，宣誓忠于美国的青年人，他们在陆军情报学校受训后，被派来中国。

美国战略情报局东洋学专家阿卡，带了日裔军人阿利岳西、科齐、库利斯、依西依等四人，来到重庆，成立编辑部，编辑出版日文版的《日本新闻》。但这份报纸办得不够好。如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枚炸弹爆炸，周围一团黑色，旁边还写着“不投降，就看这个惨图吧！”这幅画，受到鹿地亘善意的批评，认为日

本一般群众看了这幅画，只能引起反感，阿卡接受了批评。他们在重庆，不断地表示愿意援助在华日人的反战运动。阿卡还聘请鹿地亘为《日本新闻》的顾问。他写的每篇论文，都认真征求、听取鹿地亘的意见。

鹿地亘充分利用了各个机会，努力宣传反战同盟过去的经验，传播若恢复同盟，会对联合国的反攻，重建日本战后和平，起很大作用的舆论。他考虑到当前的战争趋势，认为现在不仅要反战，而且要开始进行战后日本的准备工作。他认为，仅仅恢复反战同盟，已经远远不够，应该建立日本民族解放同盟一类性质的组织。当时的舆论，正在探求这种想法。美国人爱马索对此想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美国人如此重视鹿地亘和他领导的反战同盟，不能不使国民党意识到他们过去解散反战同盟的错误，也开始重视鹿地亘了。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国民党中央礼堂，主办演讲会，特邀鹿地亘用英语对在重庆的外国人，作关于战后日本展望的演讲。受到各国听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接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邀请鹿地亘、青山和夫谈话。鹿地亘提出：由宣传部请镇远收容所中的训练班写广播稿、传单、调查资料等，宣传部以稿费的形式，送训练班以经费。王世杰同意。

宣传部给训练班稿件付稿费一事，给训练班成员以精神鼓励；对他们治疗疾病，是个很大帮助。文化工作委员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请训练班写各方面的稿件，并以稿费的名义，给予财政援助。军政部等机关，也不便从中作梗了。

国民党宣传部为要鹿地亘工作，在部内为他专门设了一间办公室。他除了研究室工作，一般不去那里，后来由宗十郎、山野井去那里做联系工作。

这时，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陈诚，从昆明的司令部发函，聘请鹿地亘担任中国远征军驻重庆顾问。鹿地研究室的工作不断地增多了。

政治部面临当时的形势，很想把鹿地研究室，和日人反战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派第三厅第一科科长曹先锟来到鹿地研究室，问需要什么帮助，鹿地亘提出：“最好的帮助，是恢复反战同盟。”

1943年12月初，鹿地研究室为了在外部扩大工作范围、影响，给政治部施加更多压力，提出增加人员的要求。政治部很快同意了，即以扩大研究室，增加工作人员为理由，由鹿地亘选用反战同盟的三名干部。

鹿地亘一方面不愿意国民党机关派宪兵把三名同盟干部带上手铐脚镣，送来重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趁在镇远收容所停留期间，和训练班成员以及全体俘虏接触，向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将来的展望，和为战后日本做准备工作等，给他们鼓励和信心，使他们更好地生活、学习和工作。

经政治部同意，鹿地亘决定亲自去一趟镇远。12月4日，他为选购带去镇远的东西上街时，碰到从日军占领区回来的邹任之。邹任之劝告鹿地亘不要去镇远，取消要三个同盟干部的计划，集中精力，写一份关于战后日本展望的计划书，由他转呈给蒋介石。并认为这样做，对鹿地亘、对反战同盟员，都将有好处。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和邹任之本人的又一个阴谋。

鹿地亘敷衍着说：“让我考虑考虑吧！”第二天，即12月5日上午，他接到政治部正式批文，就带着政治部第三厅一位上校科长、特务任明德和一位勤务员踏上了去贵州的旅途。

他们在路上坐了七天汽车，快到终点时，汽车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凹地慢行，鹿地亘突然听到路那边有人用纯粹的日本语喊他

的姓名。他立即看到，在修理的拖拉机旁，一群穿着灰色衣服的人中高举双手的康天顺。

他让车停下，快步走过去，看到康天顺的双脚上铐着脚镣，一个宪兵用绳子牵着他，一小队共8个宪兵，押送他去重庆。康天顺请鹿地亘拍电报给郭沫若，赶快营救他。

据后来了解，当时蒋介石的侍卫长、军政部第一副部长钱大钧于1943年11月28日下了密令：逮捕收容所主任管理员康天顺，没收他的一切物品，交当地宪兵队押送重庆。

莫锦龙把康天顺叫到警备中队洪队长的家中，问康天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康天顺说没有，请调查。莫锦龙于是打电报给军政部，说自己正在调查康天顺的问题。他把康天顺留在洪队长家里。康天顺怕当局从训练班那里查出有关书刊和资料，就写了个条子，说自己在街上喝酒，遭到厄运，被拖拉机碰伤了脚，流了很多血，请派人捎衣服来替换。条子请管理员朱宗熹捎到训练班。（朱宗熹，1939年在桂林行营时，就与鹿地亘、西南支部成员认识。后在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北京《人民画报》社离休干部）这样，就使训练班的人们有了准备。

过了三天，军政部又来了电报，催着要尽快将康天顺押赴重庆。莫锦龙在监禁室为康天顺开了送别会。他们从早晨出发，坐了三小时的拖拉机，在飞云岩遇到了坐汽车来的鹿地亘。鹿地亘拿出身份证，要宪兵在路上照顾好康天顺，并拿出200元钱，给康天顺路上用。

鹿地亘算了一下，正是他出发的那一天，即他碰到邹任之的第二天，钱大钧下了逮捕康天顺的密令。很明显，这一计划的直接目的，是要卡断他与收容所的接触。他考虑到在镇远拍电报太危险，康天顺会因此在路上被害死，因而只能待回去途经贵阳时，偷偷拍电报给郭沫若。

鹿地亘一行到达镇远，住进街中的旅馆。待问清收容所的地址后，鹿地亘、任明德就一起去收容所。

收容所的卫兵将他们带到里面，二楼上很快有人看见了他们。“啊！鹿地先生来了！”濑户、长吉、樱井等都奔下楼来，逐个与鹿地亘握手、问好。

他们问鹿地亘看见康天顺没有，鹿地亘说：“他才走，有两个小时，被押送到重庆去了。”

鹿地亘会见了濑户、及川、宗十郎、江都，决定住在收容所里面。莫锦龙来了，带他们两人到所住的旅馆吃饭。吃饭时，鹿地亘提出，他要在收容所内住两个星期，以便会见俘虏。并说这已得到政治部的同意。

但莫锦龙拒绝了他在收容所住宿的要求，也不同意他去参观。

晚上，鹿地亘要任明德打电报给政治部、军政部，请他们打电报到收容所。鹿地亘说：“我不达目的，决不回重庆！”任明德无奈，只好去拍了电报。

从这天晚上开始，这个山城的军政各界要人，轮流欢迎、宴请“著名的日本人”。鹿地亘还受邀请，到部队中作了演讲。

第六天，才得到莫所长的同意，开始参观收容所，但不允许与俘虏谈话。

他们先到前院二楼。一上楼，先看到一红十字病室，下个房间是训练班。接着是研究班，见到了内岛（江洋夕）和安田宽一。有人叫先看新生班，第三到第五个房间是新生班住的。新生班的人一定要鹿地亘讲话，并公开说：“中国当局讲的话不可信。”鹿地亘答应以后一定讲。

往回走，见到及川等，鹿地亘和大家紧紧握手。

最后，到了一间妇女住的房间。住在这里的女人大概有三十四、五岁，样子不大正派。

他们在所长室休息时，前后院都派来代表，欢迎他们，并请他们看棒球比赛。

看比赛时，几百名日本人一起喊口号、握手，表示欢迎他们。这实际是对收容所当局抗议、示威。

根据规定日程，第二天，鹿地亘开始对收容所 500 位日本人演讲。他说：“激流总会冲过岩石向前流的，这是我最近一个总的感觉。只要能流着，总会冲过岩石，向前流出一条河来。否则，不流动就会成为腐水……冲过岩石的流水，以想象不到的速度流向平原，前面就是广大的平原，那就是湘南的大平原啊！”

鹿地亘展望了太平洋战争、欧洲战争的形势。指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转向胜利，日本军部必然失败，民主日本一定会建立。“我们与岩石战斗，必然会结出胜利的果实。”

鹿地亘强调：“前舍、后舍，不要对立，忘记过去的对立，以民族为重，结成一体，为胜利的来到，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还会有困难、险阻，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笔直。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定会到达平原，这是一定能办得到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一起，为了和平、友爱，为了新的世界，让我们一齐努力吧！”“大家要学习不惧艰险的流水。水的力量能够改变火山的面貌。否则，这水只能是腐水、臭水！”

绝大多数人举起了手，表示他们的决心。

莫锦龙开始对鹿地亘表示好感，特别是这以后三天，从早到晚一直陪着鹿地亘，到各班开座谈会，举行招待会、宴会。预先安排的日程，一直顺利地进行着。

最后一天的午前，在各班的房间开座谈会，接着照例是宴会。训练班派来几位代表，一定要鹿地亘去参加他们的欢送会。莫锦龙对此不太高兴。但在任明德、何禹门的赞同下，他也去出席了

训练班的欢送会。

这是胜利的祝贺宴会。会上，大家请鹿地亘代向郭沫若问好。

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训练班开座谈会时，别班的人都来旁听。莫锦龙说：“这违背原有的协定！”这样，鹿地亘只好请其它班的人出去。但他们到门外，就不走了，站在那儿继续听。

告别收容所前，鹿地亘由濑户带着，去看已去世的新田寿太郎、森本、川本的墓。他们在收容所后面的小山丘上安息着。

临行前，鹿地亘在前舍，接见了及川（山川腰）、山野井（岸本胜）、宗十郎（泽村）三人。三个班的全体日本人等着欢送他们。

鹿地亘把军帽高高扬起，深情地说：“亲爱的同胞们，我们走了。但我们还是一个整体。我们宣誓：我们不做腐水，我们是急流。我们要冲破岩石，向前！我们永远是一个整体，永远大步向前！”

鹿地亘和莫锦龙握手后，离开了收容所。

在贵阳，鹿地亘和任明德散步时，抽空偷偷去了邮局，把准备好的电文，拍给了郭沫若；康天顺被捕，已押去重庆，请立即抢救；鹿地亘发自贵阳。

本编小结

1942年8月——1944年1月，这近一年半的时期内，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各国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转折时期。日本在军事上开始不断失败的同时，国内各种矛盾迅速加剧。在侵华战争中，因给养变劣，作战伤亡剧增，日军内部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增多。

在延安召开的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以及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成立，特别是士兵大会制

订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反战团体大会通过的《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根据过去几年反战工作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前者规划了日军内士兵经过争取能够达到的目的和各个方面的要求，也即规划了反战同盟工作时的口号、标语、宣传题目；后者指出了反战团体各方面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些，标志着敌后日人反战运动已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等各个方面，进入到一个成熟的新时期。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组织上更加巩固发展，并且在晋西北建立了分校。由先进的学员担任了学校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学员们的反战宣传工作，和大批毕业学员奔赴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对那里的反战同盟的建立，反战工作的深入，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进一步显示出它作为解放区日人反战运动的摇篮和基地的作用。

在华北联合会、日本工农学校指导、支援下，华北、华中的日人反战运动跨入新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反战同盟支部的普遍建立和扩大；反战活动的更加深入和见效；主动投奔八路军、新四军的日军士兵和日军俘虏的不断增多。

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遭到国民党的多方限制，以至扼杀。经历了一个大挫折。但在郭沫若等人的有力支持下，仍继续秘密存在、发展。鹿地研究室的工作，越来越引起反法西斯同盟国美、英等国的重视。在镇远收容所的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经过长期工作，使青山和夫把持的青山研究班，新来俘虏组成的新生班，与之逐步接近，联合成立了新生活协会，为所内组成包括全体日本人在内的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国统区的日人反战活动正在冲破国民党政府布下的重重黑云，发射出它特有的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光芒！

第四编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建立 和反战运动的胜利结束

(1944年1月——1946年)

第一章

日本政府统治下人民反战运动的蔓延

日军继续不断地败退。1944年2月，美军于马绍尔群岛登陆。7月7日，塞班岛三万日军全部战死。8月10日，美军攻占关岛。1945年1月9日，美军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6月25日，美军占领冲绳全岛。美军从1944年6月18日起，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使日本不少城市变成焦土。

同时，亚洲各国人民也奋起抗击。在越南，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建立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人民在各地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在菲律宾，1942年3月，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成立，建立了解放区，不少华侨加入人民抗日军，组成“四八中队”（“四八”两字，取自新四军和八路军）。在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也有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5月2日英军占领仰光。在光复缅甸中，缅甸人民抗日武装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解放区军民在1944年开始了局部反攻，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日军主力长期陷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泥沼。中国军民的长期抗战，是彻底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一个主要因素。

1945年5月8日，疯狂残暴的德国法西斯侵略集团投降。同

样疯狂残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集团，面临绝境。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军部、财阀在战争不断败退时，采取措施，不断强化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对人民进一步压榨，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财阀们则从中大发战争财。战争导致日军人数猛增，最多时竟高达七百万兵力。日本国内劳动力越来越紧张。

军火工业迅速膨胀，民用工业、农业急剧萎缩，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944年，全国棉纺织品的产量，仅为1.49亿平方米，只有1937年的七分之一，而且大部分被用于军需。农业、渔业部门的产量，则倒退到1933年的水平。1943年底，日本农商省估计，全国缺粮1000万—1500万石。

消费品不足。人民普遍贫困。社会一派衰败景象。

日军士兵的待遇逐年下降。日军士兵的名义月薪虽有增加，但扣去强迫储蓄金，加上物价上涨的影响，其实际所能购买的物品，在不断减少。日军士兵伙食不断恶化。到1943年，在华北的日军士兵，不少连面粉、蔬菜、萝卜、南瓜等，都吃不饱肚子。其他日用品方面的供应，更是每况愈下。

日军官兵素质不断下降。随着战争的扩大和伤亡的剧增，现役军官中，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原来每个中队为200人—240人，后来仅有120人—130人。不少新兵，体质很差，不能作战，只能担任警戒任务。

1943年后，日军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这里有高级军官与下级军官的矛盾，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与非士官学校毕业军官的矛盾，老兵与新兵的矛盾，日军中的日本籍军人与朝鲜、台湾籍军人的矛盾等。主要的是官兵间的矛盾在不断加深。士兵们展开的反对军官压迫、剥削的斗争，个别的或集体的，不自觉的或自觉的（主要是受八路军、新四军、日人反战团体宣传的影响）迅

速蔓延开来。

日军士兵装病，不参加打仗，在老兵中变成普遍现象。1944年5月，独立步兵3旅团一士兵，把手伸到射击孔外面，用手榴弹炸掉自己的一只手，达到了回国的目的。

日军士兵逃跑的，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的，不断增多。据日本工农学校调查，来校的新生中，自动逃来投诚者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多：（按每年9月至下一年8月计算）

1939—1940年	1940—1941年	1941—1942年	1942—1943年	1943—1944年
10.0	31.8	21.4	40.7	44.1

从中可以看出，华北、华中的日军士兵的士气，已降到何种低下的程度。

在太平洋各岛的战斗中，日军的士气尚不太低，这和在华北、华中的情况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最重要的是七年来，在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日人反战团体——反战同盟、解放联盟，对日本军队进行了持续的、细致的、面对面的反战宣传的结果。

这一切，表明侵华日军已在不断瓦解中。这一发展趋势，已不是日本军部所能扭转的。

广大日本人民对战争已失去胜利信心，日军士兵完全丧失必胜信念。甚至连日本急进的法西斯头目桥本欣五郎陆军上将，也透露了这种想法：“值此多事之秋，我自己时时对战争的进展情况，产生疑心的感觉。”^①

实际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越来越感到必将失败。某新闻记者的感叹，就是他们的代表：“‘德意志何时投降？’‘下一个定将是日本了。’深深陷入失败主义的人们都断言：日本正在步着意大

^① 见日本《现代》杂志1944年11月号。

利的老路!”^①

在农村,农民拒绝按照军部的要求去做事。《朝日新闻》(西部版)1944年12月5日发表的文章,就写着:“产生必需的食粮,是当务之急。但在我们农村青年中间,缺乏全国农民应该具备的精神,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农民们对政府要他们献出大米,非常不满,用各种方法进行对抗,或者对献出的数量进行抗议。如1944年春,从日本九州和东北地区来到华北的农民说,他们想一切办法隐藏大米。他们说,除了极少数富农家,大多数农家,都隐藏米、薯,拒不献粮。这种现象,在现时农村,已是普遍现象。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就献粮事,掀起了抗议运动。

工人们反战的具体行动,是怠工缺勤,以及破坏机器。这种情况,在军需工厂,更为严重。当时军部、军需资本家在国内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防止工人怠工。如工人缺勤很多的,设在东京的冲电气公司一职员说:“我们厂,把工人编成军队组织,每天早晨开中队长会议,即使这样,缺勤率也没有下降。”^②

常盘煤矿一矿工说,他们煤矿的工人,每月只工作二十天左右。剩下一周或十天的时间,以各种理由休息,公司对此也没有办法。

东京《朝日新闻》1944年10月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东京警察厅,在这前十天时间,在街上拘留了所有有不良言行者,这其中,有意不上班者有6559名。”这只是在街上发现的。由此可见,怠工者人数有多么庞大。为此,有的地方,竟由有关机关出面,组成督查队,专门对付长期缺勤者。

^① 日本《同盟世界周报》1944年10月7日的文章:《时评》。

^② 见《实业之日本》1944年11月号。

在工厂，很多工人，尽可能地怠工，特别是夜班工人。如横须贺海军工厂和东京的野包工业公司的工人，在夜间12点以后，一般就睡大觉，让机器空转。这种现象，在别的工厂也很多。

有的军需工厂，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当时，对日本军需资本家损害最大的，是工人的低效率。工人已开始觉悟到，他们是在为资本家谋利益，为什么要使十二分的劲呢！这是工人们真正开始觉悟的起点。

日本人民正在做大规模斗争的准备。常盘煤矿一位工人的话，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意志和决心：“30岁以上的矿工，都在回顾十几年前的工人运动。他们在现在的苦难困境中，没有消沉。他们正在等待时机。一有机会，工人们就会站出来的。”

第二章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的召开

1943年10月，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召开华北各支部代表大会。会后，从11月底到12月7日，晋西北、太行、晋察冀、冀南、冀中、山东等支部的代表，先后到达延安。从12月中旬起，各位代表，对会议的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先后讨论了一个多月，议论的中心，第一是对1942年8月两次反战会议以来，反战斗争的情况，其中包括宣传工作，对日俘教育工作，防特反特工作等的检讨；第二是关于由反战同盟发展、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问题。

这次扩大的执委会，于1944年1月5日到8日，在日本工农学校礼堂，举行了预备会议，由当时的冀南支部副支部长高山进主持，各支部的代表，分别汇报了一年多时间以来的工作情况，代表们就上述汇报，分组进行了研讨。

1944年1月15日，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了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杉本一夫、森健、高山进等执行委员、各支部的代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代表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冈野进主持。朱德、叶剑英、李初梨等应邀出席了会议。

大会首先通过了名誉主席团，成员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王稼祥、叶剑英、冈野进、市川正一、鹿地亘等。

接着选出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杉本一夫、森健、高山进、吉田太郎、松本一郎等。

与会人员，对在进行日军工作中光荣牺牲的反战同盟员黑田嗣彦、大野静夫、安藤清、浅野清、吉田武、福冈留等，中国同志董秋农、吴部长、周科长等 25 名，朝鲜同志金明华等 8 名同志，默哀一分钟。

杉本一夫致开幕词后，由朱德讲话：

各位反战同盟成员！反战同盟成立以来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各位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开始叫觉醒联盟，那是在晋东南时，同日本同志商量之后成立的。那个组织现在已经壮大了。反战团体如此壮大，这对于中日两国人民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过去，中日两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日本人民不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听说是‘圣战’，是为了天皇陛下，就去卖命。这是一个大问题。

反战同盟开始活动以来，大部分同盟成员懂得了这场战争是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发动的，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同盟力量的壮大，起初比较顽固的人，如今也渐渐理解了，真理唤醒了他们。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以前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它已成为将来的活动向着更好的方面转化的基础。

中日两国人民是勤劳的人民，如果没有战争，可以和平地从事劳动，我们的生活也会提高。各位盟员为了这样的日子曾进行过奋斗。

我希望各位将来进一步开展活动。各位代表远道而来，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充分讨论，相互交流经验和教训。

第二，我们的目的是反战。这是指打倒日本的法西斯军部，建立谋求和平、自由和幸福的人民政府。建立人民政府的国家是不侵略别国的，我相信这必定会实现。因为日本的盟友——意大利已经垮台，希特勒的失败也已不远。所以，日本也必然接着垮台。军部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说‘取得了赫赫战果’了。去年召开的三个会议也和我们抱着同一目的，就是说，从地球上消灭法西斯，在世界上建立起民主的国家，这是三个会议

的共同目的。在开罗会议上通过的归还台湾、朝鲜独立的决议是我们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不过我希望同志们要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工作，努力争取更多的同志。

第三，我想谈一下如何实现以上提出的目标。革命决不是简单的，只靠少数人是不会成功的。我们需要广大的群众，为了争取广大的群众，从实际出发十分重要。在日军占领的后方，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等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们正在组织起来，在深入群众中进行工作时，切勿带有民族偏见，要同群众一起共同工作。当然，为了能做到与群众结合，我们也要积极地给予帮助，应该避免成立以前那种只靠自己的范围很窄的组织。

我们应该投身到群众的伟大洪流中去，我们的活动也要像洪流一样汇合在一起。现在这股洪流日益汹涌澎湃，问题是我们的活动如何利用这股洪流。

重要的是各位要把日本内地的这股潮流和在中国的这股潮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你们有位卓越的领导人冈野进同志，他的工作方法非常出色。在冈野进同志的领导下，定能取得很多成果，尤其在华北将会取得更大成果。

最后预祝各位将来能建立一个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和平的国家！
然后，叶剑英参谋长讲话：

在华北各地指导反战活动的各位代表，今天聚集到延安，在冈野同志的领导下，总结过去的工作，研究制定新的方针，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非常高兴。大约在十年前，中国还把日本叫‘东邻日本’。但是今天已成为一家人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中日两国人民要一同起来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部，建立民主、和平的东亚。恰如建造这座大礼堂时大家一起干一样，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共同奋斗。

日本军部一定会崩溃。日本军部崩溃之日，便是日本人民胜利之时。为了打倒日本军部，建立日本人民的政府，必须让日本人民站起来。必须向还不理解我们抗战，至今尚未觉悟的人民大众作正确的宣传和教育，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你们当中有卓越的领导人冈野同志。为了完成好任务，各位先觉悟者要成为领导者，要克服困难，加强对日本人民的宣传，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阵营里来。为此各位准备成立解放联盟，这具有重大意义。我相信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功。

当然，日本军部不会自行灭亡。他们在灭亡之前必然要进行垂死挣扎。我们的工作接近胜利时将会遇到困难，但是活动家一定要争取胜

利。只进行反战活动是不会实现日本人民的解放的，必须建立解放联盟。各位决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无论什么事情，开始都是弱小的，但会逐渐壮大起来。现在日本军部惊恐万状，把你们的力量比作几个师。只要各位在冈野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出席这次大会的敌军工作部长李初梨也讲了话，

各位一直在从事非常艰苦而困难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向各位反战同盟成员和反战同盟的代表们表示敬意和慰问。下面向各位提出三个问题，希望能讨论一下。

(一)现在反战同盟的力量强大起来了，各位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向日军喊话。你们了解日军的实情，从各方面看，你们向日本士兵喊话有很多有利条件。希望今后的对日军工作，以你们为主力，八路军给各位以支援。

(二)现在日本法西斯军部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已达到极端残忍的程度。在向日本军部发出警告的同时，希望诸位调查一下军部的暴行，作为将来惩罚他们的依据。

(三)现在边区正在扩大衣食的生产。都说生产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现在有学习和生产两项任务。要生产就必须深入群众之中，这有利于思想改造。我们要通过生产解决穿衣吃饭问题。所以希望各位也要重视延安的生产活动。

最后，希望各位充分讨论一下建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问题，并预祝大会成功！

另外，作为来宾出席会议的华侨代表也讲了话：

各位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员们！我能代表一千万华侨在这里讲话，感到光荣。首先我预祝大会成功。

今天在这里召开这样的大会，清楚地表明日本军部处在崩溃的前夜。冈野同志提出建立解放联盟，不仅诸位响应这一号召，一千万华侨也响应这一号召。过去，华侨一直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所以我们也支援你们，因为我们华侨可以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建立，跟日本人民一样得到解放。这个解放事业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不过我们要与各位携手共进。解放联盟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有卓越的领导人冈野同志，还有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法西斯的众多的人民。你们如果成立了解放联盟，我希望把它发展到南洋去。解放联盟的成立，是日本人民的胜利，也是南洋弱小民族的胜利！

上述的开幕词和几个讲话，给代表们以很大鼓舞。

大会共举行正式会议六次，非正式会议十多次。大会通过了《致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书》：

亲爱的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们：

我们代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谨以至诚向你们致战友的敬礼。

你们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并且用尽了一切方法教导我们，使我们从迷梦中清醒过来，使我们有了识别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的能力。

在你们这种恳切熏陶下，我们才能高举起反战的大旗，为了打倒中日人民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建设真正和平、自由、民主的新日本作了献身的奋斗。

现在反战同盟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使得日本军部非常恐惧我们。

对于你们的援助和指导，我们谨表示真诚的谢意！

八路军新四军的将士们：在“把法西斯从地球上铲除干净”这个辉煌的口号下，我们愿作正义的战士，誓以全力支持开罗会议的决定，和你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打倒东方的法西斯强盗——日本军部。

其次，我们和你们一样期待着，我们不仅在战胜日本军部的战争过程中，亲密团结，而且在战胜日本军部之后，仍将继续团结在一起，为了确立真正的东亚和平及建设真正的中日两国的共存共荣而努力。

今天我们在延安召开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在会上慎重地讨论我们的斗争方针。这个会议的成果，将一定会使日本军部的崩溃加速和我们的胜利早日到来。

在这里，我们深切地希望你们今后在各方面给我们更有力的指导和援助。

……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会议

1944年1月15日

另外，扩大执委会还就日军的暴行提出决议：

现在日本法西斯军部崩溃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因此，他们作最后的挣扎，如同负伤的野兽一般奔窜于华北的山野，极尽其残暴之能事，进行大规模的杀戮、放火和掠夺。关于他们的非人道的行为，我们是无法详尽地列举出来。用刺刀和皮鞭强迫无辜的中国民众做苦工，强奸妇女，掠

夺、破坏粮食和资财等残暴行为，已属司空见惯。只要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尽数捕去。或充作新兵练习刺杀的靶子，或吊在树上烧死，或者用火管烙刺，或者割去耳鼻，或者喂军犬，凡此种种残暴，实非笔舌所能描述。而在近来的战斗中，他们公然下令‘杀尽所有的生物，烧尽所有的房舍’。或用机枪扫射，或施放毒气。甚至将数十人，数百人关在一间屋内，纵火焚死。房舍和粮食则全数烧毁，欲使中国民众陷于无食无住的境地。

在这里我们作为正义的战士，认为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军部，是人类的公敌，战后应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加以逮捕，交给民众审判与处决。

同时我们还认为现在强迫有人性的日本士兵干这些暴行的将校们，是暴行的直接罪魁，并向他们发出严重的警告和抗议，要他们立即停止对中国民众的一切无人性的暴行。

为此，我们应该负有详细、系统地调查日本军部的暴行的重大任务。因此，反战同盟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在各支部内设立“日本军队暴行调查委员会”。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行委员会

1944年2月24日

2月7日、8日，在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日军暴行座谈会，日本同志们把亲眼看到的日本军队野兽般的行为做了揭露，下面是座谈会谈话记录：

田中同志：1939年6月初，独混八旅（水原义茂中将）33大队（永泽正美大佐）2中队，从河北省元氏县南佐镇出发讨伐，结果被八路军和民兵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很重，士兵失踪者即达12名之多，中队长三好桃源恼羞成怒，断定城里有人向八路军告密。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新民小学校的—对教员夫妻抓来了。

男的约二十七、八岁，是个文质彬彬的瘦人，女的二十二、三岁，白净的圆脸，一看便知道是个良家妇女。

三好大尉带着小谷军曹和一个中国翻译官走进情报室，把教员夫妻叫到跟前问：“你们为什么把日本的消息告诉了八路军？”连声追问。但教员夫妻却大义凛然，一言不发，只是瞪着眼睛，对翻译官说：“你是中国人，帮日本人做事，难道不害羞吗？”

三好大尉命令军曹，将男的拉到院子里，把衣服剥光，捆在一丈多长的梯子上，用冷水慢慢地灌进鼻子和嘴里，达半小时之久。教员喘不过气来，挣扎着，连梯子都晃动了。女的忍不住，从屋里冲出来，向中队长求

情。但残暴的中队长抬起穿着长筒皮靴的脚，踢在女人胸部上，女人倒在地上，想爬起来抱她的丈夫，中队长叫卫兵把她拉开了。女人临走时，不断地回过头来，望着自己的丈夫。

男的昏过去了，肚胀得像面鼓。中队长叫士兵替他作人工呼吸。醒过来后，吐出的水流在地上有三米多长。当晚，男的被关在卫兵室里。

女的被中队长和中队干部轮奸，一夜之间，变得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眼睛都发红了。

第二天，继续审问，但男的还是一言不发。中队长又把他的衣服剥开，用二公分粗、三十公分长的铁条，烧得通红，对准他的胸部，威胁他，要他自首。可是那男的毫不动摇，只说：“要杀便杀！”于是火红的铁条烫在他的胸部和手臂上，发出吱吱的响声，皮肤上都是红色的血泡，中队长还不满足，又用点着的蜡烛轮流烧他的鼻孔和耳孔。鼻子和耳朵都烧焦了，他浑身痉挛，最后手足僵硬倒在地上。

当天晚上，男的被几个卫兵抛在南佐镇郊外的井里，用手榴弹炸死了。

女人被中队长和中队干部百般侮辱后，在她丈夫死后几天，在南佐镇的郊外被枪毙了。

伊藤同志：1941年，井关第36师团近藤123联队野三大队上田中队在山西省泽州南岭守备时，抓住一个中国人，年纪约二十七、八岁，像个商人。但上田中队长一定说他是敌探。把他交给军医“动手术”。军医叫士兵剥去他的上衣，仰卧在地上，又叫士兵按住他。军医拿一灌满了水的注射器戳进他的胸部，又抽满了血拔出来，接着又继续把水打进商人的身体里去。血开始从这个叫喊着的人的口中流出来，连按着商人手脚的士兵们都转过头去不忍看。只有军医笑嘻嘻地，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商人全身发肿，昏了过去。军医又注射一种药品，那商人又慢慢醒来。仰起身子向军医求饶。军医皱起眉头说，“讨厌”，一脚把商人踢倒，又用水注射进去，这样几次，结果他死了。——那个残酷的军医才拿起他的东西走开。

浅见同志：1941年7月，在北平长辛店军犬训练所，我看到加藤少佐命令士兵把50多个中国人赶进一个围着高墙的院子里。加藤少佐站在围墙上命令道：“开始袭击！”院子那边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一大群军犬如潮水般地涌进来，露出锐利的牙齿，咆哮着，向中国人扑去。中国人叫喊着，从头部到腿部，都被咬烂了，鲜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直溅到军犬的身上。一条军犬张开嘴，摇着头，突然又咬住一个中国人的大腿，咬住之

后，头还左右摆动。有的中国人反抗，用拳头打军犬，但越打越咬得凶，眼看着五十多个中国人，东倒西歪地躺在血泊里，奄奄一息，有的胳膊只剩下一根白骨，有的大腿肉被撕得一条条的，淌着鲜血。而血又刺激着军犬，使军犬更加疯狂了，把这些牺牲者撕成一片片，直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被咬死，吃饱了的军犬才被带走。

大谷同志：1940年5月，日军独混9旅团的第39大队3中队驻在山西忻县的三交镇。有一天，小野少尉对士兵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今天我们来一次杀人实习。你们不要把中国人当人，把他们当作比狗猫还不如的东西好了。勇敢些！现在，自愿参加杀人实习的，向前一步。”没有人动，中尉发火了。“你们这些胆小鬼！没有一个配作日本军人！没有自动出来的吗？好！我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喊名字：“三村——吉川——上野——田岛——大谷”我的天！那是我的名字。在中尉差不多是疯狂咒骂的逼迫下，我用战栗的手举起了上刺刀的步枪，慢慢地走向站在土坑旁边的、神情恐怖的中国人，那个土坑是他们被迫为自己挖掘的墓地。我的心里暗暗向他道歉，求他原谅我。我闭着眼睛，中尉在一边骂着，我把刺刀刺进那呆若木鸡的中国人身上。当我睁开眼时，他已倒在土坑里了。“杀人凶手”，“罪犯”，我这样叫自己。（《解放日报》1944年6月8日）

田中同志：1939年4月，水原旅团伊藤大队加藤中队扫荡河北省晋县一带。我们走进一个村子，听见女人的哭叫声。进门一看，原来是后泽中队长拿着皮鞭，在抽打一个怀孕的女人，那女人流着眼泪，嘴里吐着血丝，在没命地躲闪，但躲到那里，鞭子就抽到那里，中队长上前又一脚把她踢翻，孕妇喘着气，正想爬起来，抬头看见中队长已高举军刀，吓得脸色发青，大着肚子的身体在不停地打颤，嘴里不停地叫喊着。

中队长对准女人的胸部，一刀砍过去，女人哼了一声，就昏过去了，血流满地。

后泽中队长命令一等兵仓田，剥去她的裤子，露出雪白滚圆的肚皮。后泽满足的笑了，命令仓田剖开她的肚皮。仓田听到这个命令，呆住了。后泽发火了，叫道：“这是队长的命令！”仓田只得从旁边用刺刀去刺。可双手发软，戳不进去。后泽不耐烦了，跨在女人的身上，拿起军刀，在女人的肚皮上乱划了一阵，肚皮裂开了。后泽伸手进去抓出胎儿，用刺刀割断胎儿的脑袋，把它劈成两半。临走时，在胎儿的脑袋上贴了一张纸，上面

写着：“这是八路军干的”。^①

延安《解放日报》就日军暴行座谈会发表了评论文章《向日本弟兄们致敬》：

日本工农学校的“日军暴行座谈会”，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中国施行的种种暴行。座谈会的记录只到第二次，所反映的情形也许还只能算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一读内容，那血淋淋的杀戮、放火、掠夺的事实，异想天开的残忍狠毒的杀人花样，已够十分令人惊心动魄，令人非常愤恨了。

报上常常把希特勒称作生番，其实生番的野蛮，还不够形容法西斯主义者的残暴。生番只是野蛮落后而已，虽然有时吃人肉，那是迫于生产力太低，不能不胡乱找一些补助的食物。法西斯军阀却在野蛮上加以近代的技巧，在残忍的暴行里要出千种万种的花样。单就杀人一项来说，枪杀刀砍已是太平凡了，还要创造出打靶，活埋，挖眼，破脑，挖肝，狗吃活人等等极尽残忍的方法，残暴的行为在法西斯军阀已成为嗜好，一定要在被害者的身上造成极大的痛苦，才以为是最大的快乐！简单的生番那里懂得这样多的复杂玩艺？我们座谈会上的日本弟兄们，也不能不愤激地说：“太残忍了，这是人干的事吗？”

的确，日本的军阀不是人，而是野兽，它们在中国土地上及太平洋上横行着，逢人便要伤害。不但中国，连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要一致打死这些野兽，而且日本的人民也要打死这些野兽。这样人类才能继续生存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同学们义愤的语言，是代表日本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上述的暴行表明日本军阀不但把日本国内的人民压制得牛马不如，而且在战场上，把日本人民的子弟——日本士兵们，逼着和野兽同化。饥寒交迫的日本人民如果再知道了他们的子弟是怎样被军阀强迫着试验胆量，学着野兽在无辜的中国人民身上施行惨绝人寰的暴行，是会更觉悟到自己与中国人民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战斗目标的。

上月15日到本月16日，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召开扩大执委会，决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日本工农学校的座谈会就是在这同时召开的。由日本弟兄的口中，把亲身经历过的日军暴行揭露出来，那意义是很大的，这对于全世界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对于中国的抗战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也会有很大的

^① 《解放日报》1944年6月8日。

推动作用。我们感谢日本工农学校的同学们对中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我们期待着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领导日本人民取得斗争的胜利。^①

扩大执委会的代表，一致痛斥了日本军部特务的罪行，通过了《粉碎日本军部特务政策声明书》。

大会检查了1942年8月以来，华北反战同盟的工作。认为1942年8月以前，是华北日人反战工作的播种时期；这以后，贯彻了反战运动的新方针，同盟组织扩大了，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年多时间，是华北反战同盟的巩固时期。

由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反战组织的统一，由于国统区反战同盟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以至实质上的解散，使解放区，特别是延安，明显地成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解放区日人反战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坚决地贯彻了《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和充分运用了《日本士兵要求书》。

盟员们在工作中，执行了新的工作方针，即通过根据日军士兵亲身经历的最感痛切的日常要求，引起他们对战争、对上级军官的不满，促使他们在日军内进行各种斗争。

在宣传方面，有了很大改进。通过散发宣传品、通信、喊话、战地联欢、打电话、送慰问袋等，这些直接与日军士兵接近的方法，已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日本士兵要求书》，已在日军士兵中，引起普遍强烈的共鸣。

总之，这一年多时间，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战斗和政治攻势，由于反战同盟全体成员的坚忍不拔、细致深入的工作，日军内的厌战反战情绪日益炽热，反抗长官、自伤、自杀、逃跑、自动投降、主动投奔八路军的事件，不断增多。日军的士气不断下降，战斗力不断减弱。

^① 《解放日报》1944年2月25日。

会议一致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广泛开展有针对性的,利用、加剧日军内部具体矛盾的宣传手段,逐步采用和日本士兵直接谈话的方法,更加致力于开展联欢工作,组织武装工作队,开展日侨工作,加强反特斗争,调查日军暴行等工作。会议认为,在华日本反战斗士,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很好地完成上述的各项重大任务。

第三章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和发展

第一节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

在扩大的执委会上，冈野进作了题为《日人反战同盟扩大执委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的报告，指出反战同盟进行更广泛政治斗争的客观、主观条件，已经成熟，有必要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负起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的重大任务。

森健在会上作了关于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的提案报告。吉田太郎作了关于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发展、改组为解放联盟的提案报告，指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斗争，将成为解放联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战同盟已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应该发展、改组到解放联盟中去。

2月16日，在扩大执委会举行的闭幕式上，冈野进作了总结报告。大会通过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决议成立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反战同盟善后处理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致八路军、新四军内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书》，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日本人的《告各地日侨书》。

闭幕式结束后，接着举行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该大会《决议》指出：把反战同盟改组、发展为解放联盟，是件极为重大的事情，须待在华、在海外的日侨，和日本国内人民赞同后，才可正式实行。关于解放联盟总部所在地，也要各界日本人协商决定。

华北、华中反战同盟各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由反战同盟改组、发展为解放联盟。这样，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于1944年4月9日，宣布正式解散，其一切工作，移交给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华北地方协议会。

根据扩大执委会决议，由冈野进、森健、杉本一夫，担任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华北委员；由冈本进担任创立准备委员会华中委员，由吉田太郎担任华北地方协议会委员长，冈岛担任副委员长，小林武夫、和田真一、堺清、西忠、水野靖夫等担任委员。

解放联盟成立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请看世界新面貌》的社论，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统一了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的斗争，和日本国内、海外日侨的斗争，定将推动战后出现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日本。

第二节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纲领草案》

该《纲领草案》全文如下：

一、结束战争

由于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大东亚战争，我国的军国主义者及大军火商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我国国民和东亚各民族却遭受了无法计算的牺牲。此战争越延长，我国的困难和危险也越严重。因此，我们要求：

1. 立即停止战争。

2. 从一切占领地区撤退日本军队和军舰。

3. 与交战各国举行和平谈判。

上述方案目的在于使我国国民获得和平生活。

二、永久的和平

近五十年来东亚之战争，几乎全为我国的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由此，我们要求：

1. 严厉处罚发动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大东亚战争的主谋者。

2. 肃清军国主义者在我国政治上的势力。

3. 以保卫国土为限度，减缩军备。废止征兵制，采用志愿兵制。

4. 彻底实行和平外交政策。

5. 参加战后国际和平组织（新国际联盟）。

上述要求目的在于防止战争再度爆发，在共存共荣原则的基础上，确立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三、富强的经济政策

因长期的大规模战争，我国的经济已极度凋敝。因此，我们要求：

1. 削减军费至最低限度，将国家财政之大部分用于复兴、发展经济及提高国民生活。

2. 继续加强国家对银行和大企业（独占企业）的统治。

3. 以现在的重工业为基础，高度发展机械及精密工业。

4. 为了国家之兴隆，确立能最有效地利用土地的土地制度，使农业机械化。

5. 在相互融洽的国际关系中，发展对外贸易。

上述要求目的在于保证我国的独立和繁荣。

四、打倒军事独裁政治

鉴于军国主义者已经成为日本政治中最独裁，最声名狼藉的势力，我们要求：

1. 剥夺军国主义者所有的一切特权。

2. 禁止军人干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

3. 解散军国主义者操纵下的一切团体。

上述要求目的在于净化我国政治。

五、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我国国民之自由民主权利，长期为军国主义者所蹂躏。因此，我们要求：

1. 废除声名狼藉的法令，诸如总动员法、征用法、治安维持法以及

其他一切坏法令。

2. 释放因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者、反对侵害社会权利而被控告和判刑的政治犯。

3. 取消对居住和参与政治的限制。

4. 给人民以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5. 二十岁以上之男女，都应有选举权。

6. 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7. 召集国民会议，修改宪法，以便建立民主制度。

上述要求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日本。

六、改善人民生活

我国人民在军国主义者长期的剥削下，过着第三等级的生活。无望的战争，更使他们陷于饥饿和贫困的深渊。因此，我们要求：

1. 商品的价格和强加于劳动者的捐税必须降低。所有不合理的强制的经济或劳动负担必须废除。

2. 解除对工人及职员工资的限制令，规定公平的工资制度。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建立工会组织。

3. 废除强迫收购农民谷物的制度及不合理的农业法令，允许农民协会存在。

4. 保障学术研究的自由，废止强加于学生的劳动和军事操练，承认进步的学生团体。

5. 对中小商业者，给予更有效的接济。

6. 采取一切方法，改善并提高我国人民生活与文化水平。

七、保证陆军士兵、水兵及其家庭的生活。

现在被征入伍的士兵和退伍的士兵生活最为悲惨。因此，我们要求：

1. 保证被征士兵之家庭的生活。

2. 保证退伍士兵的职业，保证负伤军人及残废军人的生活。

3. 改善陆军士兵和水兵的给养，严禁打骂及虐待士兵；给予外出、通信、读书、集会的自由；给予选举权；服役期满立即退伍，禁止再召集。

如此，以期完全保证与改善战争第一牺牲者的生活。

八、组织人民政府

上述目的，皆为我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但现在的军国主义者和大财阀的政府，对此极力反对，极力阻挠其实现。因此，我们要打倒战争政府，组织代表人民利益及意志的各进步党派联合的人民政府。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1944年2月16日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章程草案》指出：该联盟以贯彻其纲领为目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代表大会；该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该大会选出联盟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正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联盟的日常工作。联盟的组织系统为：中央委员会——地方协议会——地区协议会——支部。章程还规定了团体或个人加入联盟的资格，联盟下级组织的组成和工作，等等。

第三节 解放联盟组织的发展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得到国统区日人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等的全力赞同和支持。鹿地亘做了充分准备，要跨出相同的步伐。终因国民政府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不久，解放联盟华北协议会设立了日本军队研究会、侨民工作委员会、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以更有效地进行有关工作。

解放联盟各级组织相继建立。1944年3月15日，解放联盟晋察冀地区协议会成立，会长津田秀，副会长宫本哲治。

1944年5月5日，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在淮南成立，香河正男为委员长，高峰红志为副委员长。

1944年12月18日，解放联盟冀鲁豫地区协议会成立，会长秋山良照，副会长宫川英男。

1945年1月25日，解放联盟晋冀豫地区协议会成立，会长田村义次，副会长渡边。

同时成立了解放联盟山东地区协议会，会长本桥中，副会长大西正。

据 1945 年 7 月 31 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统计，当时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议会；有晋察冀、冀鲁豫、晋冀豫、山东四个地区协议会；有延安、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滨海、鲁中、鲁南、清河、胶东、冀东、苏中、苏北、淮北（1945 年 6 月 6 日，淮南支部并入淮北支部）、鄂豫、苏浙、华南等二十个支部；联盟员 1000 多人。

第四章

解放区日人反战运动的高涨

第一节 联盟盟员参加整风学习

中国共产党为克服战争造成的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从1941年起，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全党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冈野进的指导和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直接关怀下，在华北、华中的反战同盟——解放联盟员及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先后参加了整风学习。

反战组织成员，由于历史原因，除少数经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一般来说，政治思想水平还不怎么高。具体表现是：有的人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牢固树立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和日本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坚定信念；有的人对艰苦奋斗环境表示不满；有的人始终沉浸于思亲的苦海，不能自拔；有的人甚至认为，新四军、八路军最后会败在日军手中，等等。

在作风上，反战组织的某些成员有军阀作风，缺乏民主意识；不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懂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主观主义严重；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着无的放矢；组织性差；个别组织没能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针对上述情况，敌后日人反战组织先后

进行了整风学习。

反战组织的整风学习，分两个部分进行。一是在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进行，要求较严，其全过程，都类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先是思想动员，接着是学习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冈野进等的有关报告、论著，掌握精神实质，然后深入联系自己思想、工作实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今后努力方向，达到端正思想，加强团结，促进工作的目的。

另一部分是反战同盟员的整风学习。他们根据华北联合会关于整风的规定，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一部分文献，进行对照检查，订出切实可行的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措施。

在整风学习中，盟员们着重学习了1943年7月10日冈野进提出的关于展开“三大学习运动”的指示，积极投入了整风运动。经过学习，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觉悟都有了提高。他们认真交代了过去不敢暴露的错误言行，作了检讨，决心将今后一生献给伟大的日本人民的反战反法西斯事业。

第二节 各支部的反战斗争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日人反战组织的成就，给予它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1944年2月5日，在其《关于部队政治工作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对敌政治攻势应组织武工队，扩大敌后的宣传……敌军工作目前主要注意力，是争取敌军的宣传，进行思想的瓦解工作，并以划归日人反战同盟去做为有利。敌军工作部要集中力量做伪军工作，而对敌军工作，则着重于指导反战同盟。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各组织，在中国军民支持下，在总部领导下，迅速地进一步地开展了对日军的工作。

晋西北支部从1943年底开始，配合晋绥解放区军民，对日军

占领的城镇、据点进行“闪电宣传”，紧张地进行撒传单、贴布告、写标语、喊话等活动。平山县某据点日军士兵看到反战传单后，都说：“他们说的都是对的，我们没有办法。”该据点16名士兵，因厌战先后自杀。1944年7月23日，八路军攻打晋西北岚离路圪洞日军据点战斗中，日军因受解放联盟宣传的影响，小队长和20名士兵很快缴枪投降。

晋察冀支部的反战宣传品，甚至贴到了保定日军司令部、伪河北省行署的大门上。

在太行支部的反战宣传等影响下，1944年2月上旬，太行地区某日军据点4名士兵集体跳井身亡。同年3月3日，太行区中村日军一个分队8名士兵一起向八路军驻地逃跑，途中遭到日军追击，8人都跳井自杀。太行支部盟员砂原利男、佐野甚七在反战工作中，不幸牺牲。砂原利男，日本三重县人，在该县商业学校毕业。1943年8月，来到八路军中。佐野甚七，日本岩手县人，1944年8月自动向八路军投诚。1945年5月底，在八路军部队掩护下，两人一起向晋武河口日军碉堡喊话，遭到敌人扫射，砂原脚部中弹，但他坚持不下火线。两人在继续喊话时又遭敌人猛烈射击，同时壮烈牺牲。6月17日，太行军区为两烈士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称颂他们的业绩和牺牲精神，永垂不朽！^①

冀中支部支部长田中实，1943年在豆铺里战斗中，被日军俘去。日军要他发表背叛反战同盟的声明，遭到他的严厉痛斥。后来他壮烈牺牲。小又长福，1940年4月来到八路军。同年10月，几位日本士兵商量成立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时，他举双手赞成。1941年11月，八路军进行反扫荡时，他和战士们一起浴血奋战，最后负伤被日军俘去。他遭到长期关押，受尽折磨，最后为日本人民

^① 见《解放日报》1945年7月16日版。

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善于做反战宣传工作的吉田，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冀中军民深为哀痛。

由于晋冀豫支部的长期工作，驻潞城日军的不少士兵对战争失去了信心。在该部队调往他处作战时，不少士兵对伪军士兵讲：“我们不会回来了。此去只有死路一条。”1944年12月10日，驻潞城日军某小队队长投奔八路军，受到热情接待，他由衷地说：“这边好！日军那边很不好！”冀鲁豫支部成员醇田嗟产，1943年上半年，随部队进行反扫荡，被敌人包围，在子弹打光后，壮烈自尽。1945年6月7日，冀鲁豫地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宫川英勇，在冀南南峰山官庄反扫荡时，被敌包围，无法突围。他为了不当日军俘虏，毅然拔枪自尽。当日军将宫川遗体运到星德车站时，不少伪军见了深感惭愧，不少日兵也受了感动。日军军官见势不妙，立刻偷偷地把遗体埋于车站附近。峰山六区干部和当地民兵，在6月21日夜，攻入车站附近，将宫川遗体抢回。冀鲁豫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7月12日，解放联盟总部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举行隆重追悼宫川等几位同志的大会。冈野进致了悼词：“在目前重大时机中，我们很不幸失去了几位优秀的干部。但我们并不哀伤，因为他们已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应如何为日本人民的解放去奋斗……我们一定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①

山东各支部，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加强对日军的反战宣传。他们特别注意制作印刷精美、文字生动、画面感人的，富有日本民族色彩的宣传品。这强烈地震撼了当地日军指挥机关。他们在内部通报中，不得不承认：“中共正在各地推行反正、谋叛工作，并且逐渐奏效……各据点已连续发现日本解放联盟的喊话宣传，应

^① 《解放日报》1945年7月16日版。

严加戒备……”仅据地处山东军区东南部的滨海支部统计，在1944年一年中，他们向日军散发传单22,200张，小册子25,000册，与日军通信247封，送慰问袋146个，喊话11次。在此影响下，日军斗志大为下降，如1944年5月6日，八路军在攻打山东徂徕山区王家庄等日军据点时，很快就俘虏了士兵12名。1944年8月15日，八路军在鲁中沂水战役中，使日军士兵山田等15人很快缴枪投降。1944年秋，胶东支部成员，随部队分赴四个地区，开展反战攻势。在攻打日军据点水道战斗中，副支部长小林清等冒着极度危险，进入据点附近，进行喊话，使10名士兵，在战火中投奔到八路军方面。在围攻荣成县城战斗中，胶东支部成员从四面进行喊话，一些才从水道战斗中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也主动上前线呼喊同乡放下武器。这使该城日军军心紊乱，不得不放弃据点，向外逃窜。有的盟员，在战斗中英勇献身。如山东分会的经木，在反扫荡中被敌人包围，与两位中国战友将手榴弹掷完后，在与敌人拚刺刀时，被日军俘去。他坚贞不屈，临刑时，还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日本共产党万岁！”

在苏中支部的政治攻势等影响下，1944年3月车桥战役中，日军中尉山本一三、军曹水鲁吉率梅村政一、宫末一郎等残部24人，投降新四军，并且很快要求加入解放联盟，要求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1944年6月23日如中战斗中，新四军很快活捉了日军小队长等14人。1944年5月14日，驻江都县仙女庙的日军山本师822部队的渡边，带着妻子一起投奔了新四军。1945年1月10日，驻石庄日军曹长田井达三及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等武器，投诚新四军。同年6月初，驻苏州狮泾桥的日军宪兵伊山志雄，在解放联盟启发下，毅然放了捉来做苦役的中国人，自己投奔了新四军。在苏中车桥战役中，盟员松野觉英勇献身。

松野觉是日本广岛县人，1941年12月来到新四军，1943年任苏中支部委员，1944年12月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常写作传单。他自制弓箭，练习用弓箭把传单射入据点。他经常上前线向日军喊话。1944年2月12日，在新四军攻打泾口战斗中，他的喊话，打动了日军士兵的心，使据点里的日军士兵，鼓掌欢迎。同年3月初，车桥战役时，松野觉等人主动要求上前线向日军喊话。当日军龟缩到最后一个碉堡后，他冒着危险，进到距敌人20米的一个碉堡处，向日军喊话，以最后争取日军士兵能少伤亡些。但死到临头的日军毫不领情，使他不得不拿起旁边战士的步枪，两枪打死两个敌人。当开第三枪时，他自己头部中弹，当场牺牲。苏中支部刊物《新时代》，专门出了一期纪念松野觉的专刊，共发表了新四军一师敌工部长陈超寰等写的五篇文章，以示中日人民永远纪念这位日本反战反法西斯的英雄！

在苏北支部等的宣传、启发下，在1944年8月28日大兴镇战斗中，一开始就俘虏了日军警备团长青柳坂次郎等6人。不久，这6人主动要求参加了苏北支部。

1944年后，鄂豫支部成员分散到8个军分区，展开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并且在各军分区，成立了鄂豫支部的支部。1945年8月，该支部盟员已达100多人。鄂豫支部支部长坂谷义次郎，日本大阪人，1940年主动投奔新四军五师。1941年11月，和几位同志一起建立鄂豫支部。他在领导支部从事反战工作中，做出了出色成绩。1944年9月，他去应城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宪兵跟踪、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仍大义凛然，最后英勇就义。

在华南，1943年12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1944年初，他们先后俘获了日本士兵，以及朝鲜、台湾籍日本士兵十多人，开办了日俘训练班。经过一年时间的教育和生活体验，他们思想觉悟有了提高，愿意投入反战斗争。1945年6月

25日，在东莞、惠阳交界处的任岗，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南支部，随即展开了编印反战传单，喊话等活动。到8月，该支部已有盟员15名。

1942年5月后，新四军挺进浙江东部敌后地区，开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他们先后俘获了日军少佐顾问吉永久寿秀等多人，以后，成立了解放联盟苏浙支部。该支部出版了《解放周报》，积极展开了瓦解日军的工作。1945年5月26日，驻慈溪县汶溪的日军驰驱33107部队士兵岩田文雄受苏浙支部宣传等影响，投奔了浙东新四军，受到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的欢迎。到7月，该支部已有解放联盟盟员十多人。

解放联盟还参加了解放区的各项政治活动。联盟盟员积极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反共军的斗争。1944年6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西北大会上，冈野进指出：国民党制造国共分裂，破坏团结，只能有利于日本法西斯。如果中国内部分裂，不实施民主政治，中国内部不能形成铁一样的团结，那么，要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反战组织的各级领导人，不少人参加了当地的参议会，参与政权管理。如森健、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标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都被选为当地的参议员。

他们对中国民众，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各地中国群众集会上，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组织剧团，为中国军民表演有意义的话剧。

他们给八路军、新四军以各种帮助：为敌军工作干部开办日语训练班，为战士教有关的日语口号；应部队要求，为战士讲解武器的使用和修理方法；为部队指战员治伤治病，等等。

他们主动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和解放区军民一起，度过困难、改善生活，促进了与当地军民以及内部的团结。有的人获得

了民主政府颁发的一等劳动奖章，出席了当地的劳动英雄模范大会。

解放联盟的战斗业绩，引起了有关各国的重视。

第五章

日本工农学校的巨大成就

第一节 各方面的工作成就

1944年8月，日本工农学校演出了大型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

此剧演出时间，约两小时。由曾在日本筑地小剧场工作过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女剧作家颜一烟^①指导排练。出场的，有日本兵、伪军、日军翻译（译说日军道白的）和八路军战士，一共有十五六人。演日本兵的，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演八路军战士和伪军的，是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

原计划在边区礼堂演出3天，因很受欢迎，各机关、大学都要求他们去演出，结果，前后共演了将近一个月。

初次公演时，毛泽东也来观看了。他坐在台前，由赵安博给他说明。毛泽东看后，对此剧作了评论：“内容丰富，演技高超。”

^① 她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演员、儿童文学作家。抗战前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写有五、六十个剧本，一百多篇小说。代表作有：《八女投江》、《烽火少年》、《盐丁儿》等。

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①，看完《岛田上等兵》的演出后，说：“日本士兵为我们演出的戏剧，真切动人，富有教育意义。”又说：“日本反战组织给我们在延安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在春秋两个季节，学员到延安郊外旅行，参观延安附近的机关、设施和名胜古迹等。

这样，使容易陷入寂寞的异国学习生活，变得活泼有趣了。

剧本《岛田上等兵》，是学员们根据1943年发生的两件事，集体讨论、创作的。它刻画了日军内部的黑暗和残暴，反映了八路军、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前线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个话剧，共有五幕。

第一幕

在八路军所在地区与一个日军阵地的中间地带，有一群士兵。穿着日军制服的上等兵岛田宪政（由中国话讲得流利的吉田太郎扮演），在几个月前，作战时受了伤，做了八路军的俘虏。有几个八路军战士，和几个穿着八路军制服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盟员。

岛田宪政曾在八路军医院里住了3个月。他感谢在这3个月中优待过他的人：“我们在日军中听人说你们处死囚犯。但我回去这件事，将使他们知道那种说法不是真的。我感谢你们了解我要回原部队的愿望，虽然你们给我讲解了日本军国主义。我是个爱国者，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一个中国农民领着他，向日军阵地那边走去。

^① 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施加强大压力，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接着，美国史迪威与周恩来就此事在重庆会谈。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为组长，谢伟思、戴维思等组员组成的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同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艾默生、日侨后裔有吉·幸治，作为组员，飞抵延安。有吉·幸治的任务，是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技术，特别是对日军俘虏的教育方法，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军俘虏的借鉴。有吉·幸治后来写道：“以前，我对共产党在赤色中国成功地教育了日本俘虏的报道，是持怀疑态度的。”“我对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工作是成功的报道的疑惑，通过与工农学校学员们的畅谈，逐渐消失了。”当时，有吉·幸治甚至向在重庆的美军司令官威迪麦耶和美国大使赫尔利写了报告：“如果发生内战，共产党将取得胜利。”“即使国民党有精良的装备，但是它的军队实在太腐败，士兵没有忠诚心，士气低落，这在共产党军队里是见不到的。”

第二幕

日军占领的小镇上。日军大队长（由身体高大壮健的梅田照文扮演）的房间里。几个日本军官和伪军头目，正在开会，商量怎样分配从中国老百姓那里抢来的赃物。

岛田宪政走进来，向大队长报告自己被俘前后的情况。他卷起长袖，露出手臂，给大队长看上面的枪弹伤。大队长大声怒斥：“你被八路军俘去，大大污辱了皇军。部队名册上，早已划去你的狗名。你被当作死者，已有几个月了。混蛋，你今晚必须自杀！”

第三幕

日军阵地上，岛田宪政向日军士兵们讲自己最近3个月的经历。将八路军的反战印刷品交给他们。士兵们传阅着。他低声地给士兵们唱了一支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创作的反战歌。

“八路军不杀死俘虏，长官的话，是骗我们的。”岛田宪政说：“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经常虐杀俘虏。”

“请大家看看《八路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吧：‘第一，严禁伤害和侮辱日军俘虏；第二，给受伤的日军俘虏以特别的照顾；第三，凡要回原部队的日军俘虏，必须安全送回；第四，凡愿留我方工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侵略，或共同研究有关专业的日军俘虏，定要帮助其成功；第五，日军俘虏写信给原部队的人，或其家属的，必须给予邮递的方便。’日本士兵们纷纷拿此《命令》，细心地看起来。

岛田宪政又说：“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还教了我许多新知识。我们的人，在被俘后不久，便决定和他们一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他们认为我们到中国来，打中国人，占领中国领土，是没有道理的，不道德的。他们可能是对的；我至今还没能完全肯定这一点。但我感到，我必须回去，尽我一份责任。”

对岛田宪政这番话，有的日军士兵鄙视、厌恶；有的好像漠不关心；大多数日军士兵很感兴趣。

第四幕

同上幕的地点。还是那些日本士兵。只是没有岛田宪政。大队长带着一个军曹（由山室繁扮演），进来搜捕岛田宪政。大队长追问：“岛田宪政在哪里？”士兵们都说：“不知道。”士兵们光是抱怨恶劣的食品，低下的待遇，长官的凶暴，等等。

士兵们遭受了刑罚。按照日军的惯例，大队长用非常精细的方法，琐碎而卑鄙地拷问着士兵。他狠狠地把几个士兵打倒在地。

大队长、军曹离去后，士兵们开始低声商量向大队长报仇的办法。

第五幕 最后一幕。

日军阵地前的空场上。夜晚，士兵们在值夜岗。这中间有岛田宪政。他向八路军地区向往地观察着。

一个中国农民从邻村伪村长那里，带来了一个消息，八路军将对这里的日军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同时，给岛田宪政和其他士兵带来了放有礼物的“慰问袋”；报道世界形势发展情况的小报；反战的传单。这些都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有组织地偷偷送进日军阵地来的。

不少日本士兵围了上来，拿慰问袋，看小报、传单。

远处传来了许多声音：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一个宣传队，随同前进着的八路军，通过扩音器高呼着反战口号。日本士兵听到后，感到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士兵们都静静地听着，有的偷偷地擦着眼泪。

大队长急步来到场上，立即厉声命令士兵们开枪。士兵们犹豫不决。岛田宪政大声呼喊：“不要打他们……”

大队长转身看到岛田宪政，把手枪指向他。在大队长能够扣扳机之前，自己却给身后一个士兵（由茂田江纯扮演）发射的子弹打倒了。

岛田宪政，举着白旗，率领日本士兵们，向前面的八路军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队伍，奔去！

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活动，使日本军部极其害怕，极度仇恨。日本军部认为，要搞垮华北、华中地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必须首先搞垮日本工农学校。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向日本工农学校，派遣了特务分子。

在日本工农学校成立的最初3年里，在学员中，发现了日本军部派遣的几名特务分子。

这些特务分子，是怎样混进日本工农学校的呢？日本军部利用八路军宽大的俘虏政策，将这些特务装扮成日军的逃兵、行军中的掉队者、战斗中的负伤者、自动投降者，混入八路军和反战同盟，进而混进日本工农学校。

这些特务分子，受过短期训练，知道编写、破译密码，联络方法；掌握使用武器，撒放毒药，和其他的杀人办法。他们的任

务，是窃取八路军和反战同盟的情报，煽动学员捣乱、逃跑，放毒，暗杀我军指战员、日本工农学校师生等等。

学校发现特务分子后，就在学员中展开了坦白运动。坦白运动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由冈野进讲了坦白运动的目的、政策和要求，学员进行了讨论、思考。在此基础上，进行坦白交待，检举揭发。

这些特务分子，是日本军部、财阀进行侵略战争的先锋、走狗。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职业特务。他们原是劳动者，大多数是在日本军部的奖金、勋章、保证职业和家属生活的诱惑或逼迫下，勉强当上特务的。因此，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军部的牺牲品。当他们在学校领导人和同学们的耐心、细致教育下，作为劳动者觉醒了，痛悔前非，坦白交待一切，停止特务活动后，学校就不去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行，并且真诚地把他们当作友人看待。

由于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在日本工农学校里，先后发现了几个特务分子^①。这件事说明了日本军部的卑劣和伎穷，也从反面证明了日本工农学校的重要和成就。

外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于1944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考察延安后，在《来自红色中国》一书中写道：“在我参观的时候，延安就有6个这样的特务。他们都是自己供认的。24岁高个子的泷川直亮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他的特殊任务就是暗杀解放联盟领袖冈野进。这时，冈野进正替我翻译。泷川直亮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被强征入伍，在铃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当一名士兵，驻在华北。有一天，联队长北川中佐召他到司令部，和气地给他啤酒、饼干和咖啡：‘你的喜欢吗？’泷川惊诧得不晓得如何

^① 有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回忆，曾发现十几名日本特务分子。赵安博告诉作者，这是当时康生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在该校留下的扩大化的后果。其实，真正的特务分子，只有几个。

回答，于是他被升职了。几天后又被召去，在一顿午宴后，军官告诉泷川说，他选择泷川做一件特别光荣的事，要他成为一个间谍，被八路军俘虏后加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假使任务完成了，他的工作将相当一个师团，他回来时将要授以勋章，升级，而且还有一大笔奖金，同时给他一次长假让他回家。假若他失败，那么他的家庭将由国家供养，而且在社会上得到荣誉。

……

“于是泷川进了山西阳曲的一所特务学校。在那儿，跟他一起的有 15 个人。他花了 4 个月学习拍密码、柔道和其他许多不用武器的杀人方法。在政治课上，则告诉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是直接受斯大林命令的。斯大林利用中共作为傀儡，以便征服日本和远东。同时又告诉他，当他进入共产党的地区，便将和中国的间谍一道工作，还教他怎样用简单的动作来传递情报，如脱去帽子，揩一下额头或者指一下鼻子。假使他的行动被发觉，他只需稍微说出一点就够了，无论如何他不必怕八路军，因为八路军从不杀战俘。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泷川笑着说：‘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共产党把俘虏都虐待死了。’

“于是他‘逃到’共产党地区。当一队八路军的侦察兵带他到一座小茅屋时，他看见一幅蒋介石的像，他以为落到中央军手里了。‘但是，’他告诉我当我在另一面墙上看见毛泽东像时，我才知道没有走错，虽然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一切。’

“八路军送他到延安。在延安，他要求加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当然啦，我们差不多一开始就认定他是特务。’冈野进说，‘我们详细检查过他的行踪，发现不少矛盾。不过我们不作声，因为他将要被所有盟员监视，他不可能搞出什么鬼来的。’

“特务分子坦白交待后，多数人提高了政治觉悟，真正认识到

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和必然要失败，我们抗战事业的正义性和必将要胜利，也步入了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行列。

“当然，也有个别特务分子拒不坦白，并设法逃跑的。但没有跑得很远，就被根据地军民发现了。

“有一个特务分子，坦白交待后，整天喝酒闹事，发泄不满情绪。他不断闹着要去西安——国民党统治区，学校也满足了他的要求。”

第二节 山东分校、华中分校的 成立和成绩

山东分校于1942年8月前就开始筹备、上课，由当时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山东支部管理。后于1944年11月2日，正式宣布成立。据原日本工农学校教导主任森健（现名吉积清）1984年来信介绍：山东分校“校长本桥朝治，原姓阪本，学员人数时有变动，开始时大致十人左右。学校工作人员有五——七人，学习内容，类似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初步性质的教育。”

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1945年7月11日指出：山东分校的一切校务，由解放联盟负责，由它委派校长、队长、班长、经理部长，生产配给部长、教员、炊事员等。经济完全独立，生活真正民主。教职工工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积极生产，勤俭办校。积极帮助群众生产，与根据地军民亲如一家。他们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山东分校共办了两期，学员有的是投诚的，有的是俘虏的，也有个别是敌人派来的特务分子。但在正义的耐心地教育下，争取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为反对法西斯日本服务。不仅一般士兵可以争取，而且争取了敌航空员、技师、船长、顾问等十余人。当他们认识真理后，便愉快地担当起抗日前线的工作。甚

至有些特务分子，在真理感化之下，良心发现，痛改前非。

山东分校先后培养了 200 多位反战斗士。

后来，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扩充为山东总分校，在鲁中、鲁南、渤海地区，先后办了三个分校。

在华中，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它附设在苏中公学内。苏中公学是 1944 年 6 月 1 日正式成立的。1944 年 12 月 6 日，办了个第 20 队。这个队有学员 43 人，其中朝鲜学员 12 人，日本学员 31 人。日本学员中，有 1939 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滨中、香河、田畑、后滕，以后从战斗中过来的南乡、冈崎、久保，以及 1944 年 3 月在车桥战役中过来的 14 人，1944 年 6 月，在如中战斗中过来的 10 人。他们都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盟员。

苏中公学，是由抗日军政大学九分校发展而来的，对外称部队，对内称学校。第 20 队，在校内称 20 队，国际兄弟队，在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人士，则认为它是附设在苏中公学内的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

苏中公学的校长是粟裕，副校长是管文蔚、张藩、夏征农。校部先在宝应县的金吾庄，后曾移驻到青沟、肖家庄、孟家庄、流均，当时在宝应县的西安丰镇。第 20 队住在钱家沟。

第 20 队的队长是朝鲜人李德武，他很早就参加新四军，当时是某部的敌工科副科长。他朝语、汉语、日语都讲得很好，主要负责朝鲜人的教育工作。

另外，学校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鲍汉青兼管 20 队的工作。他日语讲得很流利。

20 队日本学员的学习、工作，多以解放联盟组织的形式出现，以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的负责人滨中为主要领导人，指导学习、工作等活动。

他们的学习大致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形势政策教育，分

国际形势、中国抗日形势、日本国内形势三个方面。着重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有关部分，冈野进的《告日本国民书》，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的决定、指示等。

第二单元，是参加整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三者以整顿学风为重点。当时，校部将毛泽东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油印本，发给每人一本。在学习中，对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组织了深入的辩论，着重解决站在哪个阶级立场看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等问题。

整风的主要方法，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班、组上突出的问题，大家都能尖锐地展开批评。班上设立墙报，大家写稿子，谈认识，谈体会，人人敞开思想，大胆发表意见。当时的口号是：“脱裤子，不怕羞。”检查书不上交，转变思想立场，就是好同志。

第三单元，是人民政权和共产党的建设。主要内容有：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政权；建设一个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坚持武装革命的共产党。着重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有关章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及冈野进的《建设民主的日本》等文章。

每一单元，都由李德武或滨中作3—4次辅导报告。辅导课理论联系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形象生动，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日本学员和全校师生一样，大家睡门板，铺稻草，点油灯。冬天，一人一条二斤重的棉被；夏天一人一顶三尺纱布的蚊帐，只能罩住头部。这在当时当地已是不错的了，因为周围的不少农民家，连一顶这样的帐子也没有。他们的津贴费和连级干部一样多。

伙食由学校给予特殊照顾。

他们身穿新四军的灰色制服，外出时都打裹腿带，很讲究军容风纪。

他们文体体育活动很多。每天早晨做军事体操，有时练习木制手榴弹。平时班组经常开展小型文艺活动；每个单元学习结束，队里都搞文娱汇演，捉迷藏、猜谜语、唱歌，演戏，搞体育比赛等。

1945年6月1日，为纪念苏中公学成立一周年，举行了全校运动会。会期六天。大会的竞赛和表演内容十分丰富。日本学员作了精采的棒球表演和军事表演，受到全校同志的热烈欢迎。

他们天天唱歌，唱《跟着共产党走》、《长江游击队队歌》、《苏中公学校歌》、《天快亮》和日本反战歌曲。他们特别爱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1945年5月4日晚上，日本学员和全校教职员工一起，观看了副校长夏征农编写的、学校前线剧团首次演出的《甲申记》。6月1日晚上观看了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演出的《李闯王》，三师十旅文工团演出的《太平天国》，给了他们很多启发。

1945年春节第一天，日本学员集体到邻近的中国学员队去拜年时，特地把他们自己做的赤豆糯米团子分别送给各队，请中国兄弟品尝日本风味食品。

春节第二天，早饭后，各中队到西安丰镇校部拜年。日本、朝鲜学员和同住钱家沟的15队、17队的中国学员，同在校部联合演出了踩高跷、耍龙灯、荡湖船等精采节目，获得学校领导人、学员们和围观群众的一致好评。文艺节目一直演到下午两点多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8月16日，校部接苏中军区政治部通知：将日本学员调离苏中公学，赴某地集中待命。日本学员们走上了新的征途。

四十年后，有位中国学员在回忆当时与日本学员分别时依依不舍的深情时，写道：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
异国兄弟一起欢呼，
依依送别，热泪盈眶，
他们的临别赠言，
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理想。
苏公，是我们再生摇篮，
苏中，是我们的第二家乡。’
是的，母校啊苏公，
您把国际主义的火炬高举，
把和平、友谊的种子，
播向富士山、太平洋。”

第三节 毕业学员在前线

1942年11月21日，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三万多人的日、伪军，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日本工农学校1942年5月毕业的、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小林清等，跟随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一起抗击日军的“扫荡”。

11月底，日军包围了昆崙山。司令部研究了突围的行动方案。张科长通知同盟支部，让日本同志和乡亲们一起行动。小林清等不同意，坚决地说：

“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反战同盟员，也是八路军战士，

我们坚决要求参加掩护乡亲们突围的战斗。”

张科长见说服不了他们，就去请示参谋长。他们紧跟在张科长的身后，来到司令部。贾参谋长对他们说：

“你们日本同志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反战宣传工作，这项任务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们。你们所发挥的作用，是我们中国同志做不到的。”

他接着说：

“最近你们已经十分辛苦了，不能继续参加掩护突围的战斗；万一在战斗中出什么差错，我可无法向反战同盟总部和军区首长交代。”

不管参谋长怎样讲，小林清等还是一直恳求批准他们参加这次战斗。他们再三表示：

“我们过去是有罪于中国人民的日本军人，现在是我们为中国人民立功赎罪的机会，更何况我们现在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保护乡亲们突围脱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都是优秀机枪射手，与一般的战士比起来使用轻、重机枪更熟练些，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即使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是死得其所！”

后来，许世友司令员知道了他们参加战斗的决心，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到了军区警卫连，战士们十分欢迎他们。连里有一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小林清与几名战士合用一挺重机枪，另一位同盟员与几位战士合用一挺轻机枪。

天渐渐黑下来了，突击队出发了。他们凭着雪地里淡淡的反光看路，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地翻过一道山梁，走出了山沟。远远望去，只见敌人点燃的一堆堆篝火，绵延不断，像一条吞吐着烈焰的毒蛇；横躺在山路上，截断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他们望着前面的敌人，想着身后不远受苦的众乡亲，心里焦急如焚。他们摩

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冲过去，消灭敌人，杀出一条突出去的通道。

他们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着，渐渐地接近敌人的火堆。日军士兵围着火堆，像猪一样乱躺着。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哨兵端着枪，在火堆远处来回走着。

他们伏在一个山坡上，把枪口指向敌人，竖耳瞪眼地等待着进攻的信号。

这是他们被八路军俘虏，离开日军后，第一次重新端起机枪参加战斗。从前，他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帝国的军人；现在，他们是日本人民的儿子，反战的勇士。从前，他们的枪口对着中国人民、八路军，现在，他们的枪口对着日本法西斯野兽。

随着“砰”的一声清脆的命令进攻的枪声，阵地上所有的火器一齐怒吼起来，子弹像雨点般洒向敌群。他们咬着牙，快速、准确地向敌人射去子弹。整个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枪声和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的声音。毫无准备的日、伪军士兵，被这奇袭打晕了。突击队战士们及时从雪地爬起来，端着枪，喊着震天的杀声，向敌人扑过去。慌乱的敌人，扔下一堆尸体，滚着、爬着向四下溃逃。

突击队占领敌人阵地后，后续部队迅速向两边扩大通道。参谋长指挥司令部的警卫部队领着乡亲们跑着冲上通道，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慌乱的日军指挥官很快清醒过来，指挥日伪军向八路军阵地反扑，妄想把刚刚打开的通道再封死。为了掩护乡亲们能跑得远些，两位同盟员和战士们坚守在刚刚占领的阵地上。敌人的枪炮不断向这边打来。在一片狂喊中，他们隐隐约约地听到日军指挥官用日语大声喊叫，命令炮手向他们的机枪阵地轰击。他们立即叫旁边的中国战士大声喊道：“快，日本同志说敌人要向我们机枪阵地开炮了！快转移！快！”八路军指挥员带着五挺机枪刚撤离阵地，原阵地上就响起了敌人炮弹的爆炸声。他们重新找了一块地

势高、较隐蔽的地方，迅速架起重机枪、轻机枪，又猛烈地射击起来，子弹不断打到日伪军士兵身上。这时，阵地上的同志们互相大声鼓励着：

“同志们，狠狠地打！坚决守住阵地，决不能让敌人冲上来！要保证司令部和老乡们安全转移。”

“轰”的一声，敌人的一颗炮弹在离他们不远处爆炸了，掀起的土块，落了小林清一身，他的胳膊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经验告诉他，这是负伤了。在这样紧张激烈的战斗中，他顾不上包扎，仍旧死死地盯着敌人射击。敌人的炮弹又打过来了。他们又一次进行转移。转移中，才发现一位弹药手因弹片打中头部，流血过多，而突然倒下牺牲了。他们迅速架起机枪，悲愤地瞪大眼睛，扣动扳机，狠狠地向敌人横扫过去。步枪，机枪，手榴弹，炮弹的声音搅在一起。日、伪军一批批倒在他们阵地前面。敌人的猖狂反攻，被迫停住了。

这时，司令部和乡亲们已经冲出去很远了，按照指挥员的命令，他们撤出阵地，跟在司令部后面边掩护边转移。在撤退的路上小林清才感到胳膊一阵阵剧痛，卫生员赶来给他包扎了伤口。部队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后，他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被同志们用担架抬进了后方医院。

敌人精心策划的这次冬季“大扫荡”，不得不在12月底停止，撤了兵。

胶东抗战史上，日军发动的最大一次的“扫荡”，被英勇的胶东军民彻底粉碎了。两位反战同盟员为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83年5月5日，肖华指出：江苏省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建有日本友人中野博的纪念碑。他的名字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高山流水同在。

中野博 1919 年出生在日本国本州岛的秋田县，毕业于秋田县实业学校。中等个子，很英俊。不久，他接到应征入伍的红帖，非常兴奋。他母亲立即从早到晚，在街道上征求“千人针”^①，以求他“武运长久”，“永保平安”。

1939 年初，中野博随所在部队——日军 32 师团长田大队来到我国，驻扎山东省汶上县。8 月 3 日，在进犯梁山的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获。

被俘后，中野博深感有愧于天皇，想自杀，并且组织同伙逃跑过。在八路军 115 师独立旅杨勇旅长等指战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在日本人觉醒联盟的教育下，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决定停战后再回日本。

他学习努力，进步很快，1941 年 6 月 2 日，和另外 4 位同志，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被选为宣传委员。1941 年 7 月 7 日，他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主持下，庄严地履行了参加八路军的宣誓仪式。

《大众日报》1941 年 7 月 22 日第一版上，登了中野博的题词：

“我们醒悟了，
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
为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

——奋斗到底！”

由日本人觉醒联盟山东支部筹建的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于 1942 年 8 月开始上课。由于中野博多次要求，他成了分校的第一期学员。

在山东分校，中野博一边协助校长本桥朝治做宣传工作，一

^① 即“千人针腹带”。当时日本人入伍、出征时，亲属们拿着一尺宽、五尺长的白布，请街上来往的人，用准备好的红线在上面缝一个结，直到一千个人缝了为止。意思是有一千个人为他祈祷保佑他出征平安无事。

边努力学习，当好学员。

山东分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时事问题、日本问题等。中野博对每门课程，都认真思考，深入领会。

中野博热爱中国劳动群众，在山东分校学习时，他从自己很少的津贴费中，千方百计节省下10元钱，全部送给了生活困难的房东老大爷。

在山东分校毕业后，中野博意气风发地去鲁中地区，被选为反战同盟鲁中支部第一任支部长，辛勤地领导了鲁中支部的反战工作。他经常在山东莱芜、博山一带，从事各种反战活动，经常受到八路军指战员的好评，公认他是位好战友。

1943年夏，中野博和山东军区武工四队一起活动。为了便于活动，队长于镜清建议他改名为金野博。在于镜清和队员们配合下，他们到了日照敌占区，选定日军南北交通要道——海（州）青（岛）公路——中间的傅疃河桥头日军碉堡，作为开始的工作点。他们经过调查，得知碉堡里有个翻译，叫孙志轩，二十七八岁，家在蔡家滩，过去在日本洋行当过佣人，学会了日语。因生活困难，被迫到傅疃碉堡当翻译。他本人有一定的爱国心。于是，他们决定到蔡家滩，去做孙志轩的工作。

金野博很快和孙志轩建立了联系，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他对碉堡里日军士兵的姓名、家乡、出身、过去的职业、家庭情况，直到思想情绪，平日言谈，都了如指掌。

初秋的一个夜晚，第四武工队三十多人，秘密包围了傅疃碉堡，一部分人潜伏在据点附近，防止敌人出来袭击。一部分人设法把装有宣传品的慰问袋，送入碉堡，或放在碉堡附近。接着，金野博开始喊话。刚开始，敌人就打来几梭子弹。这样反复了几次，敌人就不打了。金野博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地传进了日军士兵的耳鼓。他从祖国家属的受难，讲到日本军队内的残

暴，从日军在山东的受打击，讲到侵华战争的必败；从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讲到欢迎日本士兵到八路军方面来。娓娓动听，感人肺腑。

金野博的喊话，很快有了反响。几天以后，孙志轩对金野博讲：“你讲得真好，句句话都说到他们心坎上了。这几天，他们都不大讲话了，似乎每个人都在想着什么。传单和慰问袋统统被小队长收去上缴了。其实，人人都偷看过了。虽然小队长说统统是八路军的诡计，但有的人相信：喊话的人一定是日本人。也有人说：真有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组织。别看小队长嘴上骂，心里还是愿意听的。”

后来，他们到日照县边沿区小曲河一带休整，金野博给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支部长本桥朝治写了一封信，汇报他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在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和日照城里翻译见面，我没费多大劲，那翻译是我方敌伪工作站兀盾同志的老关系，是兀盾同志介绍的。前几天，我第三次和他见面时，他说傅瞳桥喊话，对城里日军震动也很大。当他知道喊话是我干的，慰问袋是我以日本反战同盟名义送的时，就一口咬定：‘错不了，你就是反战同盟的人。’弄得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还是于队长替我说了话：‘不瞒你说，金野先生是真正的日本人，是反战同盟的战士。’那翻译忽然站起来，向我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连声说：‘惭愧！惭愧！你是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抗日救国；我是中国人，却帮助日本打中国，惭愧！惭愧！’我对他说：‘你不是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吗？’那翻译说：‘对，对对，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认识的八路军个个是梁山好汉。你这个日本人也被逼上梁山，成了我们的梁山将了。’”

由于八路军、民兵给了日军沉重打击，由于金野博不断地喊话、送慰问袋、写信、打电话等，当时驻日照县涛雒的一个日军

士兵，在修工事时，低声对伪军士兵说：“我不如死了死了的好！”说完就大哭起来。有一个日本士兵因厌战，在日照县城东门楼上自杀了。另有一个日本士兵，在日照县东海峪的一间小屋里，用枪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切，引起了驻山东滨海地区日军指挥机关对反战同盟的恐惧和仇恨。

1944年春，反战同盟山东支部要金野博去汇报工作。于队长派了几位队员，护送他回根据地。当金野博返回途中，在边沿区——高兴圩的一个山村住下。第二天拂晓，突然和日伪军遭遇，经过激烈枪战、顽强肉搏后，金野博被敌捕去。第四武工队竭力营救，没有成功。

根据后来伪军情报机关透露出来的消息，说金野博被捕后，一直不开口，敌人认为他是个哑巴兵。后来才知道他是日本人，立即将他带到城里，由日军直接看押、审问。不管敌人怎样拷打、用刑，金野博一点也不畏惧，不告饶，并且滔滔不绝地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使审判的日本军官，变成了被审判者。他不止一次地向审判者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

最后，金野博被日军宪兵司令部秘密杀害了。

金野博英勇献身的消息传来，使驻山东地区的八路军指战员、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同盟员、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的教职员工非常悲痛。1944年7月18日，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召开大会，由山东军区敌工部黄部长，报告了金野博英勇反战、壮烈牺牲的事迹。晚上，反战同盟员、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教职员工，联合演出了话剧：《我们在一起》，再现了金野博生前在山东清河区的某次战役中，英勇抢救八路军战士的动人事迹。

1944年7月7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在驻地召开追悼阵亡将士大会。肖华在题为《我们要报仇》的讲话中指出：日本人反战同盟的金野博同志，当他在火线上负伤，被日军俘去后，临

死前，仍不屈不挠地高呼：“打倒法西斯军阀！”这样坚贞的气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91年4月，在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赣榆抗日山烈士陵园第四坡段正中偏西，矗立起一座高四米半、统体灰白色、深绿色字迹的、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碑身正面刻着“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13个大字。旁竖有一石碑，简介金野博的生平。这是赣榆县政府、人民为永远纪念金野博特意建立的。其后，不断有中日两国人士来此瞻仰，敬献花圈。

金野博同志将永远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日本工农学校另一位毕业学员松木春一的工作更忙了。他偶尔坐下来回忆往事，觉得自己与过去确实判若两人了。

他是日本京都人，日军的一个曹长。1941年一次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他当兵时间较长，受法西斯教育毒害较深。被俘后，八路军指挥员请他讲讲他原来用的日式九二重机枪的使用、装卸方法，他竟火冒三丈，满脸发紫，浑身发抖，大吼地骂着：“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快步冲过来，一脚把机枪踢翻了！

他穿了八路军的棉衣，但死也不戴八路军的帽子。他对谁也不屑一顾。

经过清河军区（后改为渤海军区）的首长和敌工科长符浩^①、敌工股长郭建平等苦口婆心地开导和实际生活的教育，他开始觉醒了。他终于认识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认识到中日两国劳动群众是一家人，日本军阀、财阀是两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

根据松木春一的再三要求，觉醒联盟同意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学习。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冈野进

^① 建国后，符浩曾任驻日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等有关著作，使他完全改变了世界观。1944年他回到渤海军区，被盟员们选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渤海支部支部长，接着参加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和日本同志一起，不断地向日军据点和被围小部队喊话，送传单，唱反战歌，送慰问袋，打电话，听电话获取情报，教育新被俘的日军士兵等等，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5年9月，渤海军区首长，根据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关于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命令，率领特务一团、二团和领导机关，以及解放联盟渤海支部成员，向津浦铁路线挺进。

部队接连拔除不少敌军据点后，于10月22日夜里，包围了黄河涯车站的日军。这里驻着日军1269部队第12小队的50名士兵。为首的是一个军曹，姓藤仓。这个小队有机枪一挺，掷弹筒两具，长短枪45支。

特务一团的指挥部设在离日军据点六七十米的一间房子里。为了打开受降局面，军区司令袁也烈、副政委周贯五亲临这个指挥部。部队在敌人车站附近架起了平射迫击炮，接着就由松木春一登上指挥部的小土楼，用日语向敌人讲话。

“喂！藤仓先生！日军弟兄们！祝你们晚安！”

“八路军部队和你们谈判来了。”

“你们已经知道，7月26日，同盟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命令，要求抗日武装部队向日军送出通牒，限定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9月2日，日本政府已下命令，要日军无条件投降。今天，八路军部队来和你们谈判投降的问题，请你们答话！”

据点里没有声音，没有枪声，也没人答话。

松木春一又一次大声说：“现在你们已被八路军严密包围了。你们除了投降，放下武器以外，已没有别的出路。你们放下武器，

八路军会宽待你们；如果抵抗，就是死路一条。曹长先生，我们衷心地希望你珍惜弟兄们的生命，珍惜他们健康地回国和家人团聚的权利。不少日本兄弟被骗、无谓地丧生了。你不能再让你手下的日本兄弟做无谓的牺牲了。时间不多了，希望你和日本弟兄们认真考虑，不要错过时机！”

日本士兵听到喊话者流利的日语，已怀疑他是一位日本人，不一会儿，据点里有人问了句：“你是什么人？”

“我是日本人，姓松木，原来和你们一样，是日军的一个曹长，现在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一个支部长。我是来拯救各位兄弟的，你们一定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你们一定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好好地回国！家人时刻盼着你们回去啊！”

黄河涯车站的日军，鸦雀无声地听着他的话。

松木春一讲了一阵，就下来，向首长严肃地报告了情况，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首长们估计日军过一会儿，会有反应的。

果然不错，不一会儿，据点里有人大声讲话：“我们立即派两个人去谈判！”接着从车站走出两个日本士官，由松木春一把他们带到指挥部。经介绍后，他们就郑重地向袁司令举手敬礼。

由松木春一翻译，袁司令严肃地向他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腥罪行，耐心地阐述了中日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日本军阀、财阀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详尽地说明了日本宣布投降的经过，交代了我们的俘虏政策，指出了他们的唯一出路是缴械投降，宣布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一小时内做出答复。两个日本士官不断地点头，然后返回了据点。

过了半小时，松木春一奉命又上土楼，对着据点讲话：“请你们快点考虑、决定，不要自取灭亡！”过一会儿，据点有人答话，说他们已考虑好，决定投降，要求袁司令接见藤仓，请示投降的具体安排。松木春一即命令藤仓立刻前来。

藤仓见到袁司令后，双手把指挥刀递给了袁司令，表示投降。他说，日本士兵都愿意放下武器；要求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允许随身带走个人的东西；按期遣送他们回国，与家人团聚。他还要求八路军帮助他们把一个头部负伤的士兵抬走。袁司令答复：“保证你们全体人员的安全，不搜腰包，医治伤兵，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我们将按照上级的安排，及时遣送你们回国；立即在南面的小路上集合，把武器弹药放在那里，听候命令。”接着，袁司令立即派出一副担架，去抬日本伤兵。

一刻钟后，日军小分队在我军指定的地点，放下了武器。缴械后，不少日本兵沉默不语，心事重重；有的纵情地谈论着，笑着；有一个很年青的士兵，牵着一匹没有鞍具的小马，一下骑到马背上，不断用手掌打着马，在小路上来回奔跑，嘴里不断地喊着：“快回家了！快回家了！快回家了！”显出了获得新生的狂喜心情。

松木春一因为劝降立功，受到渤海军区的表扬和奖励。

抗日战争胜利后，松木春一回到了祖国——日本。他一直思念着第二故乡——中国，思念着解放联盟渤海支部、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的一切。1977年8月，符浩担任中国驻日大使。这一年，松木春一参加日中友好访华团来华。1980年4月，他参加日本东部地区中小企业访华团来华。两次访华，他都是一到中国，先去拜访老首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和其他首长，感谢他们的教育、关怀之恩！

1980年下半年，松木春一因病在京都住院，特地请他夫人给杨国夫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们虽然都年老了，但是日中友好将世世代代传下去！”

第六章

国统区反战斗争的曙光

第一节 为日本的和平民主运动 努力工作

1944年1月2日，在贵阳，鹿地亘秘密给郭沫若拍发电报之后，就会见了中外记者，谈了对于战争的展望，认为为了争取盟国的早日胜利，必须在“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基础上，建立有纲领的日本和平民主运动。

回到重庆，鹿地亘即把康天顺在镇远被捕事件告诉了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等，请他们向国内外发表消息，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声援。接着他设法把因长期劳累，患肺结核的山川腰（及川）送到郊外歌乐山的中央医院疗养所疗养。山川腰疗养了三个月，一待病情稳定，就急着回研究室工作。

1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转载了新华社消息：在延安，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已发展、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这是在延安的日本人向海内外日本人呼吁向建立统一组织迈进的第一步。

鹿地亘立即给冈野进写信，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带去延安。信中表示坚决响应建立解放联盟的号召，准备在国统区建立解放

联盟组织。

很快地从延安传来了冈野进写的密信。他高度赞扬了鹿地巨夫妇的革命战斗精神，指出在重庆同样使用解放联盟的名称，可能会妨碍它发挥作用，建议在重庆使用“日本民族解放同盟”这一称呼。鹿地研究室根据冈野进的建议，经过反复讨论，拟成了纲领草案。

《日本民族解放同盟纲领草案》

一、我们反对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期待着立即停止侵略战争，把祖国和人民从沉重的战争灾难中拯救出来。为此

1. 打倒掌握全部权力，强迫人民遭受巨大牺牲的军事独裁政府。
2. 召集能够代表全国人民意志，要求和平、解放、进步的各党派，联合建立日本人民政府。
3. 立即停战，从所有侵占地区，撤出日本军队、舰队，由人民政府与交战各国进行公正的议和。
4. 严惩满洲事变至今给人民和祖国带来巨大牺牲的战争责任者。为防止日本制造战争势力的抬头，应废除军部的一切政治特权（秘密向天皇奏事权，军人担任军务大臣等）；解散军部指导的一切团体（翼赞会、翼政会、翼赞壮年会、各种报国会等），使军部再不能干涉国家政务。
5. 人民政府实行彻底的对外和平政策，在和平、独立、平等、互助原则基础上，确立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努力使战争永远不可能再发生。

二、我们根据人民的意志，摧毁把人民作为不准讲话的奴隶、肉弹的独裁权力的政治基础，解放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期待依靠人民力量来实现祖国的复兴和繁荣。为此

1. 废除剥夺、蹂躏人民权利的总动员法、战时刑事特别法、维持治安法，以及一切其他为行使独裁权力而设立的恶劣法律。
2. 废除强制的征兵制度，采用志愿兵制度。
3. 释放一切为了人民利益，反对侵略战争、独裁政权，而被逮捕的政治犯人。
4. 废除对职业、居住等变动的限制，实现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完全自由。

5. 给 20 岁以上的男女公民以选举权，在祖国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

6. 为了上述目的，召开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宪法会议，改正钦定宪法，建立保障全部民权为目的的人民宪法。

三、我们期待复兴由于军部的亡国战争已达到极其疲劳的日本，建设为了人民幸福、富强的新日本。为此

1. 把军事费用缩小到保卫国土需要的最低限度。确立复兴、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国家财政计划。

2. 为保障和平和人民福利，对银行、垄断性的大企业，加强国家统制。

3. 把现在的战争企业，转换、发展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生产机器等生产资料的和平企业。

4. 为了粮食、原材料等的大量生产和有关技术的开发，必须改革土地制度，消灭农村的贫穷，实行新的农业政策，使农民能充分利用耕作机械、农艺新技术。

5. 实行新的对外贸易政策，振兴国民经济，使之得到充分发展。

四、我们期望救济因侵略战争而遭到巨大牺牲的人民，恢复、提高陷于破产的人民生活。为此

1. 制止物价上涨，减轻工人所交税款，废除人民的不正当的各种负担（如强制储蓄，捐献钱款、物品，购买公债，强制出劳动公差等）。

2. 废除强制向人民借款的命令，确立保障工人、职员生活的最低工资制，缩短劳动时间，恢复、改善工厂法。

3. 废除强迫农民交纳谷物和种植何种作物的制度。禁止强迫退租，收回土地。用低价供应充分的肥料、农具。

4. 保障学术研究自由，废除学生的强制劳动和军事训练。实行新的文化教育政策，提高国民文化。

5. 对中小企业进行有效的救济、扶植，给它们特殊的优惠政策。

6. 恢复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职业合作社、进步的学生团体。以及维护各阶层人民生活权、增进人民福利的各种自主团体。

7. 改善士兵的供给，严禁军队内的残酷虐待，保障外出、通信、读书、集会的自由。给他们选举权。及时让服役期满的士兵回国，不准再召集他们入伍。

8. 保障士兵归国后的职业，保障伤残军人的终身生活，充分保障

这个草案，参考了解放联盟纲领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是团结他们打倒军部、资本家政府，建立民主政府，停止侵略战争，恢复、维护人民利益的行动纲领。

该草案送给了镇远收容所内的和平村训练班，送给了除去青山和夫以外的所有住在重庆的日本人，美军的日裔同情者，不少关心日本问题的盟国人士等。同时，在《鹿地研究室报》上，以中文标题《为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告同盟国诸朋友》，发表了该草案全文。

同年4月，鹿地亘收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来的冈野进的来信：

鹿地亘同志：

得知各位赞成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创立宗旨，并正在重庆方面，继续准备建立这类组织，我非常高兴。各位希望有公开的组织关系，若重庆情况不允许，那末，采取别的形式，也是好的。基于“解联”（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简称）的宗旨，切望要把尽可能多的日本人，吸引到组织中来。若这是少数人的组织，那就没有意义了。听说青山先生不赞成这个纲领，也要尽可能地努力，争取他们加入。即使只有受他们影响的少数人能够加入，也要尽力争取。另外，在印度德里，和北美的日本人那里，也要用一切办法进行接触，尽可能地建立起组织。

青山先生对我写的《告日本国民》一文中，没有写打倒天皇制，表示反对（他写的东西，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使我非常奇怪。这一方面，我作一简单说明，仅供参考。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打倒天皇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倒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这里，是不需要改变的。为什么在解放联盟的纲领中，不写打倒天皇制呢？这有如下的理由：

一、在现在情况下，我们集中攻击的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这是为什么呢？①现在，军部是唯一掌握日本政权者，是这次侵略战争的实际指挥者。②打倒军部的斗争，不仅是工农、知识阶层的迫切要求，而且能够吸引中小资本家，以及所有因战争受到损害的人们，从而有可能组织起最广泛的人民战线。③更重要的，把军部和天皇制分开来考虑

是错误的；军部是天皇制中最强大的势力，是天皇制的支柱。打倒了军部，使打倒天皇制度极其容易。打倒军部是打倒天皇制度的最理想的捷径。

二、天皇制的首长，是日本的天皇，他在国民中保持着半宗教的影响。对此，我们要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今天提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从获得广泛的人民群众拥护这一方面来说，是不利的。要使人民知道天皇是人民的敌人，这需要依靠人民的实际经验。因此，作为共产党的口号，揭露天皇制的本质，在反战、反军部的过程中，是必要的。但作为人民战线的口号提则是有害的。

我们上面说的，是关于反对战争和军部的人民战线，而不是打倒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只有进行人民战线的斗争，才能使打倒天皇制度变得更加容易。这是日本共产党今天采取的战略战术。

关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外国的例子。现在，德国共产党不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是提打倒希特勒的口号；英美等共产党，不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是主张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此，支持现在的资本家政府）。此外，中国、法兰西、意大利关于统一战线的主张，都是这样的。这是为了革命胜利，在现在条件下，必须这样做的一个过程；若跨越此过程，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这是革命战略战术的常识。

若误解上述的人民战线的战术，就是有意地或无意地妨害了革命斗争。

当前的内外形势，极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我们对未来的斗争，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在国外的我们，要加强自己理论的、思想的修养，培养尽可能多的革命干部，这是日本革命的要求。现在，在华北、华中，这样的干部，已有了一批。衷心希望你们在这方面作最大的努力。

最后，希望你们能送来尽可能多的资料、消息。这里，重庆最近发行的刊物，一件也看不到。

和这封信的同时，送上中文的《对日本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日文的《介绍日本工农学校》两文，以及这里最近发行的刊物，供参考。

祝斗争胜利！

冈野进（野坂铁）

1944年4月5日

于延安

鹿地研究室根据冈野进信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他们为了使在镇远收容所的全部日本人能够返回日本，和训练班联系，请他们对一切赞成《日本民族解放同盟》纲领草案宗旨的日本人开放门户，欢迎他们加入。但国民党当局，还是继续阻挠训练班成员接触一般俘虏。

冈野进主张尽可能地团结青山和夫。此时，青山和夫在重庆干什么呢？他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唆使，在青山研究室，实际是青山一个人办的《国际》上，用大量无法无天的胡言乱语，对冈野进进行了泼妇骂街式的大叫大骂。他以自己虚设的日本“民主革命协议会”的代表资格，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名义，批判冈野进不提打倒天皇制，是对党的叛变，他还要把冈野进清除出党。

从湖北前线来到重庆想听取鹿地亘关于在前线组织反战同盟支部的一男二女三个日本人，被国民党有关机关带到了青山和夫那里，青山和夫就不准他们和鹿地亘联系。并把男的撵到别处，肆意玩弄这两位女娃，待他玩弄够了，竟把他们三人交到敌侨收容所关押起来，以后这三人就消失了踪影。

面对有如此劣迹的青山和夫，鹿地亘遵照冈野进的意见，还是亲自登门，耐心地规劝他。为了说动青山和夫，他还走访了王芃生。但青山和夫借口“回避打倒天皇制，与自己的意见不相容”，而拒绝合作。在他的错误看法被一一剖析后，他又推说：“对政治运动，我已失去兴趣！”坚持不合作。这是他当时已变成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走狗，成了人民战线的有意识的破坏者的必然表现。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1944年7月后，日本全境进入美国空军的轰炸圈。在越南的日军，受到美军越来越大的海空军两方面的压力。战争的结局，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面对这种局势，国民党开始积极地从事国内反共战争的准备，对

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蒋介石在1939年7月之所以批准成立反战同盟，一是要显示自己的“伟人”气质，二是企图利用反战同盟为其情报工作服务，企图使其成为完全受控的傀儡组织。当他们达不到这一目的时，就决定把盟员集中到镇远收容所，进行所谓的“再训练”。随着最后胜利的接近，日本反战运动，对他们来说，更显得可有可无了。

在军政部和美军参谋总部的合作下，在重庆南郊，即长江南岸南温泉地区，买了地皮，设立了美蒋合作的俘虏集中营，关押从前线转来的日军俘虏，从他们身上获取各种情报。这个集中营，绝对不准鹿地亘研究室的人员进出。

与此同时，镇远收容所莫锦龙等，在政治部调走三个同盟干部后，开始加强对所内反战运动的思想监视。到1944年9月，所当局卡断了新生活协会与鹿地研究室的一切联系。

在泥潭中垂死挣扎的日军，为了支持在越南的侵略军，打通中国大陆到越南的交通，从1944年夏季到秋季，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面对日军的进攻，一触即败，一溃千里。在广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无阻挡地追入贵州。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他们决定把镇远收容所转移到重庆。

这次转移由邹任之任总指挥。由于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政治迫害和不负责的行动，给盟员和其他俘虏们带来了灾难和死亡。路上，有两人因拖拉机烧木炭，导致瓦斯中毒死亡。全体日本人都搞得病弱不堪。

1944年12月12日，村民们到达重庆南温泉下车。大家因17天来在寒风中蜷曲于车上，不能入眠，又常缺饭食，而接近瘫痪。从南温泉下车，到鹿角场收容所，只一里半路，竟走了四、五个钟点。

第二节 在鹿角场收容所

鹿角场收容所，在重庆巴县鹿角场村的三圣后和梁家边院子，仍名和平村，当地农民称之为鹿角战俘营。

鹿地研究室得知盟员已到达鹿角场，很多人身体虚弱，有的患病，就向美国友人求援。美国友人寄来了有关药品。鹿地研究室就把这珍贵的药品、慰问信，以及郭沫若赠送的慰问款，委托视察收容所的国民党教育部的同情者，一起送给他们。事后得知，这些钱物竟都被管理人员没收，用做他们自己的服装费了。这件事充分显示了国民党官员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

1944年12月25日，盟员们得知，禁止随身携带的所有珍贵资料，竟被所方在贵阳处理掉了，都痛心得流下泪来。

1945年1月4日，就改善生活问题，前后舍代表到管理员室，与朱、何两先生面谈。

当时日俘的供应标准是：

米	24两（一斤半）
次煤	1斤
盐	0.297两
菜油	没有
副食费	2.5元
烟草	每10天每人1/8两

这副食费2.5元，不支付实物。当时物价飞涨，连买蔬菜都不够。一天两顿饭，副食品只是二、三片带盐汁的萝卜片，没有油味，营养失调的人激增。为了改变这种窘状，他们提出了每人每天的最低限度要求：

全部供应实物：

米	24 两
盐	0.3 两
菜油	0.55 两
大豆	1.1 两
蔬菜	8 两

还提出建立供水设置、增发衣服，每月洗一次澡、增加寝室的

要求。

管理员回答说：“根据军政部的命令，因为战争，没有办法，这种要求无法考虑，非常抱歉。到和平时再说吧。”

其它要求诸如工艺品制作，农园开拓等，根本无法实现。

1945年2月19日早饭后，在党部礼堂举行了“和平村教育队”成立大会。

会议由濑户主持。他先提议向牺牲者致哀。接着由渡边说明了教育队的纲领、规约^①；由内岛宣读了教育队成立宣言；由高山带领大家宣誓。

莫所长、朱管理员在大会上致了训辞。队员代表长谷川讲了话。

这样，训练班、研究班、新生班统一为一个团体的愿望，经历了苦难的历程，终于得到管理当局的正式承认^①。

会后，选举了副队长、班长。渡边、内岛、棚桥、长谷川、濑户、益田、高山、林（长吉）、林（直）、秋月、野本、关村当选。坂井、鲤本、平村作为候补者。当选者互推长谷川为副队长，其余为班长。队长则由所长、管理员担任，他们只是挂个名，目的在于捞取“善于教育俘虏”的美名。

^① 和平教育队的纲领、规约，大意是要求队员们努力学习，反对日本侵略战争，改造自己，要遵守收容所纪律等。

当夜，举行了到这里后的第一次晚餐会。

从这一天开始，收容所内再不称前舍、后舍，而称为上院、下院了。

1945年5月11日，和平村教育队根据形势发展和战后工作的要求，改为日本民主革命工作队。

契利斯托教育年会的一位牧师来所参观，买了他们做的工艺品，说是拿去开现卖展览的，给了20万元。莫所长买了不少材料、工具，使因转移中止的工艺品制造所又开始了工作。

第三节 请求盟国支援

随着美国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进入东亚大陆，在国统区，英国的势力相对日益缩小，美国势力日益膨胀。美国外交官，军事人员与鹿地研究室的联系、合作不断加强。

1944年7月，鹿地研究室在赖家桥举行招待会，纪念反战同盟成立四周年。其主要目的，是使盟国人士对同盟过去的历史，有个深刻的印象。与会的还有郭沫若、冯乃超等。由于当前形势的变化，过去努力解散同盟的人也来了，政治部各厅厅长都出席了。不少日裔美籍军人也出席了招待会。

在会上，鹿地亘对美国国务院秘书、东亚问题专家爱索马说：“这里有原来的反战同盟，在延安有解放联盟，在美国也有一批日本人。希望盟国方面给予帮助，使在海外的日本人形成一个整体，作为代表日本国民的组织。并由这个组织协助联合国，进行各方面的活动，这个团体可以叫日本民主委员会。这个团体应有广播电台，发行报纸，力求后期战争少作牺牲，并努力使战争早日结束。希望能得到你们大力支持。”爱索马认真考虑后，表示同情。

1944年底，根据爱索马的建议，由池田、山川、岸本、泽村

等研究人员，与他举行座谈会，就美军即将登上日本本土作战的时间，如何减少牺牲等问题，提出了看法。此外，池田幸子等向爱索马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盟国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且使它将来不可能复活，因此，要尽早地保证民主地重建日本的和平和独立；二是为了使海外一切反战日本人团结成一体，协助盟国，盟国方面对此给予支持，组成统一的海外反法西斯日本人团体，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召开代表会议。

爱索马答应尽力帮助。他在返回华盛顿前，访问了延安。去延安前，请鹿地亘写了介绍信，以便会见冈野进，代表鹿地亘就上述建议，征求他的意见。鹿地亘同时写了给大山郁夫的信，请他带到美国。

不久，爱索马访问延安回来，说冈野进完全赞成鹿地研究室的建议。后来，爱索马回到美国，找到大山郁夫。大山先生因为事前受到美国政府的警告，同时需要静心养病，不准备考虑工作问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爱索马通过重庆的美国国际情报处负责人法阿派库博士（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传来下述信息：爱索马为了实现鹿地研究室的建议，不断在国务院内尽力活动，好容易将取得实现的可能性时，战争结束了，从而失去了实现的机会，他感到非常抱歉。

1944年10月，爱索马曾秘密征求鹿地亘意见：“你是否准备帮助美国军队？”鹿地亘为了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表示愿意协助。

这事不久，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法夏带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部领导人利托鲁大校。利托鲁希望鹿地亘协助美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具体的是编辑、出版日文报纸，由日本人方面提供编辑人员，由鹿地亘负报纸编辑总责。鹿地亘对此表示赞同，并提出条件，要求美国方面向国民党交涉，再解放若干名镇远收容

所内的反战同盟员，以利展开工作。对方表示可以考虑。

1945年初，利托鲁的继任者旦林访问鹿地亘，商讨具体工作。约定合作基地设在云南昆明的美军基地附近。美国方面派出藤井周而、八岛太郎（原日本无产阶级美术家同盟的画家）、富杰依·孝吉等5人。

鹿地亘提出要长谷川、濑户等15人出来协助工作，请美国方面向国民党交涉，旦林表示同意。

此事，鹿地亘方面主动做了很多工作，但终因政治部不同意释放15名同盟员等原因，最后没有什么成果。

第七章

绿川英子的反战活动

第一节 一位进步的世界语者

“为了希望的未来，我们不惜流血成海。
五年的抗战，奠定了中国解放的基石，
筑成了人民和平的堡垒。
今天我们挺着胸脯，高唱黎明的赞歌吧，
这响亮的歌唱，在明年第七个七七，
一定会变成侵略者的黄昏葬送曲！”

这是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处在极为艰难的岁月，日本反战女作家、英勇的国际主义女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绿川英子，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气贯长虹的诗篇《黎明的合唱》。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完全同中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坚决公开反击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著名人士，除了鹿地亘、池田幸子，就是绿川英子了。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33年10月，她用世界语节译了小林多喜二著的《蟹工船》，登在《世界语文学》上。1935年4月，她在世界语学会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日本文学小史》一文。

同年9月，在《五月》杂志上，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等。

同时，她开始与中国世界语者有了联系。1935年4月，上海《世界》杂志发表了她的文章《日本妇女状况》，8月发表了《粪》，1936年4月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处于何种现状》等。

大约在1935年，绿川英子结识了我国东北辽阳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刘仁（原名刘砥芳），并于1936年秋，不顾家中反对与刘仁举行婚礼（没有同居）。这对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她父亲对此事大发雷霆，不给她办理户口手续，取消了她的简易保险。她的亲戚朋友不理解她的婚姻。当时不少日本人有一种看不起中国人的偏见。更明显的是，绿川英子本身有反法西斯言行，和中国有反抗日本侵华言行的留学生刘仁相认识、相结合，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绿川英子所以和刘仁结婚，首先当然是有了爱情，其次是具有先进思想，坚决反法西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刘仁，在政治思想上，对她起了引导作用，两人言行相合。她感到在日本难有作为，到中国这个反日本侵略的热土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才有意义。这正如她自己在离别日本时想的：“如果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是50岁的话，那我已度过了半生。这前半生，我过得庸庸碌碌，在后半生，也不可能出类拔萃，因为我是个平凡的女人。然而我相信并觉得，如果和我留在日本相比，我将能做得多一些，做得有意义一些。因为我是个世界语者。”

当时日本民法规定，男满30岁，女满25岁以前，结婚必须取得家长同意。绿川英子把她离别日本的时间，定在她年满25周岁生日一个月以后，是做了周密考虑的。她考虑到留在祖国的父母的处境，不要因她出国而受到牵累。这也表现她意志的坚强。

1937年1月，刘仁先乘船回到上海。同年4月中旬，绿川英

子在中日两国朋友们的帮助下，乘从温哥华出发，经横滨、长崎、上海，到马尼拉的加拿大航线上的“皇后号”邮船，秘密离开日本海岸。当时，她心里反复地想着：“陆地远去了，远去了。25年来，我在那里编织了玫瑰色的幻想，红色的愤怒，黑色的厌倦，和绿色的爱。现在这陆地成了一片灰色。但愿这灰色的它，不要成为从我身上消逝的一切的坟墓。”

第二节 在被侵略的国家——中国上海

4月19日中午，绿川英子到达上海。不几天，过去向她约稿的叶籁士等两人来访问她，使她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当时的中国世界语运动中心联系上了，并获得他们的帮助。她积极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怒吼》重新出版的编辑工作。她当时说：“当我拿起笔来时，我由于正义感的受压抑而热血沸腾，由于对野蛮的敌人的愤恨而怒火燃烧。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她在1937年8月写了《爱与憎》一文，表达了渴望投入反对日本侵华的战斗：“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里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的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

……

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化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文明，使它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蹋，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

但是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

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此外，它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同时，我与同志们一起，向日本的兄弟们大声疾呼——“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①

1937年11月，她在《中国怒吼》上发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致日本世界语者的信》，号召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她写道：“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同胞感到羞耻……”

我们确实预见到，道路是荆棘丛生的，但这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同志们，尽管政府以死相威胁，反战运动在日本或已燃烧，或已暗中点燃了。甚至在上海的日本军队里，竟无视战时严格的纪律，也出现了反战的标语。

同志们，在这次战争里，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

啊，同志们，在这祖国危急存亡的阶段，中国的士兵们战斗得多么英勇顽强啊！我时常感到心脏剧烈的跳动，甚至热泪盈眶。如果你们也能亲眼来看看……但可怜的是我们祖国的那些士兵。报纸上说，最近一周内，在上海死去了12000名日本士兵。而人们还不断地把成千上万个青年人送来。我怎么能肯定，在他们中间没有你们之中的这位或那位呢……把战争强加给被压迫的邻国人民，而自己也白白地死去……”^②

① 《爱与憎》一文，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第4版。

② 载《中国怒吼》1937年11月第3卷第4期。

据三宅史平回忆：《中国怒吼》等世界语刊物、文章书信，当时通过新加坡，转寄到日本，给日本世界语者以很大鼓舞^①。

1937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绿川英子和刘仁在叶籁士的帮助下，在这天早晨坐船离开上海，去香港、广州，希望能从那里再去新的抗战中心汉口。

绿川英子夫妇于12月1日在香港上岸，3日到广州。他们急切地盼望做抗日工作，盼望去汉口。她心中反复想着石川啄木的诗：

“让我有工作吧，
我愿尽力去做。
做完之后死去，
我也心甘情愿。”

当时刘仁曾遇见郭沫若，请郭沫若给予帮助，郭沫若自己才从日本回国不久，还没有工作，因此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但他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入了脑海。

后遇到在广东有影响的丁克。经他奔走，成立了由广东省政府管辖的广东国际协会。任务是国际宣传。绿川英子、刘仁在世界语科工作。他们计划出世界语刊物《正义》等。但不久，因她是敌国日本人，被广东公安机构驱逐到香港。刘仁也随着去那里。他们在那里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这时绿川英子完全可以回日本，但她没走这一步，她深信中国抗战是正义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因此，她继续笔耕不辍，坚持把鹿地亘声援中国抗战的文章《真实的正义》，翻译成世界语；并撰写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压迫、剥削日本人民的文章《日本——野蛮统治下的国家》。

^① 三宅史平：《两个人的死》，载日本世界语学会会刊《东方杂志》1949年12月号。

第三节 在东方的马德里——汉口

1938年6月底，在郭沫若、叶籁士等帮助下，国民党政府发出了护送绿川英子夫妇的命令，使他们终于来到了当时中国抗战的中心汉口。绿川英子在她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中，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写道：“这一阶段仅有三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抗战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的抗战了……我看到了、听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

由郭沫若推荐，绿川英子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中央电台，担任对日广播员。她担任这项工作，直到她到重庆后的1940年夏天。她每天站在抗战中国的麦克风前，用流畅的日语广播，像一把把钢刀，刺向敌人的咽喉，使敌人手足无措，惊恐万状。

当时，朝鲜诗人王子天被绿川英子的言行所感动，写了首诗《和平鸽》来赞美她：

“如今你站在麦克风前开始翻译播音，
向你的同胞把真理预言。
你那尽管温柔的嗓音，
却足以制造电闪雷鸣。
你句句金玉献给仍有良知的心灵。
你的声音是不会白费的呵！
因为它定能将那喝血入迷、制造痛苦的狼心
打得粉碎，撕得干净。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确有成效。如原日军华中派遣军某部通讯兵堀锐之助，听其广播后，心情激动，写下了短诗：

“重庆广播，
偷偷倾听，
那流畅的日语，
心中难以平静。”^①

日军侵占汉口后，才探知那对日广播员是长谷川照子。1938年11月1日，日本东京的《都新闻》，以头版显著标题刊登有关此事的报道，攻击绿川英子：“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原来是‘赤色’败类长谷川照子。”同时登了她的照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竟寄恐吓信给绿川英子的父亲长谷川幸之助，要他“引咎自杀”。

日本人民对此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日本女作家泽地久枝说：“照子被扣上卖国贼的名字，这是任何日本人也得不到的勋章。”^②

7月29日，在汉口举行了欢迎英国女作家阿特丽（《日本的泥足》一书的作者）茶话会，老舍、邵力子、胡秋原、盛成、胡风、白薇、绿川英子等30人出席。绿川英子用世界语讲话：“我希望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绿川英子在汉口会见了东北抗日英雄赵老太太，使她很受感动。会见后不久，她就在《抗战文艺》1938年8月13日第2卷第4期上，发表《赵老太太会见记》一文。在文章中，她记叙了赵老太太对她讲的一些话：“你到我们中国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如果你们以为我们恨日本人，那就错了。侵略中国只是一部分日本人，我们反对日本，不是我们高兴这样做，而是我们不能不反抗。你得告诉你们日本人，中国是讲礼义的国家，我们从来不欺侮别

① 大岛义夫、宫本正男著：《反体制世界语运动史》，日本三省堂，1974年版。

② 戈宝权：《忆中国人民的战友——绿川英子》，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26日版

人。要是有一天中国要侵略日本，我赵老太太决不参加！”“你想看，日本人到中国来，把一切东西都抢去了，还说中国不对，还说义勇军是土匪。义勇军如果真是土匪，它为什么不到日本去抢劫呢？”

绿川英子高度称赞中国抗战的士兵们，表示自己要尽一切办法支持抗战。她在《新华日报》1938年8月20日第3版上发表的《日本朋友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中国士兵们！

首先我向你们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实的敬礼。

……

假使我有百个身体，定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谈一谈，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使我有千只手，定要到所有战线去，给中国士兵绷绑受伤的地方，替他们洗一洗衣服。但可惜得很，我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两只手，只有留在汉口，帮你们做点后方的事情。但，我努力做下去，因为这也是必要的。可是我非常对不起你们，当你们在吃着大苦的时候，我一个日本人，却过比你们舒服的日子。

……你们是为了四万万的中国民族的生存而进行正义的英勇的战斗。

亲爱的前方的兄弟们！

日本军队不过是持较优良的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看哪，经过一年余，他们打得已有些不好了！而且他们在张鼓峰同苏联冲突时，吃了大亏，只好屈服，虽然他们进攻汉口，可是不管在什么战线上，他们都没有精神，现在无疑地是给他们大打击的一个好机会。

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支持抗战。

你们的日本朋友

绿川英子

第四节 在抗日的雾都——重庆

1938年10月26日汉口失守。绿川英子随国民政府机关撤

出，先后经长沙、衡山、桂林、贵阳，于12月到达重庆。先住在两路口的大田湾，1939年5月3日、4日日机大轰炸后，她家就搬到三厅所在地，金刚坡下三塘院子附近的金刚村居住。

刚到重庆时，她继续在国际宣传处工作，同时，始终努力参加进步文化界、文艺界的抗战活动，为《新华日报》写稿，协助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的编辑工作。这时，她身体虽然不很好，但却是参加各种集会，从事写作、翻译最活跃的时期。

1938年12月17日，她为《新华日报》举行的义卖活动，写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出钱》一文：

现在中国香港工人发起义卖运动，扩大到全中国的规模，这是中国人民救国的一个伟大运动。这运动是与日本的根本不同的。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用钱挽救在患难中的中国的父母兄弟，难道谁不愿买点东西给他们呢。什么人不愿出钱呢？

义卖是最大众的，最容易的，而且是最切实的助战！

每个中国人应参加这运动！

同月29日，她在《新华日报》纪念世界语创建者柴门霍夫80年诞辰的特刊中，发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语者同志》的信。在信中，她号召全世界世界语者团结起来，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我毫不怀疑，即使没有外援，不管困难有多大，中国定将继续抗战下去，并获得最后胜利。然而援助中国，是所有国家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义务，因为中华民族不只为自身的解放而战，也是为人类的和平而战。因此，我，一个在中国的日本人，向你们提出如下的请求。这些请求不但是世界语者所应该做到的，而且也是所有人道主义者应该做到的。

1. 督促贵国人民和政府实行国际联盟条约第16条；
2. 要求贵国政府绝对禁止出口军需品给日本；
3. 不要买，而且劝别人也不要买日本货；
4. 号召贵国人民捐助医药、其他必需品和金钱给中国。

1939年4月，绿川英子写了《失掉的两个苹果》，从自己身体的消瘦，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表达自己不屈不挠地斗争的决心：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
两年啊，不停地颠沛流离，
请原谅，妈妈，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我那脸颊上的苹果消失了。
然而我确实知道，是谁把它们夺走。而这只可憎的手同样就是那只好手，它从千百万男女青年和儿童那里，也残忍地夺去了他们双颊上的红润，

不论是在这儿中国，还是在我的祖国日本。

我，我们，

应该夺回被夺走的一切，

但我们何以夺回？

难道无能为力地暂时“静坐等候”？

母亲啊，

不要掩着耳朵，不要遮住眼睛，即使你怕得要死。

只有从激烈战斗的熔炉中，我们才能把它们夺回。

但是，母亲，

如果你的女儿永远失掉了，你疼爱地给我的那两个苹果，请你不要为此责备我。

请看，我亲爱的母亲啊，

我满怀喜悦和自傲的心情断言：

中国人民决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

而中国的世界语者也不会背叛他们胸前闪闪发光的绿星的。

……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1940年7月，在重庆召开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成立大会。绿川英子出席了这个会议，在会上被选为该总部的领导成员。这使她进一步关心、参与反战同盟的活动。1941年8月24日，反战同盟遭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解散时，她的心情十分沉重。25日，她与总部全体反战同盟员，合影留念！

1940年夏季，第三厅改组，郭沫若被免去厅长职务，经周恩来巧妙斗争，迫使蒋介石在政治部内，设一文化工作委员会，安排从三厅退出的一批文化名人。由郭沫若任主任。绿川英子在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难以继续工作，就和刘仁一起，转入这个委员会的第三组，即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组工作。

1941年6月，她用世界语翻译了日本作家石川近三揭露日军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并由《中国报导》社出版。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举行小型晚会和聚餐，纪念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四周年。周恩来、邓颖超也亲临会场。周恩来还为签名轴题署。绿川英子、鹿地亘、池田幸子，和几位同盟员也参加了。绿川英子高兴地会见了敬爱的周恩来。周恩来握着她的手，笑着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听了，万分激动地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的女儿。”席间，周恩来带头向郭沫若祝酒后，提议“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植耘，有把白的折扇，扇面未题书画，过去，请文工委的战友们签了字。这次庆宴中间，他请求周恩来、邓颖超题名。他们笑着答应。邓颖超把折扇的两面反复地看了看，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她对绿川英子说：“我们并肩作战！”

1941年10月，绿川英子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暴风雨中的细语》，内中收集了《爱与憎》等15篇文章。

同年11月16日，为纪念郭沫若诞辰50周年和创作活动25周年，绿川英子为《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的纪念特集撰文《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对郭沫若表示祝贺。她在文内写道：

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和我们日本反战同志们的聚会上，当他的感情不可遏止的时候，我看他用笔，像蛇行似地，写了他这一次从日本脱出时的一首律诗，接着他高声朗读：

此来拚得全家哭，
今往还看遍地哀。
四十六年罹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另一次，在反战同盟的一个集会上，先生酒后吐露他的纯情了。当时的话不能完全记忆了。大概是这样的：“自己到五十岁，还得向那荆棘的路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这些话像刀似的刺进刚受到中国神圣革命战争洗礼的盟员的内心，他们静下来，默默无言了。他那种诗人的热情的宣传，在这样一个国际的集会的场面，我实在深深感到了它的力量。

“我所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苦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到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初出夔门）

这是先生写自传的时候记下来的感想，把它当作先生一贯的政治态度来看，是断然不会错的。在现代中国政治家当中，像先生那样普遍地受人拥戴的并不多。然大家所爱戴所尊敬的，正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一切的人。

同一天，郭沫若在绿川英子从日本带来的一块两尺见方的红绢上，写了一首诗，惠赠给她：

茫茫四野弥黢暗，
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
照书还喜一灯妍。

绿川女士嘱书

郭沫若

1941. 11. 16.

这一块有郭沫若赞扬、鼓励她的题词的红绢，直到今天，还由绿川英子的儿子刘星、女儿刘晓兰，当作无比珍贵的红色宝物，用心保存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15日，绿川英子起草，由她自己、鹿地亘、池田幸子、青山和夫共同署名的《反战宣言》，在《中国报导》1942年第1期上发表：

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弟兄们，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光荣的时刻来到了！

让人类神圣的愤慨表示出巨大的力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向联合起来战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的中国、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和人民致敬！

我们向坚定地抗击法西斯狱卒们地狱般统治的民族和人民致以热烈的问候！

太平洋大战已经爆发。法西斯恶棍们现在在整个地球上张开了魔爪。史无前例的灾难，人类文明和幸福的危机威胁着我们。现在正是全人类必须用火与铁一般的战斗意志联合起来，勇敢地粉碎和消灭那些可恶的共同敌人而斗争的时刻。

我们日本人民以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向你们伸出双手。我们毫不犹豫地向你们声明：——我们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是属于你们的。日本人民是法西斯最老的敌人。我们战斗着，不可战胜。我们从未投降过。我们确实相信，这一天是定将到来的，而且像在黑夜里等待光明一样等待着它。当我们看到你们轰轰烈烈、全民性地行动起来之时，我们是多么激动啊！现在我和你们在一起将为彻底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战斗到底！

我们可以向你们肯定，“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这一真理正是我们日本人民用无法表达的痛苦经验最早学到手的。从他们的魔爪压向日本之际，我们热爱的祖国就变成了可怕的地狱般的战场。它变成了悲剧的战场，在那儿他们最野蛮地压迫人民生的权利，极其残忍地奴役人民，破坏文化和道德，并用难以想象的屠杀和折磨压迫人民。我们的祖国到处在受难，在呻吟。人民的血和泪连一分钟也没有干过。有组织地进行强盗般的剥削和屠夫式的统治——他们把这称之为“国家的新秩序”，并称赞它为“全民族支持的制度”。

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奇怪。他们把屠杀和奴役征服称为“为和平的神圣工作”，并赞叹破坏人类生存的秩序为“新秩序”。而这种超人的奇谈怪论，我们日本人是经常听到的。

不宣而战，断约，利用和谈进行突然袭击——这些他们誉为“Blitzkrieg”^①。此种无耻的下贱勾当我们早已亲身经历。

因而我们坚定地断言：跟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战斗！无情地、毫不宽容地消灭这些人类道德的亵犯者！

这些法西斯恶棍，我们跟你们说，他们现在正在把全世界造成一个系统的战场。他们向全人类进行挑战。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事实：他们在东西方紧密配合，企图开辟战场，并且制造了今日世界的灾难。他们以一次战争为另一次战争作借口，用战争哺育着战争。战争在他们手中是残酷的事业。对此，日本人民早就吸取了难忘的教训。向你们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强迫我们民族为他们“提高天皇的尊严”的神谕进行战争准备而挑起了饥饿担子，以及他们如何表示因此而造成的人民的饥饿是向他国要求“生存空间”的原因。

他们不断用战争扩大饥饿的地狱，而又借口这饥饿来扩大战争。他们把那些不愿在那种饥饿政策面前屈服的人，作为“丧失国民忠诚的卖国者”而进行无情的屠杀和迫害，并且把那些不愿为他们的强盗政策提供军需给养的国家，作为“对帝国和平条约不忠实的国家”而进行同样的打击和挑衅。

我们坦率地跟你们说，自那些无耻之徒刚出生之时起，我们日本人民就以亲身的体验相信他们的这种特征。正如他们向我们民族挑战那样，他们现在在向全世界挑战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挑战。这一次我们定要战斗到消灭他们为止！

法西斯流氓们幻想恢复中世纪野蛮的军阀统治。弟兄们，这事实正是我们日本人最早通过自身的痛苦经历而学习到的。“不死不活”是中世纪日本统治的主要原则。现在在那儿这“不死不活”又重新席卷全国。整

^① 德文，意为“闪电战”。

个民族仅仅被保证享有有限的奴隶和肉弹式的生活条件。像狱卒那样看守着人民并把他们大批大批地赶向饥饿、赶向死亡——这样的统治他们赞之为国家的新制度！他们夸耀的“东亚新秩序”和“欧洲新秩序”的地狱般的状况，完全不出我们的预料。

我们可以向你们肯定，他们幻想倒转人类历史的车轮。但是历史离开了人类合理生活进展的愿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转动的。人类的敌人和历史的对抗者定将被它的车轮轧得粉碎。

现在正其时矣！我们全世界的联合正是人类愿望的光荣体现。毫不留情地粉碎、歼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

1941年12月15日

她在为国际青年节题词中，鼓励青年们做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

以青年的热情与纯洁，
做反法西斯的先锋队，
未来是属于青年的！^①

她大呼中国妇女，以更大力量投入抗日解放运动：

有人把解放妇女作为国家文化尺度来看，我想也可以把它作为民族解放的尺度……中国正处在解放战争的路上，它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战胜敌人。这就是中国妇女必须解放的前提。两万万的女，是不可想象的伟大力量呵！^②

这一时期，绿川英子还发表了《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她们在战斗中前进》、《目前日本妇女的生活》、《忆萧红》、《解放是要争取的》等优秀反战作品。

1944年下半年，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绿川英子、刘仁两人转到高崇民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担任该会机关刊物《反

^① 《新华日报》1942年9月6日第4版。

^② 《中苏文化》1943年第13卷第5、6期合刊。

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即将来临时，国民党就全力准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行新的战争了。政治部长张治中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1944年4月1日，在重庆天官府街7号，举行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集会，除文工委全体人员外，重庆文化界著名人士，包括绿川英子，都参加了。郭沫若在这次集会的签名轴上题词：“县华林纪念，始于今天，终于今天，憎恨法西，勿忘今天。”^①给绿川英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4年7月10日，绿川英子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一书。书中回忆了她从日本到上海一年多的流浪生活。1945年8月15日，特大喜讯传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胜利了！绿川英子怀着不可抑制的心情，走上街头，加入火炬游行的洪流，欢庆这个难忘的狂欢之夜。

这时，绿川英子、刘仁参加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8月10日左右，高崇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东北干部迅速返回东北开展工作，决定青年干部先走，绿川英子夫妇暂留重庆，坚持把《反攻》半月刊，出到9月18日停刊后再北上。

作为一个真正爱国的日本人，她长时间考虑：今后日本将怎么办？1945年9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她写的《在歧路上的日本》。她在文章内写道：

无疑地，我们胜利了。但不要认为他们的投降，就是和平的到来。

他们既不是因为箭折矢尽，更不是为了爱惜人民才投降的。他们把纳粹的前鉴看得很清楚。《波茨坦宣言》叫日本走“理智之路”。果真是理智叫他们投降吗？是的，他们有他们的理智，他们不愿意陷于完全毁灭之境。

^① 政治部第三厅，1938年4月1日成立于武昌县华林，到1944年4月1日，前后正好整整六年。

一句话，他们过早的投降，是为了尽量保存自己的力量。

军阀是侵略的前驱，财阀是侵略的原动力，官僚们拿着刺刀和法律恐吓人民，这功劳对于侵略还算小吗？他们是几位一体，谁也少不了谁。日本的独裁专制统治机构是他们的综合体。

我要特别向中国人民申述：日本法西斯根本不承认中日战争的失败。请看，8月15日，天皇的敕书，铃木内阁的文告，都仅仅提到将近四年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抹杀八年来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血债。他们又把“中日合作”、“中日亲善”的法宝拿出来了。中国人民还允许他们用甜蜜的谎话来掩盖血淋淋的事实吗？

我们要揭露这种阴谋，我们要打破这种阴谋。

我们所要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和平。

我们不需要“反布尔塞维克堡垒”的日本。我们要民主的日本。

我们要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我们拒绝它的人物、制度、军队、经济、思想等一切的一切。

天皇问题让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天皇的独裁权还在，以他为中心的统治机构还在的时候，请问，日本人民有存废天皇的自由吗？

多年来，眼睛被蒙蔽，耳朵被掩盖着的日本人民，恐怕只认为，日本的战败，是苏联的参战和原子弹造成的吧！他们还不理解，这次盟国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民主的胜利。他们未必明白盟军登陆日本的意义。

《波茨坦宣言》坚决地说，“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

是的，必须永久剔除，而且迅速和彻底。

我们要永久的和平！

我们要民主的日本！

第五节 在战火中的东北

1945年11月，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刘星到达武汉，准备北上。1946年1月初，4岁多的刘星失踪。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迫害，同志们利用《双十协定》签订不久的气氛，多方营救。绿川英子亲自到汉口警察局，找局长报案，据理交涉，迫使国民党

特务在1月10日把刘星放了回来。

第二天晚上，绿川英子全家和同志们一起，秘密登船去上海。在上海，在招商局顾问、进步人士金月石帮助下，搭上招商局为国民党向北运兵的轮船。他们在轮船进入黄海后，才爬出小舱门。在甲板上，绿川英子无限感慨地说：“八年前，是这茫茫的大海，使我同祖国和亲人隔离，把我引向新的生活；今天，又是这茫茫的大海，把我同旧世界隔绝，引我走向光明的彼岸！”

他们在秦皇岛登陆后，于1946年2月，坐火车到达沈阳。这年冬天到达哈尔滨。她担任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

后因解放战争迫近，加以绿川英子在沈阳出生的女儿刘晓兰还不满周岁，为照顾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一家人随后方留守处撤退到佳木斯。

在佳木斯，绿川英子还被聘请到东北大学讲课，由刘仁作翻译。她讲述自己在武汉、重庆的所见、所闻、所为，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这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周围的同志都反对，只有刘仁同意妻子的意见。虽然请了一位名医，不幸在手术中刮破子宫，引起感染，当时又缺少必要的药物，病情很快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同志们！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鉴于绿川英子在反战、革命和学术上的功绩，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仁深深懊悔自己的错误，悲伤得顿足痛哭，不愿离开绿川英子的遗体。在绿川英子逝世一百天后，刘仁也因病去世。

绿川英子夫妇的遗体，都安葬在佳木斯烈士陵园。他们的子

女刘星、刘晓兰，由刘仁的弟弟刘介庸抚养。

1949年10月1日，当同志们在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高崇民十分感慨地说：“绿川英子要是能活着多好啊！她对新中国的建设，对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2年春天，高崇民率领中央代表团，到佳木斯一带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时，特地到墓地去凭吊长眠于地下的战友——绿川英子和刘仁。

绿川英子短促的一生和永存的业绩，将永远鼓励我们为正义，为和平，为世代代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而努力。绿川英子将永远活在日本人民的心中，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活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

第八章

日本投降后联盟员的工作和回到祖国

第一节 协助劝降、受降工作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向中国东北进军，以歼灭日本关东军。8月9日，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这些给日本军部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中国抗日战争也开始转入全国范围的战略大反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击》。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战略大反攻的七道命令。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1日发出照会，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广播了日本天皇《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日本天皇下令日本一切武装部队停战投降。

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热烈庆祝胜利，随即投入受降接收工作。由于国民政府向在华日军发布了只准向其军队投降的通告，在国内迅速形成一股阻止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成果的逆流。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员，竭尽全力，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体军民，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5年8月11日，解放联盟发出通电，号召日军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亲爱的日本士兵们：

日本政府接受七月二十六日同盟国在波茨坦发出的《公告》，向苏、美、英、中无条件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解除日军武装。国外的日本士兵得以安全返回日本，日本内地将由盟军占领。严惩发动并进行这次战争的日本军人，官吏、政治家，财阀。在日本国内实行言论、宗教、思想自由的民主政治。现在，日本政府接受了上述条件，因此，一直统治日本的军部及其一派已被打倒，将实施人民的政治。这对日本人民是极大的幸福，前线的士兵能够回到故乡，过和平的生活了。

我们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始终为了反对这一可诅咒的战争，打倒军部而奋斗，今天此目的即将实现。我们大部分盟员是和你们一样的日本士兵，在战斗中被俘虏的。但八路军、新四军并不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而看作是可怜的朋友，在物质上亦尽量地给我们优待。又为了教育我们，在延安、山东、华中等地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这些事实想来你们一定从八路军、新四军释放回去的日本士兵及日侨那里听到了。我们解放联盟所以能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成立支部，并为建立新日本而战斗，这也完全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是日本人民的亲密朋友，将来各位回日本后，同样也会给你们以一切援助。

亲爱的日本士兵们！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本政府命令你们停止战争，投降盟军。在你们面前是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军队抱着曾经接待我们的同样心情和亲切期待着你们过来。不管你们指挥官发出怎样的命令，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即带着武器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

八路军、新四军内除了我们日本人以外，还有许多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你们绝不会感到不方便，你们如果带了武器过来，你们的生命将得到保障，名誉受到尊重，我们尽量优待。等到交通恢复，情况安定时，即将你们送回自己的家乡。

看了这张传单之后，请你们和战友商量，马上一起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你们不过来，你们将遭受不幸。

我们以极大的热忱等待你们过来！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8月11日^①

8月14日，冈野进代表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向日军官兵发出通告：

日本军指挥官及士兵诸君：

天皇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业已来到。身居盟国军队之一——八路军、新四军内的我们日本同胞，深望指挥官及士兵诸君携带武器，率领部队（包括皇协军）投来我方。如诸君所熟悉的，华北和华中的大部分今日处于八路军、新四军之统辖下，将来亦复如此。又对于过去俘虏的日兵和日侨，八路军、新四军绝不加以杀害和侮辱，而且予以适当之招待。八路军、新四军并为了我们日本人民，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援助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发展。对于欲在战后留在中国继续经商之日侨，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允许的。八路军、新四军诚为日本人民之良友，将来也愿与民主的日本缔结亲密的友好关系。

我以同胞的身份，奉劝指挥官及士兵诸君，携带武器，率领全体部队（包括皇协军）投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绝对保证诸君的生命安全，尊重诸君人格。待形势安定、交通恢复后，我们将送指挥官和士兵诸君返回我祖国——日本。

你们指挥官之决断何去何从，今日如有失算，不仅将使诸君本身，并且将使数万、数十万的日本人陷于不幸，蒙受屈辱。诸君应采择的唯一道路，是到我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八路军、新四军来！

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代表 野坂铁（冈野进）

八月十四日^②

8月17日，解放联盟向朱德发出致敬电：

总司令朱德将军勋鉴：

联合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部的战争胜利结束了。

^①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②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八年来，你领导了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抗日武装和人民，在空前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你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在联合国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共同事业中，有不可磨灭的光辉功绩。你们为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而奋斗，你们争取了中国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不仅如此，你们又有力地援助了日本人民从法西斯军部奴役下争取解放的运动。我们祝贺联合国的胜利，特向你致崇高的敬意。在今后，我们也将和你们团结起来，为实现民主的日本而奋斗！

延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

8月17日^①

为了配合中国人民取得用血汗、生命换来的全部成果，为了使日本士兵不再无谓地死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各支部、日本工农学校（包括各分校）成员，准备奔赴最前线，协助做好受降工作。

从8月12日起，日本工农学校全体人员，投入了编写新传单的工作。他们把写好的传单，通过解放联盟总部，迅速传递到前线各支部。各支部盟员日夜轮流换班，印制了几万份到几十万份的《告日军士兵书》、《告日军长官书》，组成前线工作小组，或解除日军武装工作队，或接受日军投降工作队，准备随同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占区，参加受降工作。

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人员，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人员，为即将告别延安，奔赴前线工作，在王家坪礼堂，举行了出发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来宾，有叶剑英、李初梨和美国友人等。

大会由杉本一夫主持。他首先发言，叙述了解放联盟和工农学校的发展历史；指出在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部斗争中诞生的解放

^①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8日。

联盟，做出了显著功绩，将成为民主日本建设中的光辉一页；指出日本工农学校在培养解放联盟干部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杉本一夫感谢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给予他们的巨大的援助。最后，他强调指出：“解放联盟和工农学校的工作，只是暂告一段落，并没有结束，希望全体同志，把解放联盟、工农学校，数年来勇敢战斗的精神和传统，带回日本，并且继续发扬光大。”

接着，李初梨讲话，他说：“解放联盟和工农学校的一切成绩，是日本人民的领导人冈野进同志精心指导，苦心经营的结果。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就提出来的对日本人民的希望，现在已成为现实。我们衷心祝贺今后日本的民主力量，继续得到发展。”

冈野进接着讲话，他指出：“在解放联盟、工农学校，不久就要告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延安，出发上前线，接着回日本去的时候，所有的日本学员，没有一个不深深思念：数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所给予的种种的援助，无限的情谊。现在全体学员都清楚地知道，过去存在的八路军是否要利用俘虏的怀疑，全是误解。过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怀疑呢？这是因为他们过去被禁锢在法西斯军队里，看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想帮助日本人民的伟大胸怀。”他强调指出：“不管是谁，只要真正决心为日本人民工作的，那末，他就会不怕任何困难，越过任何障碍，为建设民主的日本，去英勇奋斗。这是感谢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的唯一的方法。从这时开始，才能说自己不愧是个日本工农学校的毕业生。”

接着，美国朋友发言。他感谢日本同志，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出的巨大功绩，并衷心祝贺日本人民力量的胜利。

叶剑英接着作了深情的讲话。他说：“过去，我们把各位作为

好朋友来欢迎，现在又把各位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还是好朋友。同志们，我们务必要保持中日人民间的这种珍贵的友谊，并且使它不断发展。”他对在与日本侵略军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解放联盟员，表示沉痛的哀悼。他希望日本友人，在前线，在归国后，要向广大日本人民、士兵，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要紧紧地发动、组织、依靠日本人民。他说：“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一定能够创造出和平、民主的亚洲。”最后，他高呼口号：“中日人民的民主万岁！”

学员代表公文、解放联盟代表大山，致了答辞。学员山下、相乐、山田、重富等，相继登台，发表个人演说。他们在发言中，一致感谢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援助，谴责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行为，决心为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积极奋斗！

大会在通过给中国人民的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感谢信后，宣告圆满结束。

1945年8月30日这次大会，正式宣告日本工农学校已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8月30日大会通过的《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感谢信》，是日本工农学校的政治常识课教师山室繁誉写的。山室繁誉写的这封《感谢信》的原件，现保存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下面是这封《感谢信》的全文：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为了上前线工作，接着回祖国日本，即将离开延安。现在，在我们心里不断涌起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感谢的激流。今天，我们能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决心为建设民主的新日本而斗争；解放联盟、日本工农学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完全是由于你们正确领导、全力援助的结果。假使没有你们的援助，我们一定会在日本军国主义崩

毁面前，和军部一样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而不能自拔。现在我们是朝着光辉的前程，怀着新的希望，向祖国迈进！

我们报答你们关怀的唯一办法，就是牢牢记住你们的教导，努力锻炼，不断进步，在 frontline 教育新来的日本兄弟；归国后，克服任何困难，为建设民主日本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告别延安时，向你们作的保证。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已成过去，今后，要建立一个友好、互助的关系。但今后能否建立起这种关系，还要看日本人民能否建立和平、民主的日本，还要依靠人民的努力。创建民主的新日本，征途上将会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坚信，我们定将克服重重困难，获得胜利。日本的将来一定是人民的。

日中两国人民团结万岁！

日本工农学校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支部

1945年8月29日

在此以前，1945年2月3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就发表了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原日军110师团139联队滨田真实写的文章，标题是《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友谊》。

从8月下旬开始，日本工农学校学员都抓紧时间做上前线、回祖国的准备。他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存款。当时每位学员多少都有些存款。不少学员主张捐献给边区政府和人民，但中国有关方面，始终严加拒绝。梅田照文回忆当时情景说：“我不得已，用存款买了一件手工织的、淡绿色的厚毛衣。后来，我回到战后生活艰难的日本时，这件毛衣竟成了珍贵物品了。”

冈野进和作为他的三位随员的森健、梅田照文、山田一郎是先告别延安的。行前，8月28日前的某天，毛泽东特为冈野进等4人，举行了欢送会。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参加了这个欢送会。

在当时极为紧张、繁忙的局势下，周恩来还抽出时间，代表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代表中国人民，来到日本工农学校，表示欢送。他深情地对日本同志说：“当各位即将回国时，请原谅我们没有赠送什么贵重的礼物，我们送去的，是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日本青年。我想，这是最珍贵的礼品！”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将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也会发展。日本虽然因战争而荒废，但它一定会复兴。两国经济的各自的发展，不会缩小两国之间的贸易，而是会使它无限扩大。中日两国的合作，是亚洲和平的基础，让我们为此努力吧！”

9月8日前的某天，冈野进等4人，去延安机场，和聂荣臻等同坐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在机场，日本工农学校全体人员和中国朋友前来欢送。他们到张家口后，换乘苏军飞机，到长春。接着，去莫斯科。

9月18日，秋高气爽，在50几位身体病弱、不适宜长途行军的学员和中国同志、众多居民的不断挥手惜别中，日本工农学校的200多人的队伍，在杉本一夫和中国干部刘兴渭的带领下，排成三列纵队，走出了校门。

他们旅途的服装和八路军战士完全一样：一身绿色的军服，背上背着一公斤重的被子，以及脸盆、饭碗、毛巾等。

不少机关的同志和街道居民，在路旁频频招手，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地回到日本。

他们走了三、四里路，停了下来，都转过身来深情地看着宝塔山，向日本工农学校故居告别！向边区人民告别！向中共中央告别！

解放联盟各支部，奉总部命令，先后告别八路军、新四军，前往东北地区集中。

各支部在奔赴东北前及奔赴东北途中，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做了大量的对日军的劝降、受降工作。

日军一些小部队或据点驻军，明白大势所趋，一般经劝降后，就主动缴械投降。有些日军军官坚持等国民党军前来受降的反动立场，企图顽抗，但在人民军队、联盟员的反复劝导、警告下，也放下了武器。联盟员在劝降过程中，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前往敌军中进行劝导、警告，表现了可贵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请看胶东支部一位领导人的回忆吧：

在8月中下旬之际，我军截获了在青岛外围驻守和从即墨等地逃窜回青岛的一部分日军，有两个中队两百余人。他们不投降，想溜回青岛向国民党军队缴械，但被我们胶东部队堵截在这里，想溜也溜不了。

南海军分区贾司令员带着几个参谋坐着汽车也赶来了。他们研究之后，决定向敌人送去《最后通牒》、《优待俘虏条例》及解放联盟总部和冈野进的《通告》。我还和敌工科的同志们向敌人阵地宣传了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

被围困在这里的日军大队参谋长西田少佐、中队长松本大尉、中队长西村大尉都是日本侵华派遣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长期驻防在胶东一带，是我们的老对手了，曾打过多次交道，被我们包围在青岛郊外。

日军西田少佐满面愁云，心情沉重。他用一双发抖的手，捧着《最后通牒》和《优待俘虏条例》，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心里似乎很矛盾，向八路军投降吧，可青岛日军总部给他的指示是向青岛撤退集中，向国民党缴枪，然后乘船回国。要是把武器交给了八路军，国民党会恼怒的。可是在眼前被包围的情况下，不缴枪又怎么行呢，西田少佐反复思索着，没有好办法。他这回深深地感到现在不是按他的意愿就能解决问题了。他不住地搓手，可时间也不能太拖啊！《最后通牒》规定了在24小时内缴械。他想来想去，让一个军官到外边向八路军喊话，请八路军派代表来谈判，试探八路军的態度怎样，再作下一步打算。

贾司令员决定派我和两名参谋为全权谈判代表去日军方面谈判。

我对贾司令员说：“我尽力圆满完成任务，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们就坚决消灭他们，不用顾虑我的生死问题。”

“看目前情况，日军不会对你们为难的，他们现在主要考虑的是他们自己的出路，不过你们一定要小心，不要大意，不能在最后受降中牺牲。”贾司令员郑重地对我说。张科长等贾司令员说完也说道：“请首长放心，是日本军队请我们去谈判的，何况他是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呢。”

“好！我再派两个参谋跟你一起去。我委任你为少校军衔、八路军作战部队全权代表。不过你们的衣服应该整理一下，不要随随便便的。”贾司令员认真地说。

我和两名参谋换好了新的八路军军装，系好武装带、手枪，带上公文包，就精神抖擞地向敌人阵地出发了。

到了敌人阵地前，我大声向敌人喊了话。一个值班的日本军官跑出来，得知我们是去谈判的代表后，就领我们进里面去。

在谈判室，我坐的位置和两名参谋隔着一张桌子，对面是日军参谋长西田少佐。我是第一次面对面的和日军谈判，心里感到一阵紧张。过去，我是这个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受尽了日本军队中的非人待遇，过着可怕的战地生活。作战被俘后，他们找了一个别人的尸体烧了，把骨灰寄给我国内的家属，还给我家里发了战死通知书，可是我现在代表八路军，代表800万胶东人民，代表胜利的中国人民来和我过去的部队谈判受降问题。我充满信心地打开公文包取出文件，用日语严峻地说：

“我们是来谈判受降的。根据《波茨坦宣言》：一、你们应在接到通牒后24小时内向我军交出全部武器、弹药、文件。二、凡属个人财产，不是掠夺中国人民的东西都可以带走。三、受降时集体站队，正式由我军受降，最高指挥官在投降书上签字。四、对高级军官的处理和士兵同等待遇。你们必须自动接受投降，不得抵抗，中国人民会原谅你们过去的罪恶。对你们的罪过经调查证实纯属军人而无特殊罪恶，仍同样可以遣送回国。”

西田半天没有回答，好一会才抬起头来，申述道：“我们是奉命到青岛集中交武器的，你们要把武器留下，我们究竟服从谁的命令呢？贵国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让我们到青岛集中缴械，难道你们不知道贵国中央政府的命令吗？”

我听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你们不明白服从谁的命令吗？让我来告诉你，你们要服从胶东抗日军民的命令，服从八路军的命令。八年来，你们在这里烧杀抢掠，欠下中国人民多少血债！今天要你们就地投降，你们就该缴械，向附近驻军交出武器，这是《波茨坦宣言》的规定，不就地投降就是拒绝投降，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敌人消灭。”

随我同去的南海军分区参谋也严肃地说：“限你们24小时内交出武器，我们优待俘虏，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等形势安定后送你们回国，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自取灭亡。”

西田站起来，汗珠从额角沁出。他小声说：

“是，是，对不起，失陪一会儿。”他没有主意，和几个中队长商量对策去了。他感到不交出武器是很难离开这里了。两个中队长小声向他反映部队情绪低落，毫无斗志，都想早些向八路军缴械，好回国去。这里，我们看到许多日本士兵也拿着我们散发的解放联盟和冈野进的《通告》，互相议论，说八路军优待俘虏，保证生命安全。

西田焦急地转来转去，他觉得枪、炮，仿佛连一点用也没有，就是勉强突围，士兵已失去斗志，这200人也会被解放区抗日军民的海洋淹没的。再说粮食也没有了，即使不战斗也要被八路军困死的。他长叹了一口气，拿着武器装备的表册和人员名册进来，踌躇地问我们：

“你我身为军人，贵国所提优待条件都能保证吗？”

“我们八路军一贯说到做到，我们在国际上是有声威的军队。”我自豪地回答他。西田仍惴惴不安地问：“在作战中打死对方，不能列为特殊罪恶吧？”

“是的。但是，如果超出军人行动的范围，在中国犯有血债的，就是特殊罪恶，这些我们都会调查的。”

“是，谢谢！”西田弯下身子，点了点头后，又接着说：

“因为我们已经结束双方交战状态，可以抛开敌对的交战关系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没有战斗力，作为日本军人来讲，我们是看不起他们的。八年战争，我们主要是和共产党八路军打的，自然由你们受降最为适合。但是，军人应执行最高指挥官命令，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按理说，我们驻胶东的日本军队是应该由胶东的八路军受降，因为我们是交战的双方。”

“你能明白这个问题，那很好！”我表扬他说。

谈判似乎到此为止了。但是西田对我说：

“阁下是日本人吧！”

“是的，但你要明白我现在是八路军。”说完，我立即站起身来，准备要走。

“请留下，用了午餐再回去吧！”西田脸上的表情明朗起来，为了联络感情，他客气地挽留我们。

值班的军官在门口听见他们的长官决定要投降了，便把消息悄悄传给其他军官和士兵们。日本军队的士兵们有的在恸哭着；有的失神似地瞪着眼睛呆想着；有的兴奋地说着、笑着；还有的默不作声，不知他们是悲哀，还是高兴？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战争结束了，八年来的恐怖悲惨的战场生活结束了。他们大概都在想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

从胶州湾海边吹来的风，除了刮得军旗哗哗直响外，阵地前的旷野上，却肃静得听不到其它声音。四周是全副武装的军区主力部队。

排成纵队的日军士兵，迈着沉重的步伐，从阵地走出来，在一块平地中间排成整齐的队列。每个日本士兵都静静地笔直地站立着，他们的脖子仿佛支持不住头的重量，都低垂着头。他们把所有轻重武器，都集中放在队伍的前面。

以西田少佐、松本大尉、西村大尉为首的一队日军军官，走到平地的中央，向受降指挥员立正敬礼，接着把象征权力的日本军刀从身上解下来，双手平端着，交给受降的八路军指挥员。于是，西田代表日本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完字，他转过身去向全体日军发布命令。日军官兵们听到命令后都把武器放在地上。这时，只听见响起一片劈哩啪啦武器放在地上的声音。日军放下武器后，一齐向后转，随着一阵阵沉重的皮鞋声，他们灰溜溜地走了。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猖獗狂妄的生活。

有的日军军官，顽固不化，辜负了八路军、新四军、联盟员的一片好心，死不投降。有的勒令士兵与他一起自爆身亡，有的在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时，遭到伤亡或自杀。

联盟员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做了大量日军安置、转移工作。他们帮助集中日俘、安排日俘生活，进一步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揭露日本军部的侵略罪行。同时，在日俘中调查了日军暴行等等日军内部情况，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第二节 日本反战友人先后回国

冈野进、森健、梅田照文、山田一郎四人，从莫斯科回到东北后不久，经过朝鲜，在釜山坐船，于1946年1月3日到达日本九州博多湾，回到祖国。

日本工农学校成员，从延安向北，渡黄河，经张家口、承德，11月中旬到达东北地区的本溪湖。后来，应当时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民族部长李初犁的要求，他们中的半数，暂时留在东北，帮助

解决繁重的 80 万日本侨民、难民的生活、教育、遣返等问题。日本女同志原清志当时留在东北，担任了有关工作。

当时，他们又参与、协助赵安博负责的东北人民政府日本人管理委员会，出版日文报纸《民主新闻》等等。

1946 年 2 月，他们中一半左右的人，在朝鲜釜山坐上遣返船，于同月 12 日，在九州博多湾登陆，回到日本。

日本工农学校和解放联盟有一部分人，是在以后回国的，如杉本一夫等。有的则一直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辛勤地工作着，如小林清等。

第九章

国统区盟员的斗争和回国

第一节 国民党妄图战后利用 鹿地亘等反战人士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后，鹿地研究室根据形势决定：不介入中国的国内问题；日本反战人士、俘虏一个也不留在中国，全部复员、回国。这一决定，很快传达到鹿角场收容所的全体盟员。

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妄图在战后继续利用鹿地亘和研究室的其他日本人，为其服务。

在这之前，1945年4月，冈野进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建设战后日本的纲领性的报告《建设民主的日本》。在重庆各界议论这一报告时，政治部第二厅杜副厅长访问鹿地亘，表示他将提供军委会机关报《扫荡报》的全部版面，为鹿地亘发表批判冈野进报告的文章。鹿地亘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和冈野进一样，婉言予以拒绝。

日本投降后，政治部通过杜心如向鹿地亘表示：国民政府打算聘请他为顾问，留在南京工作。鹿地亘婉言回答：首先表示感

谢国民政府的盛意，说明自己是为了中日两国共同反侵略的目的来中国的。抗战结束后，他将回国，为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而努力。

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军政部、政治部、外交部等机关的特务，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鹿地研究室人员的对策。结果一致决定：秘密处死鹿地亘和研究室人员。这个决定汇报到陈诚那儿时，陈诚表示是他请鹿地亘来参加中国抗战的，他将送他顺利回到日本。因此，暗杀鹿地亘等人的阴谋没能付之实施。不久，陈诚身边的人传话给鹿地亘，请他多加防范。

鹿地研究室决定使全体同盟员优先回国。及川作了名册，共170人。当这名册送上去后，政治部的人暗地里生了气：反战同盟不经同意，竟在不合法状态下大量发展同盟员。

第二节 毛泽东会见鹿地亘夫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就急着发动内战，但其军队还远在大后方，尚需要一定时间进行部署。同时，渴望和平的国内外人士也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因此，美国就支持蒋介石搞和谈骗局。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逼中共做出重大让步，否则就将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于是国民党提出国共两党谈判，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去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乘飞机飞抵重庆，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双方代表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这使国民党承认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人民的某些基本权利，承认了要避免内战，两党合作，

共同建设新中国等协议。

9月14日，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他们由外交部友人杨觉勇陪同到国府路张治中的住宅（桂园）的会客室。

他们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百忙中的毛泽东就稳步来到会客室，和他们亲切握手、问好。

毛泽东说：“鹿地亘是文学家吧？”鹿地亘笑着说：“我是文学家，但我忘了文学，我是忘了文学的文学家。”他们之间的讲话，由杨觉勇作翻译。接着，鹿地亘大致地谈了国统区日本反战人士的艰难斗争：1939年建立了反战同盟，1941年基本上被解散。在镇远和鹿角场收容所的不合法的发展，现在有组织的反战同盟员，全在鹿角场收容所里。

毛泽东不断地点头，问：“那末，现在你手中，有多少日本同志？”

鹿地亘感到很为难，吞吞吐吐地说除了妻子、孩子，只有四个日本人。毛泽东大声说：“这很好，很了不起。请你们看重这四个人的力量。四个人是个小数目，但到时候，是会变成百万之众的。”

鹿地亘夫妇很有兴趣地看着毛泽东，听着他那有力的话语。当鹿地亘对毛泽东说的“到时候四个人可以变成百万人”的话表示不理解时，毛泽东用谈天的方式说：

“这是根据我们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30万党员。但我们在上海创立党时，人数是屈指可数的啊！”

他开始讲述中共的战斗历史：南昌起义，井冈山上竖红旗，江西苏维埃的斗争，两万五千里长征，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民族自卫的抗日战争……

他在鹿地亘夫妇面前，展开了洋洋的思想大河，河水在不断

地汹涌澎湃。

这些都不是新发生的事情，但随着他的言谈思绪，给鹿地巨夫妇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鲜感受。

毛泽东继续说：“人民的力量，是在不断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曲折，甚至倒退。因为人民事业是正义的，并且进行着越来越符合实际情况的斗争。它一定会成长壮大。要爱护干部。要带好这四个人。热爱他们这样一个整体。不断地积蓄、扩大，一定会飞跃发展成为百万人的。若没有这样的积蓄，到战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那时就非常被动、可惜了。所以要努力积蓄。不要失望。要有信心，继续自己的战斗。”

鹿地巨夫妇像吸入千钧重的言语。这是中共战斗几十年，成千万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重量啊！他们反省自己八年来的艰难斗争经历，更加体会到毛泽东这些话的正确。

鹿地巨说：“请毛泽东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深刻领会您的教导，把四个人带好，今后进一步去战斗、工作。”

毛泽东还讲了冈野进等已经离开延安，踏上回国的征途，去建设新的民主的日本。他祝愿鹿地巨夫妇身体健康，回国后多培养干部，为中日人民的友好合作，为日本人民的民主、幸福，做出更大的贡献。

鹿地巨夫妇十分激动地、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含泪告别。

第三节 盟员们回国

鹿地研究室为便于与各界人士联系，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在大田湾设立了联络事务所。半年后，因对外接待的需要，在重庆市内设立了接待所，开始在这里会见同盟员。经常来这里的有康

天顺。

康天顺是根据1945年9—10月间，国共两党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协定，和别的政治犯一起被释放的。释放后，他立即来到鹿地研究室，会见了鹿地亘夫妇和冯乃超，接着去郭沫若家，报告他被捕后的情况。

康天顺说：当时从镇远到贵阳，他一直坐在桶里面。到了重庆，先被关在南岸江边军统一个机关的地下室。它的拷问室在长江底下，上面有一个厚盖子，一拨盖子，长江水就冲下来。在那里，他得知他是作为“利用日本人反对蒋介石”的大罪被逮捕的。这是邹任之们为加强对镇远收容所的同盟员和其他日本人的控制，切断鹿地研究室与该所同盟组织的联系，精心炮制的一个阴谋。一戴上如此重罪的帽子，就可实行长期关押，拒绝任何人提出的释放以至探视的要求。

数天后，康天顺被转移到枣子垭的地下室，最后关押在青木关集中营。

在那些天天受恐怖、迫害的日子里，他肉体上虽受到折磨，但精神上却更加充实。他在青木关集中营，坚持学习英语，对转移到同室的日本人驹田信二、无故被关押的青年孟仲贤等，进行生活方面的帮助和思想上的教育。使他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孟仲贤是因看鲁迅著作，在1941年19岁时被捕的。1944年夏天，他担负为集中营买菜的任务，赶到青木关与赖家桥之间的上立场赶集时，秘密赶到赖家桥，把康天顺的信，送到鹿地研究室，这样才使鹿地亘夫妇、冯乃超、郭沫若等知道，康天顺被关在青木关集中营。郭沫若、鹿地亘等请孟仲贤给康天顺捎去慰问信、治疗他痔疮和补充营养的药品、其他的食品，以及他要的美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图书等。

郭沫若很快向有关方面要求释放被陷害的康天顺，但没有结果，连探视也不准。新任鹿角场收容所所长刘长裕，也希望康天顺回所工作，请求释放他，也没成功。

青木关集中营 150 位政治犯被释放的当天，康天顺、孟仲贤，拜会了郭沫若、冯乃超。晚上，鹿地研究室为他们举行慰问宴会。大家畅谈到天亮。在谈话中，他们两人发誓，从明天开始，要与以邹任之为首的宿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鹿地亘在听懂他们的意思后，说：为了几亿人民的和平、幸福，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以极大的气魄，与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革命者和人民的蒋介石握手，缔结了《双十协定》。我们个人的私愤，不必牢记心头。我们要考虑大局，为国家、人民的大事去奋斗。鹿地亘还说，列宁告诫我们：若是必要，也可以和恶魔握手。

善良的康天顺、孟仲贤，红着脸，频频点头。

过了一天，从青木关集中营释放的十几位难友，借重庆市两路口的宿舍招待鹿地亘。席间，大家热烈畅谈，发誓要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日两国人民的民主、幸福继续战斗。与会中一位被囚禁了 25 年的中学校长，大声笑着说：“我要大大感谢国民党，它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教育。它的‘恩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以后，我一定要不断报‘恩’。”

孟仲贤很快参加了组织民主同盟的工作。康天顺回到鹿角场，担任管理员。鹿地亘夫妇请他不要忘记与同盟组织联系，给予帮助。通过他，鹿地研究室与鹿角场收容所的同盟组织，得到了经常的联系。

停战后，国民政府才重新承认日本人反战组织，容许反战组织成员外出。所以，去鹿地接待所的，除康天顺外，有航空委员会特种收容所的日本人去找小林一加；鹿角场收容所的长谷川、渡边、青木、片桐、濑户、棚桥、长吉等也去了。他们是经康天顺

默许，以外出购买制造工艺品的原料的名义出来的。鹿地亘夫妇、及川、宗十郎等，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这是两年后的重逢。大家都议论回国的事情。

鹿地亘为了使国统区反战同盟的历史能够保留下来，教育和激励后世，秘密委托康天顺在收容所发动、组织有关同盟员回忆、整理、编写《军政部第二收容所八年的历史》。因这本资料是用毛笔在粗糙的黄土色纸上写的，通常称之为《毛边纸记录》。它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设立两个日本战俘收容所：在西安的称第一俘虏收容所，战争末期成了关押战俘的集中营；第二收容所最初设在湖南常德，后迁至镇远、重庆。在重庆近郊，还有关押所有轴心国侨民的小规模的收容所，内中有几个日本人。另外，在其他地方也有几个受隔离的日本人。

这份记录共分三大部分。第一篇是讲“从常德收容所到镇远、桂林收容所的合并”，第二篇是讲“从合并到四川省巴县收容所”，第三篇是“医务回忆录”。

第一篇执笔者：田中明。

第二篇执笔者：楠正雄。

第三篇执笔者：没有署名。

这是不少盟员分组回忆、讨论、研究写成的，是集体劳动的产物。

这本记录题为：《1945年在四川巴县和平村民志》。

这本珍贵资料，现由鹿地亘的后妻鹿地濑子保存着。

康天顺回收容所不久，就发现由顽固派支配的后舍俘虏们还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他通过鹿地亘借来了美国战略情报处的有关新闻照片，在收容所展出，才使后舍的人们确信日本已经投降。他们开始不再受顽固派的摆布，靠近日本民主革命工作队，思想很快有了觉悟。

在借照片时，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美国职员们表示想到收容所参观。刘长裕很快同意了。康天顺邀请鹿地研究室人员，同时去收容所参观。

一天，鹿地亘、及川和几位美国人一起去鹿角场收容所。一到那里，同盟员就认出了鹿地亘和及川，大家围了上来，一个个上前和他们拥抱。队长江见整理好队伍，向大家介绍了鹿地亘与美国友人，并致欢迎词。

康天顺、刘长裕很快赶来了，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回忆性的交谈。以松原为首的新同盟员带着鹿地亘、及川到后舍，见到了伊藤慎之助。鹿地亘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握着他的手说：“你们辛苦了。今天特意来看望你们。我们一定要一起回国，去创造和平、幸福的新日本。让我们一起干吧！”

伊藤慎之助这个一贯顽固的头目，紧握着鹿地亘的手，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对及川说：“我也和你们一起干！再也不要分开了。今后请多指教吧！”

在归途中，那几位美国人赞扬说：“你说的那些俘虏，确实不一样。他们是最可信赖的、必胜的部队。这都是大家亲自目睹的。”

1945年过去了。鹿地亘他们还是没有接到出发回国的消息。1946年3月，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友人们，为了促进政府早日允许鹿地亘他们回国，计划召开以促成鹿地亘夫妇及其他日本反战同志早日归国的欢送大会。在开会前，3月14日，陈诚招待鹿地亘夫妇，进行慰问，听取他们的要求。鹿地亘希望早日回国，请求陈诚能给予方便。陈诚当即答应，并且命令副官预订了鹿地亘全家人和四位研究人员去上海的飞机票。

鹿地亘接着说：“在回国的时候，我就没有顾虑地讲话了。”同时拿出研究室准备好的反战同盟全体盟员的名册，请求安排他们“优先归国”。陈诚说：“这件事，我可以办到。”

结果，示威的欢送大会，变成了实际的欢送大会。在郭沫若筹划下，3月15日，重庆市24个民间团体，联合举行盛大的欢送会。青年联谊会赠送了一面红旗，上有题词：

为打倒法西斯团结战斗

为争取民主要永远合作

3月16日，国民政府设宴欢送鹿地亘夫妇。接着，驻重庆中共代表团，设宴欢送鹿地亘夫妇和研究室全体人员。3月18日，他们乘飞机，离开重庆去上海。

在上海，他们被迫停留了一个月。驻东京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在日本选举前，给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来密电，建议鹿地亘等暂缓回国。直到5月7日，他们才回到日本。鹿地亘找到野坂参三（冈野进），恢复了日共党籍，请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5月17日，鹿地亘在门司车站，与回国的170位同盟员汇合。在去东京的火车上，长谷川、秋山、江见三人作了有关报告，使鹿地亘知道他们是在他动身不久，就乘船经武汉到达上海的。一路上由康天顺护送，直到他们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于5月13日在日本福岡登陆。

康天顺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后，参加了南京附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他把有宿命论味道的名字改了，“天”字去了一横，“顺”字去了右边的“页”字，变成了“大川”，表示要像大河一样，不怕任何困难险阻，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这位康大川，现任《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如今还经常接待日本友人，去日本参加有关活动。

在长谷川等报告后，鹿地亘讲了今后的工作意见。他说：我们战斗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和平、民主的日本。我们今后的任务，更加重大、艰巨。反战同盟八年的历史，表明我们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我们要回到人民中去。全体队员要投入国民斗争

的行列。在重建和平、民主日本的工作中，带动别人，一起前进。我们在东京保留联络总部，各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全体队员赞成这个意见。由回东京的队员，组成联络总部。每个相应的地方，成立一个班。各班很快决定了回家乡后的工作任务。随着列车的东行，他们作为民主的种子，撒向日本的四面八方。他们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日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成了战后日本的一支进步力量。

本编小结

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日益接近最终失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团体面临着新的更大的任务。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反战同盟基础上的创立，要求在华、在世界各地的日本人，联合起来，为早日打倒日本军部，建立一个和平、民主、人民的新日本而奋斗。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在晋西北、山东、华中的三个分校，更加有效地进行了解放联盟干部的训练、培养工作，为战后的日本，提供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为进步事业奋斗的干部。

在解放联盟总部领导下，联盟员配合八路军、新四军，进一步做好反战工作，瓦解日军斗志。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后，他们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日军中做好劝降、受降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新的贡献。

国统区日人反战活动开始增多。鹿地研究室的工作，进一步引起各界，特别是美国有关人士的兴趣。和平村训练班转移到重庆巴县鹿角场后，改名为和平村民主革命工作队。他们在解放联盟的影响下，加紧学习，为归国后即将面临的新工作，积极进行

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抗日军民的大力支持下，解放联盟一千多位国际主义战友，在胜利完成他们的伟大反战任务后，先后在1946年上半年，回到祖国日本，去进行伟大艰巨的建设新日本的工作。

本书结束语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民也开始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在国内，由于受到日本政府有计划的、长期的、反复的残酷镇压和分化瓦解，总的来说，日渐处于分散的软弱状态。这个运动的重心，逐步转移到了中国战场。

1939年11月，在中国解放区的日本士兵中觉醒联盟的建立，标志着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有纲领、有组织、战斗力不断增强的反战斗争的新时期。接着，国统区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及其总部的成立，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和解放区其他支部的成立，在中国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呈现出一幅史无前例的、宏伟壮观的、燃烧着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烈火的画卷。这一斗争，贯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始终，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向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呈交无条件投降书。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和中国抗日军民，并肩战斗，挥汗流血，几十位盟员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业，做出了重大的特殊的贡献。有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中国解放战争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如绿川英子、坂本贤阶等。有的至今还在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小林清、山崎宏、原志清等。

日本在华反战团体成员，最多时达 1200 多人。他们了解日军士兵的语言、思想、风俗习惯，熟悉日军内部的种种矛盾情况。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方法，去接触日军士兵，进行反战活动，收到中国军民无法取代的效果。他们使日军士兵更加思亲厌战，经常发生拒绝命令，反抗长官事件，不断增多的自杀、逃跑、向中国人民军队投诚事件，导致在华日军战斗力的不断削弱。日军侵华战争的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中在华日人反战团体的努力工作和战斗，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人民国内外的反战斗争，汇成了一个整体。在华日人的反战斗争，对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是个很大的支援。在困境中进行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日本国内人民，从各个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关于在华日人反战斗争的信息、传单、文章、报刊，都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励。特别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它关于停止战争、打倒战争独裁政府、实行人民民主、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张，使日本国内人民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伟大任务和光明前途，极大地鼓舞着他们进一步展开全面深入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当时，在国内狱中的日共中央领导人决定，派冈田文吉到延安与冈野进取得联系，协调在国内外重建日共党组织，加强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为战后的日本准备了强大的进步力量。在中国解放区，在中国国统区，反战团体成员都长期深入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受到人民民主的政治教育，不少人经受了与敌人战斗的生死考验，成长为革命战士，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回国后，成为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日本的先进部队。他们中的很多人，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成了日本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他们坚持日本

人民阵线的方针，坚持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反对在日建立美军基地的斗争。他们一直坚持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滔天罪行及其对日本人民的严重危害，率领人民反对军国主义在日本抬头，反对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他们组织了纪念在中国解放区生活的日日夜夜的“八四友会”^①等，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为加强中日人民的友好合作而不懈努力。

回顾五十年前日本人民的反战争，特别是在中国解放区、国统区的日本人的反战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可贵的启示。

第一，中国解放区日人反战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办得吸引世人注目，证明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所坚持的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的俘虏政策的正确。

第二，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开展和胜利，又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日本人民、日本士兵，同样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和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和一致的根本利益。被侵略国人民和侵略国人民结成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这是最终打倒侵略者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日本人民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相结合，终于致日本这头到处乱闯的侵略野牛于死地。这一用中日两国人民的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要尽可能地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三，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历史表明，政治思想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要进行反侵略战争，并取得胜利，必须使本国人民树立起战争是正义的、它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并且使侵略国

^① 以八路军、新四军的第一字命名。

人民和官兵，树立起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应败、必败的意识。中国人民和在华日本反战斗士，积极运用了正义战争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法宝的威力，全面彻底地揭露了日本军部对日本人民、官兵的欺骗宣传，使他们逐步觉醒，站到了日本军部的对立面，从而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政治、军事危机，使日本军部在军事、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遭到彻底的失败。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全过程，深刻地启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必须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我党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大威力。

回顾五十年前那几千个日日夜夜严峻、火热的斗争历史，使我们深切地感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人的反战运动，是中国人民军队敌工工作培育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抗战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中日两国人民精诚团结、友好合作绽出的一束瑰丽的樱花，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令人惊异和衷心叹服的奇迹！

回顾那段历史，使我们进一步深信：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有少数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蒙蔽群众，制造战争阴云，也终究是暂时现象，不会长久得逞的。人民正义事业的洪流，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阻力，一定会冲溃逆流，奔腾向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闭目塞听、不顾事实、矢口否认对中国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侵略战争，甚至重做向外侵略美梦的一小撮狂人，必将被人民的历史巨轮碾得粉碎！

在华日人的反战斗争，永存史册！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事业，必将世代相传，与日月同辉！

附录

日本人民反战斗争大事记

1930年

11月 川合贞吉等在上海成立日中斗争同盟，展开反对侵华的活动。

1931年

9月18日 日本军部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

9月19日 日本共产党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1932年

1月29日 日军进攻上海时，有200名士兵拒绝执行进攻命令，被押回日本。

2月9日 东京明治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战示威游行。

7月15日 日共创办了以陆海军士兵为对象的反战报纸《士兵之友》。

1933年

3月30日 日本关东军运输队士兵伊田助男（日共党员），为给中国抗日救国军送去一卡车子弹，英勇牺牲。

5月26日 《赤旗报》发表社论：《反对掠夺华北，组织群众性的反战活动》。

6月 由关东劳动组合协议会提议，在关东成立了反纳粹、粉碎法西斯同盟。

8月 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等，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成立大会。

1935年

2月10日 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山本悬藏在莫斯科联名发表《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日共党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组织和群众，反对军部发动的侵华战争。

1936年

1月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秘密来到上海，受到鲁迅等的欢迎。

同年 鹿地亘在上海结识青山和夫。

1937年

1月19日 绿川英子到达上海。

6月 绿川英子参加上海人民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的游行。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

9日 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出现大批反战标语。

9月5日 东方弱小民族联盟沪支社发表《告日本士兵书》，号召进攻上海的日军士兵，反对法西斯侵华战争。

25日 中共中央发表《告日本海陆空军宣言》，号召日本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部。

10月25日 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阐明中共优待日本战俘、瓦解敌军的政策。

1938年

2月14日 日本共产主义者团发表反战檄文。

4月1日 在郭沫若帮助下，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到达汉口，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七处的对敌宣传工作。

6月 在郭沫若帮助下，日本反战作家绿川英子到达武汉，在国民党中央电台作广播员。

1938年 鹿地亘在国统区发表《日本文化在监狱中》一文，指出日本文化已被军部所控制、利用。

1938年 日军小队长石川次郎，在与太湖地区中国游击队作战时，率领全小队士兵向中国游击队投诚。

1937、1938年 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人，经常向我五战区情报科传递重要军情。

6月 我东北抗日联军袭击集安土口子铁路工区时，在日本工人福间一夫再三坚决要求下，同意他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其后在与日军作战时，福间一夫壮烈牺牲。

7月19日 在法比瑞同学会举行了欢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国阿特丽女士的会议。绿川英子用世界语发言：“我希望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0月上、中旬 鹿地亘在刘舜生、廖体仁陪同下，视察了常德战俘收容所。

12月 鹿地亘在冯乃超等协助下，在桂林制定了创办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计划。

1939年

1月2日 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总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庆祝新年的集会上，日本士兵杉本一夫等三人宣誓加入八路军。

3月 日反战分子投弹大阪陆军兵器厂，引起大火。

3、4月 冯乃超、鹿地亘在桂林，给国民党军青年军官办短期日语训练班，讲授以反战为内容的日语。

4月 冯乃超、鹿地亘去衡山南岳国民党游击干部训练班，讲授日本问题。在会见周恩来、叶剑英时，商谈了准备创建日本人反战同盟问题。

5月 蒋介石批准了反战同盟计划书。为了研究计划的具体实施，郭沫若请鹿地亘、冯乃超飞抵重庆。在郭沫若处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6月 湖北增城日军司令部发生反战斗争。

6月 武汉日军500多名官兵发生哗变。

12月23日 在冯乃超协助下，鹿地亘在桂林领导、建立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西南支部。

12月25日 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前线工作队离开桂林，去昆仑关前线开展反战活动。

1940年

2月3日 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大会上，日本士兵田畑作造、香河正男、后藤勇、滨中政志宣誓加入新四军。

3月25日 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野坂参三）秘密从莫斯科到达处延安。

3月29日 重庆反战同盟总部成立。

4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从日军俘虏中，选择少数进步分子，予以训练。

3月至6月 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等地演出日语反战话剧《三兄弟》。

5月1日 在延安，根据林哲（冈野进）建议，在王学文具体协助下，森健、高山进等三人，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6月2日 觉醒联盟山东支部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成立。

6月23日 觉醒联盟第一支部（太行支部）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成立。

7月20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总部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

9月27日 反战同盟总部组成工作队，由鹿地亘率领去宣

昌前线展开反战活动。

10月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开始正式上课。

12月14日 根据对方日军代表建议，工作队以反战同盟总部名义，代表当地中国军队与之进行战场停战谈判。

1941年

2月23日 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成立。

3月16日 在邹任之、青山和夫等人的策动下，发生了以总部成仓进为首的8名同盟员逃亡事件。

5月4日 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

5月15日 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朱德等到会勉励学员。

7月20日 郭沫若发表《纪念日本人反战同盟成立一周年》一文。

7月21日 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成立。

8月7日 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

8月15日 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成立。

8月23日 张治中签署解散反战同盟命令。

9月6日 反战同盟总部、西南支部成员到达镇远第二收容所，他们成立了和平村训练班，以秘密展开反战同盟活动。

9月18日 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

10月初 日本工农学校全体人员，参加了延安东南区专门学校选举区选举边区参议员的活动。

10月26—30日 日本工农学校森健、原清志等五人，代表日本民族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学校35名学员，在会上宣誓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当即表示热忱欢迎。

11月11日 在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成

立。

11月22日 日本工农学校召开大会，庆祝森健被特别批准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2月底 日本工农学校中小静路夫当选为延安市参议员。

12月13日 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召开全体大会，发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战争宣言》。

12月15日 鹿地亘、绿川英子、池田幸子、青山和夫，就日本法西斯挑起太平洋战争，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兄弟们，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

12月31日 同盟员组成赴新加坡工作队。后因国民党特务阻挠，未能成行。

1942年

1月20日 八路军总部、野战军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对逃到根据地来避战的日军官兵、家属，应以国际友人看待；对逃来的日本随军记者、知识分子等应优待礼遇。

2月17日 延安的留日同学会，邀请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们出席联欢会。

3月15日 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

4月 觉醒联盟太岳支部成立。

夏 日本日立制造公司的龟有工厂工人，公开举行有组织的怠工，使产量大为下降。

6月12日 赵安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蜕变》一文，介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们的进步。

6月23日 在延安，林哲创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7月15日 反战同盟苏北支部成立。

8月初 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开始筹建、上课。

8月15日—29日 在延安，同时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

会和日本人反战团体华北大会。会上，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日本人反战团体华北大会决定华北的日人组织——反战同盟与觉醒联盟——合并，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讨论并通过了《华北联合会工作方针书》。

9月18日 反战同盟清河支部成立。

9月 反战同盟晋西北支部成立。

10月 反战同盟淮北支部成立。

10月 美国战略情报局《日本新闻》编辑部主任富卡，聘请鹿地亘担任该刊编辑部顾问。

11月 反战同盟滨海支部成立。

11月 反战同盟淮南支部成立。

同年 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成立。

同年 有一批毕业学员前往晋东南、胶东等地前线工作，以毕业学员小林为首的日军工作团，前往晋西北前线。

1943年

3月31日 反战同盟晋冀鲁豫地区协议会成立。

春 坂本贤阶在为在中国浙东游击总队英勇大队做了大量工作后，主动投奔了该队。

5月14日 反战同盟华中地方协议会成立。

5月18日 反战同盟鲁南支部成立。

5月31日 冈野进在延安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公开露面。

7月7日 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开学，茂田江纯任校长。

7月10日 冈野进公开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身份。

7月 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暂时并入晋察冀支部。

7月30日 反战同盟山东地区协议会成立。

8月 日本一批新兵和负伤治愈的老兵被押往神户港，送去南洋作战时，送行士兵的母亲、妻子阻止驾驶员登船，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

8月8日 日本工农学校自卫军正式组成，编为一个大队。

10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的长篇报道。

同年 这一年，日本平均每天发生一起影响较大的反战事件。

同年 在冀中，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独立步兵第32大队第1中队，一小队长命令士兵向被包围的八路军进攻，该小队士兵拒绝冲锋，把枪口转向小队长，使八路军突围出去。

同年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泽西村、中岛，被选为学校劳动英雄。新以久男被选为学校的特等劳动英雄。

12月30日 鹿地亘等人，带着反战同盟干部山川腰、山野井、宗十郎三人，一起离开镇远收容所，到重庆鹿地研究室工作。

1944年

1月11日 反战同盟清河支部，随所在军区改名为渤海支部。

1月 鹿地亘根据冈野进的建议，在重庆提出了在国统区和美国等地建立日本民族解放同盟的草案。

2月7日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执委会发表《要求全体盟员参加防奸斗争，粉碎敌军部特务政策的声明》。

2月9日 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执委会通过决议，在反战同盟各支部设立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

1月15日—2月15日 在延安举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叶剑英对包括学员们在内的日本反战士说：“现在日本军部非常害怕，把各位的力量，

看成等于几个师。”2月20日，会议决定把反战同盟发展、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2月 工农学校学员与延安周围的农民，互相邀请，参加新春宴会活动。

4月9日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

春 由于鹿地亘等的教育和争取，使政治部同意原日本空军大尉堂国加入鹿地研究室工作。

6月6日 解放联盟淮南支部并入淮北支部。

6月8日 在日本工农学校举行的日军暴行座谈会记录：《我们目睹的日本军部的野兽面目》长文，在《解放日报》发表。

6月中旬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日本工农学校等地。

8月12日 解放联盟、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大会，欢迎美军观察组。

8月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等，在延安公演反战日语话剧《岛田上等兵》。毛泽东看后说：“内容丰富，演技高超。”

11月2日 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举行开学典礼。

12月6日 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成立。

12月12日—16日 日本工农学校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举办日本问题展览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前去观看，并留言称赞。

下半年 绿川英子在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任编辑。

1943、1944年 和平村训练班通过召开座谈会，写出有价值的报告150篇，送重庆鹿地研究室、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1944年 解放联盟苏浙支部成立。

1945年

1月6、7日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春田、大坂、光江田，被

该校评为学习模范。

4月26日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冈野进发表演说，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

5月4日 解放联盟冀东支部成立。

5月11日 国统区和平先锋之友会，改名为和平村民主革命工作队（即原和平村训练班）。

6月25日 解放联盟华南支部成立。

7月4日 中国民主党派代表黄炎培等参观日本工农学校，对学员的学习和工作十分赞赏。

7月 绿川英子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出版。

7月 国统区反战同盟已有盟员（即和平村民主革命工作队队员）170名。

8月11日 解放联盟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发出通电，号召侵华日军士兵投降八路军、新四军。

8月14日 冈野进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代表的名义，发布通告，命令日军官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8月15日 日本军部无条件投降。

8月18日前 毛泽东为冈野进、森健、梅田照文、山田一郎四人举行欢送宴会。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参加。

8月30日 解放联盟、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告别延安、出发回国纪念大会。叶剑英代表八路军致词欢送，希望发扬中日两国人民的珍贵友谊。

8月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到日本工农学校，欢送日本同志返回祖国，衷心期望今后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

8月 日本工农学校，从1940年11月到1945年8月前，共有200多位毕业学员，奔赴前线工作。

9月2日 日本政府签订无条件投降书。

9月8日 冈野进、森健、梅田照文、山田一郎四人，乘飞机离开延安去我国东北地区。

9月14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接见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鼓励他们更好地培养干部，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

9月18日 日本工农学校200多名教、职、学员，步行离开延安北上。

1946年

1月3日 冈野进等四人乘船到日本九州博多湾，回归祖国。

2月12日 日本工农学校教、职、学员100多人，应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邀请，暂留东北帮助工作；另100人坐船回日本。

5月17日 在日本，开往东京的列车上，由鹿地亘主持，举行了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解散大会。

后 记

本书是作者三十多年来悉心研究本课题的一个主要成果。它从各个方面,比较完整、系统地论述了1931—1945年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在研究、写作本书过程中,承蒙已故的王震、邓颖超、郭沫若、李初梨、野坂参三、鹿地亘给予指教;赵安博、吉积清(即森健)给予指导;康大川、刘建业、罗焕章,中共中央联络部有关负责同志,审阅过本书并对部分章节,给予指正;杨正光审阅了全书,作了序;上述有关同志和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若没有上述领导同志、专家、日本友人和有关单位鼎力相助,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北京出版社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衷心感谢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这三级党委、政协的关怀和指导!

孙小明同志帮助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并写作了部分章节。

欢迎读者对书中不妥之处予以批评、指正。

孙金科

1994年9月2日

